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反攻大陆”密谋透析



“反攻大陆”密谋透析

第一章

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要求派兵参战，同时在中国东南沿海开辟战场牵制解放军，并借机窜犯大陆

第一节 整训“反攻”武力

末路枭雄的悲怀

这是1950年元旦，蒋介石并没有在台北欢度新年。已经覆亡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年前12月7日就迁到台北市，旧时的总督府插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挂出“总统府”的牌子，却没有“政府”首脑。“有国无君”（实际“无国无君”）的局面，已经好长时间了。眼下李“代总统”在纽约割治十二指肠，滞留不返。台湾实际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这时正与蒋经国隐居在台湾中部日月潭的涵碧楼，寄情于山水之间，“兴叹英雄末路的悲怀”。

除夕日，蒋经国陪蒋介石荡舟日月潭，借垂钓聊以解愁。老人孤舟，随波逐流。蒋经国望着须发已斑白（蒋虽不蓄须发，但也能辨出黑白）的父亲，不禁悲从心头起。

这时，蒋介石握着的鱼竿猛一颤，鱼线紧绷，蒋连忙收竿，一条约5尺长的大鱼，无可奈何地跃出水面。

划船的人献媚地说：“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

“好！好！”愁眉苦脸的蒋介石微微露出笑容，蒋介石一生迷信，除夕得大鱼，岂不正应“年年有余”的好兆头，1950年会是时来运转的。

元旦这天，蒋介石去教堂，做完祈祷，回到寓所，筹划应付对即将来临的形势的对策。新华社的广播，是一定要听的，尤其是重要的社论、时评等。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庄严重申：“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立场、态度，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美国如何对待台湾，是蒋介石最关心的，视为生死存亡的关键。

华盛顿数度集会，反复讨论国民党政权能否得救的可行性。会议分为两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日本将受威胁。于是他强烈主张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蒋介石防守台澎。这代表美国的所谓“鹰派”的典型意见。国务卿艾奇逊予以驳斥，他说，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从头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所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就已经看出美国民主党政府对蒋已感绝望，在这份美国的外交文件中，“蒋介石”三字，已成为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独裁、专制的代名词。艾奇逊有意将蒋介石说成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还进一层说，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

杜鲁门总统作最后裁决，他支持艾奇逊的见解，于是拍板定案。对这件事，有舆论说，杜鲁门这个脾气倔犟的密苏里老农，还在忌恨两党竞选时，蒋介石以金钱支援杜威，现在他仍在泄私愤。事实上，杜鲁门不能公然以武力侵占台湾，是慑于美国及世界人民的反对，因这时尚找不出任何侵略的借口。

1950年1月4日，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将美国对台湾的意见，公开诉之于众。杜鲁门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政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

军队。”

美国同时宣布，自台湾撤走侨民，美国留驻台湾的，只剩一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看来杜鲁门存心坐视蒋介石“自生自灭”了。更使蒋介石感到不安的消息，就是美国国务院里的苏联问题专家们（蒋介石将这些人说成是“亲共分子”），再度推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人说服杜鲁门的理由是，再延迟与中国建交，只有利于苏联，使毛泽东更靠近斯大林，而危害到美国的远东利益。

新年伊始，台湾便笼罩着很浓的失败气氛。美国公开抛弃台湾，传及世界每个角落，蒋介石虽严命台湾报刊不许走露半点消息，但人们还是从各种迹象上感觉到了这一点。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蒋介石能在台湾呆一年以上。高官富贾，开始溜之大吉。只有宋美龄，在逗留美国数年后，不愿再受杜鲁门的冷漠鄙夷，于1月19日默然回到“孤岛”，帮助丈夫“保卫大台湾”。

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他在台湾恢复“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蒋介石反思“介寿馆”

蒋介石复位后，每天清晨6时，台北介寿路准时响起“中华民国国歌”，青天白日满天红之旗徐徐升起。

那里是“总统府”的所在地。路名为“介寿路”，是纪念蒋介石60诞辰时取的。“总统府”原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改称“介寿馆”，复任“总统”的蒋介石，就在“介寿馆”3楼办公。

这一天，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忽然出现一本不平凡的书，书名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乃海峡彼岸他的政敌毛泽东。

毛泽东此书写于1936年12月。在它的千千万万的读者之中，蒋介石是最特殊而读了最有体会的一位。因为毛泽东此书所写的，就是如何打败蒋介石的战略问题。当年，蒋介石就翻过这本书，无奈，他正忙于跟毛泽东打仗，心静不下来。如今，他是败军之将，正在作沉痛的反思。读毛泽东此书，使他感慨万分。他这才明白，毛泽东确实是一位熟知战争规律的战略家。毛泽东正是用这些战略战胜了他。

毛泽东写道：“弱军对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可不是吗？毛泽东经常用的就是这一手。

毛泽东又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解释……一切的‘走’都为着‘打’。”

毛泽东也常用这一手。

最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的是毛泽东书中的一段话：“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蒋介石不正是毛泽东所说的蠢人吗？

蒋介石此时此际，认识到自己在发动内战之初所实行的“速战速决”、“全面进攻”犯了战略性的错误。蒋介石认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军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蒋介石总结了4条“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

第一、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共党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

第二、是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

第三、是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

第四、是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

蒋介石反思了自己的军队，还总结了高级将领们的 8 大缺点。

他认为，他的军队成了“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六无”军队，军人也成了“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六无”军人。

由此，蒋介石得出结论：“非失败不可”。

成立军官训练团

1950 年 5 月 21 日，经过一段时间的紧锣密鼓的准备，“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又称“圆山军官训练团”）在台北大直营地成立。蒋介石亲自担任团长，彭孟緝为主任，曹士澄为副主任。“复职”不久的蒋介石，亲自出席开学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

“这次的军事训练比以前的任何一次训练都重要，而且，今后我们国家的存亡，个人的成败与荣辱，都要以这一次的训练来决定。”

蒋介石认为，这次训练除了精神训练外，其他则侧重在陆海空军联合作战。他解释：

“过去在大陆的时候，我们有 400 万以上的军队，当时共军在东北与华北最多只有三四十万人，比较起来我们的兵力要大过他们 10 倍以上，但为什么我们反而被他们打败呢？最大的原因是我们平时不注意联合作战的教育，各兵种与军种之间，没有同仇敌忾生死与共的精神，以致被共军各个击破。”

蒋介石强调，从八年抗战到三年内战，“国军”伤亡很多，军官替换过快。因为忙于作战无暇学习的缘故，来台的“国军”骨干不但缺少基础能力，而且欠缺协同作战的能力，即使是高级指挥官等也都欠缺这方面的能力。

蒋介石还说，这次训练，聘请的是日本教官，受训者不但要学习指挥技能和战术运用，甚至连他们的精神状态、行动、语言都要留心学习，视为模范。

重用日本战犯图谋“反攻”

被蒋介石重用的日籍教官是何许人？他们是怎样来台“重整国民政府军”的？这段史实在台湾军方一直被列为头等机密，从未对外公开。

1995 年 10 月 29 日到 11 月 1 日，台湾《中国时报》在题为《“白团”——战后日军在台报恩的一段秘辛》连载中，首次披露了这段肮脏的历史。

故事的主轴，开始于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大陆。1945 年 8 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过八年的含辛茹苦、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停战诏书”，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根据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部划分的受降分工，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是北纬 16 度以北地区，包括中国大陆、越南北部、台湾、香港和海南岛等岛屿。后来因香港为英国殖民地，临时又通知划归英军受降。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中国战区的受降主

官。因此，何应钦领导并主持了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整个活动，尤其是亲自主持了南京的接受日军投降典礼。

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投降过程，是按三个步骤进行的。一是芷江洽降；二是南京投降；三是全国按 16 个受降区分别投降。

芷江是湖南西部的一个军事重镇，是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距日本侵略军最近的前线指挥所之一。这里设有较好的机场和通讯设备，是中美空军的重要基地，因此被选中作为与侵华日军洽降的地点。8 月 20 日前，何应钦与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以及各地受降主官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等陆续抵达芷江，数十名中外记者亦云集这个湘西小山城。

8 月 21 日，根据中国政府的指令，日军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受司令官冈村宁次派遣，乘日军用飞机 1 架，到芷江洽谈投降事宜。中国空军派出 6 架 P—51 战斗机，在指定日军飞机飞行路线上空来回巡逻，负责监视和指导洽降日机的飞行。中午 12 时，机尾挂有我方指定红布标志的日机，在中国战斗机监护下抵达芷江机场上空，随即绕场飞行一周，以示向中国军民致礼。飞机降落后，今井武夫等由中方联络官引导，乘坐两辆悬挂白旗的吉普车离开机场。在机场数千名中外军民欢呼胜利声中，今井武夫一伙脸色惨白，汗流如注。很多美军官兵激动得撕下日机机尾所挂标志布条，珍藏起来留作胜利纪念。

次日，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及美军代表麦克鲁准将接受日军代表的洽降。日军洽降代表呈递了日军在华驻军的有关资料，中方代表宣读了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备忘录。

在中日两国八年争战中，日军曾经在中国大陆屠杀过无数的中国人。8 月 15 日，在中国的日军从广播中听到天皇无条件投降的命令，8 月 16 日，蒋介石就立刻电告冈村宁次，要他继续坚守岗位，并且负责维持秩序，把所有武器装备移交给重庆国民党军队，若遇到“不法扰乱者，还可自卫反击”。两天后，冈村给在华日军下达了一份《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再三叮咛要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

8 月 27 日，中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奉何应钦之命，率部分人员至南京设立前进指挥部，具体指挥中国军队进驻南京和筹划受降大典。

9 月 8 日中午 12 时，何应钦所乘专机，在数十架战斗机护卫下，由芷江抵达南京，以盟军与中国政府受降主官的名义，参加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的典礼。

受降大典特别选定了 9 月 9 日上午 9 时，即所谓“三九良辰”，地点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南京黄埔路原中央军校礼堂）。是日，军校门口高竖松柏扎的大牌坊，牌坊顶端有一英文“V”字，两边中美英苏 4 面国旗迎风飘扬，下面横幅写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12 个大字。进入礼堂，会场布置成一个正方形，四周墙上环以白绸，悬挂着中美英苏 4 大国的国旗，正中饰以英文“V”字和中文“和平”两字。坐北朝南设受降代表席，置长形宽条桌案，后置皮垫靠椅 5 把；面对受降代表席置一窄小长案，木椅数把，为投降代表席。

8 时 56 分，受降主官入座。带头的正是中国受降最高长官——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他身着军礼服，肩挎武装带，左佩短剑，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地进入会场。这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时刻。依次是受降官陆军上将顾祝同、海军上将陈绍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空军代表张廷孟。其左侧为中国高级

将领和记者席，右侧为盟国军官及外国记者席。

受降仪式由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主持。接近9时，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率正副参谋长等投降代表，乘坐汽车，由中国武装士兵押送，穿过扎有“和平永奠”、“胜利和平”等金色标语的牌楼，来到受降会场。车到大门口，冈村宁次等依次下车，倾从地解下所佩军刀，以示解除了武装，一个个用手端着军帽，低垂着头走进会场。依次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日军驻台湾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日军驻印度支那第三十八军参谋长三泽吕雄大佐，以及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和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冈村宁次进入会场时虽然低垂着头，两眼却频频偷看何应钦，无法掩饰内心的不安。

日军投降代表进入会场后，由中方联络官引导，一字排开站在投降席前，立正敬礼，然后在木椅上坐下。

仪式开始，冈村宁次起立，出示受权投降的证明书。降书内容9点，内称：“自此以后，日本陆、海、空军当即服从蒋委员长之节制，并接受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颁发之命令。”降书由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连同日军的编制、人数、武器装备、驻地分布等清册，一并双手捧给何的参谋长萧毅肃中将。萧用一只手接过，交何应钦审阅。阅毕证明后，萧毅肃即取出投降书两册，小林浅三郎急趋前敬礼，领取后交由冈村宁次用毛笔签字并盖章。然后向前数步，两腿立正，弯着腰，低着头，双手将降书捧送何应钦。何应钦微带笑容，起立用双手接过降书，随即命令冈村宁次按规定将日军集中，分别向盟国驻军办理投降手续。冈村宁次回答：“我完全接受这个命令。”受降仪式结束，又按入场时的顺序将冈村宁次等降将押走。

签字投降的第二天清晨，何应钦召见冈村宁次。冈村一见面就说：“日本已经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地携手合作。”何应钦说：“我们一同努力做吧！”这时的合作，指的就是一同对付与国民党争夺受降权的中国共产党。

日本投降后，东京大本营曾经以正式指令致电冈村宁次：“此际莫如将红色势力引进中国本土，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亚之混乱，日本便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倒是符合作为战败者统治集团在当时的报复心态。但没想到冈村宁次断然拒大本营的主张，反而以一贯的反共立场与国民党政府一同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

从抗日战争结束之日起，一场微妙的蒋日关系便悄悄上演。何应钦后来回忆说：“在蒋总统以德报怨的指示之下，中国曾经在短短几个月内，大量动员国内仅有的交通工具，共遣返在华日本军民达200万以上。而为了减少他们回家后的生活困难，更允许每人携带行李30公斤。”据同样负责此业务的曹士澄指出，当时在东三省的关东军有很多被抓到西伯利亚做苦工，英国也估计他们国境内的日军需要4年半的时间来遣返，而中国，却在10个月内遣返日侨达235万人。如果以美方估算，这项工作本来要7年才能完成。

“以德报怨”日军心存感激

此外，蒋介石还在开罗会议上力主保留天皇制度。二次大战后的胜利国如菲律宾等要求日本赔款，蒋介石则以那将造成日本贫困而使共产党坐大，因此不要日本赔款；原来各国还打算让美国在北海道、英国在广岛、中国在

名古屋等地划分军事势力范围，但是蒋介石坚持不派兵，同时也要求其他各国不派兵，以保持日本的领土完整。

有一件事，日本军人心里深深感激，就是按照国际惯例，战败国家应缴械，军官与士兵将被分别拘留，分开受战俘的待遇。

一般情形都是如此。但是国民党政府却不是这样对待日本人。冈村宁次很感激地向何应钦说：“我们打了败仗，但是中国派遣军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没有武装的军人。”

当时，美军顾问团曾经反对中国将派遣军的指挥权交给冈村宁次，但何应钦反驳说：“虽然冈村宁次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战争一旦结束，他却是一位可靠的朋友。”而令冈村宁次内心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最后得以在国民党政府的全力保护下“无罪释放”。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日本军阀造成中国军民伤亡 3500 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 5600 余亿美元。二战结束后，冈村宁次因从 1944 年 11 月 26 日起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而被列为被告。

但最后，冈村却出乎意料之外地获得“无罪释放”。负责审判战犯的审判长石美瑜在判决书上说：“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的事，与被告无涉。”

当时同被列为战犯的共有 149 人被判死刑，而身为中国派遣军最高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却获判无罪。

石美瑜念完判决书后，法庭内全场哗然。石美瑜拒绝回答现场人士的质问，立刻宣布退庭。随后，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声明中提到：“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对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政府擅自宣判无罪。”

当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逮捕冈村宁次，但是，时任松沪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却将命令扣押不发。

1949 年 1 月 30 日凌晨，美籍轮船“维克斯号”悄悄停泊在黄浦港边，没有人知道冈村宁次已经在船上躲了一天了。那时的上海街道上到处贴着“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上午 10 时，“维克斯号”终于驶离上海黄浦港，冈村终于可以回到他阔别 7 年的家乡了。当年他以大将的荣耀出征到中国，最后却是在一片声讨声中溜回国。这艘船在 2 月 3 日夜里驶进横滨港，这时的冈村已经 65 岁了，而且身体不是太好，还得了肺病。

战犯处理工作告一段落后，解放战争的局势出现了国民党一再退守的局面。到了 1949 年 4 月人民解放军渡江，5 月上海解放，国民党政府被迫迁到广州，大陆上只剩下西南、两广及闽南一带地区。而政治方面，蒋介石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并派出代表团前往北平和谈。在情况混乱中，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迁居来台湾，当时台湾隶属陈诚的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管辖，陈诚的部队防守闽南、厦门一带，台湾仅有孙立人训练中心 1 万余名学兵，而且海空军方面军力也十分薄弱，整个士气低落，人心恐慌。

冈村号召旧日军官结盟

这时，原服务于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的曹士澄奉调到日本，主要任务是与日本军方各界联络，寻求日方所藏匿的武器及探寻各种有助于国民党政府的机会。而在日本，浪人打着“征集义勇军援华”名义，不法骗财的事时有所闻。曹士澄看了这个情况兴起一个念头，认为可以有计划的方式召集日本正规官兵，并且组织“国际反共联盟军”，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同时，他也计划促成日本军事顾问团，前往台湾。

曹士澄日后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他在计划草拟完成之后，立刻到医院去探视正在养病的冈村宁次，冈村当即表示赞同，并且愿意负责办理。在梅雨过后的7月，冈村就收到国民党政府驻东京代表送来的信函，信上写道：“目前国府在大陆各地的战闻，连日皆败，虽想确保四川、云贵、两广以策长久，但亦思将长江下游、南京、上海等江南地区兵力及要人撤至台湾，以图重编。关于重整军力，希借日本旧军人同志之力。”

曹士澄与冈村经过一番详细研商后，把它写成具体的建议书，然后飞回台湾，当面呈给正在台南视察的蒋介石。再经过几次的协商，蒋介石决定先行聘请日本将校若干人来台办理军事教育的训练工作。

曹士澄又去了一趟日本，这次他带了钱，开始进行工作。首先，他将蒋介石的亲笔函交给冈村。冈村便找来旧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大将、旧第五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小笠原清中佐3人共商对策。他们与国民党代表商量渡航方式与留日家属联络的方法后，便开始积极物色人选。

小笠原清（萧立元）相当于冈村宁次的秘书、联络人、斡旋人。调查员等，他曾经在《文艺春秋》发表的文章中提到，冈村有感于战后日军归国的顺序、维持军队组织、指挥系统等各种处理事项，几乎都获得国民政府的认可。那时关东军还被苏联扣留，南方派遣军也还未完全撤回日本，而最令人担心的大陆派遣军却在最优惠状态下返回祖国，这使冈村感铭肺腑。小笠原清说：“冈村之所以愿意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报恩。”

在台湾的蒋介石对于日本军事顾问团除了办理军事教育训练外，还指望要兼理作战计划等方面的工作。并且对于人数、兵种、兵科、学历、健康等条件都有详细指示。蒋介石并且定第一批为17人。

日本战败后，旧日军组织已经瓦解，联络不易，必须以明察暗访的方式寻找。那时，军人成为被整肃的对象，不但不可以服公职，不得做任何的军政活动，原有的补给也被取消。系贺公一日后曾说，战争结束以后，日本人被灌输军人都是坏人的思想，当他被褫压公权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军人打败仗，他无话可说，当时没有职业，俸饷也已停支，生活困境已到一无所有。

冈村宁次因为自己健康欠佳，在经过挑选后，决定由前日本陆军驻广东第一军参谋长富田直亮为团长。富田直亮曾驻香港，这时担任某会社的会长，有一天经由小笠原清的介绍与曹士澄见了面，两个人相谈甚欢。

澄田、十川、小笠原3人开始积极准备。从9月至11月间，便获得富田直亮等17人的承诺，12月时又加入2人。第一批19人，每个人都取一个中国化名。

小笠原清说，他们这些人的化名并非随意为之，而是与陈昭凯上校商量好，以原名中的汉字谐音，再参考中国人的姓氏而成。例如小笠原清则采谐音叫萧立元。

团长富田直亮也保存原名中的亮字，以白为姓，鸿是中国的吉祥字，就取名叫做白鸿亮。曹士澄说，因为共产党是红的，所以团长就姓白，整个团就叫做“白团”。

1949年10月，第一批19名日籍军官在东京高轮一家小旅馆秘密签约，并听取曹士澄说明各种保密规定、行动暗号与联络方法。在商谈时，还派人在门外放哨，以防止美军前来突击检查。这19人共同结下盟约的内容为：“值此赤魔逐日风靡亚细亚大陆之际，当是尊重和平自由、坚信与××合作为要之××××同志奋起，共同保卫东亚，联合反共，更密切携手迈向防共之秋……”

契约中同时约定，凡是同意前往的可以先领安家费8万日元，每月薪资是3万日元，每人每年可回日本省亲一次。

曹士澄说，当时在日本一直谣传日本义勇军要去台湾的事情，为了避免盟军总部及日共注意，乃要求所有人要特别保密。这些获得挑选来台的日本将校，只能对自己的太太说实话，其他一律不准说。但是其中有几个连自己的太太也没有提起。

结盟工作完成后，因当时日本军人一律被限制出境，要来台湾均不能用公开身份搭乘飞机或轮船，只能以偷渡方式出境。最后是采取分批密运的方式。1949年11月的某一天，第一批为白鸿亮、林光（荒武国光）等3人。白鸿亮和林光以盟军总部假情报员的身份，搭乘飞机先到香港再转台湾。

其余的17人则是分批冒充假船员，但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船只直接来台湾，必须先绕到香港，再到台湾。以1950年的情况来说，这些人数不算少，要全部偷渡不是那么容易。起先打算利用渔船从九州出发，后来因为有中方招商局的运蕉船“铁桥轮”开进神户，“白团”团员以船员身份上船。有一次当船靠近日本下幽码头时，日本警察上船检查，这时化名范健的本乡健正在削洋芋皮，他只好冒充厨师。而曹士进（内滕进）为了躲避检查便与数名同伴藏在船底的煤炭中，全身都弄得乌黑才避免被发现。

只有船长与送伙食的船员知道船上有日本人。范健在船上仅学了一句中国话：“没有关系。”当船在香港靠岸时，香港警察来问他的姓名，范健随口回答：“没有关系。”答非所问，弄得别人都十分紧张。还好香港警察都是广东人，普通话也听不太懂，才糊里糊涂过了关。

在香港等船到台湾期间，“白团”的所有人只能暂时呆在旅社中。负责密运的人还告诉大家，在人多的地方绝不可以开口说话，以免发生麻烦。于是，每次外出吃饭时，大家都埋头闷吃，弄得旁桌的人都以为他们是哑巴。

船开到台湾基隆港口，通日语的宋倬云与基隆港务处人员已经等候多时，立即负责把第一批日本军官送到北投一家叫“偕行社”的日式宿舍中。每个人都拿到保安司令部为他们准备的假身份证，并且在台北大直营地成立“圆山军官训练团”。当时，台湾已经有几个美军顾问团成员。“白团”化名来台的时候，美军顾问团的人并不知情，因为美国人分辨不出中国人与日本人。

第二节 企图借助朝鲜战争反攻

蒋介石拟与李承晚合作

蒋介石在加强武力整训的同时，也积极探讨“反攻大陆”的各种实施方案。由北向南“反攻”，则是他诸多方案中的一个。

1950年4月19日到22日，蒋介石派遣吴铁城和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访问南朝鲜。台北与汉城官方皆称此项访问是与李承晚“就国际反共情势交换意见”。

但据美、英两国公布的秘档指出，吴铁城和朱世明此行的真正目的乃是向李承晚商借海、空军基地，俾作为“反攻大陆”之前进基地，蒋介石以协助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为交换条件。

美、英秘档透露，李承晚本有意答应蒋介石的请求，但吴铁城却做错了一件事，而使气度狭小、天性猜疑的李承晚改变主意，拒绝与台湾合作。原来吴铁城当年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身份主持对韩工作时，曾与一些政客结成莫逆，这次访韩自然少不了与这些人接触，而他们之中，有的就是李承晚的头号政敌，故而激怒了李承晚，使蒋介石的构想成了泡影。

危疑孤岛出现转机

然而，李承晚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拒绝蒋介石后的两个月，他不得不向蒋介石求助了。

1950年6月25日，寂静的“三八”线两边，朝鲜南北双方的士兵正在隔着这条临时军事分界线相互对视着。

突然，一声尖锐的枪声划破夜空。紧接着，震耳欲聋的炮声平地而起……历时3年又1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爆发了。

这一天，蒋介石正在吃早饭，负责给蒋介石递送情报的蒋经国匆匆走进。“什么事？这样慌慌张张。”

蒋经国连忙站住：“我们收到一些情报，说南北韩之间发生了战争。”

蒋介石接过简报，只见上面零星混乱报告了有关战事。

“命令所有情报部门加紧对韩战的情报收集，通知美国和日本使馆密切注意美国政府及远东美军的动向，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蒋介石激动地下达了一连串命令。

直到深夜10点，始接到国民党台湾政府驻南朝鲜大使邵统麟的首次报告，才了解大致的战况。

令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露端倪。他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大致与邵毓麟在报告中的分析不谋而合。邵说：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中共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果不出所料，朝鲜战争一发生，美国立即派第7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因此而喘了一口气。

英第七舰队进入海峡

第7舰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香港《天文台》日后曾刊登一篇题为《急驶东京湾的美国第7舰队》文章，如是吹嘘了它的实力：

美国第7舰队，是自由世界远东的一支主要军事力量，这个舰队驻扎在北起堪察加半岛，南迄苏门答腊的辽阔水域内，它的任务是防止两支最大的共党国家——苏联及中共——军队的侵略动向。

它也是一种警察力量，它从来没有向它所巡逻的水域的海岸进行侵略性行动。这个水域的面积约有3000万平方英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东南亚海岸的水岸。但是由于最近中南半岛形势危急，它已奉命急驶东京湾，以防万一，因此该区局势，大堪注目。

美国在太平洋区有约39万名正规军，其中大部分是海军（约24万人），包括第1舰队及第7舰队，还包括许多岸上设施及6万名海军陆战队。美国空军在这地区内保持两大单位——驻在日本及冲绳岛的第5航空队以及驻在菲律宾的第13航空队。每个航空队通常有600至700架作战用的飞机。空军人员的总数约65000名。这地区内的美国陆军有3个9师，共约8万人。

第7舰队的组织是经常改变的，而且在不断发展中。在通常情况下，它有61名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125艘舰艇（包括3艘攻击性航空母舰）及650架飞机。这个舰队在情况需要时可迅速扩大编制，增加舰只实力。

补充这支攻击力量的，尚有一支由舰艇及飞机组成的抗潜艇部队及一支由运输舰、攻击性货船、登陆舰、海滩登陆艇及一艘攻击性直升机母舰所组成的两栖部队。另有一支由30艘补给舰组成的机动后勤部队，负责向战斗舰艇供应粮食、燃料及弹药。此外，尚有水雷艇队，一支抗潜艇巡逻队，一支空降特种警戒部队及一支海军陆战队。

第7舰队在组织上分为五个特种部队及五个特种组合，每一单位各有明确划分的任务。但是主要的攻击力量是在三个特种组合中。这三个特种组合，都是以一艘攻击性航空母舰及其飞机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

在通常情况下，这三个特种组合皆在战略上集中行动。一个驻在北部，在日本水域活动；第二个驻在中部，经常在冲绳与台湾之间；第三个驻在南部，通常在南中国海活动。

这三个特种组合经常分散部署，这是核子时代的安全所需的，以免在突袭之下一举被歼。舰队当局采取了谨慎措施，从不使3艘攻击性航空母舰同时逗留在同一个港口中。即使进行救济任务或对远东各地进行访问时，也皆保持这种分散原则。

美国的第7舰队的力量是惊人的，驻在航空母舰上的200架作战飞机，代表着强大的攻击力量。通常在一艘巨型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分为6个中队。

除了一个中队之外，其中5个中队都是喷射机。此外，每艘航空母舰上尚有一些测候机、直升机及轻型运输机。

第7舰队对于抗潜艇战特别有备无患。它配备有新式的探测设备，对于侦察潜艇有高度的正确性。一旦探到敌方潜艇的位置后，就由飞机加以对付。

第7舰队享有的主要有利条件是：编制上的伸缩性，不受敌人攻击的危险以及得以避免使任何盟国成为攻击目标。它纵贯西太平洋南北的三个特种组合，可以在一两天内合并为两个或一个。大部分攻击部队可以在接获通知后于短时间内集中起来。空中力量

的部署也可随意调动，在巡逻中的潜艇可以召回来参加攻击部队。

第7舰队在西太平洋没有岸上基地，而且根本不需要。属下的舰艇都可以在海上补给。因此，舰队司令可以不必征询任何附近国家的同意而执行任务。

这舰队分布在辽阔的海洋中，是个难以袭击的活动目标。对于这样的目标，敌人的弹道飞弹是无所施其技的。

舰队在公海上活动，不会招致敌人向诸如日本或菲律宾等盟国实施攻击。敌人向太平洋地区内的任何国家的港口发射飞弹，不会伤害第7舰队的还击力量。

从第7舰队的战斗力及共党的明显目标看来，这舰队已经作出些的贡献，曾如下述：

第一，它曾经并且继续在保护南韩。近来第7舰队虽然很少在朝鲜半岛周围的水域活动，但它足以保证万一韩国再遭侵犯时，联合国将获得一些决定性的优势。第二，在远东国家中，日本享有特殊的安全，得以免受共党攻击。因为这舰队保证了日本周围水域的安全。第三，这舰队出现在台湾四周的水域中，使共党无法下手攫取。

同时，整个东南亚获得这支舰队的保护。虽然这地区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没有海路进入，但是第7舰队仍可以有许多作为。它可以向越南、泰国及其友军提供他们所需的空中支援，使该区附近的共党武力有所顾忌。这舰队也可以确保载运弹药、武器及其他供应品的船只之安全。而且第7舰队可以用直升机、登陆艇或在码头上使成千成万的海军陆战队登陆，开入内地与友军并肩作战，对抗侵略。由于它具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所以它每次出动的结果，总是消弭战争而不是参加战争。目前东京湾风云险恶，越寮两国形势危殆，为奠边府之战以来所未有，第7舰队随时出动，自有十分迫切的需要。这次它将做出什么贡献，我们等着瞧吧！

关于第7舰队的主要侵略基地，《解放军报》于1964年8月9日做了如下揭露：

美国海军第7舰队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一支主要的侵略力量。20年来，它不断扩大侵略，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在北起日本，南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侵略基地网。这些基地是：日本的横须贺、佐世保、岩国，冲绳的中城湾，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以及台湾的高雄、基隆等地。通过这些基地，美国一方面镇压当地人民的革命运动，控制所在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对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民族独立国家进行侵略活动。现在，我们把这些基地的情况简要地介绍一下。

日本是美国在远东的最主要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军第7舰队的“大本营”。第7舰队在日本的主要基地有：横须贺、佐世保等军港，岩国、厚木等机场，以及20余处海上演习场和其他设施。横须贺是日本最大的军港，港湾设备等都极为优良。美国占领横须贺以后，把它作为第7舰队司令部的驻地和主要的后勤支援基地。在那里，第7舰队设有一个庞大的后勤供应中心（弹药库、修船厂、医院以及其他单位）。第7舰队的舰只经常在那里活动。佐世保是第7舰队的主要补给基地，第7舰队的第73特混舰队（后勤补给）司令部就设在那里。岩国和厚木是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属第7舰队指挥）的驻地，在岩国还驻有300多架飞机，其中包括两个海军巡逻机中队的飞机。此外，第7舰队在爱知县依佐美，还设有一个强大的长波电台，可以向北起北极圈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内活动的潜艇进行指挥。

冲绳面对我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冲绳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整个岛屿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第3师（属第7舰队指挥）全师1万8千人驻在冲绳。美海军陆战队第1航空联队的一个直升机大队也在冲绳的普天间。美海军陆战队第3师经常处于紧张的训练备战状态，随时准备投入侵略战争，是美国在远东

的主要机动登陆兵力。冲绳的中城湾是第7舰队的一个重要停泊和集结地，也是美国封锁和侵略我国的一个重要据点。在冲绳的那坝，还驻有美国的一个海军巡逻机中队。这个中队的飞机以那坝为基地，屡次侵犯我国领空。

菲律宾处于西南太平洋的咽喉地位，面对着东南亚。美国海军认为菲律宾是一个“理想的海军基地”，具有“极好的战略位置”。随着对东南亚侵略活动的加剧，美国正在日益加紧对菲律宾基地的建设和控制。第7舰队在菲律宾的主要基地有：苏比克湾军港和桑莱海军航空站。苏比克湾位于马尼拉湾，距我国仅600海里，目前已成为第7舰队在南中国海活动的最主要的基地。近年来，第7舰队三次陈兵南越，多次武装干涉老挝，都是以苏比克湾为出发地或集结位置和补给基地。在苏比克湾，第7舰队设有后勤供应中心（弹药库、修船厂以及其他设备），还包括有一个库比岬海军航空站。为了加强对东南亚的侵略，美国海军在1962年特地派了一个两栖舰船大队司令部常驻在那里，以加强训练准备和指挥。在这同时，美国为加强战争物资贮备和战地补给的所谓“海上流动仓库”，也经常驻在那里。离苏比克湾不远的桑莱海军航空站，是第7舰队主要航空兵基地，经常驻有一个巡逻机中队，执行对我国沿海的巡逻侦察任务。

台湾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在美国的霸占下，台湾的高雄、基隆，都已成为第7舰队的重要活动基地。在这些地方经常驻有第7舰队的舰只。第7舰队所属的第72特混舰队，就以这些地方为基地，在我

国沿海进行封锁、侦察等挑衅活动。在1955年我军解放一江山岛和1958年美国在台湾海峡对我国进行战争挑衅时，第7舰队的舰只都曾经大批地云集在台湾海峡，妄图以武力威胁我国。

香港是第7舰队舰船的一个重要“休假”港口。在那里，第7舰队经常驻有一艘供应船（通常为驱逐舰），负责与英国海军的联络、通信中继以及所谓“休假”事宜。第7舰队的舰只经常定期去那里“休假”。

南越的岬港是第7舰队侵略南越的主要据点。第7舰队的舰只经常在那里活动。

多年来，第7舰队一直密谋侵入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以填补所谓“真空”，并直接衔接在波斯湾和地中海的美国舰队。1962年，美国与印度合伙在孟加拉湾东南的安达曼群岛修建海军基地。1964年4月，第7舰队的航空母舰“好人理查德”号和3艘驱逐舰竿正式到印度洋等地“访问”，开始了第7舰队对印度洋广大地区的侵略活动。

对于美国公然武装入侵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提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随后，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这一运动不久以后发展为抗美援朝运动。

美国出兵台湾，使新中国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3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传达了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现在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我军事重点由南向北

自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后，新中国在东北和台湾海峡两个方向都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而当时的东北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所以

中共中央在军事上的着重点自然转到东北边防问题上。7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粟裕、肖劲光为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员，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当时准备将东北边防军建成一个下辖几个兵团的大单位）。尽管粟裕、肖劲光二人因故都未到职，但是中央军委决定这两位原定的台湾战役的主要指挥员到东北边防军任职，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央军委战略重点的转移。

在推延攻台计划的同时，中央军委对于是否攻击金门等沿海岛屿的问题还一时未最后决定。6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对美国介入台湾海峡的程度采取密切注视的态度，攻击金门准备工作一时还未停顿。原定入闽配合第10兵团进攻金门的第24军、第25军和炮3师继续按原部署于7月间入闽。7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协同陆军攻占了浙江东北部海域的部分岛屿，7月12日解放军华东海军又突袭了浙东的披山列岛。7月下旬，福建军区发现金门守军有撤退迹象，于是派遣1个营渡海对大担岛进行武装侦察（因遇7级大风侦察失败）。在7月下旬以前，美军的舰只是在台湾海峡中巡逻，还未直接支援华东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守军，这些岛上的国民党军仍准备撤退台湾。胡璉1976年8月在台湾发表的《金门旧忆》中也公开承认说：

7月中旬我军曾有放弃金门的计划。后经东京美军当局的劝告“与共产党斗争，寸土不让”，我乃仍坚守不放。正当决定撤守并准备实施时，7月23日，国防部忽派专员送命令来——仍然准备在金门作战。

7月13日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率16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次日和蒋介石签订了“保卫协定”；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司令抵达台湾，并成立台湾前进指挥所。由于美军的直接干涉，国民党军停止从金门撤军，并又进占了刚刚放弃的浙东部分岛屿。

考虑到美军介入台湾海峡后的形势，8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同意陈毅的意见并指示：台湾决定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可决定在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后待命再打。随后，人民解放军停止了攻击金门和沿海其他岛屿。当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军，麦克阿瑟又预料人民解放军会在台湾海峡进攻，在那里做了充分的准备。据美国军方后来公布的材料说，“麦克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台湾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指挥。”麦克阿瑟甚至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再实行渡海作战显然是以己之短击敌之长，而选择陆地战场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较量，则能充分发挥我军的优势。

杜鲁门首拒蒋介石

1950年6月25日晚，蒋介石在收到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关于朝鲜战争报告的同时，也收到了李承晚由其驻台湾的大使而交的告警求援急电：他当即向李承晚驰电声援，并予以鼓励，表示将采取有效步骤对南朝鲜进行援助。同时在台北阳明山“总统官邸”召集紧急军政会议，出席人员中有陈诚、王

世杰、谷正纲、黄少谷、张道藩、张群、雷震、张其昀、吴国桢、俞大维、叶公超、何应钦、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蒋经国、黄镇球、彭孟缉等。会上决定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从6月26日零时（即25日午夜后）起，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实行宵禁，停止三军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加强台湾海峡和大陆沿岸的海空巡逻，加强各岛及台湾海防的战斗准备，加强台湾的防空和民防措施，加强对交通运输和经济活动的管制，加强特务活动。台湾岛顿时处于弓上弦，刀出鞘的临战状态。

据麦克阿瑟派到台湾担任联络的费尔德上校和汉斯上校透露，1950年6月25日清晨朝鲜战争爆发后，当天一早，麦克阿瑟在东京就得到了布朗（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和穆西奥（驻南朝鲜大使）的战况报告，立即同正在东京的约翰逊和布莱德雷、诺斯塔德举行紧急磋商。中午和下午又陆续得到了朝鲜战况的进一步报告，获悉：南朝鲜第1师在瓮律、开城被歼，第7师被击溃，春川被围，江陵失守，共军主力指向汉城。麦克阿瑟、约翰逊、布莱德雷和诺斯塔德再次开会到深夜。会上，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份“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经约翰逊、布莱德雷等人研究赞同后，交由约翰逊向杜鲁门转达。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1.立即援助南朝鲜，并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南朝鲜；2.认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3.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4.保卫日本的安全。征得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同意后，麦克阿瑟连夜派出以费尔德为组长的“驻台湾军事联络组”进驻台湾，同时致电蒋介石，通报朝鲜战况和向台湾派驻联络组的决定，并询问蒋介石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能否派一个军驰援南朝鲜以及台湾所急需的援助，并请蒋介石严密监视大陆中共的动态，对大陆沿海采取积极的行动，以探测中共对台湾进攻的紧迫性。

6月26日晨，李承晚再次向蒋介石急电求援，蒋介石便立即召集陈诚、俞大维、叶公超、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黄镇球、彭孟缉、萧毅肃、俞济时和王世杰等在阳明山“总统官邸”开会，直到深夜。

26日中午稍过，美军驻台湾军事联络组在组长费尔德率领下，由东京飞达台北。“国防部”厅长赖名汤、刘廉一前往接待，并陪同费尔德到阳明山会见蒋介石，费尔德向蒋面交了麦克阿瑟的亲笔信件。

当蒋介石“得悉北朝鲜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已断定南朝鲜将难以进行有效的抵抗，所以他首先考虑的是用什么办法及时地对南朝鲜作有效的援助，以“击破北朝鲜共军的进攻”。蒋介石同费尔德等人从外交到军事，从保卫台湾到援助南朝鲜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决定派遣52军（附3师）立即作开赴朝鲜战场的准备，并对52军的干部配备、兵员装备的补充更换、运输等问题作了部署。当天下午蒋介石分别向李承晚、麦克阿瑟复电，表示一经同意，52军即可经空中和海上运赴朝鲜战场，投入战斗。同时通过外交程序向杜鲁门提出这项建议。

在美国布莱尔大厦杜鲁门召集的晚餐会宣读麦克阿瑟关于“在亚洲遏制共产党扩张的计划”时，宣布了蒋介石的这项建议。当时，约翰逊、布莱德雷和柯林斯从朝鲜战争的实际需要和军事原则考虑，都主张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杜鲁门也表示：当他听到蒋介石愿意派兵援助南朝鲜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应当接受蒋委员长的这番好意”。他并且希望看到有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地参加“对朝鲜的行动”，他还希望联合国发出号召并组织行

动。

国务卿艾奇逊则对台湾出兵南朝鲜一事坚决反对，他说：“当前台湾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麦克阿瑟明确指出了这个危险，所以我们才决定派第7舰队和13航空队去保卫台湾，怎么反而叫台湾跑到别处去保护他人呢？况且蒋介石的军队并不见得比南朝鲜军队高明。这样就不如把这些需要给蒋介石的装备直接送给南朝鲜，其效果是可以预期的。”约翰逊马上进行辩解，说台湾只是缺乏海空军，其地面部队在亚洲地区的反共国家中却是最强大的。蒋介石要求派去支援南朝鲜的52军，是蒋介石在东北的60万军队中唯一没有被中共消灭的一个军。约翰逊认为在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从台湾调52军去增援南朝鲜是可取的。杜鲁门看到双方相持不下，争论不休，遂宣布暂予搁置，待下次会议再从长计议。

6月27日，麦克阿瑟又向杜鲁门告急，并再次请求批准蒋介石的建议。而艾奇逊却将他收到的建议蒋介石出兵的电报擅自扣压，并继续反对讨论蒋介石派兵援助南朝鲜的建议。

6月28日，蒋介石驻美“大使”顾维钧和胡适在白宫会见杜鲁门时，面交了蒋介石建议派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副本。杜鲁门表示他是十分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意见，同时答应将扩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麦克阿瑟于6月29日从朝鲜前线视察回到东京后，第三次急电杜鲁门，请其从速采纳蒋介石的建议。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也向杜鲁门进言，应当接受麦克阿瑟的请求，批准蒋介石的建议。杜鲁门、约翰逊、布莱德雷、柯林斯都主张动用蒋介石的52军，而不急于使用在日本的两师美军。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争取时间，及时稳定战局，并且可以减少美军的伤亡损失，使有限的美国地面部队能够在紧急情况时使用到别的更重要的地方去。可是，艾奇逊和国务院却一致反对。艾奇逊用一种歇斯底里的神情提醒约翰逊和布莱德雷等人注意中共6月28日声明所包含的严重性和蒋介石关于援助南朝鲜声明发表后在西方盟国中所引起的震动和惊愕（注：中共声明即6月28日周恩来针对杜鲁门的6月27日所发表的声明。蒋介石声明，系指蒋介石在6月26日晚广播讲话中所讲对南朝鲜将进行军事援助和派兵驰援的事）。艾奇逊说：“中共的声明不只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而且是他们打算出兵干涉的预兆。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朝鲜打击北朝鲜共军，毫不怀疑，中共必将加倍地进行还击。那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就会扩大，局势的发展也必然难于控制，其结果不仅美国将要深深地陷进去，而且会把我们的盟友吓跑。”

蒋介石的建议和麦克阿瑟的3次请求，终于在艾奇逊的阻挠下，于6月30日被杜鲁门最后否决。

美国拒绝国民党出兵的消息传出后，台湾当局颇为失望。当时在美国的于斌主教对台驻美“大使馆”武官皮宗敢说，美国政府拒绝的原因乃是台湾自己“大嘴巴”之故，到处宣扬派兵援韩，以致吃了闭门羹。当时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也表示他完全同意于斌的看法，亦认为台湾当局处理此事极为失当。事实上，蒋介石出兵援韩的用意，乃是欲利用美国力量助其反大陆，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失掉了一次机会，但他并不懊恼，因为他在此时此地的当务之急是巩固台湾，待机反攻。

7月1日，52军各部队也先后收到命令，重新恢复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沿海的防卫施工。

老蒋盼藉日军重振士气

初次要求出兵朝鲜受阻，蒋介石并没有灰心，他相信会有机会，当务之机是加强对自己部队的训练。此时“圆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批学员已经结业，这期训练为期两个月，受训为 100 人。朝鲜半岛的战火，使蒋介石更加重视这项训练工作，他经常亲自来视察，除了慰问“白团”军人外，更是为激励那些败撤退台的各级指挥官。当时蒋的算盘是：“武器靠美援，士气靠日军重振”。

1950 年秋天，美援武器逐一抵达，紧接着需要部队训练，以及更进一步的实战训练。一年后有数百名指挥官接受训练，于是，那年又来了 10 名日本军官，1951 年再来 54 人。这时，共有 83 名“白团”成员在台湾。

比较晚来的这些成员，前往台湾也是以化名方式，搭乘中国籍的运蕉船“铁桥轮”到台湾的。方法是船只预先减少船员数，待“白团”成员上船后，船员名额与人数刚好相符。有的人则是在舱底睡了三天两夜，船靠岸后才能够出来。据小笠原清的了解，当时麦克阿瑟总司令和日本政府应该已经知情，但他们都保持沉默。“白团”的人偷渡到台湾，一直到 1952 年“中日和平条约”签定后，才得以有各种名义申请护照。如岩坪博彦（江秀坪）以“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研究员”的名义申请，大桥策郎（乔本）以“凤梨工厂顾问”名义申请，自始至终不能说出“白团”的名义。日籍军官在日本也以中文名字相称，从来不问彼此的日本原名。

“白团”的日籍军官长期滞留台湾，一开始他们每年休假一次，后来变成两年三次，每次休假期达一个月，每次回日本时一定是先去看冈村宁次，报告在台情况后才回家。而因为身体欠佳不能来台湾的冈村宁次，也再三叮咛军事顾问团在台工作：“绝对不得涉及经济与生意”，以免抵销了报恩的诚意。同时，小笠原清每个礼拜会到“白团”人家里收信一次，每三个月给送薪水一次，而且每一次一定要拿到他们妻子所写的收据给冈村宁次检查。然后冈村宁次再亲自将收据交给台湾方面，以免发生误会而使得工作无法进行。

参加“白团”工作的 83 名军官为从少佐至少将的旧日军，多数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和日本海军大学，他们都是旧陆海军的中级干部，属于兵团参谋或团长。

小笠原清认为，如果与占领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麾下的 200 名军官团相较，在质与量上皆有其 1/3 至 1/2 的实力。这支从未公开真实身份的“覆面部队”，悄悄进台湾本岛后，20 年来在台湾训练国民党军部队，准备反攻，从来不敢张扬。他们并且预备，在工作全部结束后，也要以“覆面部队”的姿态完全撤退。

“覆面部队”曝光

但是，在 1950 年夏天时，“白团”的事情终于外泄，日本有部分周刊及媒体陆续报道旧军人的鬼崇行动，并且明白指出冈村宁次正是幕后的唆使人，为此盟军最高总司令便命令冈村宁次出面说明。冈村的回答是：“我们为报答终战时的恩义而参加这个行动，这也并不违反美国的利益，美国还应

该感谢我们，难道不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认识不足，才丢掉大陆的吗？”

说起来，“白团”并不是最早来台湾的日本军官，1949年10月25日发生的金门之战（台湾称之为“古宁头战役”），才是日本军官以败军之将帮助国民党反共的第一战。

1948年以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原地区接连解放，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下，“国府”情势更趋危急。这时有一名台湾青年李性源宣称带来蒋介石的亲笔函，去拜访根本博，恳请他协助“国府”应战。

根据曹士澄的说法，1949年，日本政府正在闹义勇军事件时，国民党政府情报机构保密局之情报员李性源在日本九州，打算以组队援华为名义，邀集根本博、吉原中佐与另外5名走私渔民共7人，从九州鹿儿岛搭乘小渔船，准备偷渡来台湾。

根本博在二次大战期间是日本驻蒙军司令，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根本博就已经认识蒋介石，彼此曾经有“为了东亚和平，中国与日本必须合作”的共识。以后中日战争爆发，两人便兵戎相见了。

战争结束后，根本博是败军之将，但是蒋介石立刻邀请他来访。据根本博生前的回忆说，蒋介石一点也没有战胜国的骄横，因为他的书房只有两张椅子，蒋介石让侍卫长商震上将、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等高官站着，但却拉着根本博的手请他坐下，口中并肯定中日合作的重要，让根本博心里大受感动。

因为根本博身为司令，心里颇为担心战后审判的问题，至少是个戴罪之身。但是蒋介石告诉他，处罚战争罪犯是联合国的协定，一定要做，但他却不愿意举发太多战犯。于是，根本博在35万部队和45万日侨撤回日本后，自己以无罪之身返回日本。

在李銍源传达蒋介石的求援讯息后，一心想报恩的根本博二话没说，带了几个部下立刻出发。一开始他打算到上海，但却接到情报说解放军已经逼近上海，于是又变更计划，直接到台湾来。出乎意料的是，1949年5月8日，全部人员半途在九州遭美军宪兵逮捕。根本博十分担心失去报恩的机会，于是他向美军表明一定要去援助蒋介石的决心，没想到美军居然同意，还派了一名日裔美军随行警戒。

两个多礼拜后，根本博一行人又搭乘30吨的机帆船“捷真丸”悄悄出港，沿着西南诸岛航向台湾，不料又遇上台风直扑琉球群岛，就在“捷真丸”号快要沉没前，被美国海军的警备艇救起，于是又受到美国海军的严厉调查。根本博二度说服美国海军，美军遂以军舰将一行人于6月10日送达基隆。但是此事传出后，日本各大媒体均以大篇幅报道，根本博的照片也出现在报纸上。

媒体的报道，引起盟军总部写信到“中国驻日代表处”查询，当时代表团团长为朱世明，朱将这件事告诉了曹士澄，然后回复盟军总部，表示：“不知此事，与代表团无关。”从此以后，日本警察在各港口加倍严查，因而使“白团”人员的密运工作耽误了四五个月之久。那个时候，台湾方面正急需这批日本军官前往开课。

据“白团”成员大桥策郎说，当时台湾情况十分混乱，基隆官员非常紧张，他们听不进美国军官的说明，就先将根本博一行7人扣押约一个月，然后又突然释放。当根本博他们被通知要理发、沐浴、换新衣并享受丰盛食物时，还以为自己就要被枪毙呢。

这时，被安排与根本博见面的，包括“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陈诚、副司令彭孟緝，以及与根本博极熟的参谋长钮先铭。陈诚非常感谢根本博的雪中生炭，要“保安司令部”警务处长王成章负责接待，根本博一行被安排住在北投的警务处招待所。

8月中旬，汤恩伯赴阳明山向蒋介石报告舟山群岛的军情，蒋介石将根本博介绍给汤恩伯，要求根本博协助汤恩伯作战。根本博同意后，便以汤恩伯私人顾问身分为汤恩伯献策。当时汤恩伯凭借海军优势固守舟山群岛，于是，根本博立刻飞到舟山群岛的定海，视察各岛状况。

根本博认为舟山群岛大小岛屿太多，需要机动力很高的机帆船，以灵活探知解放军的动静，方得以迅速联络总部以派遣增援军等。但是这种机帆船在当时只有日本才有，于是以捕鱼为由，以15万日元采购33艘机帆船。就在船团组成出海后，因为其中一名伪装的前海军中将在一次冲突中刺杀一名流氓而引起日方海上保安队的追捕，特别是在日警发现有很多船上的人都没有船员证时，立刻展开彻底调查，才发现背后有军方参与。后来根本博还被形容成“台湾募兵运动的核心人物”，但根本博认为，他只是蒋介石麾下的一名军事顾问罢了。

曹士澄说，根本博来台湾从事军事顾问这件事与“白团”无关，但是如果这件事不解决，将会影响“白团”整体的工作。于是他建议蒋介石，除了保留根本博1人外，其他6人均遣送回国。其中还发生吉源中佐骗取大家的安家费，回国后不予分发，以致又引起日本国内很大的纠纷，是一件轰动的社会新闻。

当根本博在台湾时，中国军方原本有意将他并入“白团”，并因为他的资历很高，有意使他担任团长。后来经“白团”全体会议，因内滕进等人极力反对而作罢。据说，根本博最后被遣送回国，终日酗酒，了却余生。

其实，国民党军队在过去也曾经聘请过不少国家的军事顾问团，如英、法、德、意等国都有。但是因为这些军事顾问团是由“外交”关系而来，或是因为购买他们的武器而跟着来中国教授，而“白团”却是以秘密方式自愿来到台湾。

1949年11月，“白团”团长白鸿亮来到台湾后，立刻携副官林光，并由包沧澜上校陪同，陪同蒋介石前往重庆前线参与作战布置。18日午，奉蒋介石命令就地图上研究战局，下午赴复兴关“国防部”听取作战单位说明战况。

第二天再由侍从参谋于豪章辟设地图室，白鸿亮以一天的时间，就敌我态势要图及有关资料，反复研究。20日上午，他又乘小型飞机，侦察重庆周边我军的情况，后来又请求派赴川南第一线察看地形，亲自面会司令官罗广文。但是第二天清晨当白鸿亮返回重庆时，半途中就听到了川南解放的讯息。

“白团”成员刚到台湾时，一下子还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但每人都最怕身份暴露而被遣返。如白鸿亮原本留有日本式的小胡子，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为了保密，就把胡子剃掉了。去台湾之前，内部有人提醒他们要注意服装，因为中国人讲究派头，所以特别指示他们要系红领带，穿咖啡色皮鞋，留短须的人都剃掉。还有，不要穿绑带式子的日本内裤，也不要拿包袱皮来包东西，因为台湾人没有这样的习惯，免得露出马脚。

因此，每一个来台湾的“白团”成员，都是两手空空地来到台湾，什么东西也没有带。村中一德说，他们有一次坐火车，前座的人还回过头来问是

不是日本人？日本现在怎么样？村中说：“我觉得台湾人凭长相就认得出我们是日本人。”

“白团”抵台备受老蒋信任

白鸿亮在研究战局后，提出两个方案供蒋介石参考，蒋介石采取了第二方案。随后蒋当面告诉白鸿亮，要他先回台湾准备在台国民党军官的教育训练，这是蒋介石在逃台后，为在台“重建反攻复国革命武力”所做的重大决定。

“白团”的其他成员陆续来到台湾后，蒋介石特别指示，对这些军官不必有秘密，以至于像军队的编制、兵工厂的设备与力量，“白团”成员都是一清二楚。而且蒋介石还说，现在就是要日本教育，其他的不要考虑。“白团”的人心里想，蒋介石一定是想起他在日本留学的事，因而让国民党军官接受日本式的军事教育。

第一批“白团”成员报到后，首先就奉还未“复职”的蒋介石之命，分别赴南部凤山与台中参观陆军训练及装甲兵部队，以了解国民党军队的状况。然后又奉命研究台湾防卫作战构想，在蒋介石“复职”后，立刻由白鸿亮提出具体报告防卫台湾作战构想长达3小时。

对“白团”来到台湾的报恩行动，在台湾受到部分将领的反对，其中以陈诚和孙立人二人反对最强烈。据“白团”成员提到，当时陈诚、孙立人对他们最不服气。“圆山军官俱乐部”正在建设时，有一次陈诚正好路过，他看了后好像很不满意，并且说了现在建设已经来不及的话。孙立人则是直接对“白团”的人说，跟他们没有什么可学的，而美国可以学的就比较多。

其他蒋军将领中也有人不满，私下抱怨日军是敌方，是被打败的，怎么可以让他们当教官来训练部队？蒋介石听到以后很生气地说：“也许有人会说，日本同我们经过八年战争，过去他们侵略我们，做过我们的敌人，现在我们打了胜仗，还要请他们来做教官，教训我们，实在使人不能悦服。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观念呢？如果有，那就是一种极大的错误。”

为了让这些重要将领改变态度，蒋介石要求“白团”的人策划一次陆军联合作战演习，陈诚与孙立人都到场观察。这次演习主要由中山幸男策划。据中山幸男日后指出，演习主要有3个项目，分别是纵深阵地的攻击、步炮协同以及实战的演习指导。中山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面积广大，“国民政府”如果横形进攻共军阵地，很快会把力量消耗掉，因此必须采取纵形方式，以便把战场弄得狭长一点。

另外，在日本演习时都是炮兵先从后面攻击敌人。但是台湾的演习却是实弹演习，每一个实弹都通过步兵的脑袋，步兵再往前冲，这种情况连他们自己也没有经历过，自己也吓了一跳。还有，在实战演习时，过去指挥官都是用挥动白色或红色大旗来代表前进或是后退的指令，这次日本顾问要大家改用电话分别仔细传达命令给攻击部队和假想敌部队，使得演习有如实战。

联合演习展现坚强实力

中山幸男说，这场陆军演习共历时两个多小时，包括孙立人等人看了以后，对于日本顾问团就不再反对了。

中山幸男原是日本步兵学校的教官，他把日本的典范令（简单地说就是规定军队的教练、演习、战斗等基本方针的教材）改良成中国式，再编成中国军队的典范令，例如，日本典范令中没有突击射击，因为日军在突击同时并不射击，只是拼命打冲锋，但是美国就有一边冲、一边射击的战技，所以他们也加入这项指导方法。

还有，为了让台湾部队具有实战性，团长白鸿亮一开始就希望在 32 师的训练中不仅是沙盘推演，还要实战训练。村中德一便负责新竹湖口 32 师的实战训练。

村中说，蒋介石那时候告诉他，希望他们能把 32 师训练成中山师、模范师，是以建立如日本天皇周围的亲卫队为目标，然后再由其他师团来模仿。而训练内容则是从平时生活方式到实战都是日本模式，于是开始补充所需的教官，连指导营区生活的下士官也一并找齐。村中说，原本蒋介石是希望日本军官能够以一对一的方式去教，但是因为“日本军事顾问团”不可能进来那么多人，因此在训练 32 师时，教官最多时人数达 20 人之多。

严格训练竞相观摩

32 师内部共有步兵团 3 个、炮兵营 1 个、工兵营 1 个，以及司令部直接管理的通讯部队、卫生部队，总人数约 1 万人。他们整理了一年的教材、进度表，然后一步步实行，在他们演习时，岛内高级军官都来参观，观摩后再把经验带回去。

日本人的训练与美式的全然不同，日籍军官说，炮兵训练不像美式乱轰一阵，而是打一炮就要中一炮。所以当时炮兵还接受每发必中的训练，工兵则训练如何利用现地就有的竹林、树林等物资的方法。

村中说，32 师原来预计是一年的训练时间，但最后花了一年半。而且，只有第 32 师是进行师全体的教育，其他师则是观摩第 32 师的教育，学习后在各部队照样实施。因此，到第 32 师的观摩者相当多，甚至已经到了妨碍训练的地步。

一年半的训练时间，最后是师全体演习，由蒋介石检阅，国民党军队中也进行射击竞技和行进竞技，第 32 师都经常优胜。大家认为中山师成功了，后来第 32 师成为最优秀的部队，部署在士林官邸蒋介石的周围，是直属“总统”的直卫部队，而第 96 团则是“总统府”的警护部队。

英军要求半数成员返日

然而，32 师的成功，却不能让这些日本教官留在台湾更久。训练完毕时，正好美国大批顾问团也同时来到台湾，当时美军的蔡斯就提到，既然请我们来，日本顾问团就不能再留下。据“白团”的人说，蒋介石虽然向美军说：“日本人是在你们不帮助我们的时候伸出援手”，但仍与美军顾问团的人协议，将“白团”人员减半，只保留了一部分，中山与井上就回日本了，中山说，他其实很想留下来，但是没有办法。村中也说，当时志愿参加“白团”的人都有埋骨台湾的心理准备：“真的反攻大陆，我们也会一起去。”

“白团”来到台湾，最主要的就是训练国民党军队将领反攻大陆，在工作上是先守住台湾，然后计划反攻大陆。1950 年 6、7、9 月间，曾经分别

在台湾北、中、南部举行 3 次陆海空联合大演习，3 次演习分别由“白团”教官负责拟写计划并协助实施，蒋介石每次都亲自校阅，并且听取白鸿亮总教官的讲评。“白团”教官还特别着重反登陆作战的深刻研究，这些日籍教官介绍了当年日军的“岛屿守备战斗教令”一书，译成中文后分发给学生。并配合实兵演习的考验，使受训人员彻底了解反登陆战的性质，因而对防御台湾更有信心。

模拟战略协助反共大业

反攻大陆一直是蒋介石最大的心愿，“白团”受邀来台湾的最重要使命就是协助台湾完成“反攻复国”的大业。“白团”成员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首先得重建军备防卫台湾，有了防卫自信后自然就想到要“反攻大陆”，如何进行也成了他们研究的内容。而动员，是第一建制要务。

1951 年初，台湾军队的部署皆呈野战态势，所有部队都在临战部署状态中，随时准备应付攻击，不像日本还有师管区或团管区等机构，可以随时动员在乡军人，以达成动员的任务。而且，台湾就算要动员，也完全没有预备部队，军中也没有负责动员的机构，如果不先整备这些组织，根本无法动员。

当时台湾虽然有兵役法，但日本军官认为只是有名无实，特别是军队中还有许多老兵与少年兵，难有大用，因此首先要降低军队的平均年龄，以征召新兵。

1951 年 6 月 21 日，日本的动员专家原第 4 师团动员参谋山下耕君（易作仁）抵达台湾，当月底“白团”就积极展开策划动员体制的工作。

当时的台湾省保安司令彭孟緝中将、副司令郑冰如中将等，都曾经奉蒋介石的命令，要在日本教官指导下实施动员演习。演习时间定在 1952 年 2 月，并责成“保安司令部”、“国防部”、“陆军总司令部”及其他单位共同筹组“复兴省动员筹备委员会”。

1952 年 2 月，“复兴省动员演习”如期实施，演习部队为第 32 师的第 94 团，动员管理师是第 32 师师长张柏亭。首先，在新竹县、桃园县、宜兰县成立 3 个团管区，进行各县的征召准备。台北市则是师管区，司令由 32 师师长兼任。然后便按暂定的演习法规实施动员演习。由于蒋介石曾经指示在正式演习前先做室内演习，动员演习计划照做后，蒋介石十分满意。2 月正式在湖口练兵场校阅动员部队，蒋介石当天因感冒没有出席，由陈诚代表校阅。

大桥策郎说，日本动员所需时间是一个星期，但是一个星期对台湾来说时间太长了，台湾要实施像以色列一样的动员制度，只要 24 小时，动员就完成了。

杜鲁门二拒蒋介石

美军在朝的“圣诞节攻势”遭到彻底失败之际，当时美第 8 军和第 10 兵团都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处境，麦克阿瑟立即请求采取下列步骤，以期挽回败局，减少美军伤亡：

- (1) 紧急从台湾空运一个军增援第 8 军，进而救援在东线被围的第 10 兵团向兴南

突围。

(2) 请求授权他派飞机轰炸中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并封锁中国的海岸。

(3) 促使蒋介石在华南、华东地区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以牵制中共，使其不敢向朝鲜战场增兵。

同时致电蒋介石告以南朝鲜在战争中的危急情况，请其仍派 52 军前往朝鲜战场以解第 8 军之围，并说已分别从冲绳和菲律宾派出飞机和船艇载着补充 52 军的武器装备驶向台湾，以接运该军从空中和海上驰赴平壤地区。

麦克阿瑟希望 52 军从速完成作战准备，一俟杜鲁门总统批准，即可启航赴朝。他还请蒋介石火速派出一个参谋指挥军官代表团，立即飞赴汉城，会晤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诺斯塔德和第 8 军军长华克，当面商定 52 军到朝鲜战场后的有关问题。

11 月 28 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麦克阿瑟的上项电报，下午便在阳明山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参加者有周至柔、萧毅肃、侯腾、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黄镇球、刘玉章、胡璉、刘安祺、唐守治、阙汉騫、赵家骧、陈麓华、郭永、王楚英、杨敬斌、何志浩、刘明奎，另外还有陈诚、俞大维、叶公超、王世杰、蒋经国及美军联络组长费尔德等。蒋介石扼要说明朝鲜的战局和麦克阿瑟的请求后，宣布：

仍然决定派 52 军驰援南朝鲜，限 24 小时内完成出发准备，要求空军加强对大陆的侦察，海军及金门、马祖的防卫部队要加强战备，随时应付共军的进攻；空军、海军均应密切同第 7 舰队及驻台美国空军的联系；

另就加强台湾防务和增援前线岛屿作战的问题、52 军的战备问题及将运到台湾的武器装备的接收处理问题等，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决定。

同时他又指派侯腾、陈麓华、郭永、王楚英于 29 日凌晨飞往汉城，同华克等商洽 52 军到达朝鲜战场后的作战行动及其他有关事项。

麦克阿瑟于 28 日急电杜鲁门，要求空运台湾的 52 军驰援南朝鲜。杜鲁门接电后立即召集国防部和国务院有关首脑会议，研究有关问题。虽然柯林斯和布莱德雷主张接受麦克阿瑟的意见，空运台湾的 52 军援助南朝鲜并轰炸中国东北，但艾奇逊、杜鲁门都害怕苏联出兵和中共增加兵力，再加上英国的反对，杜鲁门于 29 日复电麦克阿瑟拒绝其建议。麦克阿瑟一气之下，又于 12 月 3 日再次给杜鲁门发去一份措词激烈的电报，电述朝鲜局势严重，如不采纳他的建议，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杜鲁门不仅不为麦克阿瑟的威胁所动，而且下决心要除掉麦克阿瑟，遂于 12 月 6 日给麦克阿瑟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

(1) 禁止他采取任何未经许可的行动，并责成他用现有的兵力保住阵地并尽力保存实力。

(2) 禁止他发表任何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政策性声明。

但麦克阿瑟却不甘心受杜鲁门的桎梏，分别向马丁、惠里等申述他与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台湾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他已知道杜鲁门正在策划除掉他的步骤和设置整他的圈套，但出于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和要全力给予支援的目的，他在 12 月 6 日电告蒋介石取消 52 军行动计划的同时，向美国国

防部建议将驻台联络组升格为“美国协防台湾军事顾问团”，保荐骑一师少将师长蔡斯任团长，进一步扩大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并把南朝鲜的兵力扩充到 30 万人，再编 25 个师。这项建议在马歇尔、布莱德雷的赞同下，很快被批准。52 军驰援南朝鲜的行动于 12 月 6 日第二次被取消了。

杜鲁门三拒蒋介石

蒋介石前两次要派 52 军驰援南朝鲜之事已成为过眼烟云。但是，到了 1952 年 5 月，在李奇微调往欧洲，克拉克到东京上任不久，又刮起了一阵“从台湾调 1 个军去朝鲜战场替换美军”的风。于是，第三次从台湾国民党调 52 军开赴朝鲜战场作战的计划又在东京、台北、华盛顿之间热烈地讨论起来了。克拉克由意大利调到东京后，发现在苏联虎视眈眈之下，日本的防务极其空虚，除 7 万 5 千名警察外，竟无一营美国的地面部队，他非常吃惊，遂向五角大楼和白宫建议：从台湾抽 1 个军到朝鲜战场，以便从朝鲜战场抽出 3 师美军去防守日本。他满以为这项建议能获得通过，遂同时电告蒋介石预作准备。蒋介石明知只要杜鲁门还在白宫，艾奇逊还当国务卿，从台湾派军队去南朝鲜的事就永远无法实现，但他为了配合克拉克的行动，还是叫孙立人进行准备。到了 6 月下旬，艾奇逊又顶住了五角大楼和国会的压力，再一次使杜鲁门拒绝了克拉克的建议。克拉克深怀歉意致电蒋介石，请其撤销 52 军支援南朝鲜的安排。自此之后，52 军驰援南朝鲜一事就再也无人提起了。

动员演习整军循序渐进

出兵朝鲜再次成为泡影，蒋介石仍不死心，他在动员演习之后，即积极开展动员教育。1952 年 8 月，台“国防部”在石牌成立动员干部训练班，直到 1959 年 3 月底止，7 年间共开办 45 期，受训练人次超过 9000 人。“国防部”为了承接将来的动员工作，于是成立“国防部军事动员设计委员会”，首任会长为副参谋总长萧毅肃，定期每周邀集“国防部”相关单位及陆海空联勤各总司令共同讨论未来如何动员。

动员演习结束后，“国防部”积极展开一连串的整军计划。在实际工作中，首先确立由“国防部”制定有关动员兵役的机构，当时设有类似动员的局，中将担任局长，下面有 5 个单位，各负责不同的业务。再者是修改各种兵役法，并且成立“退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该组织隶属“行政院”。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台湾陆续与外国断交，于是台湾当局便改以退伍军人组织与各国保持联系，如“退辅会”每年召开一次总会，招待各国退伍军人，并藉机让他们参观台湾的军事演习。

修改“兵役法”成立“退辅会”

在所有体制渐趋完备后，1954 年 2 月，实施“国防部”春季动员演习。当时第 32 师已不在湖口练兵场四周，其麾下各团已经以平常体制分散部署在台北市周边。这次演习当天，松山机场关闭，举行阅兵式，由蒋介石亲自校阅演习部队。由于这次演习是一次测检，以检视成立的动员机构与法令是否运作得当，因此各地观摩人士极为踊跃，动员业务也有一定的成效。

据当时参与动员策划的大桥策郎日后回忆，台“国防部”在实施春季动员演习成功后，海军接着有“海光演习”，陆军总部也有“陆光演习”，空军有“楷模演习”，“国防部”又有“致远演习”等，大体上都在“白团”教官计划指导下顺利展开，从而能独立作业。

台“国防部”的动员设计委员会及动员干部训练班，先后在1959年停办，因为师管区、团管区的实际动员业务还需要实务指导，于是“白团”成员便在各地方进行巡回辅导。此外，在军队动员训练期间，同时也展开军需动员的工作。从此以后，台湾各项演习已不需再假外人指导，台湾军方已能全盘操作。

“白团”的成员回忆说，蒋介石非常喜欢看演习，而演习中更是透露“反攻大陆”的强烈企图。中文名称为贺公吉的系贺公一，在台湾约服务了18年，他主要工作即是负责草拟“反攻大陆”的教学与战术。在台湾期间，他也深刻感受到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企图。

但是，台湾只是一个小岛，军人又少，大陆那么大，“反攻大陆”谈何容易？日本军官认为首先要在大陆内部出现叛乱或是分裂时，台湾里应外合也许有机会。对于朝鲜战争这个“反攻”机会。系贺公一证实说，蒋介石原本有意派兵去朝鲜战场，但是美国方面坚决反对。系贺公一还说，如果那时台湾军队真的参战，那么“白团”就得帮忙，为他们策划。“白团”要以各种情况做考量，如在全面战争时怎么做？局部战争时又要如何做？如登陆时，兵员的弹药与粮食要如何补充？如果用船从高雄、淡水到大陆，士兵要如何登陆？小船兵力又要如何部署？

同时，“反攻”并不意味着只是登陆而已，还需要补给，这又需要美国的援助。系贺公一还说，例如渡过台湾海峡登陆时需要登陆艇，台湾当时拥有的船只充其量只够一两个师使用，无法让更多的兵员一次登陆完毕，更何况美国又不肯借登陆艇，就连台湾制造攻击性武器都不行。台湾就算集结所有渔船帆船，一旦风浪过大，也无法使用。

第三节 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

蒋军大整编

美军在朝鲜战场的战绩，使在台湾待机反攻的蒋介石十分失望。当朝鲜半岛狼烟始起时，他就迫不及待地调整“国军”的指挥机构，将台湾、澎湖、金门等地的部队予以整编，将原有的 20 个军的番号缩编加强为 12 个军又 6 个独立师，还将收编的海匪武装“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改编为“中华反共救国军”，准备“反攻大陆”。

经过整编军力，台湾军事指挥机构在福建、浙江沿海未被我军攻占的 20 多个岛屿上部署了 7 万余人的作战力量，其中有 6 万余人的正规军驻扎在最易受到我军攻击的金门、马祖两岛。

在广东沿海，国民党军队当时还占据南鹏岛及万山群岛中的几个小岛。

为了牵制解放军武力，国民党部队以这些岛屿为基地，对大陆及沿海已解放的岛屿进行各种骚扰破坏活动。

我 3 号炮艇被敌击沉

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我沿海前线部队积极充实粮弹，修筑工事，同时采取了反击与进剿并举的态势，对于撤逃到海岛的残敌进行围剿，在已攻占的海岛上抗击其回窜，避免了处处分兵、消极防守的弊端。

1950 年 7 月 9 日，毒辣辣的太阳把大海炙烤得直冒白烟。陈雪江队长检查完了队里的各艇工作后，坐在树荫下和战友下五子棋，正下得高兴时，电台里传来了海军首长的指示，要他们配合 21 军 62 师奔袭大陈之敌。

炮艇大队是 1950 年 2 月在镇江刚成立不久的一支队伍，此次出海作战，嫩竹扁担能否挑得起千斤重担，谁都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全队上下士气高涨，尤其是那些曾在国民党海军里干过的人员，更是摩拳擦掌，情绪激昂，他们渴望创造辉煌的战果，来证明自己爱国。

当日下午，陈雪江率领他的炮艇大队由海门进至琅机山，与在那里待发的陆军机帆船队集结。

这琅机山岛，位于台州湾南侧，由黄琅和白果山两个小岛组成。两岛中间夹一湾碧水，那就是金清港，出港向东 14 海里就是大陈岛了。军区指挥员选定琅机山岛为集结地点，是由于这里地势高，树木繁茂，艇船在湾内待机十分隐蔽。

按作战指挥所规定，指挥员们白天在岛上观察了大陈岛敌舰锚地和预定登陆点的地形。夜幕降临后，艇船编队出航，以每小时 6 节的速度悄悄地向大陈岛前进。当编队行至琅机山与一江山之间的海面时，海上风浪骤起，白色浪头像一座座小山似的，从右侧压过来，艇船剧烈的颠簸着，随时都有艇翻人亡的危险。当时在海上的陆军 62 师师长周纯麟担心艇船经受不住，决定撤回琅机山避风。

入夜，陈雪江命令 1 分队长张家麟和 3 分队长邵剑鸣分别率领 103 号和 3 号炮艇在金清港外锚泊警戒，监视海面敌情。

翌日清晨，辽阔的海面上漂浮着淡淡的白雾。邵剑鸣从望远镜中发现正前方海面有一个黑点，凭着他的直觉和经验，很快判明这是一艘国民党的大

型炮艇。邵剑鸣是 1944 年驻刘公岛汪精卫的伪海军练兵营的起义人员，参加人民解放军后作战勇敢，曾多次立功受奖。此时发现敌情，他立即招呼张家麟准备迎敌。

张家麟比邵剑鸣大几岁，办事比较沉着、老练。他见邵剑鸣急火火的样子，提醒道：“我们的任务是负责警戒，发现敌舰应该先请示。”

邵剑鸣沉不住气地说：“钻进笼子里的鳖，等你请示好了，它娘的还不早溜了。依我看，咱们先斩后奏，怎么样？”

“不行，一定要先请示！”张家麟毫不让步。

邵剑鸣见说服不了张家麟，也就只好采纳了他的意见，起锚随着 103 号艇一起返港报告。

途中，邵剑鸣担心请示后不让打，便让 103 号艇单独返港报告，他擅自命令 3 号炮艇调转方向，全速向吨位大于自己 10 多倍的敌艇冲去。

敌艇见 3 号炮艇单艇出击，便调头向外海驶去，诱其追击。邵剑鸣求战心切，一心想吃掉敌人，因而中了敌艇的“调虎离山”的诡计，遂令炮艇加速前进。

突然，敌艇放慢了航速，在距离 600 米处首先向 3 号炮艇开火。一发发炮弹在 3 号艇的四周爆炸，海面上腾起一支支水柱。邵剑鸣为发挥本艇火力，一直逼近到敌艇 200 米时才指挥还击。激战中，枪炮兵赵孝庵用双联装机关枪一连打了 250 发子弹，敌艇舱面上顿时混乱起来，两挺机枪也被打哑了，艇尾升起了浓烟和火舌，这时敌人发狂了，用 40 厘米双联装机炮向 3 号炮艇连续还击。激战不一会儿，3 号炮艇操纵室被两发炮弹击中，副艇长许慎和操舵兵马全福当即牺牲。一块弹片又击中正在指挥作战的邵剑鸣，他左眼被击穿，脑部受重伤，当场英勇牺牲。

这时，已经失去操纵的 3 号炮艇，艇尾又连中数弹，艇上的机枪、火炮全部炸坏，两名射手及弹药手也相继倒在血泊中，情势十分危急。

敌人见 3 号炮艇失去抵抗力，更加疯狂地向其射击。

枪炮手赵孝庵从昏迷中刚刚醒过来，他强忍着手和腿已 6 处中弹的剧烈伤痛，以顽强的毅力爬进操舵室，冒着呛人的浓烟，用受伤的臂膀扶着舵轮，全力扭转艇首，试图驾艇返回琅机山。但行驶不远，艇身又中弹 4 发，舱底钢板被炮弹击穿，舱内大量进水，不一会儿，3 号炮艇便沉没于海底。

艇上 17 名人员，除 3 人泅水生还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3 号炮艇的沉没，给参战人员的心头蒙上一层阴影。战前，陆军中有些人对小炮艇能否掩护他们渡海登陆就心存疑窦，原海军人员对小炮艇出海作战的能力也缺乏信心，如今眼看 3 号炮艇被击沉，战友牺牲，不少人情绪比较低沉。

披山岛年轻海军首显雄威

张爱萍司令员得知 3 号炮艇被击沉的消息以后，心情非常沉痛。他立即报告华东军区，军区考虑到进攻大陈的作战意图业已暴露，便电令炮艇大队“立即撤回海门待机”。

炮艇大队撤回海门，部队情绪十分低沉。

作为海上指挥员的陈雪江羞愧得抬不起头来。他走到哪里，陆军总是指着他叽叽喳喳地议论。

“我早就说小炮艇不能出海作战，可人家偏不信，这不，摔跟头了吧。”

“几条小炮艇，不知天高地厚的，竟敢跟人家的大军舰硬碰，肥肉没吃到，反倒被肉吃了，教训啊……”说者声音拉得很长。

一个河南口音的老兵话更难听：“俺打了四、五年的仗，身上连块皮也没擦掉，别在革命胜利的时候，让小炮艇把俺这 140 多斤送进大海喂鳖罗。”

面对着这些议论，陈雪江即使浑身都是嘴也无法解释清楚。他只有一个办法，痛苦的沉默。

周纯麟师长和孙云汉政委最理解陈雪江此时的心理。他们同意陈雪江的意见，找准机会，争取打个漂亮仗，把部队的信心鼓起来，把敌人的威风打下去。

于是，3 人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进攻大陈岛可暂时放一放，选一个易攻的敌岛作为攻击目标。

一个是一江山岛，这个岛的守敌虽然不太多，但离大陈岛只 7 海里，进攻时容易被大陈敌人发觉，敌舰可以及时赶来支援。

另一个是披山岛，一个月前的 6 月 2 日，披山海匪首领吕渭祥曾率敌 600 余人，乘我军驻守部队换防之机突然登陆对玉环岛坎门镇实施偷袭。我守岛部队步兵 74 师 220 团 8 连及随后赶来的增援部队立即组织反击，歼灭这股凶悍海匪 100 余人，其余之敌见我军防守严密，再战恐难脱身，只得仓皇逃往海上溃退。

披山岛的守敌实力虽然比一江山岛强大，还驻有四、五艘艇船，但离大陈岛 37 海里，进攻时大陈一时难以察觉，即使察觉了也因距离较远而不易增援。

一份由周、孙、陈共同签署的作战方案用电报发往华东军区。

军区首长回电否决了。周、孙、陈没有失去信心，他们根据掌握的敌情，重新修改了作战方案，第二次送了上去。

军区首长问：“有没有把握？”

周纯麟师长回答：“百分之百把握不能说，七八成把握还是有的。”

“我要的是百分之百的把握。”军区首长再次拒绝了他们请战的请求。

第三份报告又送了上去。

这一次，军区首长总算开了恩了。同意他们打披山岛。就在 3 号炮艇失利的第三天，1950 年 7 月 12 日黄昏，我军步兵 62 师的 2 个营兵力分乘两艘登陆艇，在 4 艘炮艇的掩护下，乘敌从披山和一江山岛秘密调遣兵力增防大陈岛之机，利用黑夜渡海，向披山岛进攻。

周纯麟和陈雪江率领一支由一个炮艇分队和不载部队的 30 多艘机帆船为第一路，从金清港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直向大陈岛方向佯动。入夜，以两个炮艇分队和装载陆军两个步兵营的 30 余艘机帆船编成第二路，由孙云汉和炮艇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廖云台指挥，直奔披山岛而去。

夜幕降临了，天气突然发生变化，乌云遮去了天上的星月，狂风骤起，波涛翻滚，气候十分恶劣。参战人员怀抱着为 3 号炮艇报仇雪恨的决心，不顾晕船呕吐，坚持航行，深夜抵达石塘湾集结。

第二天天刚破晓，艇队便出现在披山岛海面。陈雪江举起望远镜，发现岛西面锚地停泊着敌“海鹰”号、“新宝顺”号、“精忠”1 号和“精忠”2 号 4 艘炮艇，还有许多机帆船。

披山岛守敌没有料到受挫的人民海军还敢驾着炮艇长途奔袭，打上门

来。当我艇队向敌锚地发起突然攻击时，毫无思想准备的敌人摸不着头脑，顿时乱成一片，仓皇砍缆起锚，夺路逃窜。

分队长张家麟见为战友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他率领 3 艘炮艇奋勇追击，大胆插入敌艇群，集中火力围歼 300 多吨的“精忠”1 号。激战中，负隅顽抗的敌上校支队长被击毙。群魔无首的敌人，见大势已去，不敢再战，乖乖地挂出白旗投降。

“海鹰”号和“精忠”2 号丢下“精忠”1 号不顾，只顾仓皇逃命去了。

这时，被堵在锚地的“新宝顺”号仗恃吨位大，火力强，疯狂进行反扑。107 号艇冒着敌艇密集的炮火，抵近射击。但是，由于火炮口径小，无法将其击沉。艇长杜克明为在大陈援敌未到之前迅速解决战斗，急中生智，看清“新宝顺”号是木质船，便下令撞击敌船。脊背已经负伤的操舵兵陈贵松，忍着剧痛将艇首对准“新宝顺”号尾部，开足马力撞了过去。只听一声巨响，敌艇尾部撞开一个大口子，海水哗哗地灌进后舱。

在炮艇撞击敌艇的刹那间，艇上的机关炮、机关枪、小炸药包和手榴弹，呼啦啦地打了过去，敌艇上一片鬼哭狼嚎。

在“新宝顺”号艇上指挥作战的是国民党“浙江省玉环县县长”林森。此人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在他的督战下，艇上的敌军拼死顽抗。敌我两艇靠得很近，双方展开轻武器对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

激战中，103 艇和 104 艇在张家麟的指挥下及时赶来助战。张家麟也是从国民党海军起义的。3 号炮艇沉没，邵剑鸣和许多战友英勇牺牲，激起他杀敌的满腔怒火。他抓住有利攻击时机，接连下达“快速进体，撞沉敌艇”的命令，指挥 103 艇朝“新宝顺”腰部猛撞过去。枪炮兵龙钦祥、炊事员厉保安和一位向导民工，带着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趁撞艇的瞬间，飞身跃上敌艇，先将敌首林森击毙，缴了 19 名敌人的枪械，然后连续用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将敌艇舱底炸裂。

待 3 位勇士押着俘虏返回 103 艇后，“新宝顺”号载着几十具敌人的尸体沉入海底。

击沉“新宝顺”号这一令人振奋的场面，鼓舞着所有的参战人员。攻上敌岛的陆军步兵见了，都连声欢呼“打得好！”艇队人员更是个个扬眉吐气。

海上战斗行将结束时，周纯麟师长和陈雪江大队长命令艇队将敌投降的“精忠”1 号拖回。不料一艘“太”字号敌舰，从大陈岛方向疾驶而来，见“精忠”1 号已挂白旗投降，敌舰连发 10 余炮，将其击沉。然后敌舰由西南转向正北跟踪追来，企图袭击锚地内的海军艇船。海军艇队和岛上陆军的战防炮、迫击炮当即以密集炮火猛烈还击。敌舰势单力薄，不敢恋战，慌忙向大陈方向退去。

至此，披山之战胜利结束了，击沉敌“新宝顺”1 号炮艇 1 艘、俘敌“精忠”号炮艇 1 艘（后被敌舰击沉）及机帆船 1 艘、帆船 2 艘。俘敌 540 多人，毙伤敌 500 余人。

我军返航时，大海涨潮了。

此时，陆、海军人员的心中也正在涨潮，这是胜利的喜悦之潮。突袭披山岛虽是小仗，但它是华东海军成立后的首次陆海协同联合登陆作战，显示了年轻海军的雄威。第一次应用小艇打大舰、木船打军舰的做法，在人民海军创业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重新夺回玉环岛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及海匪猖狂进攻，我军还多次采取主动进攻的战术，将其立足点——被占岛屿一一拿下。

在这一年的夏季，我军驻浙部队还剿灭北麂岛敌守军 600 余人，而驻闽部队则进袭了西洋、浮鹰两岛，驻粤部队在进攻中攻占了南鹏岛。

解放军攻防结合的战术，使台湾当局借登陆窜犯扩大其政治影响，配合国际反共势力侵略朝鲜的玩火行动一再受挫。

然而，台湾当局不甘于失败，仍然硬着头皮坚持武装窜犯大陆。

1950 年 11 月 20 日凌晨，曾受到我军沉重打击的披山海匪吕渭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及充实武器装备，又率 800 余众，分兵 3 路再度偷袭我玉环岛。

当时，我守岛部队因兵力不足，被这股海匪武装攻入玉环县城及占领了该岛大部分地区。但我军少数兵力仍然与登岛之敌展开了殊死战斗。玉环县警备大队的 2 个班，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奋勇杀敌，独立阻击海匪进攻达 7 个小时，为增援部队的赶到赢得了时间。得悉海匪登岛的消息后，我车驻守楚门地区的步兵 61 师 183 团的 2 个多连部队，当即起程，徒涉 20 多里的海峡浅滩，登岛投入激战，经过我军增援部队和守岛部队的 6 个小时的协同作战，一举歼敌 180 余人，击溃了吕渭祥的残部，重新夺回了玉环岛。

“根据地”企图又遭失败

1951 年初，朝鲜战局急剧恶化，美军及李承晚部队开始向中朝军队发起全线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台湾当局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调集军力向大陆展开大规模窜犯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951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电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南军区陈毅、邓子恢等领导人，要他们根据朝鲜局势以及台湾当局可能对大陆厦门、汕头等地大规模进犯的情况，拿出对策。中央军委也向这两大军区发出了要“确保重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具体指示。

在我军调整了兵力部署，加强了重点地区和岛屿的保卫后，台湾当局自知派遣大部队窜犯占不着便宜，于是决定停止实行大规模进犯大陆的军事行动，仍然以小股武装的形式窜扰我边防地区为主。

但是，长时期地“小打小闹”，已经碰得头破血流，看来不改变打法，其最后下场决不会比原来的强。为此，台湾军事当局一改往日以窜犯沿海地区为主的作战形式，把活动舞台由沿海拉到了内陆山区，将“海上阵地”移至“山区根据地”。

根据这一战略构想，台湾当局除继续利用海匪武装打头阵外，还专门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和“大陆游击总指挥部”等长期工作机构，妄图在美国顾问对匪特分子进行了游击战训练之后，再次掀起“反攻”的“高潮”。

为了实现建立“敌后游击区”的黄粱美梦，1951 年 6 月至 9 月，台湾当局 4 次派遣 6 股共 800 余人的武装匪特，在南到广东海南岛的琼东县，和北至浙江的象山，中为福建的惠安县、乐清县等漫长的海岸线上，先后登陆窜犯，但均被严阵以待的当地军民一举歼灭。

一上岸就挨打，回回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可是时间长了，敌人也学“聪

明”了，他们开始与我军“斗智”。

如 1951 年 9 月上旬，在敌占岛——乌丘岛盘踞的“福建省反共救国军”370 余人，在原国民党仙游县警察局督察长、“泉州纵队”陈令德和原国民党德化县县长、“永安纵队司令”陈伟彬的率领下，分两股在福建惠安县登陆并于第二天越过福厦公路，打算流窜到戴云山区，在我内陆地区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准备长期与我军周旋。

陈令德率领的“泉州纵队”和陈伟彬率领的“永安纵队”，均系台湾当局聘请美国军事顾问进行强化训练并给予“全美式”装备的精悍匪特组成。

登陆后，“泉州纵队”居然凭借优势火力，一路连续摆脱了我地方民兵的阻击，向着既定目标戴云山进窜。而“永安纵队”更是阴险狡猾，全部伪装成解放军，一路冒充我“剿匪”部队，使一些地方民兵和群众被其诱杀。

台湾当局的内窜作战，正中我军“诱敌深入”的“口袋战术”。正当这两股匪特武装做着在戴云山安营扎寨的美梦之时，却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军预设的包围圈中。

1951 年 9 月 6 日和 7 日，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亲临战区，指挥这场围歼战。

“泉州纵队”和“永安纵队”在习义路、东山寨和七丘山、白洋山等地被我军 74 师、87 师和地方武装的 23 个连队、9 个区中队以及几个县的上万名民兵分割包围。9 月 7 日，“永安纵队”司令陈伟彬在七丘山的围歼战中被我军战士击毙，其属下只得分散逃窜。

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匪特武装的成员毕竟是经过严格挑选和精心训练的，其狡猾程度非一般土匪可比。

在我军的天罗地网中，少数匪特竟然想出假扮民兵押解俘虏的模样，妄图蒙混过关，但最终还是被我围剿军民揭穿，全部被俘。

“泉州纵队”司令陈令德，在战斗中只身逃跑，而后装扮成化缘和尚“云游”躲避搜捕，直到 9 月 15 日，在逃窜路上被我村村设岗、路路放哨的民兵识破而做了阶下囚。

经过我福建晋江地区军民历时半个多月的全力清剿，这两支曾不可一世的匪特武装，除 8 人从海上逃跑外，全部被歼和被俘。

台湾当局内窜建立“根据地”的企图，又一次遭到惨重的失败。

蒋介石召见胡宗南

台湾当局内窜建立“根据地”的企图遭到惨重的失败后，仍不甘心失败。蒋介石依恃台湾与美国签定的“防务协定”，企图改变战术与我抗衡。

既然“小的”行不通，那么干脆来“大的”，于是制订出了“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战术。

所谓“以大吃小”，即动用几倍或数十倍优势兵力，在其海、空军的协同下，突然袭击我军防御力量薄弱的海岸突出部或沿海岛屿，力争歼灭我军守岛小分队，一俟我军大部队赶往增援，便迅速撤离。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一直延用到第二年在进犯我东山岛遭到惨败后方才停止。

为了统一指挥浙东所有岛屿之敌，蒋介石于 1951 年 9 月 17 日亲自召见了反共老手胡宗南。

蒋介石破例为自己的下级倒了一杯茶，背着手在室内踱着步子，一言不

发。

胡宗南猜不透蒋介石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试探地问：“委员长找我有……”。

蒋介石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道：“寿山，你是一个爱说真话的人，这些年来，我被那些说假话的骗子坑害不浅，丢了江山社稷，困守这小小的台湾岛，现在，我很想听听真话，哪怕半句也行……”

胡宗南受宠若惊地从沙发上弹起来，“叭”地一个立正，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蒋介石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寿山，以你之见，这浙东诸岛还能否守住？”

胡宗南知道蒋介石素有爱听虚言的习惯，但他觉得现在站在自己面前的“总统”，似乎与以前的蒋介石不一样，于是他说：“委员长既然信得过我，那我只好直说了。以我之愚见，我军虽然退守台湾孤岛，但孤岛并不孤。”

“说下去。”蒋介石鼓励地说。

“说它不孤，根据有三点：第一，强大的联合国部队正在朝鲜战场上与共军决战，这是对委员长‘反攻大陆’方针的最大支援；第二，有美军的第7舰队帮助我们守卫台湾岛，再加上中美‘防务协定’，台湾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万无一失了。这最后一点嘛……”

胡宗南突然收住话，用眼睛的余光瞟了蒋介石一眼。

“说吧，说吧。”蒋介石催促道。

“这最后一点嘛，是这样的，”胡宗南清了清嗓子说，“现在，浙东诸岛仍然为我军掌握，这些大大小小的岛屿，既是拱卫台湾本岛的门户，又是反攻大陆的前沿基地。有了这些岛屿，民国的失地就不愁夺不回来。只是……只是目下守岛部队编制混乱，缺乏统一而正确的指挥，恐怕后果堪忧啊！”

胡宗南说出这最后一句话，光秃的额头上冒出细细的汗珠。

蒋介石要的正是胡宗南的这最后一句话。于是，他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命令道：“知我者东昌也。大敌当前，为了党国之大计，从今天起，我任命你为‘浙江人民反共游击队’总指挥兼省主席，钟常青少将做你的副手。以后，浙江诸岛的防务就由你全权负责了。”

胡宗南知道自己又上了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但又不便于立即解脱，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委任。

1951年9月18日，即蒋介石召见后的第二天，胡宗南便奉蒋委员长的旨意，把浙江沿海诸岛的杂牌军纳入突击大队和一个海上游击纵队，并从台湾先后增调4个军官战斗团和几艘军舰。总兵力达12000多人。

为了给浙江沿海诸岛守军打气，胡宗南亲自拟发了一份电报：

各驻岛国军同仁：

悉共军近日有攻打我浙江沿海诸岛之意图，望众官兵齐心协力，同守自己之世界。

为党国效劳。坚守者，将大赏。

胡宗南

9月19日

胡宗南不愧为一名反共的老手，上任伊始，他与副手钟常青亲临浙江沿

海诸岛巡视，犒劳守岛官兵。有的士兵手捧着胡宗南从蒋介石那里“特批”的大洋。感激涕零地喊：

“胡主席万岁！”

胡宗南听了，心里比吃蜜还甜。

白沙山岛首次失败

1952年春天，大陆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部队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被政治问题搞得晕头转向，自顾不暇，正是“光复大陆”的难得良机，于是秘密电告“胡主席”：

抓住战机，寻隙出击，严惩共军，为党国效力。

蒋中正

3月20日

胡宗南得到蒋委员长的如此器重，不觉精神大振，连夜召开了守岛敌军头目会议，部署秘密的“袭共”计划。

3月28日，黑沉沉的夜幕把大海遮盖得严严实实，天上下着毛毛细雨，这正是隐蔽出击的好时机。胡宗南命令吕渭祥、王枢两位上校指挥官，率领1000多名“反共救国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分乘23艘机帆船、9艘海军舰艇，向我海门镇东北岸10余里的白沙山岛守军发起突然袭击。

我守军警卫连3排哨兵吕洪书听到头门山方向有马达声，迅速向值班排长徐忠报告。徐忠听到敌情报告后，立即命令7班加强巡逻，9班进入阵地，同时，立即向连长顾展宏请示处置。

此时，大海正在涨潮，敌海军舰船趁涨潮之机向我阵地疯狂地开火射击，顿时，白沙山岛上火光四起，土石飞迸。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敌人像一群发了疯的野兽，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从一艘艘舰船上拥下来，纷纷登上岛岸，向我守岛部队开枪射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7班大部伤亡，其中一个江苏籍的战士身上中了30多发子弹。排长徐忠在与敌人抵近射击中，一连打死3个敌人后，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登陆之敌见我防御阵地失去抵抗能力，又集中兵力向纵深攻击。连长顾展宏立即命令2排投入战斗，激战半个小时，渐渐感到力量不支，退到147.5高地，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顽强抗击。

战斗打响后不久，我62师师长孙云汉得知敌人登陆白沙山，迅速命令就近的该师海防大队长齐德胜和陈超政委派部队火速支援；同时疾速通报给驻海门的华东军区海军炮艇大队长陈雪江和台州军分区机帆船大队长戴玉生，让他们派艇船支援白沙山战斗。

陈雪江和戴玉生接到命令后，分别率领各自的艇、船大队全速向白沙山海面疾驶而去。但由于气象恶劣，能见度极低，双双迷失了方向，急得两位指挥员双眼直冒火星。

战斗一直打到天亮。停泊在白沙山岛附近海面上的敌军舰船，将几十门火炮同时对准我125高地，进行反复轰击。登陆的敌人依恃着炮火的支援，向我坚守的高地发起轮番冲击。这时，我前来支援的陆军先头部队因受到敌炮火的拦阻，一时难以发挥作用。

战斗打到 29 日 8 时 30 分，我 186 团 2 营从上盘涉水上岛增援。我海军炮舰第二次赶来白沙山海面，与敌舰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敌指挥员吕渭祥、王枢见我炮艇火力猛烈，2 艘机帆船被我炮艇当场击沉，深感两面受到夹击，形势不妙，他一面指挥着敌军对我炮艇进行抵抗，一面命令登陆部队撤退。撤退中，我海军炮艇以火力进行追击，敌 1 艘机帆船中弹起火，炮艇又向其连开数炮，终于将其击沉。这次战斗，进犯的国民党军在损失 200 余人后逃走。

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1952 年 6 月 10 日，胡宗南又亲率 1200 余人进犯浙江温岭县的黄焦岛，守岛解放军 1 个连，扼守要点，激战 18 小时，后又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将未及上船逃跑的国民党军全部歼灭。此次战斗，我军伤亡 46 人，歼灭胡宗南部 310 人。

1952 年 10 月 19 日，我人民解放军主动出击，以 1 个加强步兵营和 1 个炮兵营的兵力经 4 个小时的航渡，登上国民党军占领的南澎岛，6 个小时的激战后，全歼岛上敌军 118 人，击毙其少将指挥官，收复南澎岛。

1952 年 12 月 14 日，1000 多国民党军袭击福建漳浦县的六鳌半岛，其时在六鳌镇的解放军只有 1 个边防排，他们英勇抗击了 10 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袭击，歼灭其 100 余人，并配合援军进行追击，打得来犯者仓皇逃窜。

南日岛窜犯得逞

但是，国民党军这种“以大吃小”的突然袭击，也曾有几次得手。他们在 1952 年先后袭击福建莆田县湄洲岛、南日岛和浙江平阳县乌岩、雾城时，都使解放军的驻守部队和当地人民群众遭受一定损失，其中尤以窜犯南日岛最为著名。

1952 年 10 月 11 日，驻金门岛的国民党军第 14 师和 75 师各两个团及海匪突击大队，共 9000 人，分乘舰艇、机帆船，在 3 架飞机掩护下，第三次窜犯南日岛。

南日岛是福建省东部莆田县的一个较大的岛，东西长约 14 公里，两端最宽处在 7 公里左右，中间最窄处只有 700 米。南日岛东部起伏较大，有大乔山和九重山、笔架山、猪母山，海拔都在 130 米以上，山势陡峭，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岛西部则是平缓的山丘、土坡，平均海拔 40 多米，最高处的山边村后山才 80 多米。南日岛面积约 80 平方公里，有 60 多个村庄，万余居民。南日岛为莆田县第 9 区，区政府设在岛西部的南日村。

10 月 10 日，金门国民党军称“为庆祝国庆，举行陆海空军大演习”。

10 月 11 日凌晨，10 艘登陆舰和十几条机帆船在夜幕中驶离了金门料罗湾，编队向南航行。天亮时接近南日海面，发现 1 只渔船，3 艘登陆舰集中火力射击，渔船被命中，桅杆顷刻倒下，有人被抛上半空，1 艘国民党军登陆舰又朝渔船撞击，将其撞为碎片，几个落海渔民也被撞死。

上午 9 点多钟，国民党军在万湖、土地坪、岩下村和东户、西户一线登陆，人民解放军 1 个连依托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激战终日，大部壮烈牺牲。11 日下午 2 时后，大陆增援部队 2 个营先后赶到，强行登岛，前仆后继。某部 2 营试图在后埋头登陆，遭敌人火力封锁，被迫退回。只有 1 个排飘至坑口，登陆成功，但与海匪部队遭遇，在众多敌人围攻下，除 8 人被俘外全部阵亡。某部陆战营 2 个连在坑口白沙洋强行登陆，上陆后仅剩 1 个连的兵力，

敌军先以撤退引诱我军深入，后将我军包围于草埔村地区，机枪手李忠志在全排战友阵亡的情况下，冲入敌群，拉响了手榴弹。某部5连副连长荆玉珍在战友全部牺牲、自己又两处负伤的情况下，只身奋战两个小时，打退国民党军5次冲击，最后壮烈牺牲。

12日晚9时，某部副参谋长石洪贞率1个营的兵力在坑口后埋头登陆，随即遭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攻，13日凌晨，双方展开肉搏，天亮时，我登陆战士大部牺牲。

在南日岛上我军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的同时，大陆一边的莆田至石城正抢修运兵的公路，数万人昼夜奋战，3天中抢修通了60公里的公路，但渡海增援的部队一直遭受国民党军炮舰和飞机的火力阻击，众多木船被击沉，上岛增援的兵力少且分散，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

袭击南日岛的国民党军在围攻我守岛和增援部队的同时，大肆抢劫岛上居民，破坏我地方政权组织，岛上的敌特和地霸管制分子也跳出来，为国民党军带路，指认我干部党员，围攻群众积极分子。南日岛鸡飞狗跳，混乱不堪。

战后统计，南日岛区公所干部亡5人，被俘15人；公安队亡3人；损失驳壳枪6支，步枪8支，手枪12支，大米800斤，税款160万元（建国初的人民币，100元相当于1元）；区委会、区政府、妇代会公章，县公安局通行证500张以及民兵党团员统计表全部被劫；人民群众损失鸡633只，鸭11只，猪324头，黄牛3头，衣服660件，粮食2835斤，门板75块，棺材12口，羊10只，还有11名群众被杀害，43人受伤，5人被掳往台湾。

此战，我人民解放军共损失1300多人。

13日夜里，国民党军全部撤退。

反攻年成了失败年

国民党军“以大吃小”窜犯活动的几次得逞，使蒋介石集团一度得意忘形。他们在1952年12月召开的有美国第7舰队司令参加的“战略会议”上，宣称1953年将是他们的“反攻年”，将继续进行“具规模”的反攻作战。但是，人民解放军沿海各军区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严密注视敌情，扎实做好反袭扰准备工作，使蒋介石集团的“反攻年”变成了“失败年”。

1953年5月29日，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举攻占了羊屿、鸡山和大、小鹿山等4个岛屿，歼灭国民党守军230多人，生俘“浙江人民反共突击队”42纵队少将司令何卓权。这4个岛屿位于温州湾的出海口，地位十分重要，在浙江大陆解放后的3年间，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曾数度争夺这4个小岛。我攻占4岛后，蒋介石十分恼怒，命胡宗南“务必夺回”。

1953年6月19日，胡宗南乘“阳”字号驱逐舰，亲率国民党军官战斗团1600余人，在17艘军舰的掩护下，向我60师野炮排的羊屿守军及公安17师50团3营9连两个排驻守的大、小鹿山实施突然袭击。

我守岛部队在来势凶猛的强敌面前，个个怀着血战到底的决心，他们依托堑壕，用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对敌人进行了反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后打退了登陆敌人的10多次进攻。由于敌火力太强，反扑一次比一次凶猛，守岛分队尽管奋勇拼杀，但伤亡严重，再加上天气酷热，部队无水喝，

无饭吃，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战场的形势对我极为不利。

在这紧要关头，我前来支援的海军温台巡逻艇大队 1、2 中队 8 艘舰艇和陆军 60 师的 1 个营及时赶到。海军舟山基地战舰大队的“临沂”、“遵义” 2 艘炮艇也随后而至。

敌人见我舰艇突然出现在战场上，慌忙调转舰头，以炮火进行拦阻射击。我艇利用夜幕向敌舰逼近攻击，一发发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敌人的舰船上。舰船上的敌人眼看着快到嘴的胜利即将化成泡影，岂肯甘心，便以密集的炮火进行垂死地抵抗。

激烈的近战中，我冲在前面的 1 艘登陆艇的驾驶舱中弹，艇首的大门被炸坏，钢缆被打断。操舵手的手臂、耳朵受伤，接着右腿又被炸断。他从舵舱的地板上慢慢爬起来，忍着钻心的剧痛，将胸死死地压在舵轮上，使艇保持航向。

此时，514、515 两艇冒着蝗虫般的枪炮弹，全速冲近敌岸，在 100 米处，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使受阻的登陆部队迅速登上敌滩头阵地。

居高临下的敌人，见我军已经登陆，向登陆部队猛投手榴弹，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情势非常危急。陈立富立即命令舰艇用炮火顺着山坡往山顶急袭。艇炮打到哪里，登陆部队就冲到哪里，一直用火力的伴随掩护登陆部队攻上山顶。

遭我艇炮打击的岛上之敌，他们向大陈岛守敌拍去了求援的电报。不一会儿，3 艘气势汹汹的敌舰，从积谷山以东的海面上驶来。早已埋伏在那里的 2 中队炮艇，见敌舰进入了埋伏地，主动出击迎敌，激战 10 多分钟，敌三舰两伤，遂调头朝大陈方向拼命逃去。

在攻打浙东诸岛的战斗中，60 师的部队与陈立富的炮艇中队多次协同作战，配合十分默契。该师的指战员每当接到渡海作战的任务，就提出要与海军的“老伙伴”（指陈立富的炮艇中队）搭档，再也不像开始时那样轻视小炮艇了。

为了配合大、小鹿山岛的登陆和抗登陆作战，巩固已开辟的温台航线，“瑞金”、“临沂”、“淮阴”、“遵义”、“兴国” 5 舰先后在渔山岛海面和三门湾海域进行巡逻和护航。

《海军史》对 1953 年海军在东海海域进行的 50 多次作战的战果作了详细的介绍：歼敌 1300 余名，击沉敌舰船 16 艘，重创敌舰 8 艘、艇船 2 艘，俘获敌舰船 26 艘。通过这一系列的战斗，国民党军队被迫紧缩外围的兵力，退守主要岛屿。

胡宗南这个老牌上将遭我军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后，他的反攻大陆的美梦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自感羞愧，提出辞呈，蒋介石气得破口大骂：“娘希匹，无能之辈！”于是，抓起一支毛笔，在胡宗南的辞呈上写下了“同意”两个大字。

蒋介石撂下毛笔，转念一想，胡宗南虽然在指挥浙东诸岛反共中吃了败仗，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反共的功臣。于是，他派长子蒋经国到大陈，把灰溜溜的胡宗南迎回台湾，算是给了他一点面子。

终难补赎“前愆”

此后，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西北王”，在外界眼中是颇有点神秘的。他很少接见记者，不对记者发表谈话，更拒绝记者摄影。于是，他的照片、意见或主张，很少在报纸上刊载。此外，他还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很少与人家相周旋……人们和他之间似乎隔了一层幔帐，幔帐彼方人物形象模糊，像庐山在云雾中，自然越发觉得神秘起来。对于这一点，台湾那位与胡宗南相交颇深的记者卜氏曾认为，从胡的行动谈吐，以及他左右的泄露，知道他之多少有点有意如此，大概不出下面3个原因：

一、他自视很高，既不满意于当时满朝文武欺民盗世，炫惑弄权，独行特立的性格便格外强烈地自然表现出来；

二、他是军人，军人以服从领袖命令为天职，除在职务上隶属关系中述说必要的主张意见外，没有对众扬言喋喋不休的必要；

三、他有他专心致志的工作，无谓的不说，开会，应酬，只是耗损精力，浪费时间；他了解人类心理，他企图用工作表现“不见其人”来扩大并加深人们对于他的印象。

卜发表这些看法后没几天的一个下午，他又应约单独采访胡宗南。

侍者把卜直接带进餐室，餐桌上早已摆好香烟水果，还有两只高脚玻璃杯。

胡从楼上走下来，他是在睡午觉中被叫醒的。

卜和他面对面。胡始终保持着那份矜持，即使说笑中。卜日后说，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相当微妙的，它的深浅是被决定于无数的因素，小到一种气氛也会影响到距离，素昧生平的一个新闻记者和一个退职将领的两次晤谈，不可能有更深度的彼此认识，何况再加上彼此若干程度的保留。

胡宗南始终采取让卜多获得一些的态势，但也处处设防；而卜因职业养成的惯性，自然也不放松发掘探取的机会。结果，彼此都说得很多，局面既不像他在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也不像作时事分析演讲，从未一面倒。

据卜报道，反攻大陆这一机会到来，胡是绝不放过的，他必须尽他的军人职守，另一方面也有一股消雪前耻补赎前愆的强烈情绪。他告诉卜，他的个人计划，研究对大陆作战成为他目前的主要课程。

然而，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局势对台湾不利，台湾内部各方面也极不安定。胡宗南的“军事反攻”只有梦里常温了。

1962年2月13日下午，一生倔强，并顽固地坚持“反攻大陆”的胡宗南，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对去探望他的罗烈唏嘘地说：“冷梅兄，哼……国家需要我们，反攻大陆需要我们，但，……如今我竟病倒在床上……唉……！”连声的叹息，接着两行热泪夺眶而出。20多年来，这是罗烈第一次看到胡落泪，但谁想到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呢！

14日上午，64岁的胡宗南在台北近郊荣民医院因心脏病去世。据跟随胡宗南20多年的参谋长罗烈说，胡一生自律甚严，生活刻苦，再加患有多年的血液脂肪过多症和糖尿症，因遵医嘱，禁食富于脂肪和蛋白质的食物，平素仅以蔬菜佐餐，致营养不良，体质日衰。胡宗南是2月7日（即农历初三）在家中洗澡后，突感不适，经内科名医诊断认为病情复杂，在家人及亲友的劝促后，乃即送荣民医院治疗。罗烈说：自胡住院后，蒋介石也曾于12日亲莅医院询问胡的病况。

第四节 云南边境的大规模窜扰

蒋介石赐怪宴

当东南沿海战云迭起之际，西南边陲也不平静。以李弥为首的国民党残军，受台湾“国防部”的命令，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几度危害云南边陲。后来，这支“国军”残部几经起伏、终于成了东南亚金三角的异乡人，其经历颇为独特。

1949年，挥师西南的解放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至11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这时，云南各地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更加高涨。在城市里，工人、学生、街道居民都纷纷走上街头，散传单，写标语，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民主，要求解放；在广阔的农村里，革命活动也很活跃，到处流传着“桃花开，李花开，桃李百花开，迎接解放大军进山寨”的歌声。人民的呼声震动了三迤城乡。在这种形势下，早已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一方面倾听人民呼声，停止征兵征粮，禁止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活动，拒绝国民党“国防部”和“西南长官公署”等单位移驻昆明；一方面为慎重起见，又派周体仁去广州谒见叶剑英总参谋长，请求指示。

周体仁原是北平警备司令，1949年1月31日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后，9月底却悄然到昆明，住进他的好友、卢汉的内弟龙泽汇家。开始，他守口如瓶，推说想家乡才回云南来的，后来他摸清卢汉也准备起义后，才对龙泽汇说：“朱德和叶剑英以前都在云南上过讲武堂，他们对云南十分关心，特地叫我来对你们传达此意，并介绍北平起义的经过。”随后，龙泽汇把他引见给卢汉，多次商谈起义的事。之后，周体仁又奉卢汉之命去谒见叶剑英，叶剑英很高兴地接见了，并告诉他陈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所率领的第四兵团，已进军到南宁，要他赶快随军前往，并立即派人送他到南宁，随陈、宋大军入滇。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加紧阴谋活动，仍想在成都、西康、云南作最后的挣扎。他一面命其嫡系部队胡宗南残部开进滇西，一面电召余程万到成都面授机宜，并任命余程万为兵团司令，以扩充26军的势力，还开始以昆明机场作转运站，运送主要人员和重要物资到海南岛。特务们更与26军和第8军连成一气，进行妨碍起义的种种活动。

其时卢汉在昆明，拥有两个军，一个是第93军，军长龙泽汇，是卢汉的小舅子（卢汉老婆是龙泽清），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前是第93军第22师师长，参加过东北四平街战事，在义县升为副军长。国民党军败走东北前，龙泽汇还在南京，故未随卢浚泉、盛家兴被俘。回云南又任保安第3旅旅长，拱卫昆明附近。另一个军，则是余建勋的第74军。余也是云南人，原是云南保安第2旅旅长，一向在滇西保山、大理、永平一带。这两个军，前者是保安部的底子，后者也是由第184师渗杂地方团队组成。

12月6日晚11时，卢汉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出席的有杨文清、马骥、俱晓清和龙泽汇一共5人，商询起义的准备情况。卢汉说：“时机是紧急了，如等解放大军到威宁、盘县一带，我们才起义，那就太迟而没有价值了！”与会者听后，知道起义的时机已经来临，心情非常激动。但这时卢汉的主力部队之一余建勋的74军还远在大理、保山一带，而龙泽汇93军所部的陇生文师又在剑川、鹤庆，在昆明的部队只有张中汉和张秉昌两个师，力量是很

薄弱的。最后商定，要用一切手段立刻把余建勋军和陇生文师赶运昆明。会议开到7日凌晨6点方散。

岂料这一天，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到昆明，与卢汉商谈，要把国民党的“国防部”等重要军事机关搬来昆明，像抗战时期一样，便于接受美国的军事物资，使云南成为反共的基地。卢汉以云南在抗日时人民负担过重，元气未复，民心浮动，实难应允作答。张群未达目的，即和在成都的蒋介石通电话，并说8日回成都复命。蒋在电话中，要张群告诉卢汉，叫龙泽汇和张群8日同去成都面报云南情况。卢汉动了一下脑子，即向张群说：“李弥、余程万、龙泽汇他们3个军长都在昆，一起去报告情况更好。”张群很赞同。于是，李、余、龙3人遂同张群于8日同飞成都。

李弥，字炳仁，云南莲山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抗日期间任第8军副军长，后升为军长，日本投降时率全军进驻山东，后任13兵团司令。

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第13兵团全军覆没，只身逃离战场的李弥从济南经潍县、青岛、上海来到南京，蒋介石又东拼西凑，重新组建了一个第6编练司令部。除李弥仍任司令官外，并以曹天戈、傅克精、邱开基为副司令官。第8军军长仍由李自兼，副军长仍以柳元麟担任。柳是黄埔四期毕业，浙江慈溪人，曾任过侍从室副主任，故实际是第8军军长。未久，李弥即率部赴江西鹰潭，继至湖南衡阳整训。此时南京已岌岌可危，国民党当局对西南后方已特别重视。当时云南省主席是卢汉。该省虽驻有余程万的第26军及滇东刘伯龙的第89军，但力量不雄厚，故蒋介石命令李弥入滇，以监视卢汉的行动。于是李部便一面开拔，一面招兵补充。

余程万，广东台山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过李延年的参谋长，在王耀武的第74军当过师长。抗战时期守常德，调升为第26军军长。8日下午，他们乘车驶出成都飞机场。公路上拥挤着胡宗南的残兵败将，汽车无法通行。一路上停停走走，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蒋介石的住处——“中央军校”。张群叫3人洗脸喝茶，由他上楼去禀报。不久，蒋介石走下楼来，李、余、龙三人行礼如仪，蒋介石一摆手，示意他们坐下。他照例寒暄几句，问卢汉的病好了没有？其实卢汉没有病，但被问者仍回答说好多了，感谢他对卢汉的关心。可是，蒋介石突然话锋一转，问道：“如果共军窜到云南，卢主席和你们怎么办？”

龙泽汇鼓起勇气回答：“遵照校长指示，把云南变成坚实的反共基地，积极防御，尽力抵抗。”

“要是抵抗不住呢？”

“问滇西撤退到大理一带抵抗。”

“谁叫你们跑滇西的？”蒋介石显得很不高兴，气愤地说：“我的学生必须听话，效忠党国，现在云南就靠你们！你们和卢主席要这样打算，我就不管你们了。”

“卢主席和我们有困难呀！”

“有什么困难？”

于是，龙泽汇就罗列了一些去时和卢汉商量好的困难，比如：武器不够，军饷没有，汽油也没有……

此时的蒋介石显得几分慷慨，全部给予圆满的解决。他说，武器在仓库里有的是，现有美国借给的银洋，存在菲律宾，马上空运给你们，至于汽油就更好办了，立刻可以从海防沿滇越铁路运到昆明。他还一再问龙还有没有

困难，当得到“没有了”的回答之后，又叮嘱龙“晚上去找顾总长办个手续”。

蒋介石这才转向余程万和李弥，心不在焉地问了一两句之后，就大谈其“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的有力支援”、“胡宗南部队已向云南滇西挺进”等等，勉励大家要发扬黄埔精神，保持军人气节。

蒋介石谈完后就邀请大家吃饭。在邻近的餐室里，他在一条长餐桌上席就座，却要人把龙泽汇安置在他的左边首座，其次才是余程万和李弥等。右边居首作陪的是张群，其次是胡宗南和俞济时、盛文等。蒋那天请客的方式不仅特殊，而且奇怪，侍从给每人只端来一份，量不多，采取中餐西式的吃法。大家都不说话，各吃各的，吃得很客气。这次御前赐宴很快就结束，蒋介石和张群便上楼去了。

晚上9时许，蒋介石的侍从武官领龙泽汇去见“总参谋长”顾祝同。顾正在他的官邸里烤火，彼此略事寒暄，谈话便转入正题。顾祝同问：“总统刚才电谕，你们云南所需物资，我当优先满足。不知你需要多少？”其实龙提的那些困难，只不过是敷衍之词，到底所需何物，他们正准备起义，根本没谱儿，便推诿说：“报告总长，我没有带参谋副官来，具体数字一时计算不出，等明天我回到昆明，再造表册派人来领。”

顾祝同答应了几个“行”字，龙又讲了几句应酬话。随后问了问他的兄弟、龙在军校时的同学顾蓉君的近况，便告辞回到了住处。

一夜，龙泽汇始终未能成眠，一方面是因为冷，一方面心里装着事。

平地一声雷

由于气候关系，张群的专机到9日下午才起飞。同机飞昆的除了张群、余程万、李弥和龙泽汇之外，还有新近任命的国民党西南军政副长官孙渡。冬天日短，到昆明已近黄昏，在暮色苍茫中，久候的小车载他们疾驶入城。

把张群安排在卢汉的公馆里住下之后，龙泽汇才去见卢汉。刚上楼，卢汉劈头就问：“岳公（张群字岳军）来了没有？”“来了。”“他来了就好！你先看看这个。”卢汉把一张通知递给龙泽汇，龙接过一看，只见通知上面写着：

本日张长官莅昆，订今日（九日）下午九时在青莲街卢公馆开会。各军，各单位关于应请示和需要请领的一切事项，须先行分别列单，到会时自行呈出，特此通知。

（名单从略）

主任 卢汉 九日下午五时

龙泽汇看罢通知，感到莫名其妙。卢汉解释说：“我把你和马谏、谢崇文，也列入通知的名单里了，届时你们3人不必来。今晚10时就要行动。”

“起义吗？”龙惊问。

“对！”卢汉肯定地说。

“我们的部队呢？”

“陇生文师已到安宁集结，余建勋军正在全速东进之中。”卢汉接着扼要地向龙说明了情况。原来，12月9日这天，当卢汉接到成都来电，得知张群将四度来昆之后，根据当前形势，认为这是千载一时之机，毅然决然地作出起义的果断抉择。为迷惑蒋介石在昆军政人员和特务的耳目，卢汉故作

镇静，施放烟幕，特于当天下午在私宅大摆筵席，宴请美国驻滇“总领事”陆德瑾和“副领事”，英国“总领事”海明威，法国“总领事”戴国栋等人。当时汽车盈门，宾主尽欢，一般局外人决不会预料到会有什么突然的事变发生。卢汉刚演完这出戏，现在第二出戏专等张群到来，就要开场。卢汉想趁张群大驾光临之际，假借张群之名，把蒋介石在昆的军政首脑一网打尽。

卢汉命令龙泽汇马上上五华山。在警备司令部里，副军长俱晓清向龙汇报了93军的准备情况。陇生文师已奉命在右起滇池，左至杨方凹一线布防，张秉昌师沿金殿至长虫山一线构筑工事，张中汉师负责城区戒严，作城防预备队。龙泽汇又进行了仔细检查，并召集有关人员作周密的研究。

晚9点整，余程万、李弥、沈醉和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5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师长石补天等人，都按时到会了。但卢汉却异乎寻常地到9点半钟还不见到会，按常情，卢汉总是在会前就在会客室里等候客人的。与会者等得不耐烦了，都不断地看看手表，又看看门，可始终未见召集人的影子。石补天站起来正想到外面看看动静，警卫营长龙云青却大踏步地走了进来。与会者误以为是卢汉来主持会议了，都不约而同地起身恭立。殊不知响起了炸雷般的一声吼叫：“举起手来，不准动！”在十几支手枪的威胁下，这些将军和大特务都无法施展其技，有的则吓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举起手来，服从缴械。只有李弥不甘屈服，用威胁的口吻质问：“这是搞什么名堂？”龙云青反问他：“你还不知道吗？”就这样，这些人被分批押上汽车，解到五华山光复楼扣押。他们的副官、卫士和司机，早已当了俘虏。

与此同时，住在卢汉新公馆里的张群，正在往成都打长途电话，但电话早被撤了线，摇不通。他被这突如其来事变吓慌了，当即要求副官带他去见卢汉，可是副官不在，忽然有两个警卫闯进门来，对他进行搜查缴械，并告诉他卢汉已上五华山，云南已经起义了。这个消息使张群目瞪口呆，丧魂落魄，顿时瘫软在沙发上，半天站不起来。张群就这样被软禁在住所里。

晚10点整，通讯兵已把各机关部队的电话都接通到总机上，卢汉站在光复楼的主席办公室里，向各机关部队庄严地发出命令：“现在我宣布，云南起义了！各单位按照原订计划开始行动！”

云南，就这样静静地和平解放了！

一面五星红旗从了望台上冉冉升起。龙泽汇在警备司令部里，一直等到把卢汉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全军全国以及向云南全省军民发表的通电拍发完毕，随后又检查了一下全市的戒严情况，一看表，时针已指零点。这时，龙才猛然悟到自己还没吃饭，感到十分饥饿和疲惫，便向俱晓清交代了一声，驱车回家吃饭。饭后由于疲倦，就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宣布起义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就从北京发来贺电，对云南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贺电说：“通电敬悉，极为欣慰。昆明起义，有助于西南解放事业之迅速推进，为全国人民所欢迎。”贺电还鼓励全省军民团结战斗，建设新云南。电中又指示，有事可直向在重庆的刘、邓请示。紧接着，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从重庆发来贺电；叶剑英总参谋长也从广州发来贺电，对云南起义祝贺嘉勉。

很快，起义的喜讯像春风一样传开了，全省各地群情振奋，奔走相告。原来处在紧张状态的昆明市，顿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景象：商店开门，家家户户挂出了五星红旗，张灯结彩，各界人士笑逐颜开；大街小巷，锣鼓喧

天，鞭炮齐鸣，青年学生在街上扭秧歌，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欢庆起义的成功，欢庆云南解放！

释放张群

10日凌晨3点左右，龙泽汇妻子李贤贞把龙叫醒：“快，卢主席叫你。”

龙霍地一跃而起，马上开车上五华山，快步走上光复楼。刚进门就听见啪的一声，卢汉把茶杯一掷，对马锬厉声喝斥：“叫你扣飞机，你不扣，叫你通知龙泽汇、佘晓清、谢崇文来五华山坚守岗位，怎么一个都不在？你为什么不通知？你有意扯我的后腿，破坏起义。警卫营长，把他带下去！”马锬是原国民党“绥靖公署副主任”，卢汉对他很器重，曾长期任卢汉的参谋长。在这突发的情况下，他脸都吓白了。大家都清楚，卢汉在盛怒之下说“带下去”，就是意味着枪毙。在这关键时刻，怎么能这样做呢？龙立即叫来警卫营长徐正芳，叫他在楼外等一等，便飞步上楼，向卢汉求情说：“我从成都来，一直没吃饭，是我回家吃饭后疲劳睡着了。”杨文清等又从旁劝解，卢汉这才消了气，改口说：“把他扣起来！”3天之后，卢汉又下手令，“马锬解除处分，照常办公。”

卢汉当即命令龙泽汇和佘晓清：“你们确实负起责来干，有什么差错惟你们是问。”接着大家分头去忙工作。

宪兵是蒋介石部队中比较顽固的，不好对付。宪兵13团就驻在圆通街，是当时起义的心腹之患。好在该团团长王栩是云南弥勒人，和龙泽汇在中学和军校都是同学，一向靠拢卢汉，龙想争取他参加起义。经卢汉同意，龙泽汇马上打电话叫王栩到警备司令部来，卢汉对他晓以大义，不等说完，他就连声表示：“愿随卢主席起义，绝对服从主席的命令。”于是，龙泽汇叫王栩把宪兵团集合起来，收缴武器，全团带到北教场西营房改编

驻在如安街的蒋军第6编练司令部，因李弥被扣，由参谋长卓立负责，卓立早有起义之心，龙泽汇便打电话叫他维持好所部官兵，如有困难，则派部队去强迫缴械。卓立回电话说：“不必派，不必派，只要几辆卡车，少数徒手官兵来办就行了！”他说服了全部官兵参加起义，自动解除武装，使军队毫无损失。

龙泽汇同时派部队会同警察局分别逮捕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监督驻滇的各伪中央机关部队的行动，特别是抓住了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陈世贤等，人心大快。

可是，驻在马村天祥中学的宪兵教导团，十分顽固，龙泽汇派朱德裕团去包围，双方发生激烈的枪战，还发射了迫击炮弹。后来龙了解到王栩和该团团长常德的关系比较好，便叫他写信去劝降。不久，该团便打出白旗，表示愿意起义。驻在五里多粮食仓库的26军工兵营，拒不起义，被起义部队王国祥团包围，战斗十分激烈。龙泽汇和佘晓清、昆明市长曾恕怀一道乘车视察城郊布防情况，选择碉堡阵地，都无法通行，只好从侧边绕过去。该营抵抗了4个多小时，见大势已去，经喊话后才向起义部队投了降。

还在当天拂晓，龙泽汇就已派副师长邹谷君去封锁机场，扣留飞机，并给站长蒋绍禹通了电话，望他随卢汉起义，蒋绍禹与龙是黄埔8期同学，满口应承。在视察防地路过机场时，龙泽汇又敦促他行动。他立即集合全体飞行员宣布起义，并提出请求上飞机去取行李，龙泽汇同意了。当龙继续向前

检查防地时，忽听飞机隆隆，有1架飞机起飞了。龙急回机场一看，方知是飞机油箱里的汽油没有控于，被蒋绍禹钻了空子，他带着十几个飞行员上飞机之前，抢去了两个守飞机的哨兵的枪，趁势发动起飞，飞机未经跑道，沿着机场边上起飞而去。龙泽汇十分恼恨，便报告卢汉，成立了飞机场司令部，以张有谷为司令，负责管理空军人员。

11日，当龙泽汇在机场检查工作的时候，杨文清、杨适生等送张群到机场来，说是卢汉特许他搭英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飞香港。原来，在张群被扣之后，一再向卢汉写信，说他没有军权，留他无用，望念昔日旧交，放他离昆，则感恩不尽，他保证今后到国外去当寓公，决不再搞政治活动了。龙泽汇登上飞机，察看舱情，张群见龙，以为不放他走，惊惶万状。龙说：“张长官要走，我们不强留。云南起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望去后多为国家着想，善自保重。”他这才释然而称谢。

龙走下舷梯，翘首凝望，直至飞机在白云里消失，他心想：卢汉和张群在政治上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卢汉得以在云南执政，而且突破重重难关，维持了4年之久，都和张群从中竭力维持分不开。张群认为卢汉是拥护他的，是主持滇政比较理想的人物，故主张维持云南现状，不进行改组，并促使卢汉赴重庆与蒋介石妥协。卢汉对张群也是一向知恩感德，极为尊重，每有人去重庆必送礼物，书电往返不绝。张群亦自知有恩于卢汉，所以不避艰险，四度飞昆，为蒋介石说项，要把云南变为反共基地，不料竟被卢汉所扣。然卢汉仍不忘旧恩，甘当军令，放走张群。

昆明保卫战

为了建立新的革命秩序，统一军政指挥，卢汉遵照中共中央宣布的约法八章和第二野战军规定的四项办法，成立了临时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是，主席：卢汉；委员：杨文清、李弥、余程万、安恩溥、吴少默、宋一痕、谢崇文、曾恕怀。

云南起义，粉碎了蒋介石要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阴谋。他不甘心失败，猖狂进行反扑。他提计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负责指挥蒋军第8军和26军进攻昆明；任命曹天戈为第8军军长以继李弥，彭佐熙为26军军长以继余程万；为了激励士气，每军特发大洋10万元。

汤尧的指挥部设在曲靖，他以第8军为右翼，26军为左翼，残缺不全的宪兵5个团为预备队，向昆明进犯。蒋介石又派飞机轰炸昆明，以配合陆军的进攻。五华山光复楼东边中弹1枚，门窗均炸毁；龙泽汇的副官吴昌汉把龙推进防空洞，他伏在洞门被弹片炸伤左胸；有1枚炸弹贯穿屋顶掉在民政厅的1把藤椅上，没有爆炸；还有几枚落在翠湖卢公馆附近，水花飞溅，状如倾盆大雨；华山东路平政街一带，中弹甚多，房屋被炸毁，居民死伤数百人。卢汉立即命令市长曾恕怀带人去抢救慰问，并决定将指挥机关搬到圆通山办公，誓死保卫昆明！

这个决心鼓舞着全市军民。虽然敌军两倍于起义部队，但起义部队有全市人民的支援，工人和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都自动组织义勇自卫队，要求发枪。参军极为踊跃，市民亦自发起来，参加修筑防御工事，组织救护、运输、肃奸队，军民一心，同仇敌汽。卢汉日夜坐镇在指挥司令部里，随时在电话中向军师长询问部队情况，时常找军需官了解粮弹的储备与

供应，召集参谋人员谢崇文、佘晓清、杨济宽、杨剑秋等研究作战方案，对敌我态势进行详尽分析。又特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求援告急，积极与边纵朱家璧进行联系，要求边纵攻击 26 军的侧后。当卢汉收到刘、邓大军的陈、宋兵团已奉命向云南全速挺进的消息时，起义部队极为振奋，对保卫昆明更加充满信心。

12 月 16 日下午，敌搜索部队在昆明外围与起义军警戒部队发生接触，揭开了战斗序幕。17 日凌晨，东南两路敌军向起义军发起试探性攻击，在大板桥、跑马山、小板桥一线发生激烈战斗。第 8 军之一部则迂回至金殿黑龙潭一带，侧击起义军的守备部队。卢汉在积极组织反击的同时，又派扣留下的几架运输机去轰炸蒙自、沾益飞机场，破坏敌空中补给基地，并向敌军散发传单，侦察敌情。入夜，敌军小部队四处进行扰乱，似有要在次日发动总攻的模样。卢汉星夜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鉴于 93 军防广兵单，配备薄弱，阵地拉得太宽，在敌军大兵力的攻击下，势难持久，就召集谢崇文、佘晓清、杨断宽等参谋人员和龙泽汇研究后，断然决定缩短防线，以城防工事为主阵地，在北教场、巫家坝一线的前方作为迟滞敌人行动的前进阵地。这样既可节约兵力，以逸待劳，发挥城防工事的作用，又可以控制有力的机动部队，作为支援重点方面的作战和出击，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不致造成挨打而无法还手的被动地位。

另一方面，卢汉遵照刘、邓首长的电示，加紧做李弥和余程万的工作，以瓦解和促使第 8 军和 26 军官兵起义。卢汉早在 11 日就发表二人为军政委员，12 日又把余程万搬到他家新公馆里住，派李耀廷、张天如去作陪说服；让李弥转移到龙泽汇家里住，由赵诚伯、李鸿谟作陪说服。二人都很愉快地接受了指示，当即发表起义广播，并多次写信去敦促 26 军改变番号，参加起义。李弥还主动提出放他老婆先去向第 8 军做说服工作。卢汉虽然疑信参半，但仍同意了他的请求。可是当晚，据他老婆返昆说，第 8 军官兵表示只要李弥能出去，一切均可照办。为减轻昆明的军事压力，保全地方元气，卢汉便决定放李弥出去，希望第 8 军实现起义的行动。岂料李弥一出去后，却主张不打昆明，把部队拉到他的家乡滇缅边境，以便取得美英支援。谁知曹天戈疑心他被卢汉收买，挟持他继续与人民为敌。

果然，18 日拂晓，26 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上午 8 点左右，敌人炮弹打到巫家坝机场内。龙泽汇带卫队驰至机场。恰适保 6 团退下来，龙大声疾呼：“不准退，不准退！”并当面下令该团团团长李达人稳住战局。李慌忙地说：“我、我在诱敌深入。”“胡说，你这样搞，会影响全线的！”龙怒火中烧，不顾一切地命令部队向前守住阵地，顶住打，冲上去！这时敌人的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起义部队不为所动，继续反击，全团士气大振，奋勇杀敌。正在这紧张时刻，余建勋的先头部队保 5 团赶到，于是两团官兵握成一个拳头，向敌人狠狠打去，一举将敌击退。与此同时，李焕文的保 10 团在杨方凹一带受敌猛攻，龙泽汇只好命令作机动的赵振华率保 15 团顶上去，终于打退了敌军。龙泽汇将战况向卢汉报告，卢汉高兴地给保 5 团团团长马荣凯和赵振华记功，并把李达人撤职查办。

到 19 日凌晨，东南两路敌军全线发动总攻击，战斗异常激烈。自晨至晚，枪炮声不绝于耳。敌步兵在炮兵火力掩护下，进行波浪式冲锋，声势凶猛。第 8 军的山炮部队放列在大树营前方，直接轰击东北城隅，大东门、圆通街及圆通山上均落有零星炮弹。起义部队 93 军依据坚固的城防工事，构成严密

的交叉火网，予敌猛烈的集中射击。任敌反复冲杀，仍未越雷池一步。在夜幕降临之后，敌军组织敢死队，并欺骗士兵说，城内银行里的黄金白银很多，打进昆明，可以自由行动3天。敌又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妄想利用夜暗，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推毁城防工事，打开突破口，突入城内，抢掠财物，扩大战果。但由于城内守备部队的顽强抵抗，集中自动火器，予以歼灭性的打击，粉碎了一批敢死队员的疯狂猛扑。南线的柳坝、南窑一带，炮火连天。东线的第8军一部则迂回到铁峰庵、涌泉寺一带，被起义部队张秉昌师英勇阻击，形成拉锯。卢汉命令龙泽汇和佘晓清、许义浚等分别到各阵地督战，给部队很大鼓舞。当夜，纺纱厂附近枪声激烈，龙泽汇即率领卫队经东寺街去察看，见居民纷纷走上街头，迎到他们面前，毫无惧色。人们盯着龙泽汇说：“龙军长，不要怕，假使敌人窜进来，我们拿扁担也要把这些狗日的打出去！”人民的支援鼓舞着起义部队，人人争先，奋勇杀敌。午夜以后，敌军攻势顿挫，再衰三竭，直至停止猛攻，只得派小股兵力不断扰乱。卢汉立即命令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补，以迎接来日的决战。

还在头一天上午，巫家坝前沿送了一个自称投诚的班长到指挥司令部来，口口声声要见卢汉。龙泽汇叫人仔细搜查他的身上，除了一封信外什么也没有。这是26军前线一个名叫罗伯刚的团长写来的信，信中表示该军为了营救余程万，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一人一弹，也要血染滇池，在所不惜。卢汉当即叫人把送信人带去见余程万。这个班长见余程万后放声大哭，余程万也为之动容落泪。卢汉考虑到既然26军是以营救余程万为名而战，如果放余出去该军将无所借口，可以起到从心理上瓦解敌军的作用，从而避免兵祸，可保地方元气。即使万一不起作用，大不了如李弥一样，对起义军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何况余程万信誓旦旦，坚决起义，为人也没有李弥那么奸诈呢！因此，卢汉遂决定放出余程万，并由杨文清陪同，亲自和他谈了一次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概述了当前的形势和解放大军已逼近云南的情况，并且着重指出：“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均已被打垮，现在这一两个军又算得了什么？蒋的亲信都已逃到台湾，留你们在这里当替死鬼，对国家对个人有什么好处？就利害关系而言，我过去追随蒋介石，这是大家知道的。现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也毫无顾忌地宣布起义，你们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余程万感激涕零，以手指天为誓，表示出去后一定要率全军起义，决不辜负卢主席和云南地方父老的这种厚爱。随后卢又嘱咐：“你要把26军移驻宜良、开远一带。改变番号，通电起义，接受新职，待部署妥当后，望即返昆行使军政委员的职务。”12月20日上午，即由佘晓清派一参谋和吉普车一辆，送余程万出巫家坝。岂料这时炮火猛烈，26军的山炮部队正向起义军核心阵地前沿射击。步兵正向五里多、吴井桥方向冲杀，企图突入塘子巷火车站。而第8军则重点攻击昙华寺、大树营地区，步兵在隆隆的炮火掩护下，突击崔公堤附近阵地，有的狡猾地利用连埂的村庄和工厂，企图突入市区，其炮火则不断向东城一带盲目射击，炸毁民房多处。中午，忽报铁峰庵失守，敌军已登荷叶山、王帽山构筑工事。起义部队随即将预备队增援大小连山，战局十分危急，卢汉连续急电催余建勋军主力火速来援。

直到下午4点，在26军炮击的空隙里，余程万才爬上巫家坝附近的一个土堆上，手摇白旗，高声呼叫：“我是余军长，你们不要打了！”叫了几声，对方步兵看清了余程万，遵命停止射击，把余程万迎了过去。果然，南线炮火遂趋沉寂。傍晚，26军的攻势已停。东北面的枪炮声却有增无减。

夜里，卢汉接到刘、邓两将军重庆来电，谓已饬令杨、苏兵团派出快速部队，用汽车运输，星夜驰援昆明，希与取得联系，密切配合，共歼敌军。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也从贵阳来电告知，快速部队业已派出，正兼程驰援昆明，约于23日即可到达曲靖。解放大军驰援昆明，指日可到的喜讯，瞬即传遍全军，一时士气大振，欢声雷动，连日的顾虑和忧虑为之一扫，战斗精神焕发，遂用猛烈的火力歼灭东北方向敢于来犯之敌。

21日清晨，出现了奇怪情况，不仅南线寂静无声，就连东北两面的枪炮也不响了！难道敌人已经知道解放大军不日将到昆明解围的确切消息了么？果然，敌人得知人民解放军将到的消息后，惊恐万状。26军的攻城部队是在20日黄昏奉命向南撤退，至宜良后余程万遂为新任军长彭佐熙所挟持。第8军是在当天黎明前知道26军已经撤退，陷于孤立境地，感到侧翼暴露，生怕被我围歼，也就纷纷撤退了。昆明城围遂告解除。

残军败走建水

当第8军未撤大板桥之前，170师师长孙进贤曾接到一次李弥自沾益发出之急电，即命令第170师立刻北进嵩明、东种，占领巧家。任务是掩护第8军主力向滇北撤退，计划分两路向川、滇、康边境转进，与胡宗南靠拢，但孙进贤本人及其他军官均表示反对，遂未行动，部队都集中于大板桥。

李弥此时亦自沾益回到大板桥，遂立刻开会，在提到全军转进西康计划时，第6编练副司令曹天戈及各位师长则一致反对。大家都认为当时胡宗南在西康，已处于困境，正在走头无路，自身难保。况且西康荒凉，人烟稀少，资源补给与冬季士兵之被服，都是难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大军跋涉，眷属随行，恐怕不到西康，就有瓦解之虞，不如趁卢汉、余程万两部尚未会合之际，从速穿过呈贡，直奔建水为上。同时滇南物资丰富，又接近国境，更便于进退。李弥听后，遂放弃己见，依从众议。于是即作如下之部署：

（一）令教导师为右纵队，占领呈贡，负责对卢汉之警戒，以掩护主力右侧的安全，俟军主力通过后，该纵队即直开石屏集结；

（二）军主力为中央纵队，按第42师、军部、陆军总部、第237师、第170师顺序，经呈贡、晋宁、江川、通海，至建水集结；

（三）令第331师为左纵队，并指挥陆军总部的直辖团队，经陆良、路南、弥勒至开远集结；

（四）限各纵队于即晚（22日）夜暗开始行动。

在22日傍晚，第8军即开始行动，沿途除了在呈贡、江川与卢汉的部队有轻微接触外，可以说相当顺利。在此期间，蒋第6编练部即奉命改为第8兵团，司令官则由“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兼任。汤系安徽合肥人，为合肥耆宿汤立夫的哲嗣，身材魁伟，个头比李弥、曹天戈都高，时年已60余岁。汤与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都有深厚的交情。在未来云南之前，是“陆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李宗仁虽委关麟徵为“陆军总司令”，但实际职权仍操之于顾祝同，汤则成了“陆军总部”负责人。大势渐去，汤率总部人员和眷属，由南京逃到曲江，又由广州而至柳州，最后才拖到云南曲靖。汤与卢汉的“绥靖副主任”马锷、参谋长谢崇文都是陆军大学同学，张群自

成都最后飞到昆明当日，汤就由马谏及卢汉的云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口中知道卢的起义消息，所以，先一日便逃回曲靖。此际汤尧在云南已是国民党“中央”留在大陆的最高官员，李弥和余程万分别提升为“云南省主席”及“绥靖主任”，便是由汤推荐的。

汤尧兼任蒋第8兵团司令官后，第6编练司令部之原有干部曹天戈仍任副司令官，孙进贤由第170师师长直升第9军军长。第3师师长田仲达升为第9军副军长。石建中则由第42师师长升为第8军副军长，以顶替在昆明未逃出的副军长柳元麟。

部队集中建水之后，李弥一看自己的部队尚未损失，故亦由消极顽抗趋向积极顽抗。除了陪汤尧向部队讲话外，并计划在建水成立云南临时“省政府”；还想委第8军的军法处长唐昌熊为建水“县长”。

第8军、第26军及第9军余部，此时都集中于建水、蒙自一带。附近的地区如开远、个旧、石屏、龙武、宝秀、碧色寨以及中和营、鸣鹭都在控制之下。对于全军今后之动向，李弥则主张依靠此间之丰富资源、险要地势做为基地，必要时可与解放军决战，万一不支，再入越南。李弥当时派第237师李彬甫开赴元阳、小羊街诸地，与红河两岸的摆夷地方武力联系，其中戛丽街的李润之、前93师的吕国铨亦都被李弥拉拢。但汤尧、曹天戈，则认为撤澜沧江、怒江一带，作为根据地，支撑到5月雨季到来，解放军即使追至，其亦难以行动，等到秋后，再以国际局势之变化决定行止，才是上策。万不得已，退入缅甸、老挝亦可暂保实力，最后去当白华，亦好老死在此间。至于余万里，此时已是上不为国民党当局信任，下不为部下支持的孤家寡人，只有依附汤、曹、李拖住部队再说，何去何从，意见都不一致。

蒋介石接见李弥

1950年元旦过后，蒋介石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周芳繁，和空军第三军区副司令易国飞到蒙自，接汤尧、李弥、余程万到台湾。据说在台湾见到了蒋介石，除汤尧受到嘉许外，李、余两人都受到责备。尤其余程万更是备受指责。

1月14日，顾祝同才与汤尧、李弥由台湾飞到蒙自，余程万则未同来。顾祝同指示部队务须确保蒙自机场之安全，与台湾加强联络，并决定以蒙自为基地，宣布将第26军空运台湾，防务全交第8军。1月15日上午，顾祝同召集师长以上干部训话，还特别召见新任第9军军长孙进贤。

顾祝同这次到蒙自，带了700箱“袁大头”，分发李、余两军做军费。按一箱装两布袋，每袋1000元计之，也是一笔大数字，可见当时蒋介石对这部分残军之重视。

孙进贤在清点银元现场时曾对部下发牢骚：“顾祝同刚才约见时，就嘱咐我万不得已时，可以投共产党，暂时换旗，保持实力，待机再起。这真是大混蛋，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会吃你这一套。”同时还提起其本人的一段往事：“以前我在徐蚌会战时，冒死突围逃到南京，当时没办法，穿了一套士兵棉服去见顾祝同，我说我是淮海战役逃出来的师长，门口卫兵初时就不准见。以后在南京砲亭巷第13兵团办事处借钱，买了套将军服，再去晋见顾祝同，他妈的更气人。我认真地报告徐蚌前线情形，顾老总连听都不听，拿着这么大的部队被打垮，竟无关痛痒，你说可叹不可叹！”这些话出自孙进贤

痛心战局败坏时，相信不会是假话。可见这位身居高位的顾将军，真是昏庸及至荒谬了。

顾祝同于1月15日下午，即与李弥又飞西昌胡宗南驻地，并约定16日再回蒙自。但在飞走不到4小时，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军第114师、第115师之先头部队，即从广西百色经富州、文山赶来，遂与国民党军在西戛龙附近接触。次日凌晨蒙自亦发生激战，以致国民党军队对机场失去控制能力，于是将部队空运海口，转台湾的计划被中断。倒蒙自的“空军第3军区”副司令易国瑞、空运大队第101队队长乌钺亦都随着驾驶来的飞机困在蒙自。此时汤尧与曹天戈便在鸡街开会，决定将部队集中建水，想西撤车里、南峽、思茅一带，靠澜沧江之富庶、险要，欲顽抗到底，同时亦得到西昌李弥的复电，约定部队到达澜沧后，李弥即归队。

17日，第170师、42师，陆续到达建水后，即决定退到石屏，与教导师会合。汤尧、曹天戈在召开的一次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上，亦规定了西撤的注意事项。下达的命令是：

（一）19日13时开始，分左右两纵队，以最快速度经宝秀、元江、墨江、普洱向思茅前进。

（二）右纵队由教导师、第170师编成，派孙进贤为该纵队指挥官，限于本日（19日）13时开始，于20日拂晓前出发完毕，经宝秀以北道路直趋元江，控制元江两岸制高点，确保元江大桥，并掩护主力安全通过。尔后该纵队即解除右纵队任务，改任军主力的后卫，以孙进贤为后卫司令官，继续原地监视，迟滞共军之追击。尔后与军保持一天距离跟进，同时彻底破坏元江大桥。

（三）左纵队以第42师和直属部队编成，派石建中为该纵队指挥官，限于明日（20日）12时出发，经宝秀直趋元江。军部随该纵队前卫跟进，通过元江大桥后，该纵队即解除左纵队任务，改任军主力前卫，以石建中为前卫司令官，继续前进。

在部队出发之前，已得悉彭佐熙的第26军部分空运台湾后，已无战斗力，现在向红河转进，实现其进入越南的计划。田仲达的第3师亦故意落后，在个旧附近起义。至于李彬甫的第273师，经电台彻夜呼叫，亦没有回音。在此情之下，国民党余部只有在石屏分两路西撤元江。一路由汤尧、曹天戈、石建中指挥走赤瑞湖以南，过老凹底；一路由孙进贤带领经宝秀，沿赤瑞湖以北，过青龙广。孙进贤一见田仲达被自己逼走，只剩下第3师的残余及人数不足的李桢干教导师，和自己的基本部队第170师，便格外小心。于是便在宝秀开会，孙进贤及新升任的第170师师长李得元、参谋长刘启凡，3个团长左豪、浦景云、张元伟都出席，财务科长胡土方亦在座。当时决定部队到达元江铁索桥后，即由两团人守住铁索桥两端，待两路大军通过后，再听候命令。会议指定张元伟团在最后掩护。张元伟是山东蓬莱人，陆军大学毕业，任过于兆龙第96军的参谋长。他大发宏论，表示1团人在后掩护太危险，孙进贤硬指定张元伟，并担保代为解决困难及危机，于是便整装前进。

孙进贤抗战时期在湖南雪峰山、洞口就与日本鬼子打过山地战，他命令部队一有情况，即上山头，占领高地。孙部途中以无线电与汤尧、曹天戈、石建中联络，始终不通。部队快到元江时，却传来一连串情报，如林彪的大军即来，余建勋亦出发了等等，弄得孙进贤颇为紧张，便决定边打边走，以脱离战斗前进为主。

但到达元江铁索桥后，却不见汤、曹、石的部队。且铁索桥系在悬崖之下的元江面上，与想象中的铁索桥根本就是两样。在宝秀会议时，还以为元江系在平原之上，可据守两岸，但该桥系架于深壑中，就没办法来控制。于是孙进贤便命令左豪团撤后，但解放军追击部队已占领重要山头。此时左团由下仰攻，损失巨大，结果，连团长左豪亦失踪。故使孙进贤进退失据。过铁索桥吧！部队由高处走到下面，解放军在后面追击，部队在射程之内，就有溃散之虞。同时部队一过江，铁索桥便不能控制；如不过桥，元江彼岸情况不明，一旦铁索桥不能通过时，部队就有前进受阻，后退无路之危险。再者，汤尧方面电讯不通，亦不知道第8军是溃于后，抑超于前，而且时机紧迫，又不能停兵等待。孙进贤在无可奈何下，便率领大军利用铁索桥渡过元江，未几，解放军即由后追来，并占领后路山崖之制高点。孙进贤顿呈惊慌，便在元江之平坝上查勘方向。此际，孙每一行动，后面总是尾随很多人，情景有些像淮海战役将垮前突围的局面。孙进贤即大声发脾气说：“老跟着我干吗？”其实部队已呈混乱状态，大家六神无主，不跟主管跟谁呢？

说时迟，那时快，解放军在铁索桥对岸之山头已隐约可见，过江后的部队休息于江边之平坝上，完全暴露于解放军的射程之内。孙于是立刻下令特务营营长耿方振，将铁索桥炸毁，以断追兵。

这时的孙部，除了本身的170师、教导师外，尚有第3师一部分，另外有宪兵团及空军人员随行，于是整顿一下，找了一位当地人做向导，穿过元江城直奔大歇广，而占领墨江。

至于汤尧、曹天戈、石建中之左翼纵队，在1月20日由石屏出发，21日始到宝秀。据说沿途由于向导引路错误。在孙进贤过元江后第3日，即24日才到铁索桥，当时曾遇到被遗弃的第170师团长左豪，大家都一筹莫展地困在元江东岸。后来第42师师长石建中，见无法过江，曾拟掩护汤、曹突围，另觅渡口而未成功。25日，汤尧与曹天戈均在失散中被俘。后来胡土方在贵阳遇到石建中的参谋长吕威，据吕说石一路应战，几经艰苦，始达元江，万料不到孙进贤会过河炸桥，愤恨下拔枪自杀。石建中，辽宁凌源人。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入黄埔军校第十期。

还有第26军，自蒙自机场失守，彭佐熙率领5000多人向红河方面突围，进入越南，与其时伪湖南省主席黄杰的27000多人，都被缴械困在莱州，后移住金兰湾，历尽2年寒暑终于去了台湾。的一股则由副军长叶植楠和团长罗伯刚率领逃抵车里、南峤一带。

残军立足金三角

1950年1月24日，国民党第8军主力在元江被歼灭，只有第8军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率1000余人因驻扎在元江下游而免歼，从元江且战且逃，逃至车里的大勐龙之蛮宋寨，在蛮宋由93师流落人员叶文强和车里宣慰司土司刀栋材的帮助和引导下，渡过打洛河逃往缅甸三岛。在三岛他们遇到从打洛逃出的第26军93师298团伤兵，并被告以298团残部已逃向泰缅边境，打算经泰国回台湾。李国辉率部又从三岛渡过楠垒汀，穿过野人山的原始森林地区，在饥饿、疟疾、毒蛇、猛虎的袭击下，经过12天的艰苦行军，队伍疲惫不堪，沿途不少人非战斗减员，于1950年4月21日到达泰缅边境湄公河西岸的小勐棒，与93师278团残部巧遇。

2月19日，93师278团在南峽打洛被解放军打击，被俘500余人后，团长罗伯刚、副团长谭忠率领残部500余人渡过打洛河向缅北三岛，再由三岛到小勐棒。到小勐棒后罗伯刚卖掉了大部武器，换成金条，因其妻已去台湾，就单独经泰国先回台湾，把部队交给副团长谭忠，让谭忠通过大其力到泰国，等候台湾派飞机来接他们去台湾。谭忠部队在小勐棒与93师709团李国辉残部会合，并经商讨决定留在缅北，不回台湾。小勐棒位于缅北大其力以东、湄公河以西，紧靠泰缅边界，只要步行20分钟就可以进入泰国，处于金三角的中心，是个“三不靠”的山区。李国辉和谭忠商定自立为一支“复兴部队”，由李国辉任指挥兼709团团团长，谭忠任副指挥兼278团团团长。部队合并后拥有1600余人，司令部设置在小勐棒寨子的教堂里。他们设法与台北恢复了联络，请台湾给予空投，台北回电：“自谋出路。”残军就开荒种地建茅屋、修营房，收税经商，在缅北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也是国民党残军在东南亚金三角立足的开端。

这里还要提一提云南境外的马帮。远在清朝中期，从云南到东南亚各国就有商路，云南境内一些贫苦群众，为了谋生，常常赶上几匹骡马到缅北、老挝、泰国贩卖药材、鸦片，并从泰北买回英国的布匹、化妆品、日用品等。为了防止路上抢劫和野兽的袭击，人们往往成群结队同行，并带有枪支武器。抗日战争时期，马帮有所发展，他们除贩运鸦片，还贩运军火、药品，所带武器也逐渐现代化。他们又多和当地汉人、华侨及少数民族头人保持联系。特别是云南开远、大庄、楚雄的回族马帮尤为庞大，人数多、骡马多、武器精良，逐步控制了泰缅商路。国民党残军到达缅北后，云南马帮马守一、马云庵、马绶学、马鼎臣、沐国玺、熊定钦、杨文光等均纷纷投靠，混为一体。

李国辉、谭忠的“复兴部队”经过了一段整休后，将马守一的马帮、原93师的流散人员加以搜罗，部队逐步扩大到3000人。下属：

- 709团，团长李国辉；
- 278团，团长谭忠；
- 特务大队，队长陈龙；
- 搜索大队，队长马守一；
- 独立第一支队，队长张伟成；
- 独立第二支队，队长蒙保业；
- 独立第三支队，队长石炳麟。

国民党残军在小勐棒修建营地、招兵扩军，引起了景栋缅甸国防军的密切关注。1950年5月20日，缅甸国防军一个连奉命由景栋进驻大其力，要残军派代表前往谈判，残军派“复兴部队”副参谋长、原93师参谋主任蒙振生前往大其力谈判，缅军要残军限10日内撤出缅境，残军不从。又于5月25日、6月1日两次谈判，均无结果。6月3日缅军要求派高级代表到景栋谈判，残军派丁作诏和马鼎臣为代表到达景栋，即被缅军扣捕。6月16日至8月23日缅军集中数千人的兵力，在空军的配合下，向残军驻地小勐棒、勐果发起进剿。残军于6月28日和8月23日组织两次反击，将缅军赶出了小勐棒和勐果，重返驻地，并攻占了缅军重要基地大其力，迫使缅军停战谈判，释放了马鼎臣，以残军撤出大其力和景栋至大其力公路两侧为条件，同意残军进驻猛撒。8月底，缅军派汽车将残军送出大其力，残军返回小勐棒后进驻猛撒。

猛撒是一个有40多个自然村寨的大坝子，这样，残军便拥有了基地和生

存的条件。“复兴部队”即在猛撒建立了训练队，由何永年和苏振声担任正、副教育长，公开招收当地华侨和民族子女受训，从而有了喘息和发展的机会。残军的发展便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当局的重视。

李弥二次入窜云南边境

为了搜罗缅北国民党残军，蒋介石派原第8军军长李弥到缅北进行视察，1950年8月16日，李弥经曼谷到达泰北夜柿（读音米赛）；1951年2月20日李弥第二次到猛撒视察3天，又于3月8日带领参谋长钱伯英、副参谋长廖蔚文等人，到达猛撒，正式成立“云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兼云南省主席”，直属台湾“国防部”指挥。李弥还命令709团改编为第193师，李国辉任师长，278团改编为第93师，任命原26军军长彭佐熙在香港经商的侄子彭程为师长，任命在曼谷经商的原93师师长吕国铨为第26军军长、叶植楠为副军长。

1950年4月，原第8军副军长柳元麟、第6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傅克军、李弥的妻子龙慧娱、师长李彬甫、副官处长何永年、团长浦景云等20余人，乘私人商车由昆明潜逃滇西畹町，逃往缅甸。随后相继外逃的还有卢汉起义部队暂编第12军36师参谋长（原云南绥靖公署科长）马俊回、腾冲县县长刘绍汤、滇东机场守备司令苏令德和云南省政府警务处处长邱开基、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裴存藩、整编第77旅旅长钱伯英、第5师师长李则芬、第58军26师师长王少才、第125军参谋长和荣先、预备第11师副营长徐剑光、滇西护路总队大队长王晨天、在乡军人团长朱鸣元、第26军输送营连长何子钰、第58军营长杨一波、保安团中队长杨文光、缅宁专员彭季谦等，这些外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均为李弥收容。

同时，李弥还策动了境内外民族土司头人武装，外迁外逃投附国民党残军，使国民党残军发展到6900余人。

这时，美国一面在亚洲北部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一面要阻止“共产主义”进入东南亚。美国国防部除了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者以军援外，并拟订“堵塞亚洲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的政策。三军联合参谋长于1950年4月向美国国务卿进言：“如果将采取迅速和持续的措施，减少共产党中国的压力……联合参谋长已注意到中国国民党部队活动力重振和效能显著有增加的证据。”并建议，实施“一项在干涉东南亚共产党活动的地下特别行动计划”。中央情报局并着手研究如何使用逃缅国民党残军“入侵华南计划”的实施。按杜鲁门总统的想法，武装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利用他们来使缅中边境（由西藏到泰国）成为坚固的屏障，“显然是解决的办法”。

1950年6月至7月，美国前任驻泰国武官谢尔敦在曼谷开设“海洋供应公司”，开始向残军接济军火和服装。12月，美国在泰北清迈设领事馆，专门负责对残军救济，直接指挥和派遣顾问训练残军。1951年2月，美国派人与李弥商谈军人供应，3月，由两名美国入送260驮武器、物资到残军总部猛撒，并用C—46和C—47型运输机向猛撒空投，每月至少5次。从1950年4月起，美国每月给国民党残军20万铢泰币，8月又改为7万美金，9月起每月又增加家属救济费2万美金，直到1952年6月前后才停止。

李弥受台湾“国防部”的命令，并在美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于1951年5月发动了对云南边境的大规模军事窜扰。6月21日，西路国民党残军攻

占沦沅县城、岩帅、党坝、南掌和镇康县的南伞、大营盘、山口寨；6月6日，东路军从缅北孟养地区入窜孟连县城，占据糯福、孟马和孟连县城；6月12日，游击大队吴运绥部、特务大队罗成部400余人入窜孟遮县以南地区，以牵制解放军；李弥亲自到缅北班阳雍和设立总指挥部，先后投入兵力8000余人。美国出动了无标记的C—47运输机多次向入境残军空投武器和补给。

6月3日，解放军云南军区在残军人窜云南边境时，立即发布剿灭李弥残军的命令，组织了5个团的兵力分4路追剿。6月上旬，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步兵第117团、第121团各一部向糯福、青塘出击；6月10日，吕国铨率部退出国境。6月下旬，步兵120团、123团、基干2团、115团等5个团兵力合围入侵耿马、双江的残军，李国辉率部撤出国境。

国民党残军第一次入窜失败后，李弥于7月又组织了第二次入窜。

对李弥两次入窜，云南军区司令部再次组织追剿。两次作战先后50余天，国民党残军共被歼549人，残军于7月底全部撤出国境退缩至缅北果敢至三岛一线，李弥指挥部也由班阳撤回猛撒。

李弥两次窜扰云南边境失败后，把部队集中在云南境外的几个基地上，分兵四处抢占地盘，迅速占领缅北萨尔温江以北，云南境外以南掸邦科康、佤邦、景栋3个省的大片地区，控制了该地的鸦片和贸易，收纳赋税，收缴公粮，使当地民族土司、头人纷纷依附残军。李弥在猛撒开办“反共抗俄大学”由李弥、李则芬任校长和教育长，大肆招收华侨和汉族子女扩充实力，休整训练，收编土司民族武装，给予番号。台湾还派遣军官和特工人员700余人到缅北，充实残军。1951年11月李弥在猛撒修筑机场，1952年1月又从台湾带回1队“民航运输公司”空运飞机到猛撒，C—47型运输机定期每周两次由台湾至猛撒往返。美国还以M—1型步枪、五口径轻机枪、反坦克炮、高射炮等武器装备了8000名新兵。到1953年1月，国民党残军已发展到1.85万人，编为1个总部、1个指挥部、3个军区、4个师、16个纵队，活动地区北至缅甸昔董、南至耶县，西至孟苏、孟畔土司管辖区，东至老挝孟信，南北长达530公里，东西宽有280公里。

残军被迫退台

1952年8月，国民党残军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渡过萨尔温江向缅甸中部帕奔、毛淡棉、耶县发展，并与缅甸“克伦自卫军”成立“联合作战指挥部”，公开宣称联合缅甸所有反缅甸政府武装，推翻缅甸政府。残军向萨尔温江以南的发展，直接威胁了缅甸主权。

缅甸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于1953年1月集中了3个精锐的步兵旅组织拦击。缅军这次作战以萨尔温江为中心，波及范围广，动用兵力多，战斗极其激烈。当时，缅甸的海陆空国防军全部只有20000人，而用来围剿的达10000人以上。在这1万多兵力中，7000—8000人是强悍善战的钦族部队。钦族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英勇抗日而闻名于亚洲。他们擅长于山林作战，身背轻机枪爬山越岭如履平地。此外，缅甸还雇用了以印度人为主体的“国际兵团”3000—4000人。

这次战役缅军是经过长期准备的。他们易集中兵力，处于主动攻击的地位，在人力、武器装备等方面均有较大的优势。

战争开始，国民党残部毫无准备，司令部主将李弥及参谋人员均不在，

剩下的只有“反共大学”教务长、副总指挥李则芬和参谋长杜显信坐镇孟萨。只有两个团的兵力可参加劲战，其他团队番号人数虽多，但未经过正规训练且分散于近20个点，易被各个消灭。

缅军的第一个战略步骤是：先消灭驻守萨尔温江东西两岸的江口、孟板之敌，然后分兵两路，北攻孟布，东夺国民党残兵总部孟萨。

这时残军在这些地区的兵力均甚薄弱，孟板由邹浩修率两个连防守，他的另1个连驻江口以东的拉牛山。孟萨总部只有2个连和1个排的守兵，而孟布也空虚，93师师部及1个直属连，总共不到400人。

5月21日，在萨尔温江的沙拉渡口，杜显信命令张云岳带领总部的两个连去江口增援。这时，警卫营邹浩修率两个连从孟板败退，渡江至东岸的江口，与张云岳两个连汇合。缅军1个团合围江口，一连发动3天猛攻，遭到残军的拼死顽抗，又调来重炮参战。5月22日，缅军在空军的配合下攻克萨尔温江西岸的残军桥头堡猛畔据点，残军坚守沙拉渡口。23日，缅军集中炮火猛击沙拉渡口，这时缅军采用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采用的跳蛙战术，跳过江口，在江口分兵上下游各30里处渡过萨尔温江，向残军猛撒总部和猛布据点进攻。这就是有名的萨尔温江战役。

24日，残军被迫放弃沙拉渡口，固守拉牛山。

在拉牛山山口，残军与缅军相遇并展开了激烈的肉搏，双方伤亡惨重，国民党残军只剩下400余人。缅甸国防军于第二天开始猛攻，105大炮轰得拉牛山口土崩石碎，浓烟滚滚。第4天，缅甸空军参战，飞机同时轰炸孟萨、孟布和拉牛山。30日，残军放弃拉牛山。

缅军并没有巩固好胜利果实，残军在杜显信的带领下，炮轰萨尔温江江口重镇，并以“反共大学”学员为先锋，警卫营殿后，攻占了江口，虽伤亡惨重，但缅军也痛失了江口。随即拉牛山又回到残军的手中。

缅军原打算跳过江口分兵两路攻打孟萨和孟布，一举歼灭国民党残军。现在，江口已失，而残军在孟萨总部又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缅军捕捉不到作战对象，于是转而集中兵力围攻孟布，以期消灭残军主力——李国辉部队。由于山势陡峭、地形复杂，缅军大部队四面包围孟布，但还不能合围，残军仍能从许多小道与外界联系。经过20多天的围困，仍没能达到消灭敌军的目的。

6月，残军主力由缅北基地回军增援，收复拉牛山、沙拉渡口，同时增兵猛撒、猛畔、猛果，缅军腹背受敌，于6月13日撤回萨尔温江以西。

缅军这次以萨尔温江区域为中心对国民党残军的围剿就这样基本结束了。

1953年，缅甸政府向残军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向联合国控诉台湾国民党侵略缅甸领土，危害缅甸主权与安全，并向联合国提供了大量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4月23日，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国民党残军撤回台湾或居住在指定的禁区内。尽管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设法把提案搁置，但在大量的物证面前，美国政府被迫利用它的影响于5月23日在曼谷召开美、泰、缅、台湾“四国军事委员会”会议，经1个月的谈判，决定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全部撤往台湾。

但李弥总部拒绝撤台，会议只好拖延下来。但由于联合国做出要求国民党残军撤退的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下，在国际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军队残部不得不同意派代表去曼谷参加谈判。由于李弥当时不在台湾，

故由副总指挥李则芬充当谈判代表，另一副总指挥柳元麟为代总指挥。当要“撤回台湾”的消息传到孟萨的时候，残军内部思想混乱，年轻人希望回台湾进学校，做劳工赚钱另谋出路，免得在缅甸受苦；老资格的军官们另有打算。李弥、参议员及总指挥部秘书长丁作韶不主张撤退，在台湾有后台的柳元麟认为应该服从台湾的命令撤退。反共思想十分顽固的丁作韶到处宣传不能撤退。他的理由是，撤退到台湾，大家挤到一个小岛上，有什么作为呢？留在缅甸这个无限好的江山，大有作为。以国民党残军的兵力而论，如能和缅甸山地民族反政府武装相结合，足可以成立一个“缅甸民国”，然后进入联合国，不但个人有出路，将来说不定还能反攻大陆，重回云南哩！但是，同意丁作韶的意见者甚少。当时尚在台湾公干的李弥是主张不能撤的，因为他不肯把在缅甸的既得地盘和人马输掉。但当他看到“金三角”的台柱子李国辉愿撤退时，就主张以退为进；只撤老弱残兵，留下骨干以期东山再起。在这关键时刻，国民党残军内部四分五裂，柳元麟甚至公开冲突起来。

9月，缅甸政府再次把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台湾驻泰国的代表才同意撤退部分残军。

撤退工作从11月开始，残军由缅北开往泰国边境，再乘卡车前往泰国清莱，然后乘陈纳德“民航运输公司”的飞机赴台湾。由于残军撤退时不带武器，缅甸政府提出了抗议，美国驻泰大使威廉·唐纳德为此给美国驻台湾大使发电。11月9日美国驻台湾大使卡尔·蓝钦回电答复：蒋介石提出，如果美国继续施加压力，台湾将公布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在缅甸的国民党军的内幕。唐纳德认为，此时中共和苏联早已知道中央情报局在缅甸的活动，便坚持要残军撤退时带走武器。此后残军撤退时只好带走一些破残老式武器，撤退工作一直延迟到1954年5月。先后撤退的有，李弥总部、“反共抗俄大学”、第26军军部、93师、193师、第10纵队、第4纵队和第3军田中田部的全部；保2师的大部，第18纵队、21纵队和18支队的一小部，共5472人，家属1035人。撤回台湾的残军除少数身壮年轻的编入台湾特种部队外，大部被安置在台湾花莲。李弥本人1961年才回到台湾。

李弥到台湾后，即居台北新店镇北新路，长子云川，次子获之，均学成居美国。李弥则归朴返真，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时与于斌枢机主教，关吉玉、蒋复聪相过从。1973年12月8日突以心脏病复发而逝世。死后之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谷正纲、于斌、薛岳、李宗黄、张宝树等主持。

中缅联合打击残军

李弥总部撤台后，留在缅北的国民党残军还有1万余人，多数人是云南籍及当地的民族武装，不愿去台湾，但因没有统一的指挥部，台湾曾一度停止供应，加之缅军又出动1.6万兵力攻占残军驻地，残军大批逃亡。与此同时，云南境内党政军民向国民党残军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方面散发“回归证”，另一方面，边民纷纷出境呼夫唤子，至使外迁外逃的民族土司人武装纷纷回国。这样，少数民族武装基本瓦解。1952年至1955年被争取回国投诚的国民党残军官兵共3296人。至1954年6月，残军缩减到5800余人。

1954年，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边境进行民主改革，台湾当局认为有机可乘，便派国民党残军副总指挥、原第8军副军长柳元麟，重返缅北，搜罗残部、恢复补给。柳元麟返缅北后，搜罗残军4500余人，组成第3、第5、

第7军3个军，成立“东南亚自由人民反共联军”，盘踞在泰缅边境。11月1日改番号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隶属于台湾“国防部情报局”。1955年10月，曾德兴率部由老挝到达缅北，编入柳元麟部。另以吕维英为首的一股，亦于1954年10月1日窜回缅北，在三岛地区成立“滇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1军”，共1300余人，盘踞孟美、三岛、孟歇、孟坎一带。1956年初，台湾派“国防部情报局”游击行动处处长罗果到缅北，传达情报局“统一指挥、统一补给、整编部队、加强训练”的命令。2月，吕维英部编入柳元麟部。

1957年，国民党残军经过整顿，统一了指挥关系，将总部设在缅老边境、湄公河西岸的江拉，在孟百修筑机场，台湾恢复了对残部的交通联系和补给。10月，台湾国民党召开八全大会，强调对大陆的政治反攻，指令缅北残军对云南地区进行情报、心战、策反、组织暴乱。残军为此拟订了一个“安西计划”。8月，为配合台湾对大陆东南沿海制造紧张局势，柳元麟亲率残军1460余人分4路进抵云南边境。对柳元麟的武装窜扰，云南军区在边疆成立了7万余人的联防队，执行“以军队为骨干，以群众为基础，以政治斗争为主，建立一条人民防线”的方针，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残军的窜扰，粉碎了台湾“政治反攻”的阴谋。

1959年初，西藏上层公开叛乱，台湾当局认为形势对其有利，对残军更为重视。2月，蒋介石在台湾亲自召见柳元麟；3月开始恢复对残军空投装备、给养；4月派“情报局”副局长任剑鹏率督导组到缅北调解残军内部纠纷，点验人员，统一指挥。国民党残军大肆搜编民族武装，在缅北果敢、大孟宜、卡佻山等地招兵，利用云南边境“大跃进”中出现的政策不稳定的情况，煽动边民外迁外逃，胁骗当兵。到1959年底，柳元麟部已发展为5个军、1个军区、15个师、6个纵队、6个独立团、3个独立支队，共9400余人。1960年7月，台湾将特种作战部队的1个大队400余人由台湾空运缅北，加强残军的指挥、技术、通讯、医务、政工力量，并制定了对云南边境的窜扰计划。特种作战部队中将司令夏超、第6军中将政治部主任徐汝辑、特种作战部队副司令胡开业亦受命到残军分别担任副总指挥兼教导总队长、政治部主任、孟百了守备区司令职务，加强对残军的控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这一敌情非常重视。1960年5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昆明军区呈送的内参上作了重要批示。毛泽东指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应立即加强有关地区的工作，派得力人员去各地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千万不可马虎大意，轻易相信下面太平无事的书面报告；中央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

在一次晚饭后，毛泽东走出菊香书屋，叫秘书请来周恩来总理和总理的军事秘书，一起闲庭散步，就防止国民党残匪窜犯等问题交换了意见。5月5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做出了关于边境斗争的部署，并派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率指挥组到云南，具体落实军委的指示。

缅甸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两国山水相连，胞波情深，边民常用这样的语言来说明两国边疆友谊：中方的鸡缅甸方下蛋，缅甸方的藤在中方结瓜。

中缅两国边界是清朝时期清政府和英国政府划定的。新中国成立后，中缅两国一直遵守着历史形成的国界线。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使双方更加和睦友好。陈毅副总理访缅时，曾留下美好诗句：“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1960年1月，缅甸联邦奈温将军访华。1月28日，中国周恩来总理、缅甸联邦总理奈温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

按协定，中缅成立了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由驻缅大使姚仲明担任首席代表，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少将担任首席顾问。缅方由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季准将担任首席代表，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担任首席顾问。

1960年6月，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在缅甸首都仰光召开了第一次联合会议。会议讨论了边界安全等问题。

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周恩来总理和4月份再次上任的吴努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960年中国国庆之日，又签署了正式划定中缅两国边界线的条约。

可是，由于当时李弥、柳元麟残部在边境不断进行窜扰破坏活动，不仅使边境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危害，而且使中缅勘界受到严重影响。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于1960年11月4日在中国昆明市召开联合会议。会议根据中缅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专门商讨了如何保障边界勘测的安全警卫问题。这次会议协商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跨越国界，进入缅甸20公里范围内清剿国民党残匪。会上，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将军和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联合签署了《捕诛蒋军残匪协议》和《联合作战命令》。缅方还派出苏敏昂少校作为山友准将的特派代表到西双版纳的中方指挥部，做中缅联合作战的联络员。

1960年11月，驻扎在中缅边境的我陆军第13军39师和云南省军区的部分边防部队共5个团和1个营的兵力集结边境，并在云南渤海县成立了前线指挥部。

缅甸政府于1961年1月出动5000主力部队集结在大其力、孟岭，准备进剿柳元麟总部。此时，中缅两国政府签署了勘界协议，缅甸国防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勘界警卫部队的配合和支援下，给了国民党残军一次沉重的打击，攻占了柳元麟总部所在地江拉。柳元麟率总部及主力2500余人渡过湄公河逃往老挝；第3、第5军3500余人，逃往泰缅老边境；1300余人流窜卡瓦山区。是役在江拉总部缴获美制弹药和军用物资有5吨之多，为此缅甸政府再次向联合国控告台湾国民党部队侵犯缅甸主权，同时还将缴获的美制武器进行展出，邀请美、泰、印尼等国武官前往参观。2月16日，缅甸空军又击落1架美制4引擎运输机，当时该机正向缅甸境内的残军隐藏地空投供应，这更使美国国务院的处境十分尴尬，不得不表示愿意协助国民党残军遣返台湾。遣返工作从3月14日开始，残军由美国飞机从老挝南塔空运到老挝的会晒，渡过湄公河即乘大卡车运往清莱，在清莱再乘飞机撤往台湾。到4月12日撤台告一段落，先后撤台人员共计4521人。柳元麟回台湾后，任“国防部”作战督察研究委员会委员。

留缅残军各寻出路

1961年5月，柳元麟总部撤台后，“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番号随之撤销，台湾即停止了不愿撤台残军的一切供应。留在缅北的残军5000余人，则分别由段希文、李文焕、马俊国掌握，各自为政，各霸一方。不久，因生活

补给没有着落，残军人员纷纷逃亡，各自寻找出路。原第 25 师师长曾德兴率部 500 余人，窜到老挝，投靠老挝右派军队；马俊国率残部投靠台湾“情报局”，改编为“滇西行动纵队”，专门从事武装特务活动；段希文率第 5 军 2000 余人窜至泰缅边境的孟放、回中坡地区，收编吕维英从老挝富米带回的残部和屈鸿斋部，成立“东南亚反共志愿军”；李义焕率第 3 军窜踞泰老边境景康山区和泰缅边境的景老山区。

台湾当局为了控制利用段希文、李文焕，于 1961 年令驻泰国清迈代表杨文湘传达台湾的“关怀爱护”之意，要段希文、李文焕服从台湾决策。李文焕以“化整为零，以求生存”拒绝把部队撤往台湾，并对其部属说：“总部叫别人去台，我管不着，13 师是下去的，镇康弟兄我要带着，弟兄们去台湾回不了家，见不了爹娘。”杨文湘向台湾报告：“李文焕不会将武力用于反共，主要留用在当地做大烟鸦片生意。”段希文在一次招待台北要员的宴会上说：“有人指责我违背上级命令，才陷入今天的困境。如果上级认为我还有用，我当鞠躬尽瘁，否则唯盼了清一切手续，候命行止。”从此，台湾停止了对第 3 军、第 5 军的补给。

1963 年，台湾当局为了配合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和配合东南沿海的军事窜扰，又先派“情报局”副局长沈之岳、“特情室”主任徐仁隽、“监察委员”段克昌等赴泰北，到段希文、李文焕两部“视察”，以恢复补给为诱饵，策动两部对云南边境进行心战策反，窜扰破坏。段、李二人也有求于台湾补给，所以从 1963 年至 1966 年 9 月 30 日多次由第 3 军、第 5 军派出小股武装向云南路西、孟连、沧沅、镇康等县进行武装窜扰。残军虽被解放军边防部队打死 27 人，俘虏 11 人，但台湾当局仍要段、李两部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否则不予补给，段希文、李文焕却因感到窜扰云南边境费时长、损失大，因而停止了窜扰行动。1966 年 10 月和 1967 年 3 月，蒋介石、蒋经国两次亲自召段希文、李文焕到台湾，商谈 3、5 军统一合作事宜，原则上同意恢复对国民党残军的补给，但未作具体承诺。1968 年 3 月，台湾又派罗汉青到曼谷，发给慰问金 2 万美元，继续商讨“节制”问题；年底，台湾又单独召见段希文；1969 年 5 月，蒋经国亲赴泰国；7 月，又派参谋次长易瑾、特种作战部队司令夏超到段、李两部商谈补给整编问题，条件是要兵不要官，老弱一律不要，军官重新调整，整编后由易瑾、夏超、项成豪任正副指挥官、参谋长。段希文、李文焕召开骨干会议研究，认为台湾条件苛刻，旨在瓦解其部，从而拒绝了台湾的条件，不接受改编。1970 年 1 月，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周中峰、“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再赴泰北，进一步压段希文、李文焕接受改编。段、李两部从两次撤台的教训和本身利益出发，怕改编后丢掉老本，但又想到台湾的补给，很是矛盾，因此长时期讨价还价，却始终不同意改编。

残军余部投靠泰国

段希文、李文焕多年乞求台湾补给无望，决定投靠泰国政府。从 1970 年 2 月至 10 月，段、李与泰国军方经过 6 次会谈，于 10 月 17 日正式达成协议。泰国军方同意残军 3、5 军以“移民”方式进踞泰北境内，青壮年编入泰国地方自卫队，待遇与泰边防警察相同，担任泰、缅、老边境一线的驻防和防共任务，老弱病残的官兵和家属迁入泰北清莱府帕蒙山和雷峦山居住、生产，每人分地 1 莱（2.4 亩），由泰国军方供给 1 年的生活费，从 1970 年 10

月份起进行补给。台湾获悉后，通过原总指挥柳元麟专函致段希文、李文焕，劝阻 3、5 军不要接受泰国补给，有什么困难，台湾都同意解决。1972 年 10 月叶翔之再次赴泰向段、李表示，愿意恢复补给。此时台湾政府已被逐出联合国，尼克松、田中相继访问中国，段希文、李文焕认为此时接受台湾补给“害多利少”，当即拒绝。李文焕通知所属部队：“余意：没有补给 10 余年，我们都撑过来了。现在国府日趋困难，日本驻台大使馆已关闭，中共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互派大使，泰国承认中共亦不会长，我们如再接受国府补给，短时期内官兵生活固可稍加改善，但泰国与中共的后压力必定很大，到时非逼着撤台不可……因此要求各部不准台湾特务人员进入驻地。”

残军进入泰北后，曼谷的大学生发表声明称：“泰国国土不可侵犯”，“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军队在泰国国土上”，要求残军“撤出泰国国境”或“解除武器”。残军知道缴出装备就意味着死亡，但泰国军方还是要收缴，残军只好一面交出旧式武器，一面再向商人购买新式武器，既应付了舆论，又更换了装备，以免被吃掉。

1970 年 12 月 8 日，“联合指挥部”在昌孔成立，由泰军草信少将、吞通上校为正、副指挥官，由残军第 5 军参谋长陈茂修为联络官；由 3 军、5 军抽调人员，组成“剿匪”部队，分别进驻泰老边境的帕蒙山和雷峦山。随后 3 军在帕蒙山成立帕蒙总队，兵力增加到 850 人；5 军在雷峦山的密耳成立“莱弄指挥部”，兵力增加到 800 人。从 1971 年 7 月到 1973 年 11 月先后“剿匪”作战 8 次。如叭当战斗，在段希文指挥下出动 700 余人，由段国相率敢死队一举攻克叭当，将游击队赶出湄公河。该役残军战死 70 余人，负伤 300 余人，占“剿匪”部队的一半。泰国军方授予段希文 1 枚勋章，并慰问作战部队，对伤残官兵发给公民证，对参战官兵发给居住证，并批准 3、5 军编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希文为指挥官，李文焕为副指挥官，编制为 1500 人，属泰国陆军“保安司令部”指挥，由泰国军方供给粮食和弹药，不发武器，打仗时由军方临时供给，或由泰军配属炮兵。“联合指挥部”在清莱设立“分指挥部”，在唐窝、美斯乐设有“联络处”，残军内部仍称“3 军”、“5 军”，国际舆论仍称“93 师”。

1980 年 6 月 18 日，段希文死于泰国曼谷，由副军长兼参谋长雷雨田升任军长和“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指挥官。

1981 年春，泰国政府在泰国中部修建一条以彭世洛为中心、由西向东的横贯公路。公路修到考牙山麓时，遭到当地民族游击队的阻击，修筑公路被迫停顿，于是泰国军方命令残军进攻考牙山游击队。考牙山位于泰国中部密索至汪沙公路北侧，海拔 1290 米，残军出动 500 人，由陈茂修指挥，青年指挥官杨维纲为前敌指挥，会同泰军“黑豹军”，于同年 3 月击溃游击队，从而得到泰国军方的赞赏。战斗结束后，泰国空军派 4 架专机将残军送往清迈，并在清迈当地举行了“欢迎会”。泰国报纸大幅报道残军“功迹”，泰国《民众日报》誉称残军为“山老虎”。战利品被送到曼谷进行展览，死亡者被给予国葬，列名纪念塔，参战部队全部批准加入泰国国籍，发给身份证。泰国军方进一步控制了对残军的指挥权，在残军参加“剿匪”、护路期间，泰国军方每人每月发给 370 铢，每月补给泰币约 60 万铢，至 1981 年 12 月“护路任务”结束。

1961年国民党残军第二批撤台后，第3军、第5军官兵家属1500余人逃入泰北，被泰国移民局以“难民”身份安置在泰北7个村寨。1970年10月，国民党残军与泰国军方达成协议，同意残军老弱官兵和家属迁入泰北山区居住和生产，每人分给土地，由泰国移民局安置了6000余人在“难民村”内。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泰方为防止对中国的刺激，将“难民村”改名为“自立村”，意即村民要自立更生，依靠正当行业，发展经济，独立防卫。1980年，“自立村”由7个发展为13个：联华新村、和平新村、满堂新村、老象塘新村、万养新村、蛮丙贺肥新村、光武新村、帕弄光华新村、黄果树新村、美斯乐兴华新村、热水塘新村、回中坡新村、盘龙新村。经过20多年的变迁，至80年代后期，他们及其后代人数已逾4万人，但居住在村寨里的却不足3万人，因为有人在附近城镇出生，而已取得泰国国籍，可以自由移居泰国其他地方。

据1988年资料，清莱和平新村有400余户，粮食已能自给，居民不再种罂粟，而改种咖啡、茶叶、水果，但蔬菜还得向外族购买，村内有商店十多间，每逢街天（集市）更是热闹。各自立村均设有村长，多由国民党残军留下的老年军官担任；每个自立村有1个自卫队，人数从几十人至100人不等。13个自立村计有自卫队1000余人，多系本村残军的第二代、第三代中青年人。每村有1个由本村村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本村的一切事务，并秘密向过往商队或贩毒马帮征税。

泰国军方设有“三二七部队”，专门负责管制13个自立村，白天由陆军数人把守村口，检查出入证件，晚上自立村自卫队负责治安。1986年4月，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某负责人曾说：“自卫队先缴枪，经过甄别考查，是否忠于泰国政府后，再吸收他们加入泰国国籍，并重新发给武器，成立新的自卫队，但只能穿便衣。被吸收泰国国籍的只有2000余人，其他村民只能领取外籍人临时居留证，只能到离村100公里的地区活动，不准许出国，并严加管制，不准搞两个中国。”

台湾于1970年全部停止对残军的补给后，官方关系已经断绝，只有台湾“华侨联合会”、“难民救济总署”每年派人到泰北送给各种树苗、种籽并派遣农业专家帮助残军和其眷属发展农副业生产。为解决自立村村民子女读书的课本，又委托香港“集成书店”铅印课本，通过泰国“中华商会”供应自立村子弟学生，并派教员到这些子弟学校当教员，准许每年以奖学金形式接收自立村选送40名学生到台湾上学。每年“双十节”，自立村可派代表到台湾观光、观礼。“中华航空公司”曼谷办事处常派人以台湾“地下大使”人员身份到残军驻地视察，台湾当局有时还派记者到泰北采访。

残军尽管生活极不安定，但中文学校仍以各种形式继续开办，80年代末自立村共有中、小学校17所。泰国政府1984年6月作出决定，自立村的所有学校应受泰国教育法令的约束，应以泰文为主课，中文为选修课，每周授中文不得超过5小时。但学生学中文如饥似渴，师生就利用早晨和晚上非正课时间，系统补习中文，这样既不违背泰国法令，又可以学好中文。有个训导主任风趣地说：“邓小平主张一国两制，我们搞的是一学两制。”“只是为了把中华文化传给后代，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骨血啊！”

1950年逃往境外的残军官兵，现在多是60岁开外的老人了，他们多数和缅甸、泰国的华人和当地少数民族结婚，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能讲云南话，大多数人不懂缅老语，形成了一个与住国隔绝的封闭社会，保留着中国人的传统风尚，并有不少人定居于泰国其他城镇，从一些夜总会、酒吧间的歌女、招待员的身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形影。泰国一些华文报社的排字工也占相当的比例，因为他们的中文水平较高。这些年轻人出生于泰国医院，根据泰国国籍法的法令，他们自然获得了泰国国籍。他们努力工作、学习刻苦，有中华民族意识，但不大关心形势，对前途彷徨苦闷。在泰国北部的一些城镇可以看到相貌酷似云南人，讲着一口云南话的青年男女骑着摩托车在街上驰骋——这就是残军后裔的形象。

第五节 东山岛之战

蔡斯提议袭击东山岛

这是 1953 年 6 月底的一天，蒋介石正闷郁不堪，忽报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团团长蔡斯求见。

刚刚入座，这个趾高气扬的客人就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几年以来，我们双方朝夕操练，海陆空三军并用，以敌前登陆为目标的训练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孙司令要我去看过，我也满意，希望总统也去看看，准备出击。”

在平时，对美国有关“反攻大陆”的一言半句，蒋介石都万分激动，而眼下，韩战败得惨，自己的部队不但没有派上用场，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而美方还要按照几年前的计划“反攻小岛”，蒋介石已吊不起什么胃口，但也不能表示不干，当下陪笑道：“我想起来了，团长的意思是，要我们这支苦练了几年的精兵，按照预定计划，出击挨着广东的福建东山岛？”

蔡斯道：“对对，是时候了！”

蒋介石一怔道：“怎么是时候了？你们在韩战场不好好地打，这 6 天之中，对方来了个反击，就解决了联合国 26000 人。李大统领 4 个多精锐师给击溃，对方阵地向前推进了好几公里，连战斗机都来不及起飞就给拿走，你们不但不如把劲支持李大统领的反对停战，反而还要与共党继续停战谈判。”蒋介石摇摇头道：“我对你们的做法实在不乐观。”

蔡斯冷笑道：“你说得对。可是你也忘了，突袭东山岛的计划，正是你们订下来的，也是你们要我们顾问团负全责供应装备、训练进攻的。老实说，这种帮助完全为了你们打算。请问：突击一下有什么用呢？特别是那个小岛，你要我们美国海军去守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赞成，因为这一来可以使自由中国的威信提高起来，可以使共产党顾此失彼。特别是今天，你既然明白我们在韩战场非常不利，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利用突击东山岛的胜利，以呼应韩国战线，来振奋联合国声威，并且削弱共军对韩战场的支援呢？”

经蔡斯一说，蒋介石心里也跃跃欲试，企图为自己争回哪怕芝麻粒大的“面子”，于是就顺水推舟道：“也好，既然团长这样有兴趣，我们自当按照计划办事。不过有言在先，第一，希望你们支持；第二，一旦登陆，最好占领，这一点就必须你们派出舰队，否则或许有变。”

蔡斯笑道：“第一点好办，这次出击的部队，从头到脚，从降落伞到运输舰，无一不是我们美国的东西。”

蒋介石插嘴道：“希望你们不但要派顾问去，并且希望多派几位去，因为我们没有陆海空三军敌前登陆和立体作战的经验，此外还希望派去的顾问在官衔上要高些，这样可以鼓励士气。”

蔡斯在心头骂道：“这分明是要拖美国落水嘛，你这老狐狸！”嘴上却说：“顾问是一定要派的，而且人数也一定比前几次小规模突击要多，因为突击东山岛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至于占领与否，要看具体情况，原则上恐怕还是不占领为妙。你大胜而归，声威不小，你给他撵走，就前功尽弃了。”

蒋介石道：“那么，舰队……”

蔡斯笑道：“第 7 舰队当然是防卫台湾的，要它出动，还得问问白宫。”

蒋军将领认为袭击必胜

送走蔡斯之后，蒋介石立即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众将领都认为此番出击，没有理由失败，因为东山岛上并无正规军防守，而且孤立海中，来个突然袭击，对方必定措手不及。于是，个个摩拳擦掌，仿佛不战也能“攻克”。

受此气氛感染，蒋介石也颇为兴奋，道：“我们来到台湾，已经5个年头，再不显点颜色给他们看看，我们也太对不起‘南朝王师’的大陆同胞了！我们一到东山岛，岛上老百姓一定盛情欢迎，风声远播，那么我们反攻大陆便更有望了。而且联合国军正在前线受挫，我们这次胜利，定必大收鼓励士气之效。”说到这里，蒋介石仿佛看到了“青天白日旗”已插上东山岛：“你们凯旋回来，美国的贺电也跟着就到！你们别忘记我们在南韩争取战俘归来，目前困难重重。虽然三方面合作，把不肯来台的共产党打死了许许多多，但是我们不希望把他们都弄死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东山岛大捷，这批战俘便很可能到台湾来了。总而言之，这一次你们出击的意义重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定个日子出发吧！”

经研究，会议将袭击日子定在7月16日，出发地点包括金门、左营等地；计划海路动用兵力1万余人；另遣200余名伞兵助战。

出发前空军侦察报告：“东山岛上有部队”，但美、蒋双方研究结果，认为共产党忙于抗美援朝，区区小岛，不可能驻有重兵；攻其不备，必操胜券。再说，此番出击动用了飞机、军舰、伞兵……必获全胜，于是按照原定计划汇合，趁着明月将圆，视野辽阔，纷纷准备登机上船。

空降部队首次出动

7月16日凌晨，200多名伞兵在台湾新竹机场集合待发。机场上，一位美国军事顾问正不可一世、趾高气扬地对他们训话：“你们是精锐之中的精锐。再过两小时，你们脚下便是东山岛的土地，便是共产党的土地，你们英勇地降落之时，便是共产党溃败的开始！”

“记得在空降训练之初，我们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你们大规模的空降；另一方面是特殊训练。个别的或者是三三两两地空降，但两者的目标相同：大陆！想当年你们中间有跌破头的，有跌断手的，甚至还有好几名牺牲了的。可是你们便是最好的证据：自由中国是可能建立空降部队，这使我们美国朋友十分兴奋，同时对推翻北平，也增加了信心。

“为什么我们要出击东山岛，我想我们必须弄清楚：在众多理由之中有一点：就是为了给韩国战场获以鼓励！我们攻占了东山岛，意义重大，等于在韩战场打了个大胜仗——不，超过了在韩国打个大胜仗！”

“现在，你们该检查一下全身的东西，像我们著名的球队出赛那样，希望你们的心情不必紧张，要把周身的细胞都松弛下来，直到跳离机舱之前，才把精神集中起来，并且运用你们的智慧和武器！”

最后，那位军事顾问得意忘形他说：“这是反攻大陆的第一天，也是伞兵出动获得胜利的第一天。预祝你们胜利，我们等在机场上欢迎你们胜利归来！……”

伞兵总队长顾保裕也要求部队“不成功，便成仁”。

4 时整， 16 架军用运输机在新竹起飞，直飞位于西南方向的东山岛。

这批伞兵被认为是蒋介石的“血本”。他们都经过美军长期的精心训练，从头到脚都是美国装备。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抗日战争时就开始受伞兵训练，有的已经是 10 年以上的“老兵”了。这次窜犯东山岛前，策划者首先在伞兵内部苦心拼凑，然后又把他们集中起来专门训练。据后来被俘的国民党伞兵中尉分队长张永春和少尉分队长张建民说：“在窜犯东山岛前，美国在台湾的所谓军事顾问团人员就紧张起来，给伞兵‘紧急授课’，传授所谓爆破术和美式通讯器材的使用法。7 月 1 日，伞兵就在美国军事顾问团指导下进行了‘沙盘演习’，7 月 8 日又在台湾八德飞机场举行‘菱形岛’（东山岛如菱形）降落大演习，演习时美国军事顾问团团团长蔡斯和蒋军空军司令王叔铭都在场打气。”

胡璉指挥万人抢滩

在伞兵出动的前一天，7 月 15 日 21 时，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上将司令长官胡璉，率领 45 师（欠 133 团 2 个营）、18 师 53 团和海匪 1、2 突击大队等部计万余人，分乘舰艇 13 艘，由金门后航驶向外海。

胡璉是 1949 年 10 月底人民解放军攻打金门岛失利后发了官运的国民党陆军上将。在国民党军界，他虽被讥为“匹夫”，但金门岛一战后，他几乎比任何一位国民党军星都耀眼夺目。所以，突袭东山岛这一国民党军的“反攻大陆前哨战”就由胡璉来指挥了。

胡璉久经战阵，小心谨慎。他认为位于泉州的解放军要增援东山岛至少需要 3 天，其间最关键的又是漳州附近被国民党飞机炸毁的九龙江大桥，因为在泉州到东山岛 270 公里的道路上，九龙江大桥地扼要冲，此桥未复，泉州援兵便不能南下东山；援兵不到，他便有 3 日内拿下东山的把握。

7 月 14 日中午，他是在得到空军关于九龙江大桥仍未修复的报告后命令开始行动的。

夜色中，舰队在悄悄地航行。指挥舰上，美国顾问不可一世。他双手叉腰，立在舰桥上训话道：“再过几十分钟，我们就不能说话、亮灯，发出不该有的声音了。”

“当天明之后，当我们展开拂晓攻击的同时，我们的空降部队会及时来到，当我们海陆空三军的立体战斗、敌前登陆成功时，东山岛上便会飘扬着我们的旗帜。我把摄影能手带来了，希望他在诸位努力作战的时刻，可以拍摄到很多沙龙！”

听完训话，士兵们却有另一种疑惑，有人说：“东山岛上没有守军，这个消息值得怀疑；后来有人说侦察机发现了部队，我们又该怎样调整火力？”

一个连长道，“管他妈的，反正东山岛一点儿大，我们有万把人登陆，怕什么？”

另一个排长说：“话虽这样讲，可是共产党的民兵很有几下，我们也不能不防。”

连长道：“没什么，咱们也好久没动了，也该出来活动活动，开开洋荤啦！”

那万把人偷偷摸摸来到东山岛前，按照预定计划，要在月亮下去之前，不但建立滩头阵地，而且要占领制高点。

16日4时40分，从台湾起飞的运输机和歼击机掠过胡璉编队上空。此时，登陆部队也已换乘完毕，胡璉命令部队抢滩。

海防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东山岛是福建的第二大岛，面积为165平方公里，人口约83000，是闽南的海上屏障。驻守东山岛的是解放军公安80团两个营（欠1个连）。

国民党军在金门的异常动向为当时设在上海的华东军区指挥机关获悉。7月15日23时，华东军区通报：

金门匪首胡璉亲率正规军4个团、海匪4个大队，在海空军配合下，于15日晚9时自金门出发。

福建军区首长判断，敌若往北，可能突袭南日岛，平潭岛，往南则可能突袭东山岛，因为它们距金门均约150公里左右，正好是一夜航程。其中敌最可能攻击的是东山岛，其次是平潭、大嶝及厦门岛。

16日1时，福建军区首长决定：如果敌进犯平潭、南日、大嶝、厦门，驻军坚守，后续驰援；如果敌进犯东山，守岛部队则在抗击后撤离，因为东山岛面积大而兵力太少。福建军区首长对东山岛守军特别指出：留1个精干营进行机动防御，非战斗人员在拂晓前掩护东山县党政人员转移出岛，守岛部队如遭敌优势兵力进攻，可相机转移。

16日4时50分，我东山岛驻军公安80团团长江梅耀，正根据上级命令组织撤离，忽然接到敌在岛北八尺门渡口附近上空空降的报告，游团长立即命令该地的水兵1连，坚决守住渡口，他将立即派兵增援。话音刚落，又报敌在岛南的亲营登陆，有千人之众。游梅耀略作思忖，知道来者不善，因为敌动用伞兵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敌伞兵封闭了八尺门渡口，按原计划撤离东山已不可能，岛上人员只有坚守待援，于是他命令位于八尺门渡口对面的陈岱的团后勤派兵渡海南来，支援水兵连打敌伞兵，这一招起了重要作用。

上级同意游团长坚守待援的决心，并命令就近的272团驰援东山，命令泉州附近的82师等部火速增援。中央军委也命令广东军区的122师急速东进，配合作战。

伞兵降落后林村

在我军各级指挥所文电往来，调兵遣将之际，东山岛上已是一片火海。

4时45分，正准备撤离的水兵1连官兵大部已上船，岸上只有连长和6名水兵，当发现敌伞兵在后林村西山降落时，他一边命令岸上水兵返回仓库拿机枪。一边向游梅耀团长报告情况，并派人把上船的士兵叫下来。

三五分钟后，水兵连7人手中的4挺机枪一齐对空开火，敌机队形被打乱，跳伞高度也从200米上升到1000米，降落次序混乱，有的掉落海中。

6时许，后林村的民兵也加入作战，他们一起依托300多年前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击倭寇时构筑的古寨断垣，寸土必争，与敌伞兵展开血战。

8时许，公安80团后勤派来的1个排在八尺门渡口登陆，与水兵连一起作战，控制着渡口。

敌伞兵本来信心不足，经我军一阵打，就更加慌张了。据被俘的伞兵中尉分队长张永春说：“解放军的对空射击火力真猛，打得飞机不敢低飞，有的飞到两三千米以上的高空就慌慌张张地把伞兵丢下了。我领跳的时候就觉得事情不妙。”敌伞兵1大队重兵器中队2分队中士副班长邱新林慌张得落地时连基本动作都忘记了，一下子就扑跌在地上，上胸受伤。我军俘虏他后，马上把他送进医院进行紧急治疗。他说：“我在跳伞时就知道凶多吉少，但想到不跳下来回去也是给枪毙，只得闭着眼睛朝下跳了。”

在我军猛烈而有组织的火力射击下，有的伞兵没有碰到东山岛的一块地皮，就在半空中断了气，变成“空中僵尸”摔到地上，有的带着伤跌落下来。

侥幸不死的蒋军伞兵乱七八糟地降落在岛上后林一带山区。他们还没有站住脚，岛上的人民解放军、民兵和人民群众就立即向他们展开了严密的围剿。

登陆部队进展困难

胡璉部队登陆不久，伴随着一阵军号，我军枪声四起，将那匍匐行进、辛辛苦苦进得几尺的蒋军，一下子逼退回沙滩。

眼看就要下海，可美国顾问当下要他们集中兵力，夺取高地，同时利用东山岛四周是海的特点，避实就虚，改变目标，硬攻强占。

接下的情况，使美国顾问不禁烦闷。他拿着望远镜，立在舰桥上遥望战场，队伍虽然是登了岸，但伤亡惨重，没法登上山顶。

“怎么搞的？”美国佬问舰长道：“这样打法，还谈什么反攻大陆？”

那舰长道：“不过据我所看到的，今天这一仗如果说他们打得不卖力，那真是不公平了。”美国佬喃喃地骂道：“我不管什么公平不公平，我们的工作是要你们登陆成功！”他皱眉：“你瞧，整个小岛有多大？天不亮就登陆，狗娘养的到此刻还没有结果。”

那舰长又急又气，回答道：“你瞧那个方向，仰攻，侧攻，空中扫射，实在打得很惨，我们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美国佬狠狠他说：“我总怀疑你们的战斗意志。”

舰长道：“这次实在不能怪我们了，人都是百里挑一挑出来的，个个生龙活虎，武器配备都是你们最好的，此外还有伞兵和舰艇，今天如果不能得手，那真是不可思议。”他满有把握地说：“我想你不必着急，再过一会，就可以看见山顶飘扬起我们的旗帜。”

那美国佬还没开腔，惊天动地一声响，一艘小型登陆艇已被击中，爆炸起火，迅速翻沉；美国顾问顿脚道：“脓包哪！脓包，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那舰长一听，心都寒了。正待说些什么，空中又一声爆炸，1架战斗机也被击中，爆裂开花，两个火头向山上垂直坠落，把那舰长吓呆了。

美国佬狠狠他说：“这不行，得赶快想办法，把第二线开上去！”舰长当下传达命令，第二线兵力接着涉水上岸，匍匐行进没有几步，又被猛烈的火力压了回来。

蒋介石坐等“胜利”消息

两股部队出动后，国民党设在上林的电讯总站便开始忙碌，工作人员里

里外外，跳出跳进，紧张等待东山岛登陆的消息。蒋介石在黎明前稀里糊涂醒来，问：“登上东山岛了没有？”手下告诉他：“刚才来电报，说东山岛已经在望，他们都准备好了。”

蒋介石没法再睡，干脆起床在厅中守候。蔡斯、蒋经国等人早已凑在一起，有的吸烟，一支接一支；有人喝咖啡，一杯接一杯……

踌躇满志的蒋介石所听到的战情报告，不是说：“战况激烈，伞兵业已投入战场，收获极大”；就是说“这一次把他们杀了个措手不及，我们一上去就占便宜”。

消息无一不对自己有利，可是时已过午，还接不到占领东山岛的消息，蒋介石开始忧心忡忡了。

蒋经国安慰道：“一定是因为我们侦察机去了几次，引起他们注意，临时增加了兵力，因此延长了我们攻占的时间。”

蒋介石心头结了老大一个疙瘩，绕室徘徊，感到花了这么大“本钱”竟不能当场见效，迷惘忧急，不可思议。

“前线指挥部”来的报告，仍然对攻方有利，可是时已人晚，还不闻占领东山岛的消息。蒋介石面对那幅沿海地图，眼见东山岛在上面只是一点儿大，但出动1万多人，海陆空三军“立体攻击”竟然毫无办法，而且飞机已经毁了两架，小型登陆艇也已沉了3艘，伤亡数字虽未报来，但估计不会太少。如果真的大败而归，那今后在美国人面前更是无法抬头。

蒋经国的情况比他还窘，因为蔡斯就坐在他的身边，每一道电报，每一个字，他都极端重视，不是说：“怎么回事？”就是说：“得想办法。”把蒋经国窘得无法回答。蔡斯忽地叹道：“瞧模样，那些伞兵都完了！”

孙立人道：“不至于吧？”

蔡斯道：“如果伞兵还在作战，怎会到此刻还没下山头？伞兵当然降落山头，不可能降落海里的。”

接下来没人愿意多说一句话。只听蔡斯哇啦哇啦，吹二次大战时美国兵的登陆与作战，统帅如何了得，将领如何机智，部队如何勇敢，战斗如何激烈，无一不反衬了蒋介石的无能，以及美国最新装备放在蒋军身上是如何“可惜”。

蒋经国悄悄地命电台给东山前线发了个急电：

限即刻到，×密。东山岛之战关系国际视听，务盼协力以赴，于黎明前予以攻占。

中正

那前敌指挥接到电报，真是万念俱灰，不知如何是好。拂晓突袭竟未得手，已经凶多吉少了；整整一天毫无成就，意味着这一仗只得准备开溜；夜间对方生龙活虎，能不被歼灭已属万幸，如今竟要他们在黎明前占领，岂非笑话？

战斗英雄黄飞龙

早晨的雾还没有消散，从海面上传来马达声。突然一颗一颗蓝色的白色的信号弹，透过薄雾，指向天空，敌人的坦克爬上来了，敌机在天空掠过，敌人的大炮盲目地轰击着。

“同志们，沉着地打，争取为人民立功！”这简短有力的话，是守岛部队6连阻击排火力班副班长黄飞龙在动员战友们。

大约有1个排敌兵爬上来了，标尺1500米，1300米，1200米……

敌人已落在我军的火力网中了，“打，狠狠地打！”黄飞龙立即下达射击命令。

重机枪吐出愤怒的火舌，敌人成批地倒下去了，滚下去了，敌人被打退了。

敌人恼羞成怒，又拼凑更猛烈的火力，向我阻击班轰击。他们以1个连的兵力，继续向我军阵地运动，敌临近我军阵地时，重机枪又开火了，敌人又被迫退了下去。

战斗激烈地进行着，重机枪猛烈地吼叫着，黄飞龙突然发现机枪防火帽快要掉了，这样，喷出的火苗就会增大，敌人就会很容易发现机枪阵地的位置。

怎么办？这时机枪打得快发红了，热度很高。黄飞龙毫不犹豫，用右手握着防火帽，一阵剧烈的刺痛烧痛，使他全身抖了一下，他咬紧牙关，拧紧了防火帽，右手烫起很多的泡。

敌人不能从西南方向攻下重机枪阵地，便从东北方向运动，企图从我方阵地后面来压制我军，黄飞龙立即指挥全组转移射击方向，架好机枪，瞄准时，才发现前面有一片荆棘挡住视野。在敌人炮火不断的轰击下，黄飞龙奋起跳出阵地，顾不得刚才的烫伤、荆棘的刺痛、鲜血的流淌，用双手排除了障碍。重机枪向着敌群又怒吼起来。

激烈的战斗中，黄飞龙的重机枪组，配合阻击排，连续打垮了敌人5次进攻，钉住了敌人4个钟头，给我军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的战斗条件，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通讯员传来转移的命令。接下来，阻击排最重要的任务是抢先占据一个黑色石头的山岗。黄飞龙立即组织全组转移，途中，正射手腿部中弹，黄飞龙立即抢前扛着机枪筒，继续前进。

当他们到达一个小山头，刚架起机枪要打时，一颗炮弹打来，副射手又负伤了，他吩咐副射手撤到安全地方去。这时，他感到自己的头上一阵痛，血顺脸往下流，滴在衣服上。

眼看着自己亲爱的战友被敌人打伤、牺牲，旧仇新恨，涌上心头。他回过头往下看，敌人正拥爬上来。他忘记了伤口的疼痛，抓住机枪向敌人一阵猛烈的扫射，压得敌人不能前进。

突然，“克擦”一声，机枪不响了，机枪子弹打完了。

敌人又涌了上来。这时，黄飞龙迅速地摸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拉开导火线，像巨人一般站立起来，扑向敌人。

“轰”的一声巨响，在敌尸四飞的时候，英勇的黄飞龙为祖国光荣地、壮烈地献出了生命……

战后，福建军区政治部整理黄飞龙烈士事迹上报，经华东军区政治部批准，追认黄飞龙烈士以“福建军区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

公云山高地阻击

7月15日深夜，警惕地守卫在祖国福建东山岛上的人民解放军某部第2

连的连部里，举行了紧急会议。

“……情况就是这样。准备战斗。”连长郑德修用简短的命令结束了会议。

祖国海岛上的村庄依旧十分安静。战士们用熟练的轻捷的动作，迅速进入公云山高地，指挥员周密地检查了兵力的配备和火力的布置情况，战士们又一次擦拭始终保持着洁净的武器。大家满怀胜利信心，准备痛击敢于来犯之敌。

16日清晨5时，1000多蒋军向公云山高地涌来，激烈的战斗打响了。第2连的指战员们接到团长的命令：“坚守公云山高地，把敌人钉住在高地前面，等兄弟部队上来围歼！”这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回答团长的是连长郑德修的坚决的声音：“请首长放心！”

从上午9点钟开始，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向公云山高地进行连续不断的攻击。当敌人接近公云山高地的时候，突然遇到了解放军战士们猛烈的射击和手榴弹。敌人没来得及还手，就连死带活地滚下山去。以后敌人几次冲锋也都被打垮了。

2连6班的阵地，在公云山高地西部左边的山腰间，是战斗最激烈的一个地方，敌人对这里的轮番冲锋几乎一直没有停息。在紧张的战斗中，副班长江顺珍负伤了，战士王旺炎接过副班长的机枪，把爬上来的敌人扫了下去。枪管打得烫手，他脱下鞋子垫着打。下午，王旺炎也负了伤，子弹穿透了他的腰。但是，他知道，现在6班的同志们，一个人挡着十几个敌人，少一个人就少一份守备力量，他包扎了伤口，英勇地继续战斗。

6班的勇士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冲锋，成批地杀伤了敌人。这时候，阵地上飞快地传播着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兄弟部队打得真漂亮，敌人伞兵一下就给我们歼灭啦！”

战士们欢欣鼓舞地互相保证说：“我们也一定把敌人钉在这里，最后歼灭他们！”

黄昏，战斗更加激烈起来，高地周围的交通壕被敌人占领了，山头上硝烟滚滚，敌人借着烟雾从正面和侧后爬上山来。

战士们知道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他们利用点滴时间不断地从敌人死尸身上搜集子弹，把六 炮弹的保险针拔掉代替手榴弹。负伤的士兵继续坚持作战，文化教员、炊事员也赶来参加战斗。敌人在2连英雄们面前依旧被打得头破血流，垮了下去。这时，兄弟部队某部12连迅速赶到，团指挥所调来的火炮排也到达2连阵地，大大地鼓舞了2连指战员们的胜利信心，也大大加强了坚守公云山高地的力量。

敌人当晚几次绝望的进攻，又被打退了。英雄的公云山高地，真像铜墙铁壁一样，使疯狂的敌人不能前进一步。

一网打尽敌伞兵

东山岛我军被围、被分割，进行浴血奋战之际，福建、广东朝东山岛方向的各公路干线都战车波浪，各增援部队纷纷赶赴战区。

泉州、漳州沿线的地方客货运输车辆纷纷向泉州、漳州集结，车上的旅客就地下车，货物卸在路旁，后面的车辆继续前进。

漳州附近的九龙江大桥，14日中午敌机侦察时尚未修复，但晚上工兵

们已把桥板架好，所以战斗一打响，我军的汽车源源而过，很快向东山集中。

我军援兵部队最先上岛的是 272 团 3 营。他们于 10 时 30 分上岛后，协同公安 80 团部队，牢牢控制了八尺门渡口，但岛上敌我对比，仍是 10 比 1，战斗仍然激烈紧张。

但我军勇猛迅速，蒋伞兵根本无法集合整队。降落在山里的蒋伞兵乱得东一团西一堆，有的盲目打枪，有的干脆藏到山沟和石缝里去。我军副排长林士墙带着几个战士向前搜索，发现有两个蒋伞兵正在胡乱地射击。副班长谢感猛地从他们侧后扑去，林士墙从正面冲上去。林士墙大喝一声：“缴枪不杀！”一个蒋伞兵慌忙丢枪投降，另一个还想挣扎，林士墙举起枪喝道：“你想死！？想活！？”这个伞兵也就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11 时左右，我军分割包围了所有的蒋伞兵，岛上的民兵和群众也张开了搜捕伞兵的天罗地网。我军某部 5 连 4 班赶上一座山头，刚到上面，一群蒋伞兵也拥了上来。4 班战士扔出一串手榴弹，敌人就连滚带爬地逃下去了。

4 班长带领战士跟踪追击，追到山脚下，忽然一个敌人也不

见了。4 班长突然向着稻田大声喊道：“不要躲了，赶快缴枪！”马上有两个伞兵拖着浑身泥浆从稻田里爬了出来，其中一个一面爬上田埂，一面还在撕着帽子上的国民党党徽。4 班抓了两个俘虏后，又继续进行搜索。他们发现在路旁又有一个奇怪的上堆，战士许庆森立即上去扒了一下。这个“土堆”忽然动起来，一个从头到脚都涂满了泥土的伞兵爬起来投降了。

就这样，东山岛上的人民解放军、民兵和群众从所有的角落里，把蒋伞兵一个个搜出来。前后不过八九个钟头，200 多个蒋伞兵就被一网打尽。号称蒋军“精锐之中的精锐”就这样一败涂地了。

台湾吹嘘“东山岛大捷”

八尺门渡口血战之时，国民党军登陆部队终于在亲营、湖尾村上了海滩，他们以 21 辆水陆坦克为前导，很快占领了东山县城。游梅耀根据收拢部队、坚守主阵地的决心，命令各前沿部队迅速收缩，与主力汇合。但由于敌进展较快，1 连 1 排被困于马鞍山地段，全部牺牲；1 连连部及 2 排被围于官路尾，也无一生还；县公安大队也因未及时转移被围，伤亡过半，但千方百计回撤到位的部队坚决扼守主阵地，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16 日午后，东山岛除公云山、牛犊山、王爹山 3 个主峰和八尺门渡口共约三四平方公里的地方仍在我手外，其余均陷敌掌。这时胡璉已迫不及待向台湾报告，他已夺占东山岛。台湾开始祝捷，吹嘘“反攻大陆的序幕已经拉开”，“东山岛大捷”，“东山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云云等。

然而，坚守公云山高地的公安 80 团 2 连，不畏敌人的三面包围，仅凭 7 个土木堡、200 多米长的堑壕和长不足百米的土坑道，已打退国民党军 18 次冲锋。272 团 12 连前来增援后，他们又一起击退国民党军 13 次冲锋。天黑时公云山高地前躺着 413 个敌人的尸体。

坚守牛犊山主阵地的公安 80 团 5 连与 6 连互相配合，当敌一度夺取前沿部分表面阵地后，他们组织力量反击，夺回阵地，尔后又打退敌 1 个营的 5 次冲击，毙敌 200 余人。

进攻王爹山主阵地的国民党军，也始终未能突破核心阵地。

16 日入夜后，战斗仍十分激烈。因解放军增援部队仅 272 团 3 营上了岛，

其余仍在赶赴途中，岛上我军兵力越来越少。

东山岛战争落下了帷幕

16日23时，敌指挥机构在3路主力部队进攻均无大的建树的情况下，决定加强兵力，孤注一掷，将一直充做预备队的53团投入战斗，妄图以此在天亮前拿下我军这3处主阵地。

然而，台湾军事当局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7月17日凌晨，我军增援部队272团接替了公安80团的阵地，而28军的82师和41军122师先头团等大部队已渡海进入东山岛。

41军122师先头团——365团登岛后，即于凌晨5时向五爹山方向的敌军展开攻势，以减轻我主阵地的压力。28军82师244团登岛后亦以迅猛的动作从左翼发起冲击。

登岛后曾一度幻想凭借优势兵力攻占东山岛的国民党军，此时已感到战局正朝着于己不利的方向发展，为避免被我军分割包围，遂决定收拢部队，寻找有利时机尽快突围回撤。

鉴于敌军已经动摇和准备溃逃，福州军区指挥机构果断地决定，不待增援东山岛的部队全部到齐，即刻命令已登岛部队向敌军发动全面反击。

反击作战的具体部署为：我登岛部队分西、中、东3路方向出击，最后聚歼登岛之敌于湖尾以西地区。

西路攻击部队由41军122师365团与121师361团3营组成；中路攻击部队由31军91师272团组成；东路攻击部队则由244团组成。

3路攻击部队中，打得较为艰苦的为东路的244团部队。

因此路方向的国民党部队担负着掩护主力部队回撤的作战任务，故尔拼死凭借险要地势顽抗。

当244团追击到柯塘山时，遇敌两个连兵力的阻击。敌人居高临下，而该山又陡又滑，担任攻击任务的该团2连1排，两次发起冲锋后，即仅剩下能够坚持战斗的9个人。再度攻击时，又被敌构筑的地堡火力打得难以行动。

眼见追击受阻，5班长张学栋为了保证进攻的胜利，决心与敌血战到底，不顾随时都可能牺牲的危险，端起机枪直扑敌阵，直冲到距敌地堡火力点10米处时，浑身上下已7处负伤。张学栋随手向敌堡投去一颗手榴弹，将敌机枪炸哑，当他艰难地向前爬行的时候，敌人火力点的机枪又响了。这时，伤势严重的他，在手榴弹和机枪弹夹里的子弹全部打光了的情况下，没有丝毫的犹豫，一面呼喊战友们勇敢冲锋，一面挺立起来，朝着敌人地堡扑了过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死死地压在敌人的射击孔上，为战友们夺取柯塘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53年7月17日下午6点，我军3路反击部队逼近了湖尾沙滩。

登岛的国民党士兵，眼见大势已去，唯恐被我军歼灭，纷纷拥向海边，争相夺船逃命。而前来接应的敌海军舰艇上的官兵，见状也慌了手脚，有的未等装满溃逃的敌兵，便抢着起航急驶。结果，被扔在沙滩上的部分国民党军士兵只得向我反击部队举手投降。

1953年7月17日下午7点，保卫东山岛的战斗落下了帷幕。

7月19日中共福建省委员会、福建省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联合组成慰问团，由福建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孟东波率领，前往东山岛慰问

人民解放军海防部队和协助部队作战的当地居民。慰问团带有大批慰问品和慰问信。随同慰问团前往的还有福建省京剧团、公路文工团、闽南文工团和7个电影放映队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部，也在18日派出该部文化部部长蒋峻基，带领来福建演出的华东军区解放军剧院话剧队、福建军区文工团歌舞队和电影队，并携带大批慰问品和慰问信，前往东山岛慰问海防部队。

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

东山岛战斗，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3379人，其中打死打伤2674人，俘虏715名，炸毁坦克2辆，击沉小型登陆艇3艘，击落飞机2架，并缴获轻重机枪109挺、无后坐力炮2门、六炮26门、火箭筒18个，还有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东山岛战斗胜利后，中央军委打电报嘉奖参战部队。

毛泽东评价说：东山岛的战斗不光是东山的胜利，也不光是福建的胜利，而是全国的胜利！

台湾的“检讨会议”

东山岛战斗结束后，蔡斯急忙前往慰劳美国顾问，并从那里聆取“溃败经验”。顾问们抱怨蒋介石的部队十分不济，有人说：

“从装备和训练来说，决不在共产党之下，而在共产党之上，因为美国的东西总是世界第一流的；但在士气方面，蒋的部队就远不如共产党，有如李承晚的部队那样，一触即溃，像一根糖做的手杖。”

蔡斯却想起了朝鲜的美国兵，也是一根糖手杖！便问：“到底损失情形如何？”

另一名顾问掏出小本子道：“也真可怜，1万多人去，只得七成回，一路上和各舰舰长料理善后，至少有3400名官兵出了事，包括伤亡2660人以上，被俘700人以上；途中不治或跳海自杀……”

蔡斯问：“还不到两天，从出发到归航才37小时，就死了这么多？”

“度日似年！”又一名顾问诉苦道：“这种样子的战争，守在台湾比出击好几万倍！我们一分钟一分钟挨着，实在难受！”

“其他损失呢？”蔡斯又问：“今天一早，他们还敢在报上吹牛，说是他们准备最久的一次攻击，我看这该是最惨的一次攻击了！”

众顾问皆叹气。一个说：“其他损失也不小，2架飞机、3艘小型登陆艇也没有了；轻重机枪100多挺、无后坐力炮2门、六炮26门、火箭筒18个也没有了，还有其他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品。这位‘运输大队长’当着我们的面，又把大批美援转送给共产党了！”

而最使蒋介石难堪的，莫过于双方的“检讨会议”了。他没有出席，但蔡斯的声音还是很快就能传到他的耳朵里。

“这是不能想象的。”蔡斯双手撑桌，一顿教训道：“准备了好几年，比二次大战中的邓苟克战役还充分，我们却打败了！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岛上，对方措手不及，防卫力弱，驰救困难，武器落伍，可是居然把我们进攻的精兵打了个七折！”他一顿：“而且我们并没有占领，甚至没有到达高地，就

给人家从海边到山腰，打了个落花流水！”蔡斯歇了片刻接着又道：“让我们冷静一下吧！报上说这是‘国军准备最充分，兵力最强大的一次攻击’，我看我们错了，不但报上不该发表，而且也不能这样发表。”

他冷冷地瞅了一眼蒋经国铁青的面孔：“我不打算在这时候研究新闻稿，我只想和大家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们败得这样惨！”他一顿，又一扬手，道：“首先我想起的，是你们说的：东山岛上居民一旦发现国军进攻，必然起来帮忙打共产党，而我们也必然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攻占目标、消灭敌人——”他又一顿：“可是事实如何呢？据顾问们、舰长们在舰桥上望见的，当地老百姓迎接我们的是打击而不是欢迎！甚至有些女人，望远镜中可以看见她们挑着木桶，艰难地在流弹中向守军阵地行进。没有问题，她们是尽了供水送饭的责任。请问她们这样做，说明了一个什么严重的问题呢，你们对敌情太糊涂！东山岛驻军数字到现在还不清楚，而岛上的民心如何，你们更是糊涂！”

蒋经国垂首无语。

“其次，”蔡斯道：“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击？大家明白，除了表现国军的力量之外，主要是予高丽前线以鼓舞！”他双手一摊：“如果我在高丽前线，听到这一仗的结果之后，心情恶劣，难以形容，我是如此，其他的人心情还需解释？”蔡斯哀叹一声，接着又说道：“我们的头面都打肿了，如果今天还有人惋惜国军没有参加韩战，乃引致韩战之糟；不如说国军幸亏没有参加韩战，否则韩战的溃败，恐怕会提早！”

蔡斯的这番话简直比刮蒋家父子几记耳光还令人难堪，在座的人没一个敢吱声，甚至连大气都不敢透一口。蔡斯扫了一眼与会人，绷着脸道：“我无意抨击任何一方，我只是沉痛地说明：就因为中共主力在高丽前线，我们才有更大的信心突击东山岛；如今韩战一旦停止，共军回师大陆，必然也会增强沿海兵力，到时候请问国军又该怎样反攻？怎样出击？怎样有信心杀敌？——呵，朋友们，问题实在严重之极！”

会场气氛十分窒息，但蔡斯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痛击蒋介石的机会，怎能轻轻放过？便喋喋不休道：

“而且，据顾问报告，有一个连几乎没有经过战斗，就给中共包围、缴械、俘虏了，美国武器在这里并没有好好运用，却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现象，请问这是为什么？”

凝重的气氛中蔡斯再问：“到底为什么？”

还是无人答复……忽地蔡斯大声说：“如果没有人回答，我可要说了！”

蒋经国闻言，有如巨雷劈顶之感。

“士气问题！”蔡斯道：“严重的士气问题，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他痛击蒋家父子的“军中政治工作”道：“我们知道，军中政治工作万分重要，而其主要任务，在于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反共？怎样去反共？东山岛之战则暴露了我们军中政治工作的空虚！”他加了一句：“我们要改善！”

众人闻言皆惊。这意味着不是什么“反共”问题，而是美方要对蒋“逼宫”的问题了。正窒息间，忍无可忍的蒋经国起立，发言道：

“谢谢蔡斯团长的意见，”他的声音发抖：“我们是要改善！我们的军中政治工作做得不好，我们是要改善！”

众将领紧张地听他说下去：

“可是，请各位原谅我们的苦衷，”他咽口唾沫：“中国有句古话说得

好，叫做‘胜败乃兵家常事’。譬如美国，这是一个使我们尊敬的国家，他们的军事天才，真是精彩之至，他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在两次大战中，他们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表现在敌前登陆，美国历史上的失败例子也不是一个。”

气氛似乎变得更紧张，简直要爆炸。

“拿韩战为例，”蒋经国道：“这两天打得更糟，美国的朋友公开承认，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败！是么？”

蔡斯的面孔绷得更紧。

“而今天的消息说，李大统领希望扭转局势的这一仗，败到天地失色，数以百计的美国顾问失踪了，再也没有回到部队。请问：我们能责备这些美国顾问失职么？讥讽他们无能么？埋怨韩国部队是草包么？……”

蔡斯拼命抽烟。

“不能”蒋经国大声说：“相反，我们要向美国致敬！”众人闻言皆愕。蒋经国大声说：“致什么敬呢？那是因为自由世界中，美国是反共的先锋，他们花了这么多钱、动用这么多人力、布置了这么多基地，他们反共再明白不过，并且举世闻名，因此我们要致敬！至于东山岛之战，主要虽然是国军，但更主要的是美国的力量！训练这1万多人的，是美国！装备这1万多人的，是美国！领导这1万多人的，是美国！策动并且主持这一次攻击的，是美国！而失败之后，并不以为气馁而继续要领导反共的，还是美国！”蒋经国咬牙道：“请问美国有这样坚决的信心，难道我们不应当向他们致敬吗？”

这一席话，分明把美国“得体”地挖苦个够，把蔡斯气得小胡子捋得“波波”地响。他当然不把蒋家父子放在眼里，他趁蒋经国话音刚落，就起立说道：

“自从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在反共大业上的确出了好大气力，真是举世闻名。可是拿南韩来说，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南韩的李大统领是反共的，但他的手下却是反李的，请问诸君：世界上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事么？”

众人闻言无法作声，万分紧张。

“一个国家，”蔡斯道：“只靠美国帮忙，自己没有办法，行么？蒋夫人有一次在做礼拜时，说过一句使我印象极深的话，她说：‘天助自助者’，这句话非常贴切！请问，一个不会说话、不会走路，甚至不会动作的瘫痪者，即使屋子里堆满了锦衣佳肴、漂亮的女人，甚至大批黄金，可是这对他有什么用呢？他不能自助的结果，只有加速自己的灭亡！”蔡斯狠狠地把胡子一捋：“今日美国也如此：无论怎样以反共为己任，但在需要援助的国家之中，如果都像韩国那样，我看是没什么希望的了！”他感到难以转圜，便接下去道：“我深信台湾胜过韩国，韩国的悲剧或许不至于出现在台湾，因为就双方动用的兵力来说，突击东山岛无论怎样失败，它的损失恁地也比不上韩国。”众人正透过一口气来，不料蔡斯急转直下道：“可是也有严重的，那是自由中国声望上的损失，这犹似台北报纸所宣传的：自由中国准备甚久，配备极好，却无办法对付那个蕞尔小岛，我怕天下人对蒋总统耻笑！”

蒋经国脸色铁青，却强笑道：“方今之世，美国第一，只要美国体谅我们的处境，同情我们的处境，那么区区东山岛之战，就不足挂齿、无人讥笑了！”

蔡斯恨恨他说：“不！”

在众人惊愕之中，蔡斯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可要他好看的！”

便强笑道：“为什么‘不’呢？因为是这样的：美国和自由中国的合作反共，真是水乳交融，团结无间，可这仅仅限于自由中国和美国政府之间。换句话说，中美两国的民间以及行政部门之中，对若干反共的措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是毋须解释，也不必存心躲避的。”他加强语气：“我们要重视这个事实！譬如刚才蒋主任所说的谅解，美国当然没有问题。韩国之战搞成这样子，美国不是还在反共而不是反李？——可是请注意：这是美国政府的态度而不是美国全体官员、议员的态度，更不是美国纳税人的态度！”蔡斯透了口气，继续说道：“因此可以回答蒋主任的是：美国政府对自由中国是可以谅解、并且也应该谅解的，只是这不能代表美国朝野的态度。”

蒋经国冷冷地问：“那么，美国朝野对自由中国的意见又是怎样的呢？”

对于这个挑战性的问题，蔡斯心头骂人、嘴上却说：“这件事，我想这不但不是我所应该说的，而且也不是我所知道的。不过我可以把人家对韩国的意见提供参考，由于韩国不等于自由中国，因此所说内容不一定合适，请勿误会，而且事实上我也不能负责。”

众人有山雨欲来之感，听他有板有眼地指桑骂槐道：

“美国朝野对韩国的一般印象，认为他们虽然是在反共，但对反共所尽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美国花了这么巨大的气力帮助他，可是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呢？抛开美国和联合国方面的情况不谈，南韩部队在前线所提供的不是一连串的大捷，而是一连串的大笑话！”

这分明在暗示老蒋的失败了。蔡斯捋捋小胡子道：“而在韩国政府之中，贪污之严重，军人之抓权，都是使人头痛的问题。我先声明我没有资格批评我们任何一个盟邦，我只是转达我们国内对盟邦的意见：南韩接受美援始终嫌少，但对美国希望他们能更民主一点，更自由一点的意见，却从来就嫌多。其实他们根本在胡闹，于是出现了更多更多的笑话，而这是华盛顿所不能为他们洗刷的。”蔡斯提高声音：“美国确实在支持南韩，但南韩如果不能接受美国的规劝，甚至出现了类似独裁的政权，那美国无法估计南韩明天的发展，包括李大总统个人的出路！”

这席话分明已经淋漓尽致，把蒋介石骂得不成体统了。众将领眼观鼻、鼻观心，对今天这个会的“估价”十分焦心。但蔡斯还是抓紧了李承晚的辫子，指着和尚骂贼秃道：“诸位诸位，我的话还没说完。讲到南韩问题之严重，一如自由中国的朋友所看到的，那只是上层有那么几个，与下层之间没有痛痒相关之处，也就是说：和全体军民的感情毫无联系。”

蔡斯接着大叫：“曾经有南韩的官兵在冰天雪地的前线，痛哭流涕道：‘我们在这里送命，为的是什么呢？’这句话太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凡是官兵认为这种仗对他毫无关系的话，如要争取胜利，那简直是奇迹。”

蒋经国冷冷地问道：“请问：美国官兵在韩国前线是怎么想法的呢？”

蔡斯一怔，旋即冠冕堂皇他说：“美国官兵都明白：他们是自由世界赖以支持的核心，因此反共必须站到第一线，做一个榜样给盟邦看看。”他明白对方的弦外之音，接着说：“至于成败，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韩国前线连原子弹都用不上，也只好暂时便宜了共产党。”

见对方口风已软，孙立人生怕双方再也下不了台，便笑着说：“今天这个检讨会很有收获，相信对今后的反共，有很大的好处。至于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是负责训练的，感到东山岛之败，训练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缺点，例如伞兵，盟邦帮了这么大的忙，把最有名的伞兵专家都调到台湾来，说明盟邦

的帮忙，已经是至矣尽矣！我们应该抱怨自己的疏忽，例如这次伞兵的出击，出发前的练习是不够的。我们记得有一次跳伞演习，不少人距离目标很远很远，其中有几个甚至降落在什么地方也找不到，说明我们的训练有待充实。”

众将领知道孙立人在为对方转圜，一齐透了口气。但蒋介石获悉之后，好几天没平下这口气。

七百战俘获得宽待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秋季至1953年7月近4年的时间内，台湾当局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的上百人至上万人的登陆进犯活动共约71次，出动的总兵力为47700余人，在作战中被我军民歼灭7900余人。

东山岛保卫战，是我军打击国民党军登陆突袭的最大一次作战行动。而台湾当局在这次登陆作战遭到惨重失败以后，便不得不变换手法，彻底放弃了“以大吃小、速战速退”的战略方针，从此仍以小股武装对大陆进行袭扰和窜犯。

这种小股窜犯活动，一直延续到1965年8月方才基本停止。

东山岛战斗中被我军俘获的蒋军官兵700多人，得到人民解放军的宽大待遇。

这批俘虏一到后方，我军就发给他们蚊帐、衣鞋等各种日用品和零用钱。病伤俘虏立即得到妥善的治疗。被俘官兵每天能吃到远比蒋军中丰富的食物。

头两个月，人民解放军就帮助许多被俘官兵和他们在大陆上的家庭取得联系，并分3批将部分被俘人员遣送回籍。

1953年10月12日和14日，人民解放军又分两批释放在东山岛战斗中被俘的蒋军官兵。至此，在东山岛战斗中被俘的700多人中，已有600多人被释放，其余的也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继续被遣回家。

被俘的蒋军官兵非常感谢人民解放军给他们的宽大待遇。前蒋伞兵总队1大队2中队少尉分队副张念享说：“人民解放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完全和以前一样。我们被俘后官兵都得到同样宽大的待遇。现在，我们开始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罪恶本质，再不信他们的胡言乱语了。在短时期内，我们大部分人已接到了家信，知道了家乡安居乐业的兴旺景象。我庆幸从此可以重新做人并和家人团聚了。”

对所有被释放回家的俘虏，人民解放军一律发给他们充足的路费，家在北方的还发给棉衣。

第六节 打劫志愿军战俘

血腥甄别

战争中无论是失败的一方，还是胜利的一方，都避免不了被对方抓去一些俘虏。

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与敌人殊死的战斗中，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如受化学武器和燃烧武器的袭击而窒息，坑道工事出口被敌人所占据，被敌人的大炮、飞机轰炸所震昏等，有少数志愿军官兵被俘。

朝鲜战争结束后，根据停战协定，双方遣返各自收容的战俘。美国和南朝鲜方面向我朝中方面遣返战俘共 75799 名，其中非朝鲜籍 6000 多名，基本上为志愿军被俘人员；朝中方面向美国和南朝鲜方面遣返战俘 12760 名，其中非朝鲜籍近 5000 名，大部分为美军战俘。这种数字对比说明了敌强我弱的朝鲜战争，对朝中方面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朝中方面对方战俘一直给以人道主义的良好待遇，全部遣返，但美军、南朝鲜军对外的口号是“尊重战俘个人意愿”，而背后却使用各种残无人道的手段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迫害。

据不完全统计，仅 1951 年被美军残暴枪杀的战俘就有 17000 人之多。美军不仅随意枪杀战俘，而且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美军第 1091 号登陆艇上灭绝人性地用战俘作细菌试验。据美联社透露：试验结果，“被关押的 125000 多北朝鲜俘虏中，有 1400 人病得很厉害，其余的人约有 80% 染有某种疾病”。

美军还要蒋介石从台湾派来了大批国民党特务，冒充战俘混入战俘营，强迫志愿军被俘人员在身上刺字，强制他们写血书和组织“反共救国团”之类的组织。据在朝鲜被志愿军俘获的美蒋特务王顺清、刘炳章、王福田供称，他们对我志愿军被俘人员经常严刑逼讯，强迫“签名按手印”。我被俘人员为反屠杀求生存，英勇斗争，因而普遍遭到毒打，甚至水刑、电刑，直至剖腹、活埋。

1952 年 4 月 8 日傍晚，在巨济岛战俘营，台湾特务与美军、南朝鲜军相勾结，对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血腥的所谓甄别。他们指使志愿军战俘中联军副队长李大安等几个叛徒，将“72”战俘营的战俘集中在广场上，谎称：“凡是要回大陆的，现在就到大门上车去。”为表达对祖国的忠贞，林学甫首先站出来高呼：“要回祖国的跟我走！”得到不少战友响应。可是立即被敌人打倒在地，又被捆绑起来拉到学校的大礼堂去过堂，当时，各战俘营被这样抓来的共有 120 多人。林学甫被带到讲台上，站在耶稣十字架下，叛徒李大安手持美军伍牧师奖给他的匕首，指着林学甫问：“回大陆还是去台湾？”林学甫坚定他说：“回大陆。”李大安说：“好，那就把你身上刻的字留下。”说罢，使用匕首把林学甫左臂上此前被强行刺上去的“杀朱拔毛”几个字连肉一起削下来。李大安狞笑着又问：“到底去哪里？”林学甫忍着痛高呼：“回祖国大陆！”李大安又将他右臂上被强行刺上的“反共抗俄”四个字连同皮肉一起挖下。林学甫当即昏死过去。李大安叫人端来冷水把他喷醒，用匕首顶着他的胸膛，咬着牙问道：“到底去哪里？”林学甫两眼瞪着叛徒，用最后的力气呼喊：“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没等他喊完，便被李大安用匕首刺死了。李大安剖开了烈士的胸膛，

挖出了烈士那颗还在颤动的鲜红的心，挑在匕首上狂喊：“看见了吗？谁要回大陆，就这样去找毛泽东！”但这些祖国的优秀儿女，仍然不屈地回答：“回祖国大陆！”有的也壮烈牺牲了。

美方战俘营营长杜德被扣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抗开始了。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战俘营一片寂静。13点30分，作为战俘营的最高长官战俘营的总管杜德准将，在严密警戒下，乘车来到巨济岛战俘营第76联队。这位准将发现站在第76联队营门内的一群人民军战俘与往常有些不同，一个个挺胸挽臂，目视前方，但他没有去想这些人为什么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早在当年4月，战俘们就曾多次强烈要求美方停止违反人道主义原则和违反国际公约的罪行，要求战俘营当局给予人道待遇。可是这位自认为掌握了战俘生杀大权的杜德准将，从不理睬。这次他仍然像往常一样傲慢，大摇大摆来到76联队俘虏营大门口，和站在门口的战俘代表们迎面而立。

人民军战俘代表对杜德说：我们在战俘营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你们强迫“甄别”，虐杀战俘，经常断粮断水，违反国际公约，对此再次向你提出严重抗议。

“你们要知道，战俘就是要有战俘生活的样子。”杜德仍像过去一样，并不答应对战俘生活作任何改善。战俘们愤怒了，时针指向15点20分，第76联队战俘营的大门突然打开了，10多个手无寸铁的人民军被俘人员从帐篷里冲了出来，一个人民军被俘人员抓住杜德的手，另一个人抱住腰，两个人拖住腿，把这个肥头大耳、哇哇乱叫的美国准将，连拖带拉地弄进了铁丝网，随即把大门关起来。这时，杜德全身发抖，脸色惨白，两腿瘫软，连话都不会说了。

杜德被扣以后几分钟，第76号战俘营的门口，就挂出了一幅7米长、2米宽用英文写的标语。上面写着：“我们生俘了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待我们和他进行正当的谈判完毕之后，就安全地遣返给你们。如因严重的武装行动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将由你们负完全责任。”

杜德被抬进了第76号战俘营，由被俘人员中的外科医生，给他包扎好他被抓进来的时候被削铅笔的小刀割破了的手指。被俘人员代表对他说：“我们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不像你们那样，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绝对保证你的生命安全。”杜德说：“希望你们赶快放了我，否则我的部下就要发怒了！”被俘人员代表告诉他：释放他的时间决定于他本人是否在谈判中很快答应战俘们的合理要求。

就在这时，战俘营周围开来了坦克、装甲车以及大批步兵，眼看一场屠杀就要开始了。战俘们之所以扣留杜德，只是为了要求改变战俘的待遇，要求杜德听一听各战俘营战俘代表们的呼声，停止强迫“甄别”。现在，为了避免一场新的流血，他们要杜德签署手令，解除武装包围。杜德接受了这个要求，下达了如下手令：

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我命令绝对禁止开枪，并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协商解决问题，即令柯尔生上校将代表们接来，并将部队撤离第76联队。

为了便于谈判的进行，第 76 号战俘营的被俘人员，特地把原来住 100 人的帐篷腾出来，作为杜德的临时住所，用毯子和白布隔成卧室秘办公室，并要杜德通知他的部下给他送来一部电话机，一张行军床。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允许外边按时给他送饭，同时派两个不带武器的美国兵来服侍他。

杜德被安置好以后，被俘人员代表正式告诉他，要巨济岛各战俘营都派代表来这里参加谈判，以便通盘解决各战俘营的问题。杜德马上通过电话命令战俘营管理当局用吉普车将代表接来。当晚，中朝被俘人员代表 43 人在这里开了一次会，同意成立战俘代表团，并当场选举了正副团长。会议是在杜德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

5 月 8 日，在 76 号战俘营帐篷里开了一次大会。战俘们纷纷发言，列举大量事实控诉美方迫害、屠杀中朝被俘人员的罪行。一位被他们强行截断右臂的人流着眼泪说：“惨绝人性的战俘营当局披着慈善的外衣，硬是把我的有臂锯掉了！这就是你们的仁慈吗？”杜德坐在会场上，大会主席还不时地问他是不是事实，他只是点头示意。对于战俘代表们提出的增加口粮、饮水和被服，以及为伤病战俘治疗等要求，他都点头同意。

就在这个时候，范弗里特已派第 1 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生准将接替杜德统管战俘营了。在此种情况下，朝中战俘代表团就要同时与战俘营里的杜德、战俘营外的查尔斯·科尔生两个人谈判。科尔生和杜德通过电话交换意见，每天把他们商量的结果，由杜德向全体朝中战俘代表作口头答复；如果大家有意见，再向杜德和科尔生提出，由他们研究后重新答复。5 月 9 日，美军第 8 集团军军长范弗里特还亲自到巨济岛来向科尔生面授机宜，并与战俘营里的杜德通了电话。

朝中战俘代表团在自己办公的帐篷里，摆满了各战俘营代表秘密搜集的美军虐杀战俘的文字和图片材料，包括他们自己编写的美军屠杀战俘大事记，美军远东司令部的机关报《星条报》、南朝鲜的《民主新闻》、《釜山日报》，以及美国报刊上登载的片断材料。

5 月 9 日，朝中战俘代表起草了《中朝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的控诉书》，并向杜德提出 4 项条件：

第一，立即停止暴行，停止侮辱、拷讯、强迫写血书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虐杀以及毒气、细菌武器的试验。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第二，立即停止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所谓自愿遣返。

第三，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甄别”。

第四，承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组成的战俘代表团，并予以密切协作。

当新任战俘营总管科尔生准将接到这四项条件时，已是 5 月 10 日。他立即报告李奇微。李奇微正在向克拉克交代工作，他立即决定：电告范弗里特，制止科尔生对战俘进行答复；与此同时，质问范弗里特为什么没有执行他 5 月 8 日“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紧接着 5 月 10 日当天，美方调集美**军** 187 空降团，派出数千人的作战部队，使用飞机、坦克、喷火器等各种武器，在巨济岛各个战俘营对战俘们进行血腥镇压，不少战俘又惨遭杀害。

但是，终因杜德还在战俘营里，5月10日中午，科尔生不得不同意了战俘们提出的要求。科尔生与杜德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 一、关于你方信中第一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我承诺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犯以人道待遇。今后我将尽最大努力防止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我将负全部责任。
- 二、关于第二项，北韩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自愿遣返问题正在板门店讨论，我无权左右和平谈判的决定。
- 三、关于第三项强迫甄别问题，只要杜德将军安全获释，就保证不再进行强迫审查。
- 四、关于第四项，同意根据杜德将军和我的批准，组织北韩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团。

这一对朝中战俘代表4项要求答复的联合声明，由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用打字机打成正式文件，并由科尔生和杜德亲自签署后于5月10日晚送交朝中战俘代表团。被科尔生和杜德的供状和诺言弄得狼狈不堪的克拉克，曾尴尬地掩饰说，科尔生的诺言是“在极大的威胁之下作出的”。但事实是：受到胁迫的是朝中被俘人员，并不是这位拥有众多武装力量的战俘营长官。

在杜德被扣的第二天早晨，美军就开来22辆坦克，围着第76号战俘营的铁丝网来回巡逻，大约1个团的步兵在营场四周挖工事，在两边山头上还架起了大炮。5月9日上午9时，科尔生一上台，就通过广播器威胁朝中战俘：“限你们10分钟以内释放杜德，否则，我将用武力来营救他。”朝鲜被俘人员告诉杜德说：“如果科尔生用武力来破坏我们之间所进行的和平谈判，我们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杜德便通知科尔生不要使用武力。

5月10日上午，美军坦克又包围了76号战俘营，并且摆出向里冲的架势。杜德知道以后，十分惊慌地打电话叫科尔生“赶快把武装士兵和坦克撤退”。在这一天，科尔生发出过5次最后通牒，每次都出动坦克把76号战俘营包围起来。朝中被俘人员十分镇静，只要向杜德说一句“又来了”，他马上就张慌失措，抓起电话找科尔生讲话。假若碰到接电话的是上校，他就厉声嚷道：“我不要上校，我要找将军讲话。”然后，就对科尔生说：“千万不要用武力进来，我在这里很安全。”

5月10日下午9点45分是朝中战俘代表团释放杜德时间。杜德释放前，一个战俘代表问他：“你在这里生活了几天，有什么意见？”杜德把事先写好的一个纸条交给这位代表，大意是：“我在你们这里受到了最高的人道主义待遇。在非常困难的战俘营环境下，我的生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在我们的谈判中，你们保证了我在言论上和行动上的自由。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遵守协议，并为实现这个协议而努力。我感谢第76号战俘营的全体朝鲜人民军战俘，祝你们身体健康。”被朝中被俘人员扣押了78小时又30分钟的杜德，在临出大门时，还向战俘代表挥帽告别。

由杜德和科尔生签署的联合声明，通过新闻媒介发出之后，震动了世界。因为这一声明出自巨济岛战俘营前后两任总管之手，对于处境艰难的战俘们来说，的确是一次斗争的胜利。从此，人们不会再相信美国所谓“战俘不愿意回到他们的祖国的说法了”，就连美国政府发言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件“使美国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在整个东方丢脸”。英国报纸《雷诺新闻》5

月 18 日对此发表评论说：“巨济岛事件使美国的说法和美国的甄别方式确实开始臭气熏天起来。”

但是，杜德一出铁丝网，美军当局就在全世界面前撕毁了它的一切诺言。在李奇微离开东京几分钟后，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将军就发表声明说：“科尔生将军对共产党战俘的答复，是杜德将军的生命在危险中的重大威胁之下提出的。共产党的要求是纯粹的勒索，因而科尔生将军对此所做的任何承诺，亦应根据这种情形来加以解释。”

接着而来的是克拉克命令波特纳接替科尔生为美军战俘营总管的职务，对朝中战俘进行疯狂而残酷的镇压开始了。

谈判代表营救战俘

就在美军对朝中战俘进行残酷报复、镇压时，在板门店，朝中代表团一直在营救战俘和美方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2 年 5 月 19 日，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在叙述了一对方一系列屠杀战俘事件，特别是最近对巨济岛战俘营残暴镇压后指出：现在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事实是，尽管你方对我方被俘人员采取如此野蛮办法，强奸他们的意志，但我方被俘人员仍不屈服于你方暴力之下。

南日将军严词质问道：“难道我方被俘人员不能容忍你方的虐杀而甘冒遭受集体屠杀的危险，向你方提出正义要求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战俘营长官向我方被俘人员保证不再进行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罪恶活动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不顾日内瓦公约，违反人类行为的最低标准，对我方被俘人员施行各种暴行，甚至采取屠杀的手段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战俘营长官向我方被俘人员保证不再有强迫甄别不是事实吗？”在一连串的质问下，美方代表只好低下头去，无言以对。

在 5 月 28 日的双方代表团的大会上，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和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将军，再次进行交锋：

南日：为什么你方战俘营内发生的无数次屠杀事件连一次也不能交代？

哈里逊：（拒不回答问题）我建议休会。

南日：看来你无法答复。我再问你，你以为你们对我方被俘人员公然进行屠杀，而又没有作负责的交代，你方现在就可以公然集合大批军队，甚至聚集喷火坦克，准备继续进行大规模屠杀吗？

哈里逊：（哑口无言，达 5 分钟之久）我现在和今后都不愿讨论这些问题。在这个帐篷外面有关的事实已经讲过了，我建议休会。

南日：一切有关我方被俘人员的生死和安全的问题，都与这次会议有直接关系。我们是在帐篷里面，而不是在帐篷外面举行会议。因此你必须在帐篷里面而不是在外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哈里逊：（没有吭声）

南日：你们有什么理由用断绝战俘伙食的手段来强迫他们接受所谓甄别？

哈里逊：（低头不语）

南日：你们有什么理由拒绝答复关于战俘的生命和安全的抗议和质问？

哈里逊：（又过了 5 分钟，他仍一声不吭）

南日：为了使你有时间考虑这些质问，我同意休会到明天通常开会的时候

间。

哈里逊：我同意。（站起来就走）

美方代表虽然理亏辞穷，但是他们的军队一丝一毫也没有放松对朝中战俘的残酷镇压和迫害。

在一次关于战俘问题的讨论时，由于美国提出无理要求并采取拖延手法。谈判桌上双方互相对峙。沉默的对峙。

这轮谈判，从下午2时半开始，由美方主持。

双方互相目视对方。这是一种高度紧张的精神战，一场意志、毅力、耐忍力、克制力的对抗。

韩、美代表目光游移了。

中朝代表的眼神中透出了焦躁。

中国谈判代表柴成文悄悄离开会场，来向坐镇开城的我方谈判一线主持人李克农请示怎么办？

李克农此时也在默坐沉思。他眼皮不抬地在一张纸上写了3个字：坐下去。

纸条在中朝代表手中默默地传递。

似灵丹妙药。代表们一个个挺直起腰板，稳坐不动。一双双眼中透出冷冽，逼视对手。

中朝代表稳坐不动，状如石雕。比起石雕又有令人悚然的目光。

沉默持续了132分钟。

美国人顶不住了，宣布休会。

相对无言的132分钟，恐怕创下了谈判史上沉默最长的记录了。

中国人民是有耐心的。同样，中国人也有以快制胜的绝招。

轮到中朝代表主持会谈。

朝鲜首席代表宣布会议开始，双方代表刚刚落座，又马上宣布休会。只用了25秒，弄得美国人频频耸肩晃脑，连声“NO，NO”，一副惊讶莫名之状。

毛泽东点将李克农

朝鲜战争。美国人被迫坐下来谈判，又不甘心坐下来。谈谈打打，假谈真打。自1951年7月10日上午谈判开始起，延续两年之久。

他们想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又依仗其空中优势进行绞杀战，切断我方运输线，企图使我前方部队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迫使我方谈判代表妥协，接受他们的条件。他们瞧不起新中国，派兵侵入朝鲜后，没想到遭到中朝军队的惨重打击，损兵折将，弄得临阵换帅，大丢其面子，在无可奈何情况下被迫进行停战谈判，却又想摆出过去威风的架势。

毛泽东在考虑中国参加谈判班子的人选时，首先想到了李克农，并要李克农坐镇开城。他对李克农说：是我点了你的将。

历史不能倒回去按后人的愿望有希冀重来一遍，也不能依据假设重演。但在这里，为了说明李克农和他的战友，姑且假设一下。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如王明、博古、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陈宗瑛……将难逃国民党的魔爪。CC特务头子陈立夫曾遗恨、沮丧地哀叹道：只晚了5分钟，否则，周恩来等共党首脑将被一网打尽。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毛泽东在领导中央苏区反“围剿”时，很难说会如此及时、准确地掌握蒋介石的军事部署而赢得胜利。

历史造就了李克农等人。1928年春，李克农逃离家乡来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中共中央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顿悟到要生存、要战斗、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一个特殊机构，确保“知己知彼”，以求“百战不殆”。于是由周恩来等等划建立了中央“特科”，设法获取敌人的军事动态、政治动态，铲除奸细，惩治叛徒，筹备活动资金，保证秘密交通，保护要人安全等等。

周恩来指示李克农，趁国民党CC特务组织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为名，实为扩大特务组织之际，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进去。李克农在极短的时间，掌握了应考的必备知识，以优秀的成绩名列第一。

这个无线电管理局，就是国民党CC头子陈立夫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用来掩人耳目的，由陈立夫的亲戚徐恩曾掌管。

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庆幸自己觅到一员干将。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官虽不大，却管着全国的无线报务员，这正是获取情况最好的位子。周恩来早就想把国民党初建的这个机构拿过来为我所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

徐恩曾得意地夸耀自己有3员干将：

他的贴身机要秘书钱壮飞，坐镇设在南京的特务首脑机构——“正元实业社”兼管“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有他们3人，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全国南北，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内部各派，或者其它党派的情报会以最快的速度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3人奉周恩来之命组织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由他和“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

徐恩曾十分器重他们，特别是钱壮飞，因是同乡，又有才干，连机密电报也交他翻译，分类整理。

徐恩曾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得力干将，竟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他引以为豪的特务网竟由共产党员替他出谋划策建立起来；送到陈立夫、蒋介石面前的绝密情报竟有一份复制品同时放在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面前。

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赴苏访问。李克农一直护送到中苏边境满洲里。

李克农除了谈工作，还陪毛泽东聊天，讲故事说笑话。李克农完全是一个事业型的革命家，当然也不放过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讲讲情报工作。

一天早饭后，李克农笑着问毛泽东：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来了兴趣。他没说下去，看着李克农，等待下文。

李克农说：他的第一件事是看情报要点，否则，这一天不知该说什么话，办什么事了。

毛泽东猜透了李克农的弦外之音，故意绕着圈子说：我和美国总统不同，是随来随看，不怕多，只怕少。你这个克农，还要给我上课？好，这回去莫

斯科，还要和斯大林唠叨你们那摊子事呢？

毛泽东和斯大林商谈了情报合作的事情。

李克农奉命访苏，研究合作的具体事宜。

苏联情报专家来了。他们的观点、做法和中国很不同。尤其对公开情报如何获取，李克农赞赏并实行的基本做法是95%从大量公开出版的报刊资料及有关报告中分析而得，只有5%靠秘密情报手段获得。

苏联情报专家却鄙视公开情报，嘲笑说公开情报不如克格勃手段获得的有价值，而且层次太低。要李克农按照苏联那一套去做。

李克农不同意，矛盾由此产生了。

在一次会议上，苏联专家揶揄公开情报是用来搪塞中央的遮羞布，没有真东西。苏联专家洋洋自得地说：用金钱、美女加毒药，才能获得货真价实的情报……

李克农一拍桌子站起身，打断苏联专家的话：你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里，维护中苏友好关系，一切尊重“老大哥”、“向老大哥学习”是政治原则。李克农竟当面顶撞，这还真是要有胆量和魄力的。

在中苏情报合作的年月里，毛泽东要李克农对苏联专家毫无保留，即使是最核心的机密也要讲。好比脱裤子，全身光溜溜的，让人家看个够。

对毛泽东的指示，即使有不同看法也要执行。

苏联专家似乎很关心中国的情报工作。一个一个部门的听汇报，做记录。在中苏关系破裂前夕显得特别认真，记得也特别详细，并且立即送回莫斯科。

李克农一一看在眼里。他对脱裤子有一个通俗又精辟的说法：浑身脱得光光，肉体暴露无遗，心里的秘密，只要不吐出口，你就看不到，也就不知道。

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情报专家以为满载而归。事实上，我国的情报工作未受多大损失！

李克农是否留一手？

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李克农曾给朝鲜提供过不少情报。得到毛泽东的夸奖：李克农干得不错。

这次毛泽东点将李克农时，他正犯哮喘病，时好时发，平日常用药物控制病情，要想入睡非打吗啡不可。可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李克农思之再三，怕贻误大事，把自己的病情向毛泽东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

毛泽东反复权衡，最后仍然决定要李克农去。

李克农忠心耿耿，抱病出征。他原以为不用多久，连大衣都不准备带。谁知一去两年，靠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他竟然顶了下来。

1951年7月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电文第一句话开宗明义：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

中朝两国商定：对外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实际上谈判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

毛泽东又指派柴成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

谈判桌上无戏言，字字句句都得反复斟酌。面对世界头号帝国主义，要在谈判中取胜决非易事。此次谈判，中朝联合，还有一个国际关系。首席代

表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必须既要沟通，又要尊重，倍为复杂。

谈判班子分为一、二、三线。

一线直接出面谈判。乔冠华、柴成文为二线。柴成文是联络官，往返联系。李克农隐居三线，掌握全盘。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成电文往返。有时一天十几份，工作极为繁重，李克农常常边开会边大把大把服药。

李克农和彭德怀，一个打得坚决，毫不手软；一个谈得耐心，针锋相对丝毫不让。

战俘问题争执日久

关于战俘问题，中美双方争执日久。

早在 1951 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李克农在代表团的会议室召开一次小型会议，传达中央制定的谈判方案。当谈到交换战俘问题时，李克农呷了一口热茶说：“我们主张收容多少交换多少，俘虏才是真正的不幸的人。交换俘虏，既有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估计不难达成协议。”

讲到这里乔冠华插话说：“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当然捏造总捏不圆，他所指的 81 师 23 团，我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而且美国国防部也说汉莱的声明没有事实根据。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们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 100 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作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乔冠华的预感，显示着一位外交家的成熟。没过多久，这个问题便成了达成停战协议的主要障碍了。

释放战俘，是交战双方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一个人道主义问题。无论哪个士兵的父母，如果得知他们的孩子被俘了，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亲人能早日回来与家人团聚。收容在双方战俘营中的俘虏们的反应更为强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下的“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第十二战俘营和平委员会”，发表的《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书》说：“我们希望回家，对我们当中许多人来说，这是我们在朝鲜当战俘以后的第二个圣诞节。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待我们好极了，让我们吃得很好，并且非常和善地照顾我们，但是我们非常想念我们的家乡。”“我们希望回家的理由简单得很，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妻子、儿女和我们的父母。”至于在美方收容下的朝中战俘，要求回家的强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仅用文字、语言表达他们的迫切愿望，而且用生命和鲜血记载了他们的恳求。

1951 年 12 月 11 日，讨论战俘问题的小组会开始了。会议一开始，我方即提出停战以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并书面提出 5 点建议：

第一，确定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

第二，确定在停战协议签字后最短可能的期间内，双方分批释放及遣送完毕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并确定重伤、病战俘应先在第一批内释放及遣送的原则。

第三，建议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定在开城板门店。

第四，建议在停战委员会下，双方各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遣俘委员会，

遵照上述协议负责处理战俘的交接事宜。

第五，上述各项一经双方同意确定后，即行交换双方现有全部战俘名单。

然而，美方代表则坚持先交换战俘材料，并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访问战俘营，否则拒绝讨论第四项议程，即遣返战俘问题。据负责战俘工作的杜平将军分析，美方有自己的丑恶打算。他们想扣我们的人，但还不知道我们到底收容了他们多少战俘，所以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使用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双方战俘应在所谓“公平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换。如果说美方的发言还只是向中朝方面发出了一个信号的话，那么，“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言人李维中校在同一天对记者的谈话，则把美方在战俘问题上怀的鬼胎和盘托出来了。他公开招认：“联合国军不打算给共军以很大的人力，不愿把战俘释放回去。”于是，双方僵持起来。

美方代表李比在发言中攻击中朝的建议是“没有准备好船，就想过河”。李相朝代表立即反驳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船只，只是你们不愿过河而已。”

表面上看起来，双方争论的只是个先后程序问题，事实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如按我方的建议，先确定全部遣俘的原则，那么战俘问题的讨论就将变得简单、明了。而按美方的建议，先交换资料，还不知道狡诈的敌人又会玩什么新名堂，把谈判拖到什么时候。会议僵持了1周，没有进展。为了不给敌方借口，逼其走下一步，在12月18日上午的小组会上，我方出乎美方意料，宣布：下午双方即交换全部战俘材料。李比听后，愣了好一会。他大概以为我方还会在这个问题上同其僵持下去。我方的让步，再次显示了谈判的诚意。

当日下午，对方交来132474人的战俘名单。其中，朝鲜人民军111754人，中国人民志愿军20720人。经核对，对方移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列出的姓名数，较对方所称战俘总数缺少1456名；对方经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有44205人未列入12月18日提交的战俘名单。我代表质问对方：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列入移交名单，搞得美方代表李比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与美方提交的几乎是一堆废纸的资料相反，我方交给对方的战俘名单，却是清清楚楚的，一目了然。中朝向敌方提供的战俘人数：南朝鲜军7142人；美军3193人；其他国家军队1216人，共计11551人。这个战俘名单包括了朝中方面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其中有美军第24师师长迪安将军。迪安是在1950年7月中旬的大田战斗中被朝鲜人民军俘获的。

敌方对我方提供战俘名单的准备、翔实十分惊奇，并害怕在此给美方代表带来“沉重的负担”，“造成新的压力”，于是故意找岔子。他们以美方在战场上的“失踪”人数为依据提出质问，说中朝提供的名单仅占失踪美军的27%；南朝鲜军失踪88000人，而说我方仅提供7000多人，那8万多人哪里去了？十分有趣的是，美国国防部在此以前，只承认有169名美军被俘，表明美军是勇敢的，不会投降的。现在却又把它宣布为“失踪”的人员，统统算成战俘。他们说，美方“失踪”的有12000多人，而朝中方面提出的美军战俘只有3000多。

12月21日李奇微又节外生枝，致信金日成和彭德怀，再次在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问题上作文章。信文如下：

从朝鲜冲突的早期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几次请求你们以及你们政府当局许可

他们的代表进入北朝，单单去视察战俘营，以便给你们现在羁留的联合国军战俘和大韩民国战俘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援助。

此外，联合国军停战代表团已一再向你方代表团提出建议，要求给予同样的许可，并且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从这场战争一开始时起，就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它所拥有的战俘有这种特权。迄今为止，这一切请求和建议都被拒绝。

现在我代表有关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并以被你们俘虏的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名义，我再亲自请求你们重新考虑这种行动。我丝毫看不出你们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不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执行这种基本的人道主义的工作——在以前的战争中各国都肯定允许该委员会进行的工作。

我一心只想到这些人的福利和他们的家庭的哀痛。我诚恳要求你们，请求立即许可持有适当证件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入境——他们现在已准备好随时给你们援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
12月24日复信李奇微，信文如下：

为了双方战俘和他们家属的利益，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迅速解决谈判中的各项问题，使之早日达成停战协议，以便使停留在双方战俘营中的全部被俘人员，得以在协定签字生效后，迅速回到他们的家乡去。和他们久别而悬念的亲人们团聚，恢复他们的和平生活。现在停战谈判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业已接近解决，只是因为你方一再节外生枝地坚持无理的要求来拖延谈判，以致停战协议尚未达成，双方战俘无从获释，双方万千被俘人员家属的长期悬望的痛苦也因此继续下去。

我方对于战俘，无论在饮食、被服、居所和娱乐方面都本着宽待战俘的精神和政策，给予他们以完全合乎人道的待遇。伤、病战俘都能够从为他们安排的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那里得到有效的治疗。我方所提出的关于战俘的精确名单，充分反映了我方对战俘的人道的注意和关切。因此，我们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战俘营的访问是不必要的。

但是，为了双方遣俘工作进行便利起见，我们建议，在停战协议签字生效之后，立即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十字会的代表，会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联合访问团，分组出发，到双方战俘营去进行就地访问，并准备在双方战俘交接的集中地点，协助遣俘工作。你如同意，请将我们这个建议转达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会代表访问战俘营的问题暂时搁在一边了，而一场尖锐的名单斗争开始了。我方提交的战俘资料中，按照战俘的国籍使用他们所各自通用的文字，详细地列出他们的军号、级别、部队番号和战俘的所在地点；但美方所提交的名单中，却除了英文拼写的姓名以外，根本没有列出任何必要的识别材料。中朝代表要求对方尽快提出完整的战俘材料，而且对名单和总数不符的问题也必须作出认真的交待。

面对我方的一再催促，美方显得十分尴尬。美方倒打一耙，又玩弄以战场失踪数字来索要战俘的把戏，并以此为据，指控我方对战俘施加暴行。然而这一图谋很快就破产了。

12月26日，美国《国民前卫周刊》曾揭示美国政府所发表的“失踪”数字的虚妄。该刊说：

要知道其余大多数失踪的美国士兵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这个线索不应该从“暴行”

方面去找，而应该从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朝鲜战争的悲惨过程中去找。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2月19日也对美国发表的“失踪”数字表示怀疑，并列举以下事实加以说明：

当美军第二师的一个营在1950年11月末被围歼时，估计损失为800人以上，这批人员的最大部分被列为“战斗中失踪”，但事实上在中共军对这被围的一营人作五次连续的进攻时，若干官员相信，或许这一营的一半人员已经死亡。

该报又说：

联军司令部有点处于进退维谷之境。根据制度，联军曾被迫把损失人员列在战斗中失踪，但是联军私下知道这些人员中大部分可能已经死掉了。

美方的这一阴谋在世界舆论面前，特别是在美国报纸面前被戳穿了。但是他们又不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52年1月2日，对方终于拿出一个他们解决战俘问题的所谓方案。他们公然违背日内瓦协议，提出的交换战俘的基本原则是“一对一”地交换。如果一方交换完了，出现战俘名额不够时，就用“平民”顶替，再不够就让这些无人交换的战俘宣誓“我以后不再参加战争了”，然后假释，让他们“愿”到哪去就到哪去，并美其名曰：“自愿遣返”。

美方这一建议，自然遭到中朝代表的强烈反对，因此一场新的舌战又开始了。李相朝代表对美方的方案气愤地指出：“你们应该知道战俘的释放与遣返不是人口买卖。20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全世界人民将诅咒你方的这一提案，你方自己的被俘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将诅咒你们的提案，因为你方的这一提案将阻塞释放与遣返全部战俘的可能，将阻塞迅速达成停战协议的前途。”

1952年4月，克拉克将军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但是李奇微留给他的并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差事。为了强迫中朝接受美方的方案，美军又施加军事恫吓，于是提出了“克拉克的八点行动计划”，其内容是：轰炸水丰发电站；轰炸平壤至开城的供应线；轰炸北朝鲜所有大大小小的目标；“释放反共”战俘；中断谈判；增强李承晚军；施放调用蒋军计划的烟幕。

在“克拉克的八点计划”的驱使下，1952年6月23日，美空军以590余架次飞机轰炸了中朝边境鸭绿江上游的水丰发电站以及长津、赴战、虚川等发电设备。1952年7月11日，美机746架次，又一次轰炸了平壤、黄州地区。残酷轰炸的受害者何止是朝鲜的平民百姓，他们还无数次地轰炸了没有明显标志的战俘营，造成大批战俘伤亡。

美国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就是在美国的盟国中也引起强烈反对。在这年的5、6、7月间，在英国，在美国，要求停战的呼声高涨。在英国，全国妇女大会直接向丘吉尔请愿，要求立即停止朝鲜战争，调回英国的军队。5月25日，有25位战俘的妻子在英国国会前集会请愿，要求还给她们的丈夫。”

在中国志愿军战俘营收容的英籍战俘们，几乎一致签名给到南朝鲜视察部队的英国亚历山大将军一封请愿书，要求他协助停止战争，停止杀害中、

朝战俘，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没有时我们作任何报复”。无怪英国政府强烈要求要派自己的代表直接参加板门店的谈判。

在美国，美籍战俘的父亲考德尔和另一战俘的母亲席德尔夫人，先后发起和平签名运动，要求停止战争，立即交换战俘。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全体公民致杜鲁门、艾奇逊的信上写着：“亲爱的先生，我们要求你们立即采取行动，以使在朝鲜当战俘的、我们美国的孩子们获得释放。我们觉得你对美国公民们的职责应超过于你个人的对于联合国司令部所拘留的北朝鲜和中国的战俘（他们说他们不要回家）的义务的观念。我们都要求并同意应该遣返所有战俘。”

与此同时，美国提出的“自愿遣返”的原则受到国际舆论的严正谴责。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第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谴责这种“原则”根本违反了所有国际公约，违反了所有与此有关的国际法最基本的准则和全部国际惯例。就是美国的盟友英国、法国、加拿大，也担心“自愿遣返”可能破坏日内瓦公约。美联社报道，加拿大已提请美国注意：“美国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政策是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的。”

在此期间，美国的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分析美方拖延谈判的原因。5月8日《纽约时报》在社论中说：“我们也许不得不在这既非全面战争，又非全面和平的青黄不接的时期中度过好几个月。”5月1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该报记者“在对华盛顿各方作了一番谨慎调查工作后”，可以看出美国目前的“计划是：坐在我们目前的地方不动——继续守住阵地——并继续对北朝鲜进行猛烈的空袭”。5月3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认为，美方现在根本无意进行谈判，该杂志的“细语栏”说，新任美方谈判代表哈里逊，“奉命充任一个听取意见的职务，而不进行谈判”。

第一次交换战俘

经过反复的争执，双方终于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

1953年4月，中方战俘交换代表团组成。

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是严格政审挑选出来的，共有100多人，总负责人是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秘书长为柴成文，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也分担了有关的指导工作。

代表团共分12个组，每组五六个人，其中有英语、朝鲜语翻译各一人，医务人员一人，遣送军官及助理各一人。

这次交换战俘由于是在边打仗边谈判的情况下进行的，知情者寥寥无几。初次交换的战俘不到4000人。

交换的头一天，柴秘书长在开城训练基地作完出发前的动员讲话后，各组带着敌军战俘分乘25辆大篷车赶到10公里外的板门店。那时的板门店名不副实，无村无户，无门无店，只是一个仅一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四周是铁丝网围成的隔离墙，网上挂满锈蚀的铁盒子和罐头瓶，风一吹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正门是一座刚搭起的牌楼，牌楼正中贴着“祖国怀抱”4个大字。网中坐落着大小不一的帐篷，篷顶挂着红、黄、蓝、绿4色大彩球，这是防止攻击的标志，敌我双方发现这一标志谁也不能侵袭。

板门店外，炮声隆隆，枪声如炒豆，板门店内，一方是敌我双方正在展开谈判；另一方是韩明伦和他的战友们正做交换准备工作。双方相隔不到15

米，对方的说话声和喊叫声不时伴着远方飘来的火药味弥漫到这里。

上午 10 点整，远方传来“笛笛”的汽车声，牌楼正前方隐隐约约开来十几台救护车。“来了，来了！亲人们回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远方。救护车快接近牌楼时，车上陡然掀起大波，原来是战俘们看到“祖国怀抱”4 个大亨后都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有的放声大哭，有的嗷嗷大叫，人民军战俘边哭边唱《金日成之歌》，志愿军战俘唱《东方红》。那些伤势严重不能动弹的，硬是要人架着让他看一眼牌楼。

车进交换区后，双方代表和工作人员按照各自的职责分立两旁，施行礼节后，首先是美方遣送军官捧着战俘名册，一车一车集体点名，然后从第一车开始，按战俘姓名、职务、军衔、籍贯、入伍年月进行审核和交换，点到谁就让谁下车，敌方交一个，我方换一个。交到我方的战俘听到亲人们的第一句话是“辛苦了！”接着每人发给一袋糖块和一包“大中华”香烟，接过物品的战俘们无不热泪盈眶，久久不肯离去。

整个交换工作进行了十多天，敌我双方代表和工作人员自始至终遵循有关条约和规则，没有出现不愉快的现象，特别是我方保持了严格的自律性和坚强的克制性，受到在场的印度、波兰、瑞士等中立国家官员的称赞。

大交换也就是第二次交换。

这次交换是在 1953 年 7 月 27 日停战后进行的。7 月下旬到 9 月初，为期 40 多天，近 20 多万战俘。那时，气温高达 30 多摄氏度，闷热难当，不少人患了传染病，有的呕吐不止，但谁也没有休息，就连防病防毒的口罩也没有戴。据说戴口罩不便交流语言和表达感情，也不礼貌，应该废止。

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交换战俘的工作非常重视，毛泽东感到代表们对战俘说的“辛苦了！”这句话不妥，老人家说，战士们被俘去不是干活去了，不能叫辛苦了。从此“辛苦了”改为“受苦了”。战俘们为此感受很深：“我们的苦真没少受啊！”不少人控诉，在美军战俘营，他们吃的是发了霉、掺了沙子的大米，许多人因缺乏营养和环境恶劣患了肺结核，有的被饥饿折磨得骨瘦如柴；有的伤员本来伤势不重，但美军以治病为借口，拿战士们的肉体作试验，打完针后，全身溃烂；有的手和臂只受一点轻伤，但也被残忍地截断了。有一名师政治部副主任被俘后，敌人把他关在一个铁丝笼里，难伸难屈，痛苦的惨状难以言表。有一次接到 4 百名女人民军战俘和 3 名女志愿军战俘，她们见到亲人只是抹泪，难以启齿美军对她们的凌辱。交换时，不少人怒不可遏地扑向美军卫兵，脱下大头鞋砸向敌人头顶，有的把美军发给的军服用出老远。

与此相反，被俘的美军战俘却是另一种情态。“中国人好，讲人道！”“中国人好，优待俘虏。”不少战俘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在场的记者。殊不知他们在我战俘营吃的是大米白面，住的是暖房，一个个养得白白胖胖。一名加拿大战俘老远看见韩明伦就亲热地向他打招呼：“老弟！老韩！”

美蒋勾结劫夺战俘

第二次大交换后，在美国的示意和支持下，蒋介石加紧部署，决意劫夺剩下的志愿军被俘人员。

1953 年 10 月 8 日，台湾当局把在当年 6 月间被蒋李合谋从战俘营架走的 60 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劫往台湾。

台《中央社》的消息透露，这些我方被俘人员在美方派遣的混在战俘中间的台湾特务押解之下，被用飞机从美军当局控制的釜山飞机场运往台湾。

这个消息还透露，押解我方被俘人员的台湾特务之一，就是早已被我方归来人员所揭露的参预劫走这些我方被俘人员阴谋的蒋特费玉林。

遣返回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李洪根揭露：

这年6月21日下午4时，美军当局为了协助台湾特务劫走拘禁在釜山东莱战俘营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派遣美军部队向营场里投掷了许多毒气弹，费玉林与其他蒋特就乘着战俘四散躲避毒气之际把大批战俘架走，并将他们押到东莱的南朝鲜警察局内。第二天，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就送去许多便衣，强迫战俘改装后把他们分散囚禁在釜山市内。

对美蒋的这一罪恶行动，新华社于10月10日给予揭露：

蒋帮将战俘劫往台湾的历来行动，是与美国驻蒋帮“大使”蓝钦最近的南朝鲜之行有关的。据此间获得的消息说，蓝钦的任务是促成将这60多名战俘运往台湾，并进一步策划将不直接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劫往台湾和冲绳岛。消息还说，美方准备把不直接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先幼往冲绳岛，进行“甄别”以后再把一部分战俘运往台湾移交给蒋帮充当炮灰，另一部分留在冲绳岛由美军强迫进行军事训练。蓝钦从台北到东京，再从东京到汉城和汶山就是为了策划这个重大的阴谋。蒋帮也派遣特务头子林蔚陪同蓝钦到达东京进行活动。蓝钦的这种罪恶活动，完全证实了美方正在支持和协助蒋李集团劫走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下的战俘阴谋。最近以来，混在中立国看管营场里的蒋李特务一再制造暴乱事件，袭击印度部队，蒋李集团利用这些事件公然叫嚣要“解放”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的战俘，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蒋李集团正在策划的大规模劫走战俘的阴谋正在进行中。美方遣返组组长汉布化最近发表致战俘信中，假惺惺地劝告战俘不要“骚动”或“逃跑”，显然是为美方对蒋李集团正在布置的这个严重破坏停战协

定的行动预先推卸责任。

此间人士指出：朝中方面保留着要求美方追回今年6月间被李承晚集团架走的2万7千多名朝中战俘的完全权利。对于被运往台湾的60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美方绝不能逃避追回他们的责任。同时，对于现在印度部队看管下的战俘的任何“逃跑”事件，美方必须负完全责任，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

但美蒋无视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抗议，进一步策划劫持战俘的行动。

1953年11月24日，台驻美“大使”顾维钧与美国务卿杜勒斯会谈了40分钟后，又与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勃森作了20分钟的交谈。事后，顾维钧告诉台“中央社”记者，他“曾就包括战俘之遣返以及政治会议的前途等韩国问题与杜勒斯及劳勃森交换了意见”。

尽管顾维钧没有详细透露与美国务院交谈的内容，但我们从以后的有关新闻报道中可窥测其中一二。

12月2日，《国际新闻社》报道：“一个由8人组成的国民党‘慰问团’已于数天前离台北赴朝鲜慰问在非军事区印度部队看管下的中国反共战俘。这批人前往朝鲜是去问候中国战俘。团长是台湾红十字协会会长刘瑞恒博士。”

同一天，合众社报道：“据今天透露的消息说，国民党当局准备‘猛然发动’一个外交战，除非在朝鲜的反共中国战俘能在明年2月21日以前被遣

送到台湾来。”

与国民党当局有联系的一家英文报刊《中国新闻》说：“这里（台湾）的外交当局准备‘展开’一个强硬的外交战，使那些反共战俘能在那个日期以前被遣送到这里来。”这家报刊同时还暗示说：“国民党当坚决反对把这些战俘遣送到国民党当局的这个岛屿以外的任何地方。国民党政府现在显然认为这些战俘是‘民族主义者’，它反对使他们成为‘流离失所的人’。美国第8军军长泰勒曾说，他将把战俘们视为流离失所的人，他因而受到谴责。泰勒得到警告，叫他不要把战俘问题变成‘国际难民问题’”。

《中国新闻》揣测，“联合国中某些‘软弱的会员国’也许会建议重新讨论整个战俘问题。这家报刊说，它担心当‘联合国进行无休止的讨论时’，印度看管部队将受权继续看管这些战俘。”

合众社东京12月23日称：“赫尔将军今天通知国民党当局和南朝鲜说，他的远东司令部已奉命使用一切设备尽速将2万2千名反共战俘运往台湾和南朝鲜。这位四星联军司令说，朝鲜和中国战俘将于1954年1月22日成为平民，印度军队将不再有权看管他们。”

美蒋强运战俘赴台

合众社汉城1954年1月21日电：

由美国战斗机与军舰护送的一艘载有中国士兵的船只今天由仁川港出发，驶往台湾。

这些配备着日本水手的登陆艇子今晨7点10分开始从仁川港出发：第10只在两小时以后出发。

一只美国驱逐舰在从该港出发的时候起，就跟随这个“驶向自由的舰队”，并且在海洋中将与其他的美国军舰会合，在去台湾的三五天旅途中共同护送。

美国飞机在该舰队的上空飞行，一直要飞到黄海，以防止从天空或海面来的任何阻挠这种护航队的企图。

每只船配置45名日本水手，每一船上的中国人由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医生、军中医务人员和50名左右的保安部队随行。每一只船上有两名国民党当局的“纪律军官”，带着电影和娱乐用品，并且准备向这些战俘上课，告诉他们对于到了台湾后所作的事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志愿军战俘被掠到台湾之后，台湾当局大张旗鼓地进行政治宣传，蒋介石于1954年1月就志愿军被俘人员到达台湾发表文告，2月3日召见“战俘代表”120人，4月5日，台湾当局强迫全体被俘人员宣誓加入国民党军队。台湾当局宣称：“军事反攻还未开始，政治反攻已上成效，到台战俘就是证明。”当然，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在被掠去台的被俘人员中，除极少数被台湾收买成志愿军的叛徒外，绝大多数是迫不得已的。

这些被劫夺的志愿军战俘日后的命运也是相当悲惨的，罗治芳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

罗治芳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卫生员，家在湖南淑浦县。1950年7月，他只有17岁，便随部队入朝参战。由于作战中救护勇敢，火线光荣入党，还立了二等功。

1951年10月的一天，他所在的连队守备中线临津江803高地，被美军直升机用喷火器攻击，阵地顿成一片火海。他与几个战友蹲在防空洞内，被烟火窒息昏过去。待醒来后，艰难爬出洞外，在举枪向几个敌人射击时，被侧后突然跳出的美国兵抱住，落入敌人手中。

他在战俘营被折磨了3年，两臂也被硬刺上了反动字迹。1954年被掠到台湾。由于他仍然进行反抗，在桃园“难民营”被关了两年，受尽摧残。

1956年，他同一些难友一起被编入国民党工兵部队，分到外岛小金门，整天在外面修码头、工事，风吹日晒雨淋不算，仍然像在战俘营一样被严格看管，饭吃不饱，苦不堪言。

后来部队换防到高雄，他学会了开汽车，被调到桃园运输营当驾驶员，开着翻斗车，整天拉石送料，饥渴难熬，心情十分郁闷。一天不慎车尾撞倒了一个退役军官，重伤致死，坐了2年监牢。刑满释放后，有一次去医院看病，只因用废纸包着大便去送检，便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受尽苦头。最后被勒令退役，只发给了够买5条香烟的生活补助金。退役后身无积蓄，举目无亲，连吃住都成了问题。

台湾退除役辅导委员会（安置退役兵机构）将他送进花莲“荣民”医院农场作苦力，一干就是七八年，只给一点生活零用钱，不发工资，医院给扣着身份证，想走也走不成。在台湾没有身份证是无法进行任何活动的。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保人，要回了身份证，脱离了那白白当牛马的“荣民”医院农场。

出来后，虽然可以挣点钱，但工作、生活毫无保证，先后做过建筑工、包装工、清洁工，一直到1986年。在这期间，他省吃俭用，拼命干活，想积攒一点钱，有个回大陆老家的路费。因为他在台湾30多年，风风雨雨，历尽艰辛，直到50多岁还孑然一身，冷暖没人管，病老无人问。每逢年节，更加寂寞痛苦。新春佳节，就想起家乡热腾腾的年糕和甜酒；5月端阳，便想起故乡淑水里那热闹壮观的龙舟赛。八月中秋月正圆，见别家妻儿欢聚，更想念山清水秀的家乡长坪和80高龄的父母双亲。30多年酸涩苦辣，使他再也忍受不了那种非人的折磨，坚定了回祖国大陆的念头。

无奈台湾当局实行“三不”政策。他就注意收听大陆广播，了解大陆的情况，思考回乡路线，筹措回乡盘缠。他当时的家产，除了一辆旧摩托车、一架照相机和几件随身衣服，就一无所有了。

1986年2月，他到台湾旅游局办理了出国观光护照，交了5000元手续费，又花了8700元买了去泰国的飞机票。3月5日，终于踏上了梦绕魂牵的归程。他本打算经泰国，转道缅甸，返回大陆，但到了泰国，身上带的几个钱都花光了，进入缅甸因无手续，被判刑半年。被放后，从通向云南的缅方边防区，一路翻山越岭，历尽艰辛，才回到祖国怀抱。他受到云南边境解放军的热情接待，并被送到老家湖南溆浦县，1986年9月10日，他坐着县政府派的专车回到家中。

第二章

大陆发生自然灾害，蒋介石准备铤而走险，妄图要与人民力量决一死战

第一节 “反攻”老调

蒋介石观看海空演习

“8.23”炮战后，台湾海峡又恢复了平静。但美军为了显示自己的武装力量，不断进行所谓的“例行训练”，美台媒体也借此机会给予极力吹嘘。

1958年11月14日，台中央社连续发出了该社杨孔鑫发自美国航空母舰的消息。上午10时发出的消息题目是“蒋总统今天笑容洋溢地参观可以发射核子武器的美国第7舰队在台湾海峡举行的海军联合演习”，全文如下：

蒋总统今天参观美国第7舰队在台湾海峡举行的军事演习，总统于上午由美驻华大使德鲁姆赖特陪同从台北坐直升飞机于10时降落在这艘巨型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受到美国美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霍普伍德上将、美国第7舰队司令美国第72机动舰队司令布少将和美国第77机动舰队司令克拉克少将皆在“中途号”伫候总统莅临。这艘美国军舰上的欢迎仪式十分隆重，乐队奏出中国国歌，礼炮放了21响，军舰的主桅上挂上了中国国旗和总统旗，总统曾检阅舰上阵容整齐的仪队。

这次海空大演习是于上午10时50分开始，随同蒋总统参观美国第7舰队海空联合演习的中国高级官员有陈副总统、参军长黄镇球、参谋总长王叔铭、海军总司令梁序昭、空军总司令陈嘉尚、联勤总司令黄仁霖、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国防部联络局长胡旭光、总统侍卫长吴顺明、副侍卫长许承力、英文秘书沈剑虹、美军驻台湾协防军援司令斯摩特中将。

这是蒋总统第四次参观负责在台湾海峡担任协防任务的美国第7舰队。

第一次是在民国43年(1954年)1月9日，总统坐在33100吨的航空母舰“黄蛙号”的司令台上，由当时的第7舰队司令薄赖德中将和当时的第72机动舰队司令赫定少将陪同参观美国军舰和喷射飞机的联合演习。

第二次是在同年11月，总统乘一艘斯诺克式的潜水艇潜入水下10尺，这也是总统第一次乘潜水艇潜航。

第三次是在去年11月11日，蒋总统和夫人从台北坐直升飞机降落在另一艘33100吨的航空母舰“憫优之李却特号”的甲板上，参观第7舰队的海空演习，那次遇到倾盆大雨，曾使当时的第7舰队司令比克利中将指挥的海上演习延迟了1小时。总统在参观演习后曾在那艘航空母舰上答复新闻界的询问，说美国对于中国的支持“毫无问题的”，是坚定而持久的。

这回也是陈诚副总统第三次参观美国第7舰队的军事演习，他只在蒋总统乘潜水艇潜航的那一次没有和总统同行。

随行参观这个盛大演习场面的中外记者，包括电视广播、摄影采访共39人，其中中国记者18人，外国记者21人，外国记者代表的单位包括：合众国际社、美联社、美国电视新闻、路透社、法新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广播公司、纽约时报、日本共同社、朝鲜时报、美军星条报、美军广播电台。

45000吨的“中途号”航空母舰长968呎，宽136呎，吃水32呎半。舰上有5吋炮14门，3吋40门，可载包括新式轰炸机在内的各型飞机137架，舰上并可放射导向飞弹，这艘时速33海里，威力强大的航空母舰，是于1945年建造完成，造价达美金9千万元。

下午2时，杨孔鑫继续从“中途号”航空母舰上发出消息，说：

蒋总统今天穿着五星统帅制服，戴白手套，胸前佩青天白日勋章。

今天台湾海峡的天气特别晴朗，蔚蓝的天空像刚洗过的一样没有一片云彩。温暖的太阳使每一位参观的人都在这个初冬的季节却有“初夏”的感觉，只有秋天的微风，海平静而无波，而且光亮得像一面其大无比的镜子。

这次演习是在事先经过周密安排而且是严格保密的，“中途号”巨舰于今晨6时45分才奉命驶到台湾岛北部海外，距离中国大陆一百海里的海上，参加演习的。其他美国海军部队直到今晨6时也才奉到直接命令。

演习是从上午10时50分开始的，美国的3艘航空母舰“中途号”、“刘克星吞”、“提康德罗加”和150架各型飞机。在“中途号”舰的两侧还停着美国第7舰队司令的旗舰“海伦娜号”，和两艘驱逐舰“勃里却特号”与“克辛号”。

一批属于美国第11海军陆战队的飞机第一次飞过“中途号”巨舰时，这次显耀美国在远东海军的强大实力的实弹演习就开始了，这次演习被称为“学院演习”。

从“刘克星吞号”和“提康德罗加号”舰上起飞的飞机接着掠过“中途号”舰的上空。

当37架各种形式的飞机，从“中途号”舰上利用各种方式飞出时，掀起了这次演习的高潮，当1架飞机准备妥当后，只费42秒钟的时间就冲入高空，这些飞机从飞行甲板上喧嚣地飞出时，那个声音实在是震耳欲聋，即使肩并肩站着的两个人用高声喊叫也彼此不能听见话语。

飞机群升空后即表演火力，包括空中扫射、轰炸、发射火箭炮和空中加油，射击的海面目标只距“中途号”舰数海里。这批飞机的飞行轰炸和扫射的技术可说是简直没法再好。

12时半，机群开始一架又一架地飞回军舰，它们降落时每架只费时30秒钟，比起飞时还少12秒钟。

蒋总统和随行的高级官员坐在舰桥上参观这次第7舰队的精采空中火力表演，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霍普伍德上将和第77机动舰队司令克拉克和总统在一起。当飞机从飞行甲板上飞出时，“中途号”舰开足马力向演习地区航行，这时风力变得很强，使站在甲板上的人感到呼吸都有点困难。

演习于12时50分结束。

蒋总统和其他参观的人们于下午1时在舰上午餐，总统于2时半坐直升飞机离开军舰回台北。

美国第7舰队是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尚未消除的时候举行这次军事演习的，从今天上午0时直到演习完毕，共军未向金門发射一炮，美国第7舰队现有的实力如下：

125艘军舰、500架飞机和6万人员组成6个机动舰队和5个主要的混合机动部队。

尽管蒋介石宣称据守金、马，但他深知：如果没有美国的护航与协防，据守不过是一句空话。随着台、美“蜜月”的结束，台湾海峡平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秘密制定“反攻计划”

60年代初，中国大陆由于连续几年自然灾害，加之政策失误，经济上出现严重困难。

同时，自1962年4月开始，香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大批大批中国大陆难民涌至香港，仅4月份难民人数就从200增至1500；5月2日一天

之内，难民即达千人；5月14日有4000难民；5月19日5000难民。潮涌似的大逃亡，更强化了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决心。

台湾国民党当局误以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马召开了几次高级军事会议，调集得力干将，布置制定了庞大、周密的反攻计划，即“国光计划”和“旭光计划”，几十万军队日夜演练，蠢蠢欲动。这两项计划属于台湾当局的最高军事机密，初时甚至连美国顾问团也一时被蒙在鼓里，知情人可谓寥若晨星。

而今30多年过去了，蒋介石已经作古，“反攻大陆”的梦想终成泡影，两项绝密的计划方得以陆续曝光。

“国光计划”是蒋介石密令台湾三军“副总参谋长”执行官唐守治中将担任召集人，精选优秀军官，配合参谋本部若干人员，成立了一个作业中心。后来，美国得悉蒋方瞒着他们搞“国光计划”后，勃然大怒，台湾当局只好请美国人也来参与，该项作战计划也随之易名为“旭光作战计划”。该项作战计划设想是国民党军先在闽南粤东地区登陆，迎后续部队到达，攻占福州、海丰等地，建立攻势基地，形成先期有利声势再向内地发展。

此时，老蒋不顾70多岁高龄，多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在一次会议上，他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最先问到的是“陆军总司令”罗列，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务，改由刘安祺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他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顿时喜形于色，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许多士兵都被逼写好了遗书，随时准备“殉死”。

刘安祺日后在口述这段历史时说：

“我在陆总的头一两年，经常和老先生（蒋介石）在东埔（三峡附近）的山沿里进行登陆作业、研究登陆地点。那里原来是行政院的一个疏散地，很少人知道，只有老先生、我和几个重要幕僚常去……那时一鼓作气可能就上去了，美国人就怕我们拖他下水。那时大陆正在闹难民潮，是很好的机会……”

蒋介石要刘安祺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刘氏又说：

“我们还根据沙盘作业在南部地区，包括嘉义、台南、高雄举行‘昆阳演习’，包括海、陆、空三军，以陆军为主，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演习。我在演习中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当时计划主力在金门对岸的围头登陆，此外，潮汕、青岛都是登陆点。演习的时候在林边附近的海岸设了一个登陆发起站。”

美国恐怕重演猪湾惨剧

刘安祺说：“因为美国人盯得很紧，我们也怕消息泄漏出去，所以行动相当隐密。”

事实却不然。虎年一到，蒋介石就不断向美国访客强调，反攻大陆的日子来临了，只要“国军”部队登陆大陆沿海，哪怕是只有一个师的先头部队，大陆同胞一定会闻风起义。当时在美国国务院担任情报及研究局（INR）的希斯曼（Roger Hilsman）说，国民党府“透过官方与非官方、公开与私下的管道，一直向华府施压，而且日甚一日。”

希斯曼在回忆录《推动一个国家——肯尼迪政府外交政策中的政治策略》里透露，肯尼迪政府面对来自亲台北者的巨大压力，内部引发了两种不同主张的激辩。一派主张支持国民党军反攻，认为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在沿海建立滩头阵地后，可能造成星火燎原之势，已经和中国分手的苏联，不可能出兵助战；持反对立场的人则表示，国民党军打算先行在沿海登陆一、两个师的目的，乃是企图引诱美国介入，并导致美国与中共发生大战。他们担心国民党军登陆后，大陆同胞并未揭竿而起，中共亦未垮台，则岂非要重演一年前（1961）古巴猪湾事件的惨剧？且后果可能更糟。

蒋经国游说华盛顿出兵

作为国务院情报研究主管的希斯曼苦恼极了。他戮力搜集中国大陆情报，他始终怀疑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是不是会起来对抗中共；在大陆的中国人是不是不满新中国，这种“不满”会不会升华成“集体抗暴”？他终于有机会和一个人讨论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问题，这个人就是蒋经国。

1962年3月初，美国在马尼拉举行驻亚大使节会议，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嘱希斯曼专程赴台了解国民党当局的反攻意图。希斯曼于3月8日下午飞抵台北松山军用机场，即直奔蒋经国办公室。

蒋经国引用大量“敌后情报”以说明国民党当局必须反攻的理由，希斯曼则提出以下3个问题：

第一、在大陆的中国人是否会欢迎国民党？即使他们反抗中共，是不是会欢迎过去已失掉民心的国民党政权？何况国民党已离开大陆13年了。

第二、中国人对中共不满，固然是事实，但仅凭“不满”是不够的；军人对政府不满，并不足以造成政府的垮台，何况是老百姓。古巴军队只有百分之三十效忠卡斯特罗，这百分之二十却足够使卡斯特罗政权几立不坠。民众的不满是否能衍发成抗暴起义，乃是最难预测的。

第三、尽管国府列举各种理由，美方仍认为“证据不足”；美方确信国府反攻大陆的热望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台湾所提出的理由乃是建立在一堆“假设”上面。

尽管双方看法殊异，小蒋还是略尽地主之谊，请希斯曼吃中国菜。贪杯的小蒋教他划中国拳，希斯曼连吃败仗，被罚无数杯绍兴酒。蒋经国总算在酒席上“反攻胜利”。

蒋介石急于在1962年反攻的消息，中国领导人亦一清二楚。五、六十年代代表中国与美进行华沙会谈的老外交家王炳南在《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说：

1962年3月，我同卡伯特大使（美驻波兰大使）继续会谈……这个时期，台湾蒋介石集团趁我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之际，又开始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重又战云密布，局势空前紧张。我们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蒋介石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装了

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大陆。蒋介石集团还宣布延长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他们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据说他们还从日本大量购买血浆。看来蒋介石准备铤而走险，妄图要与大陆决一死战。

1962年春天，王炳南返国度假，周恩来嘱他立刻返回华沙任所，想办法从美国大使卡伯特身上探听美国的态度。周恩来对王炳南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一些困难，今天的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

王炳南不辱使命，波士顿世家大族出身的纨绔子弟卡伯特大使听了王炳南“警告”后，当场表示：

“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

王炳南在回忆录中说：

“听了卡伯特这个明确的表态，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不禁松了一口气。美国的态度很清楚，这正是我们急于要知道的。这个重要情况将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我一刻也不迟缓地把卡伯特的谈话内容报告了国内。事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我及时摸来了情报，了解美国的态度，十分满意，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1962年3月中旬，希斯曼再和哈里曼飞到台北与蒋介石会谈，明告蒋：“反攻不可行也！”然而，台北并不灰心，继续向华盛顿施压力。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头子克莱恩为蒋经国的酒友，他建议国军采取“秘密”（covert）方式大规模登陆大陆沿海，其手法等于是大型的古巴猪湾登陆。国务卿鲁斯克对这项建议大为光火。他在白宫会议上咆哮：

“台湾军队大规模登陆大陆沿海后，即假装是大陆同胞自动自发地抗暴起义，这简直是胡闹！”

发出“反攻动员”令

在秘密制定反攻计划的同时，蒋介石还到处散布他的“反攻”神话。

1961年3月29日，蒋介石对台湾青年宣称：

“面对当前反共斗争的新形势，真是报国救民千载一时的机会。”

1962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革新、动员、战斗”的口号。何谓“革新、动员、战斗”呢？蒋介石自己解释称：

“革新”包括“心理革新、工作革新、生活革新，而着重在心理建设的上面，要从精神、思想、观念、生活，到实际行动，全面的、彻底的革新”。

“动员”乃是“精神动员和组织动员，要求发挥同志的潜力，以提振全党的活力，并加强组织，深入群众，依循国家动员的轨道，完成一切准备，以保证全民总动员的贯彻实施”。

“战斗”则是在于“发挥集中统一的战斗精神，结合全党为一个战斗体的组织，并以战斗纪律，保证党的政策、命令贯彻执行，使能在敌前、敌后、政治、经济……各个战场上，展开全面的战斗”。

蒋介石还宣称：

“以革新重启革命的契机”；“以动员集结反共的力量”；“以战斗争取反共革命的胜利”。

1962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告青年书中提出：

“今日反共形势，我们已由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候了”。“青年子弟们必须确切准备”，“响应‘革新、动员、战斗’的号召”。

1962年11月13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三大任务，其中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反攻复国”的动员与准备。蒋介石对美国记者称：

“目前正是进攻中国大陆的良好时机”。“我可独立反攻”。“一旦我们开始反攻大陆，我们预期少则3年，最多6年内。完成我们底定全国的任务”。

“神话”的依据

听蒋介石的口气，好像“反攻圣战”迫在眉睫，他立刻就能扭转乾坤了。蒋介石为什么在1962年前后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呢？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蒋介石错误估计了大陆的形势。蒋介石宣称：

中共“现在是正处于公社失败，工业倒闭，俄援不继，灾荒饥饿，空前未有的毁灭恐怖的当口；亦就是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当口”。“陷于全民的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之中”。

“中共部队的效忠精神业已愈来愈糟，理由之一，是中共政权无法以较人民为多的食粮配合供应他们的部队”。

大陆民众“所遭受的迫害，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大多数中国人民，均热切盼望我反攻大陆，推翻中共政权”。

大陆发生饥荒是事实，有些人有些怨气也能够使人理解。但决没有蒋介石所说的出现了“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人浪”，也没有军队不忠现象，更没有大多数中国人热切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事实。有的只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同心同德，改正错误，战胜困难，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与实际行动。

第二，蒋介石企图利用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蒋介石在回答记者问时宣称：

“这两个共党集团间的分裂，在赫鲁晓夫或是毛泽东任何人被清除之前，没有弥缝的机会”。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中共与苏俄之间的分裂，已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造成一适当的机会”。

1963年3月4日，蒋介石在《反攻复国的前途》的演说中，专门分析了中苏之间的矛盾，提出：

“今日世界反共形势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赫、毛斗争加剧以后，自由国家如何把握利用这一机势的问题”。

从利用中苏矛盾的角度出发，蒋介石决定“反攻大陆”立即展开。

第三，企图在台海造势，拖住美国。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国人为了从台湾海峡脱身，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企图松动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是肯尼迪入主白宫前后，曾发表言论称：他坚信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应划一条清楚的防线。他一直认为金门、马祖对防守台湾并非必不可缺，美国防线应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肯尼迪的主张，遭到了蒋介石与“外交部”不点名的批评。肯尼迪上台后，虽然在改变对华政策方面迈出仅仅一小步，但

也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他之所以在两度“海峡危机”之后，再度点起海峡战火，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台海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牢牢拖住美国，同时借机试探一下美国对台“反攻大陆”的真实立场究竟如何；还可在政治上造成一定的声势，配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成就，引起国际上的瞩目。

“反攻圣战”的部署

正是基于上述3个原因，蒋介石认为1962年至1963年是他“反攻”的“决定年”、“胜利年”，遂在新竹召集国民党军队将领会议，具体研讨“反攻”部署。为了切实完成“反攻”，蒋介石并非只说不做，他的具体措施与步骤是：

第一，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1962年4月27日，台湾“立法院”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国防临时特别捐征收条例》。该条例规定，为完成“反攻圣战”，征税金额：各类货物税的30%，娱乐税的50%，筵席税的50%，地价税的40%，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价的30%。4月30日，蒋介石明令公布此一条例。5月1日起该条例生效。

时任“财政部长”的严家淦，解释“国防临时特别捐”不增加企业负担，只从个人所得税中增加，以增筹国防经费，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行政院长”陈诚也就开征“国防临时特别捐”发表谈话，希望同胞支持当局政策，承受暂时负担，增进集体安全，呼吁工商界人士与当局合作。

尽管台湾各界人士对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表示不满，并且根本不相信蒋介石的“反攻”神话，但都怕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吃官司，故被迫上交，据台报统计：14个月内共征收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

第二，设立“反攻”机构，全力进行“反攻”准备。1962年初，国民党当局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5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反攻”大陆的决策机构。

1963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之际，蒋介石在鼓吹“反攻大陆”的同时，提议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蒋宣称：

“本党中央前后筹组反共联盟及拟订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之议，当以审虑未周，延未施行，现一切反攻准备，既已新近就绪，而在复国建国整个过程中，尤复经纬万端，非举国意志更加集中，才智更加发挥，行动更加一致，不足以迅赴事功，加速胜利。九全大会，允应掌握时机，恢宏襟袍，以兴海内外仁人志士才智俊贤，推诚合作。中正盯衡全局，深觉此时筹组并召开反共联盟，实为符合全国愿望之举措。”

基于此认识，蒋介石向大会提交了《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案，要求大会议决。该案的要点是：

- (1) 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集中海内外意志与力量，提供反共建国大计，争取胜利为主旨；
- (2) 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为在现行宪政体制下之全民性结合；
- (3) 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个人为主体。由各民族、各党派、各社团、各侨团、各经济团体、各学术文化团体、各妇女及青年团体——特别是敌后组织，具有声望、成就与代表性之人士参加之；
- (4) 拟具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草案，融会各方意见，提交联盟会议，以为今后共

同行动之准据；

(5) 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会议决议事项，其属于政府职权者，经由政府有关方面采择施行；

(6) 责成九届中央委员会根据上项原则，研拟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并望于最短期内达成此一任务。

蒋介石提交的议案无人敢违，自然为大会所通过，并决议“遵照总裁指令积极贯彻”。

翌年4月30日，“行政院”成立“反共建国联盟”筹备委员会，由一生反共的谷正纲挂头牌，其他成员均多为蒋介石的准嫡系与忠臣，如：袁守谦、陶希圣、余井塘、张其昀、黄伯度、阮毅成等。当时还煞有介事地下设秘书处于台北，辖议事、联络、新闻、总务4个组，进行各项筹备具体事项。与此同时，蒋介石、唐纵公开号召海内外人士参加“反共建国联盟”。然而海内外人士相信蒋介石“反攻”神话的越来越少，参加者寥寥无几。

第三，纠集军队、特务准备窜犯大陆。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还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蒋还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北投的政工干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中共决一死战。

美国方面早就得到台湾当局可能发动反攻的情报。见到事态愈发严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警告说：“台湾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台美协防条约’”。蒋介石心虚了，在凤山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以美国不赞同和信守“台美协防条约”作为藉口，不得不宣布暂缓军事反攻，改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第二节 幻想成了泡影

叶翔之布置“游击活动”

经蒋介石批准，特务头子、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兼“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具体部署了代号为“海威”、“班超”等的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的情报作战，企图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

为了执行这两个破坏计划，美蒋特务机关，在台湾北内湖乡开办了“海龙训练班”，在台北淡海村开办了“海威训练班”。叶翔之任“海威训练班”主任，台“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任建鹏任副主任，“国防部情报局监察室”主任项乃光任教育长。在训练班里，对那些搜罗来的特务进行了海上渗透登陆、山地作战、野外生存、策动暴乱、爆破射击、心理作战、搜集情报、电讯联络等各种特务技术的训练。

特务机关为了驱使这些特务娄罗们到大陆来卖命，竭力对他们进行欺骗、蒙蔽和利诱。叶翔之等数次对他们进行“精神讲话”，要他们相信“大陆政权已摇摇欲坠”、“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鼓励特务们潜回大陆组织反革命武装，策动暴乱，建立所谓“游击走廊”。叶翔之还奉承这些武装特务是“国家的中坚，时代的宠儿，天之骄子，革命的先锋队”。他欺骗说，“只要你们登上大陆，一定会得到大陆同胞的拥护和爱戴”。

为了给这些特务打气，叶翔之亲自给他们授衔、授印，并设宴“欢送”，祝他们“马到成功”。

然而，事实是这样的无情，所有从海上和空中派来的美蒋特务，无一漏网地被我沿海军民歼灭。蒋介石的一切幻想，变成了泡影。

下面所举是几个地方的军民和人民群众歼灭台武装特务的经过。

荒岛上瓮中捉鳖

1962年10月7日天刚破晓，广东省惠阳县港口公社的一艘渔船驶向小星山岛南面的海面打鱼，忽然发现远处漂着一个黑色物体。具有高度警惕的渔民们，马上放下一只小舢板，由杜冯来等4人划着前去查看，发现原来是一只放了气的半浮半沉的橡皮艇，艇里有5支桨和一颗子弹，附近海面上还漂着同一式样的5支桨。杜冯来立刻想到，可能是台湾特务来了，而且从艇上的5支桨还未漂散、海面上的6支桨也漂流不远等情况来判断，乘船的人还是刚来不久。他又根据海潮、风向和橡皮艇、船桨的位置，判定敌人可能爬上了附近的一个无人荒岛——小星山岛。

情况初步分析判定后，杜冯来等立即掉转渔船驶回港口，向港口公社、公社民兵连和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惠阳县港口公社民兵连得到杜冯来的报告，马上紧急集合。理发师莫镜明、庄同、张耀南都是民兵，他们正在替顾客理发，听到紧急集合的命令，马上停止工作，飞奔到民兵连部报到。搬运工人李灶等也放下正在搬运的货物，跑步前去集合。不久，来自各行各业的民兵就集中到了连部。这些民兵的一部分在港口墟一带布防，准备在特务登陆时给予迎头痛击；另外21名民兵和3名人民武装警察，由4名干部带领，乘坐两艘机动渔船，由杜冯来引

航，从港口急驶小星山岛搜捕敌人。

他们在小星山岛登陆后，分 3 路搜索，有一路负责搜索海岛的山脚地带，他们英勇向前搜捕埋伏在乱草丛中的特务，开始了战斗。另一路民兵由人民武装警察助理员滕喜祥和民兵班长李灶率领，抢占小星山岛的制高点。他们听见山下激烈的枪声，就赶向枪声响处，在半山腰打死了一个武装特务。接着，又在一个山窝里发现了第二个武装特务，他一见民兵吓得连忙双膝跪下，弃械举手投降，活捉后查明，原来他是这股武装特务的“少校通讯组长”周俊义。接着，他们又和 6 个正要抢占山头的敌人迎面相遇。理发工人莫锐明端起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这 6 个特务被迫退到一个山洼里躲藏。滕喜祥、李灶部署了火力，封锁了这个山洼，并向敌人喊话：“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这 6 个武装特务无路可逃，只好举手投降。

这一路民兵走下山坡和其他两路民兵会合，经过对捕获的特务进行现场审讯，了解到还有 4 个特务没有抓到。他们就在岛上继续搜索。当晚，海军派来了炮艇，封锁了海面。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公安部队、地方干部和民兵，也陆续赶来。第二天天亮，在全岛进行了大搜索，终于把特务全部捉住。

绿豆岭水泄不通

在这以后不久的 10 月 28 日拂晓，又有两股台湾武装特务在广东省西部电白县沿海登陆。这两股武装特务共 22 人，带着 35 支长短枪、2000 多发子弹以及烈性炸药等，乘两只橡皮艇在电白县爵山公社下村海滩登陆。他们刚上岸，就被渔民和民兵发觉。渔民和民兵马上摸黑向附近的民兵队和公社报告，公社民兵立即将特务登陆点附近的交通要道和海面封锁起来，并且占领了控制海面的前岚岭制高点。附近各村庄的男女老少也闻讯赶来，他们拿着木棍、菜刀、鱼叉、禾镰等等，四处搜捕敌人。

天明以后，民兵陈金品发现荒僻的绿豆岭上，有两个人忽隐忽现，在一块石头上还搁着一个背包。陈金品立即向他所在的爵山公社排坡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杨亚基报告。杨亚基带着几个民兵与陈金品一起，跑步登上绿豆岭。22 岁的共青团女支部书记杨亚妙，拿着一把禾叉也跟着上了山。不久，民兵营长杨大应也带领民兵们赶来。他们首先和两个放哨的敌人遭遇，杨大应高声喝令敌人投降。两个特务在威武的民兵面前吓得浑身哆嗦，乖乖地弃枪投降了。藏在附近的另一个特务正想逃跑，被民兵发现。一个民兵赤手空拳地扑上去，双手卡住特务的脖子，这个特务吓得赶紧举起了双手。民兵们从他身上搜出一支手枪和一枚手榴弹。

这时，闻讯赶来的民兵越来越多。当他们发现第 4 个特务的时候，22 岁贫农出身的民兵杨妹九悄悄地绕到这个敌人的身后，猛然冲上前，一手抢过敌人的冲锋枪，趁势用冲锋枪枪托猛力一击，把这个特务打倒后活捉。在继续搜捕的过程中，民兵们又活捉了 4 个特务。

这时，天已渐渐黑了。民兵们仍在巡逻搜索。突然，杨大应发现一个石洞内躲藏着两个敌人。他独自一个扑到沿口外一丈远的地方，依着岩石，举枪喝令敌人投降。有一个特务看到眼前只杨大应一人，便拿出金条和手表来收买他，要他不要开枪。特务们对他说，要金条有金条，要手表有手表。杨大应一听气坏了，他端起枪来就把这个特务的嘴巴打伤了。其他民兵闻声赶来，冲进石洞抓住了这两个特务。

民兵们这时已抓到 10 个特务，对这些特务进行现场审讯后，知道还有 12 个特务躲藏在这条弯弯曲曲到处是大石头的沟壑内，这时，附近几个村庄的群众也都拿着刀枪等各种武器到来，把偌大的一座绿豆岭围得水泄不通，民兵和群众怕特务利用夜色逃跑，就点起 5 盏大汽灯，挂在绿豆岭上的沟壑附近，把那里照得通明。附近村庄的老人娘和媳妇、闺女们，也纷纷烧茶煮粥，成群结队地挑到绿豆岭，给正在围捕特务的乡亲们吃。许多妇女还从家里带来了捆绑 100 个特务也用不完的绳索。躲藏在沟壑内的最后 12 个特务看到无路可走，只好一个个举着手钻出来投降。当民兵押解着这两股特务回县城的时候，沿途村庄的老大爷、老大娘们，都气呼呼地一边骂，一边拿着木棍、扫把要打这批胆敢爬上大陆来捣乱的台特，有些老大娘还哭着要替解放前被国民党反动派害死的亲人报仇，特务们个个吓得浑身发抖。

“光杆司令”的下场

10 月 8 日，有一股武装特务爬上惠来县海滩不久，沿海的渔村里就到处响起了报警的螺角声。带队的“广东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一纵队”的“司令”吴纯彬，吓得丢掉了帽子和地图，在登陆点附近乱窜。有几个武装特务不久就掉了队。当天，他带着剩下的特务在野地里伏了一天。到了晚上，他看到交通要道上已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更吓得手足无措，赶紧叫特务们丢掉电台等笨重装备，分头逃命。

吴纯彬带着一个特务找路逃生。在四处乱窜的时候，他和那个特务又在躲避巡逻的民兵时走散。他慌慌张张地钻进一处小高地下面的石头缝里，提心吊胆地挨过了一夜和一个白天。到了晚上，他实在冻饿难当，就爬出石头缝想到地里挖几个番薯充饥。他刚一出来，就被在这个高地顶上放哨的 3 个民兵发现了。民兵们拦住了吴纯彬的去路，高声喝问：“口令？”他抖抖索索他说：“我是惠来人”。民兵一听对方答非所问，接着又喊：“不准跑，你开枪就打死你！”吴纯彬被吓得连连鞠躬，结结巴巴他说：“兄弟狗胆包天也不敢开枪，更不敢跑，要跑现在也跑不动啦，从登陆到现在，我一口饭还没有吃呢！”

这个特务纵队“司令”被押到大队部以后，惊魂未定他说：“大陆上全民皆兵真吓人呀！就像是天罗地网，不说我一个吴纯彬，就是千万个吴纯彬也逃不出你们的手心啊！”1962 年夏天和秋天都平静地过去了，台湾未曾掀起反攻波浪，蒋介石苦有憾焉；在美国的强大阻力下，他又失去了一个机会。不过，蒋介石并不甘心，他仍不断向大陆派遣武装特务。

深山密林歼伞特

1963 年 6 月以后的一个时期，我广东、福建、浙江、山东、江苏等沿海军民又连续歼灭了 9 股台偷渡登陆和空降武装特务 90 人，再一次粉碎了美蒋当局对沿海地区进行小股武装骚扰的罪恶阴谋。6 月下旬的一天，海南山区的各族人民正在欢度收获节，一架美蒋间谍飞机，以夜幕作掩护，偷偷地潜入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上空，在陵水县山区空投了一股武装特务。

敌人窜扰的罪恶行径立即激起了山区周围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怒，人们一听到消息，立即拿起山刀和枪支，纷纷上山，奔向敌人空降地区。黎族、苗

族的民兵和猎手们，熟悉地形，一马当先。曾在解放初期剿匪战斗中立过功的黎族民兵连长谭才英、副连长吴亚保，刚刚从广州开完全省民兵代表会议回来，放下行李，立即星夜出发。许多在宝岛落户建设的复员军人，也雄赳赳地赶上山来。在附近执行任务的解放军边防部队某部的战士，闻讯后日夜兼程挺进。

一个围歼空降特务的天罗地网就这样迅速撒开了。

各族民兵和战士们到达敌人空降地区后，连夜设岗布哨，把各个山头、溪涧、小路都控制起来。

在某山头上放哨的凌水和保亭县交界的某生产队的黎族民兵班长黄生朝，民兵黄大祥、黄大崇 3 人，埋伏在灌木丛里监视着山坡的路。夜半，对面山坡上忽然传来脚步声，黄生朝等马上警惕起来。脚步声越来越近，在寂静的山林里听得特别清楚。3 个人带的只是 3 支火药枪，大家忙把机头打开，每个人心里都热呼呼的。

一个黑影看得见了，沉着的黄生朝一动也不动的，也没有发口令，这个 21 岁的共青团员，心里已准备好了对策，要给敌人打个措手不及。

“站住！”黄生朝等敌人行至距他们只有五六步时，才大喝一声，3 个人一齐跃身冲出灌木丛，举枪对准这个家伙——空降特工符锦富。

与此同时，一个黎族村庄——陵水县的小妹生产队，人们已经熄灯休息了，只有生产队长黄其英的茅屋里，还有微弱的火光。

这个只有 40 多户人家的小村，青壮年人大都上山搜索敌人去了，黄其英一家三兄弟就去了两个，三弟其元因身体不适，留在家里，他年老的母亲按照黎族人民的风俗正忙着酿酒准备欢度收获节。这时候，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人摸进屋里来，有气无力他说：“有水吗？给我水喝。”黄其元一听这个口音，就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他一面递上一碗饭汤，一面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个不速之客，还带着一支枪。他差点没叫出声来。

“可能是空降特务，决不能让他跑掉！”

黄其元一家是在旧社会的苦海里泡大的。他两岁便失去了父亲，身体还没有牛屁股高就给地主放牛了。母子四人被国民党军队逼得出走异乡，连仅有的一口铁锅也卖了。全家老小替地主做牛做马，直到解放以后才开始过幸福的生活。他三兄弟都参加了民兵，现在，仇人相见，恨不得一下把敌人抓住。

这时候，茅屋里只有他母子两人，手无寸铁。黄其元苦苦思索着活捉敌人的对策。他故意装作热情地和敌人搭讪，一面又给敌人递上白饭，又装着给敌人张罗睡觉的地方。他探问敌人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狡猾的家伙，一会说同行的有 100 多人，一会又说是 10 多人。满嘴胡话，真是不打自招。

当黄其元正在拉扯着的时候，他的老母亲已十分警惕地溜出门外，找干部去报告了。一会儿，屋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这个特工惊慌起来，站起身拔腿就跑。“不准动！”从山上归来的黄其连和民兵陈其光、冯有辉偕同边防战士早已把他团团围住，黄其连眼明手快，一把夺过敌人的卡宾枪。

在强烈的手电筒照射下，这家伙耷拉着胡髭满脸的头，如丧家之犬。这股空降特工的少校副队长兼通讯组长周少茂，就这样乖乖地当了俘虏。这个特务自供是在慌乱中走散了，他满以为像台湾美蒋特务机关所说的，这里是什么“安全地带”，有他们的“游击队”活动，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山

区各族人民都跟美蒋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只有缴械投降才有“安全”。

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山上山下士气大振。各族民兵、猎手和边防战士们，组成许多搜索小组，乘胜向敌人躲藏的深山搜索前进。

这里群峰绵亘，浓荫蔽日，到处都是七八十度的陡坡。漫山遍野长满了荆棘茅蒿，地上覆盖着枯枝腐叶，完全没有道路，搜山的勇士们只能披荆斩棘，开路前进。他们攀着野藤、矮树，一步一步地向前搜索。那些被誉为“飞行小组”的战士们，更是风里来，雨里去，一把炒米一口水，昼夜兼程。他们衣服给荆棘划破了，小腿给山蚂蝗咬出了血，也毫不在意，一心想着迅速、彻底、干净地消灭敌人。

山下的群众也纷纷烧茶做饭，把粮食、雨具源源送到深山里去。附近公社的党支部书记曾繁植也亲自领着一支运输队上山来。这个40多岁的共产党员和同行的3个伙伴，都参加过解放初期剿匪的战斗，走山问夜路毫不困难，他们一手摸路，一手扶扁担，踏着怪石嵯峨的山涧溯源而上，绕过水花飞溅的瀑布，在长满青苔的悬崖滑下来，又从黑糊糊的山洞里穿过去，就没有摔过一跤，也没有掉一粒米，给上山的子弟兵，送来了茶饭。

来自公社的青年姑娘郑亚照，干脆把大米、饭锅挑到山上掘坑立灶，办起食堂。突然哗啦啦地来了一场夏季暴雨，她赶忙把身上的雨衣盖在灶锅上，全身被雨水淋得湿透，她毫不理会，热情地招呼着路过的战士和民兵。当她看见亲人的衣服被荆棘划破了，又赶忙掏出针线包为他们把破洞缝好。

经过围追，剩下的6个敌人已被压缩在一座大山的山腰上，陷入四面包围之中，搜山小组像一把把尖刀似的从四面八方插向敌人的巢穴。

某部5连的上士班长陈培珠领着5个战士爬山越岭，一直插向山腰。搜索间，丛林里一种异样的声响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马上分头埋伏，接着发现两个家伙正想到溪涧舀水呢。尽管这些敌人狡猾，但逃不过训练有素的战士的眼睛。陈培珠向战友们使了个眼色，悄悄向敌人逼近。

陈培珠他们从早上开始已搜索了好几个山头，没有碰上敌人，心里早窝了一肚子的火，此刻，敌人就在眼前了，决心抓个活的！他们距离敌人只有20米了，便大喝一声：

“不准动！”

这两个家伙闻声扭过头来时，陈培珠和战士像猛虎般地扑了过去，两个特工只好颤抖着举手投降。

围歼飞贼的包围圈越来越紧了。从山沟正面往上搜索的是少尉参谋胡光达和列兵刘活成。胡光达曾经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鬼子较量过，荣立过三等功；刘活成是入伍不过一年的新战士。他俩一股劲地向前搜索，突然前面传来隐隐约约的脚步声。

“可能是敌人！”胡光达立即和小刘在一块山石后面隐蔽下来。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果然是一个台特，这个狡猾的家伙一脸惊惶的神色。胡光达一个箭步从山石左侧跃出，跳到敌人面前，喝令敌缴枪，小刘跟着冲上前去，两支枪一齐对准敌人胸口。

这家伙猛一惊，吓得脸色惨白，口里颤颤他说：“……不要开枪……”双手已举起一块白手帕，浑身打着哆嗦。

胡光达看到这个台特的狼狈相，不禁又想起在朝鲜战场上美国鬼子投降的狼狈相，真是一模一样。不过，此刻他心里急着抓台特，无心去观赏这家伙的丑相了。他俩把俘虏交给后面赶来的战友，又继续往前冲去。

这一撮残余特务被民兵和战士正追赶得走投无路，刚好就在这一条山沟里和胡光达碰上了。胡光达扬起手枪大喝一声：“缴枪不杀！”话音未落，刘活成已扑到敌人面前，附近的战友也闻声蜂涌而来。台特们眼见无法逃脱，只好俯首就擒。其中一个家伙，就是这股空降台特的少校队长邓建华。

至此，这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的特务机关“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C. C）直接派遣的8名空降武装特务，全部被歼了。缴获手枪、无声手枪、卡宾枪和弹药、伞具、通讯联络器材等军用物资装备一大批。这些罪证，从武器电、台到电池、水壶，几乎件件都打上“美国制造”的罪恶标记。

这股全副美式装备的特务自供，他们从选拔、派遣、训练到制定破坏任务，都是美国驻台湾的特务机关“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C. C）一手经办的。这股号称“海南苗黎族自治区饥民革命行动团”的台特，是阴谋在五指山区建立所谓“游击基地”，进行窃取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破坏活动，并且作“特种战争”的实验。但是，当他们刚刚着陆不久，就逃不了必然覆灭的命运。

当民兵和战士们押着俘虏和战利品下山时，各族人民都纷纷前来观看，小妹村的黎族同胞们更是欢欣雀跃，男女老少争相前来慰问全歼美蒋特务的子弟兵，山上山下响起了胜利的欢呼。

挺进人民罗网的“挺进军”

1963年8月20日凌晨，上弦月躲到云层里去了，四周漆黑。澄海县坝头公社洲畔大队的民兵王良河正在屋里煮饭，准备一早去生产队的田里锄草。忽然门外传来了一阵紧一阵的狗吠声。良河想到门外察看究竟，刚踏出门，一支枪口对准了他的胸口。几个陌生人挟持着他就走。到了堤上，一个家伙问王良河：“你们这里有没有山？”王良河听了，心里好生奇怪：三更半夜，这些人为什么要上山，难道这些人是……。便说道：“我们这里没有山。”走了几步，一个家伙拿出一只金戒指，就往王良河的手指上套。王良河这时心里明白了：这些人的的确是美蒋武装特务。他不禁把手一甩：“不要你们的金戒指。”那个特务眼看此计不成，又从衣袋里拿出一叠钞票来，在王良河面前晃了晃说道：“金戒指不要，钞票可要？”王良河又答道：“什么东西也不要。”特务们眼看利诱不成，便改用威胁了。他们将王良河的手缚了起来，然后对他说：“老实告诉你，我们是从台湾派来的游击队，我们不安全，你也活不成！你要好好想办法找个地方给我们藏下来。”说完这些话，便推着王良河说：“走！快走！”

特务们挟持王良河来到了一片甘蔗林面前。8月的甘蔗长得比人还高。王良河被推进了甘蔗园。王良河看着那些用特制的电筒在查看地图的特务们，心里怎么也不能平静，他心里的盘算：我跑出去，要是敌人开枪打死我，敌人会暴露自己；要是打不死我，我报告大队后，敌人就完蛋。最后，他下定决心，找寻逃脱的机会。他暗中慢慢将捆绑着两手的黑绸布解开，同时向特务假意说这块地天明有人来锄草，这儿是不能躲藏的。一个特务看见天快亮了，便急了起来，马上要转移。正当特务们从这片甘蔗地转移到另一片甘蔗地时，勇敢、机智的王良河，趁着特务们走得慢，像离弦的箭一样快步奔跑出去，一口气向大队民兵营长王镇田的村里飞奔。3个前来追赶的特务怎么也追不上熟悉地形的王良河，但又不敢开枪追击，让王良河跑掉了。

王良河逃脱以后，敌人眼见情况不妙，国防便慌忙跑出蔗园，急奔外砂河，企图夺船逃命。

四野宁静，蓝天闪烁着点点星光。停泊在外砂河畔、准备天亮返航的饶平县海山公社隆东大队的一艘船上，睡着庄汉坤、庄汉烈两兄弟。突然，堤岸上传来了低沉的喊声：“渡我们过河。”汉烈往堤上一望，隐隐约约看见有10多个背枪的人，他以为是“大军”，急忙准备起锚。可是，船没走几步，岸上的人已跑到船边，跳上船来了。

汉烈见来势不妙，暗暗想道：这些人这样凶恶，哪像“大军”。正在犹疑不决，那个手持短枪，坐在船头的人叱道：“开船出海，到香港去。”汉烈一听这话，就断定是特务，于是下定决心，就是死，也不能把敌人送走。可是，怎么办？他看了看天色，此刻天快亮了。他想，天一亮，两岸行人多，那时跳水逃脱就容易了，他决定先在船上慢慢消磨时间，伺机逃走。

船傍东岸，慢慢地移动了。惊慌的特务，嫌船走得太慢，用枪逼着汉烈：“起帆。”本来这时正是东北风，既顺风又顺潮，一起帆，船就会像箭一样向出海口飞驰。只见汉烈机警地答道：“风不好，不能扯帆。”那个特务又说：“把船驶到河中间。”汉烈撒谎说：“这条河中间沙滩多，容易搁浅。”这可把敌人吓坏了，敌人再不敢说话了。这时，在船头划桨的汉坤故意把桨停了下来，特务一阵惊叫：“干什么？”汉坤答道：“桨坏了，要修理。”

尽管两兄弟想尽办法拖延时间，可是由于顺风顺流，船还是迅速地流向港口，两兄弟心急如焚，就在这个时候，岸上出现了几个民兵，船旁也正好横着一个浅滩，船慢慢绕过码头。汉烈眼明手快，便将船划到浅滩上，用力把舵往下一插，船唰地一声，碰着沙滩搁浅了。这一停，敌人慌张极了，就在这一刹那，两兄弟一个箭步跳下沙滩逃脱了。“砰！”敌人开枪了，接着岸上的民兵也向敌人开火了。原来，王良河从蔗园里跑出来以后，就立即把美蒋武装特务登陆的情况报告给洲畔大队的民兵营长，很快，公社、县就接到了关于敌情的报告。按照严密的部署，洲畔大队的民兵迅速出动了。

民兵副班长王映藩和民兵王芝聪，这天刚好睡在大队的民兵部。一听说发现了敌情，一骨碌就爬起来。民兵王厝边、王汉光正在准备吃饭，以便天一亮就下田锄草，听到抓特务的消息，就放下碗筷，三步两脚跑到了民兵部。他们4人带着枪，一齐来到和尚围上。复员军人、民兵王细妹，听到有人叫他侄儿去抓特务，他跑来了。在围上，他们看见外砂河面上的一只模糊朦胧的船影，他们说道：“快追，不让敌人逃跑。”

外砂河北接韩江，南通大海。河面东西宽约六七百米，是韩江的支流，是这个地区主要航道。

这时那艘被敌人夺占的船只正傍着河西，顺着退潮的急流，从北往南驶向大海。6个民兵划着小船，斜掠过河面，赶了上来。船上6对锐利的目光，透过朦胧的河面，紧盯着前面那艘船影。

船影越来越清楚了。民兵副班长王映藩命令大家，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后来，王映藩又考虑了一下，觉得我方船小，且众寡悬殊，不如先上河西岸，利用岸上有利地形，缠住特务，待大队民兵上来。

6民兵来到了河西堤岸。岸上是一座蜿蜒曲折的石堤，离石提约1丈远，是一带防风林。王映藩立即下命令：大家利用石堤作掩护，跑步前进，追踪那艘被敌人夺占的船。他们一口气赶了7里多路，到了大新围时，终于赶上了那艘船。

这时候，船搁浅了。船上两名船工逃跑了。惊慌的敌人，失去逃往大海的希望，手忙脚乱，向岸上瞎打枪。民兵们便集中火力射击那艘船，8个敌人被迫离开了船，鬼鬼祟祟地爬上沙滩，逼近堤脚。陡直的高堤，很不利于民兵射击敌人。王映藩就叫王盛界、王细妹先撤下去接走跳船逃走的船工，又命令王汉光、王芝聪、王厝边3人，分散隐蔽在附近的防风林和竹林里窥视敌人的动静，严密监视敌人，自己则沿着石堤，继续往南跑，准备把敌人诱过来，迷惑他们的去向，再设法堵死他们的退路，把他们缠死在这里，以待援兵的到来。

爬上岸来的敌人不见王汉光、王芝聪等人，果然都向王映藩追来了。他们相距只有20来步远。王映藩见敌人被引过来了，一个劲往南跑了好几百米，然后一骨碌钻进了附近的水利管养所。敌人跟上来后，他又从管养所另一道门冲出去。敌人闯进管养所，找不到王映藩，忙乱了一阵，就慌慌张张钻出来。这时，天色已是蒙蒙亮。敌人深怕久留中计，赶忙溜回那艘船去。这时候，王映藩从管养所出来，见敌人不敢追上来，就朝附近村庄的天空鸣了两枪，发出了警报。

当6个民兵英勇阻击台特的时刻，正在河西堤岸上看管水利的新溪公社社员谢阿猪一听见枪声，便拔脚飞跑到驻军某部7连报讯。7连立即派出了几组战士前去追捕。在河的东岸，边防公安部队某部3连接到坝头公社的报告后，也派出5名战士沿着河堤跟踪追击。公社派出的“南港二号”机帆船也迅速出击。在三路包抄下，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这天，机帆船上只有一人在守船，但是当抓特务的消息一传开，有着20多年掌舵经验、曾经参加过解放南澎岛的老舵手王老鹅，他连外衣都没有披，就从另一条船跑到机帆船来帮忙。回家休假的隆都公社的干部林修辉刚从梦中醒来，也主动上船请缨杀敌。接着，基于民兵高耀佳、王河等人迅速赶来集合，几个边防公安战士也闻讯赶来了。一个由民兵、渔民、边防战士组成的战斗小组，就这样迅速在船上组织起来了。

“南港二号”机帆船朝着那艘敌人夺占的船追来了。这时，东岸的3连战士罗启才等5人也一口气跑了5里沙滩，直插南港口。在西岸，新溪公社的基干民兵谢木园正带着某部七连的几个战士，直奔南港口。敌人被团团围住了。

特务们并不死心，企图奔向港口逃命。守在东岸沙滩的某部3连战士罗启才，瞄准敌人连发了几枪，武装特务的第一大队长林石平应声而倒。敌副参谋长兼电台台长梁发有和第二大队长蔡满堂，也先后负伤。船上的敌人看到大势已去，先后有6人跳水上岸投降。可是，一个狡猾的敌人还在船上烧文件，企图毁灭罪证。从西岸插来的某部7连战士丁维铁、叶年德看在眼里，怒在心头，他们以猛虎扑食之势，涉水冲过去，喝令敌人住手。这个家伙不听命令，丁维铁便举起冲锋枪“砰、砰！”两枪，正中敌人左手。丁、叶两人趁势跳上船，一手把敌人抓住。这个国民党老牌特务、中校支队长魏雄文，连同罪证文件，就这样成了年轻战士的“猎物”。

正当6个敌人上岸投降的一刹那，敌副支队长林良勇、陈剑鸿，一头钻到水里，向大海的方向游去，妄想逃命。机帆船上的优秀射手陈兆辉看准敌人刚露头，连发几枪，先后将这两个特务打伤了。特务陈剑鸿摸着自己受伤的头，还想继续逃命，船上的民兵不断叫喊：“缴枪不杀，不举手就打死你！”这时，他只得慌里慌张地举起双手，大叫饶命。于是，民兵高耀佳、

王河用一条长竹竿把他拖到船上来了。另一个特务林良能，还不死心，涉水爬上沙滩逃跑，民兵们一心要抓活的，而机帆船这时又靠不了浅滩，怎么办？正好附近有一只小竹排，高耀佳叫声：“我下去！”就勇敢地跳到竹排上，对敌人紧追不舍。小竹排随波逐流，一会儿就驶到浅滩，高耀佳纵身一跳，敌人便俯首就擒了。

一场快速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台湾派遣的所谓“反共挺进军第81支队”这股美蒋10个武装特务，无一漏网，他们随身带来的枪支、弹药、电台等美式装备，被我民兵、解放军边防部队和人民群众全部“接收”了。

在清点战利品的时候，人们发现了特务一封没有发出的给肯尼迪的电报底稿：

请立转美国总统甘乃迪（肯尼迪）先生暨联合国主席、秘书长，并转中华民国大总统蒋中正先生钧鉴：

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民……现在有×千×百余人，集结在××地区，进行武力抗暴，誓与共党匪徒，生死搏斗，特电请赐予支援……。××抗暴军司令、主席、……。1963年×月×日。

这份电报是美蒋特务在登陆前就写好的，他们满以为爬上大陆后会真的有人来“欢迎”他们。没想到这一切竟成墙上画饼，这份电报成了对美蒋特务以及蒋介石、肯尼迪之流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战后，台特首领、中校支队长发出这样的哀叹：“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以为我们来到大陆，老百姓会来欢迎的，万万没想到一登上大陆以后，老百姓都把我们当成过街老鼠。”

喝令敌特投降记

1963年8月27日黎明前，苍茫的海空只有几点星光。浙江省温岭县莞岙公社乐峰渔业大队第一生产队的一对出海渔船，正行驶到落星岛南边的海面上。老大潘度梅，看见有一只小船在浪里飘荡。“这几天好风好水的，怎么会有船飘到海上来呢？”潘度梅警觉地想了一想，忙把睡在舱里的张正大、黄定升、潘夏奶、张加忠4个伙伴叫醒了。大家一看也觉得可疑，就决定靠过去盘问一下。潘度梅把舵一转，驶近小船问道：

“你们是哪里的船？做什么的？”

“我们是岙环的船，被风飘出来的。”对方一面回答，一面狡猾地划着桨向渔船靠近。小船擦着渔船，有个人伸手想抓住渔船的船舷，企图爬到渔船上。潘度梅眼尖手快，轻轻把舵一带，渔船避开了小船。并发现这是一只“轮子船”（安机器的小船）。他们想，邻社岙环根本没有这种船，船上的人穿戴也不像岙环人。这5个民兵，越分析越觉得不对头。同时，在另一只渔船上的民兵黄奶儿、潘老五、潘小玉和老渔民黄定寿、黄定忠5人，也已看到了这只可疑的小船。10个人一起商量了一阵，认为这十有八九是只特务船，并决意不放过这只可疑的船。

两只渔船一前一后，又一次驶近小船。潘度梅厉声喊道：“你们到底是哪里来的？”小船上的人知己暴露，想瞒也瞒不住了，被迫自招：“我……我们是台湾来的。”并企图诱骗渔民：“你们要吃东西，到我们船上拿。”

渔民们一听是台湾来的特务，一个个都红了眼。千仇万恨像潮水般地涌上心头。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特务捉住。可是，赤手空拳，怎么擒敌呢？经过商量，认为特务的船开不动，大概是没有油了，这样敌人要逃也逃不掉；他们决定留下一只船监视敌人，由另一只船去报告政府。

黄奶儿等驾着渔船，飞也似地向石塘驶去。特务们看情况不妙，拼命地划动4支桨，想甩开监视的渔船。但是，潘度梅巧妙地掌着舵，利用风向，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一会儿向左，一会和向右，紧紧盯住敌船。敌船划近三蒜岛，7个特务像丧家之犬，沉掉船只，爬上了小岛。

三蒜岛，离内陆有10来里路，是一个只有20来户社员居住的小岛。当时是石塘公社石塘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岛上的居民，在旧社会饱尝敌人的百般欺凌，没有过一天安定的日子。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有时小岛遭到台风袭击，党和政府就派人到岛上慰问。他们深深感到新社会的温暖。

27日早晨住在半山腰的叶恩富刚吃过早饭，和8岁的弟弟阿富一起上山割草，他们在山岗上看到隔坑有几个背枪的陌生人，慌里慌张，鬼头鬼脑的在那里东张西望。叶恩富立时起了疑心，停住了脚步。聪明的阿富，连忙跑到家里去告诉母亲郭银珠。不一会，郭银珠赶到山上，母子俩就一齐盘问起可疑的人来了。特务被问得露出了马脚，自知狡辩不过，只好说出是台湾来的，并装出一副可怜相，狡猾地要她母子帮忙。郭银珠一听是台湾来的，什么都明白了，她暗地里咬咬牙齿说：“你们这批强盗，残害人民，无恶不作，今天钻到岛上来，可不能饶过你！”特务见她不响，就摸出一只手表想塞给叶阿富，被阿富拒绝了。郭银珠说：“你们要活命，快向人民政府投降。”她叫阿富远远盯住特务，自己就跑向山脚去告诉社员。可是，这一天山脚只有些老年男社员和小孩子在家。大家听说有特务，就同仇敌汽，商量对策：一、马上去报告政府；二、逼特务投降。55岁的老社员郭加良刚走到半山，就和特务碰见了。他一面叫特务向人民政府投降，一面把特务引到山下来。

特务战战兢兢地走到山下，就陷入了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10来个男女老社员把特务团团围住，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缴枪不杀，只有投降才是出路”。特务面面相觑，像过街老鼠一样感到走投无路。有个特务嗫嗫嚅嚅地问了一句：“共产党真的不杀我们吗？”群众中又响起了同样的声音：“只要缴枪投降，保证不杀！”

趁这个机会，郭加良走出后门，翻上山岗，找着了正在番薯地里干活的生产队长金宗德。两个人一计议，立即用联络讯号向海上船只和内陆报讯。

在山脚的特务并没有立即投降，偷偷地溜到前面的一座山上去。这时，59岁的老社员刘阿亮和女社员陈三姐，刚刚割草回来。他们听说有特务，陈三姐抬头就看到了对面山上的特务。但是，只有右眼有几分光的刘阿亮，却无法看见。他急得直搓手，担心地问：“特务会不会逃走？”陈三姐说：“逃不了，岛上的船都出去了；我们已有人向政府报讯，解放军快要开过来了。”

听说特务逃不了，刘阿亮心上的那块石头才落地。这个贫苦渔民出身的瞎眼老社员，忘不了过去所遭受的苦难，对敌人恨之入骨。他在心里盘算：这些特务，等会儿一定会被解放军捉住，在解放军来到之前，最好先把敌人的枪缴来。想到这里，他就跟陈三姐一起上山去缴枪。

当我解放军的船只出现在海面时，岙里的老人们，又一次围上来叫特务

投降。刘阿亮挤到特务跟前说：“你们只有缴枪投降，才是出路。”

“我们缴了枪，不会将我们割肉割耳朵吗？”有个特务颤抖着声音问。

“哪有这种事？”刘阿亮反问。

“台湾说的。”

“这是造谣。”刘阿亮气愤地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一向宽待缴枪的特务，立功有赏。”他拍拍胸脯说：“我今年快60了，有儿有女有媳妇，还会说假话？要死要活，由你们自挑！”

“要活命，快缴枪吧！”在旁的老人一齐喊了起来。

敌人自知已堕入人民的罗网，无法逃脱，当场就被群众解除了武装。刘阿亮怕特务身上还藏有武器，特地走上前去，将每个特务从头到脚都摸了一遍。

“解放军来了！”群众兴奋地喊了起来。刘阿亮等抱着缴获的枪支，接来了我边防部队、公安部队和上马、石塘、钓嘴等公社的民兵。

红日当空，海风习习。台“中央情报局”派遣的“浙江反共救国军独立第30支队”的7名武装特务，到这里就全部投降了。三蒜岛上，响起了一阵胜利的欢呼声。

全歼“反共挺进军一四一支队”

1963年10月21日清晨，福建省福清县沿海，朝霞映照下的群山碧海，发出闪闪的亮光，秋风吹拂的晚稻，掀起金色的波浪。山坡上，三五成群的社员正在挥镰收割已经黄熟了的的中稻，到处是一派劳动和丰收景象。

新厝公社社长林金凯担任通宵值勤还没有休息。这位30多岁贫农出身的干部，解放初期当过民兵队长，曾带领民兵抓过18个台湾特务，10多年来在沿海对敌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上，正当他在公社听取民兵干部汇报昨夜海防巡逻的情况时，突然石垌灶大队打来电话，说社员陈玉成天亮上山打柴，拾到了一梭崭新的子弹和一块塑料布。他想，几天来，人民解放军没有在这一带山上演习过，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于是立即警惕起来，马上叫干事蔡文高用自行车把社员陈玉成和他拣到的子弹带到公社，仔细一看，是一梭美造加拿大手枪子弹。他果断地判定：一定是特务偷爬上来了。林金凯立即打电话向上级汇报，并通知附近各大队的民兵出动搜山，捉拿特务。自己带着几个民兵与社员陈玉成一起，赶到发生情况的地方。

林金凯的判断是正确的。昨夜蒋特“反共挺进军141支队”的9名武装特务，在福清县新厝公社后屿村附近偷渡登陆了。这些由美蒋特务机关精心挑选专门训练的武装特务，梦想在大陆上建立所谓“游击走廊”。尽管美蒋特务机关的头目向他们吹嘘、欺骗的话音犹在耳畔，可是，他们一踏上大陆，就觉得不妙。台特们胆颤心惊地从船上跳下来，有的吓得全身软瘫走不动，有的狂饮烈性酒，借以壮胆。他们在稻田里乱窜一阵后，天渐渐亮了，特务们看到周围都是村庄，炊烟四起，更加慌乱。支队长卢浩，派出两个特务把船只沉入海中，但这两个人却一去不复返。使他们觉得情况不妙，更加着慌，纷纷换上便服，丢下行装、电台，争先恐后地向山里逃窜。

美蒋特务偷爬上来的消息，飞快地传开了。周围山村的群众都行动了起来。这一带地方同蒋军是村村有仇，人人有恨，听说蒋介石又派了特务上来，个个怒火中烧，摩拳擦掌。“走啊，捉特务啊！”有良好训练的新厝、灶、

界下、棉亭以及二三十里外的许多大队的民兵都很快地召集起来。他们首先在海岸、港口、要道、山隘，建立岗哨，封锁了进出路口。愤怒的群众，一听要捉特务，正在割稻的带上镰刀；正在砍柴的挥起柴刀；去挑粪的放下粪桶抄起扁担；去赶墟的也跑回家拿起锄头柄把，一齐向发现特务的山头涌去。一时，田野、路上、山麓到处都是人群。棉亭大队民兵接到通知，一下子就出动了60多人，分两路，翻过3座山头，把西北山的主峰紧紧锁住了。在亥灶大队老社员陈天金听到召集民兵抓特务，高兴地赶到海边，把正在海滩上捕鱼的儿子、基干民兵陈红团叫回来，父子俩一齐拿着武器直奔山上。正和6个民兵在田里种田的郭其兰老大娘，得到消息后，对即将出发的民兵说：“你们放心去吧！田里的活全由我们两个老人包下。一定要抓住这帮狗特务！”在凤迹大队部帮助烧水做饭的58岁老大娘翁亚金，接到紧急电话后立刻赶到各处通知。她边走边骂：“蒋介石这伙短命鬼，不识好歹，又来送死。”刚从街上卖柴归来的青年民兵翁建宁等丢下扁担，拿起步枪跟着民兵营长蔡合忠，到山上搜捕去了。

蔡合忠带着6个民兵登上西北山。没有多久，民兵副营长方春光突然发现300多米外的山沟里，有一个贼头贼脑的家伙，拐着一条瘸腿，摇摇晃晃地跑着。方春光一挥手，翁建宁等马上追上，越过悬崖，从那个特务的侧面扑去；另外几个民兵跃身穿过荆棘丛，从正面紧跟上。他们出现在这个特务的面前时，吓得他呆若木鸡，站立不动，连插在腰带上的手枪都没有来得及拿出来，就乖乖地当了俘虏。原来，他就是“反共挺进军141支队”的支队长卢浩。

蔡合忠和其他民兵押着俘虏，遇到了从山上打柴回来的社员蔡芳永和翁志宗，他们报告说前面发现两个可疑的人。要民兵去追捕，蔡合忠一听，就把俘虏留给民兵蔡清能和社员蔡芳水等3人看管，自己带着其余民兵飞速向山里追去。躲在山坳里的敌特副支队长卢广谔和电台副台长锤泰源，听到民兵的喊声，像受惊的野兔忘了隐蔽，慌慌张张地向大山里乱窜，竟撞正在山坳里守望稻禾的社员翁进发和妇女翁生仔妹的面前。翁进发大喊：“在这里啦，快来捉活的啊！”这两个特务大吃一惊，扭头就跑。这时跑在后面的蔡合忠和方春光马上朝这两个特务的头上“当当”地打了两枪，吓得那两个特务蜷伏着身子不敢动弹。方春光和民兵们抓住这个机会，向敌人喊话：“你们逃不了啦！快投降吧！”“你们不要为美蒋卖命”、“缴枪不杀，宽大处理！”这两个特务看到无处可躲，浑身发抖，高举双手说：“饶命，饶命，我们投降。”

在另一座山里，新厝公社社长林金凯带领10多个民兵在搜山，他们发现4个背包，却不见台特人影，就向山上篦梳式地搜去。公社武装干事黄兴走在前面，发现小山上有座坟墓，心想，这里没有树，特务是不是躲在坟墓里？就慢慢匍匐前进，倚着墓栏抬头一看，果然，两个特务躲在那里喘息。黄兴一招手，林金凯带了民兵包围上来。这两个特务知道自己被发现了，慌忙打了几枪，丢了个手榴弹，就跳起来溜了。林金凯带了民兵跟踪追击，转过一座小山，特务又不见了，他们继续仔细搜索。这时，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的6个战士也赶来了。张两泉是个老战士，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发现山边有一座古墓，墓穴正面有几块砖头和石块显然是扒开后又重新垒上的。估计特务可能藏在死人穴里，就对准墓穴，厉声喝道：“你们要不要葬身在坟墓里？”“不愿葬身在墓里就快快缴枪吧！”这两个特务执迷不悟，终于葬身

在这坟墓当中。

躲在墓穴里的两个特务被消灭了。但是窜到山上的台特参谋长兼电台台长吕景阳哪里去了？原来这个特务还在山下被追赶时，脚就发软了，便就势躲在树丛里，企图逃过人们的眼睛，但不料被上街买农具的民兵陈文贤、钱金坤和钱文荣发现。陈文贤看到这个十分狼狈的人，立即上前盘问：“喂！你是哪里的？”那家伙慌张了，就掏出几支香烟请他们抽，陈文贤断定这是个坏蛋，就向旁边两个同伴使个眼色，示意要共同紧紧缠住他。这时，解放军某部边防部队战士林家肺路过这里，发现陈文贤向他打手势，知道前面的人是个坏家伙。几个箭步跑到吕景阳的跟前，连续大喝两声，吕景阳惊魂未定，小战士又敏捷地窜到他的背后，飞身一跃夺过卡宾枪。这个特务便束手就擒了。还有一个特务余永发，偷偷地溜回他的老家去，可是一到家，也就被逮住了。

这股武装特务一共 9 个人，除了被打死和活捉的以外，还有两个却选择了弃暗投明的道路，他们乘特务支队长叫他们去沉船的机会，把船驶到我海岸某码头，向当地人民公社投诚，受到当地人民公社负责人的欢迎。

梦想偷渡登陆建立“游击走廊”的“反共挺进军 141 支队”武装特务，就这样在很短时间内被全部歼灭了。事后，台特惊魂刚定，就战战兢兢地说：“大陆上真是到处天罗地网，处处出神兵啊！”

宽大释放台武装特务

人民政府没有食言，1963 年 11 月，福建、浙江、江苏 3 省司法机关对 1963 年以来在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地区偷渡登陆后自动缴械投降的 17 名美蒋武装特务，决定免于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对其中 3 名有立功表现的武装特务，并发给了奖金。

被释放的 17 名美蒋武装特务中，有纵队司令、副司令、支队长、副支队长、中队长、电台台长等 6 人，队员 11 人。他们是：受台湾“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派遣，于 1963 年 7 月 24 日在浙江省永嘉县老虎岩偷渡登陆的“反共挺进军第 11 支队”中队长南桂芳；受蒋情报局派遣，于 1963 年 8 月 27 日在浙江省温岭县三蒜岛偷渡登陆的“浙江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 30 支队”支队长高度妹、副支队长林茂新，队员牟德发、卢岩焕、林裕森；受台“情报局”派遣，于 1963 年 10 月 8 日在江苏省射阳县射阳河口地区偷渡登陆的“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 18 纵队”司令刘直权，副司令俞宝滇，电台台长戴克傅，队员洪庆琢、鲁轶群、赵国清、姚锦兰、刘荫楷；受台“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派遣，于 1963 年 10 月 20 日在福建省福清县后屿村偷渡登陆的“反共挺进军第 141 支队”队员黄亚土、吴士龟；受台“情报局”派遣，于 1963 年 10 月 24 日在福建省莆田县平海湾偷渡登陆的“福建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 9 纵队”队员陈金木。这 17 名武装特务，由于不愿意替他们的主子美蒋集团卖命，在登陆以后，自动向我缴械投降，陈金木、黄亚土、吴士龟等 3 人并协助当地军民搜捕同他们一起登陆后潜藏起来的其他武装特务。

福建、浙江，江苏三省司法机关鉴于他们能够自动投降，坦白悔罪，根据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决定对他们免于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安置他们适当的工作。对于有立功表现的陈金木、黄亚土、吴士龟 3 人，决定发给陈金木奖金 2000 元，发给黄亚

士、吴士龟奖金各 1000 元。被释放的武装特务，在台湾有家属、本人又愿意回台湾的，人民政府允许他们去台湾与家人团聚。

这 17 名武装特务在得到政府予以释放的通知后，都一再感激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宽大处理，给了他们以新生之路。他们深深认识到只有抛弃与祖国和人民为敌的立场，投靠祖国和人民，才是唯一的出路。并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和人民。

《人民日报》评论全歼英蒋特务

1963 年 11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祝再次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的社论，内容如下：

我沿海地区的英勇军民，最近期间又连续全部歼灭了从海上偷渡和从空中降落的九股美蒋武装特务。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原海宁省和鸿广区的海岸地区偷渡登陆、妄图窜入我广东省西部山区进行骚扰破坏的六股美蒋武装特务，也已被我们兄弟邻邦越南人民、公安人员和民兵全部歼灭。我们热烈祝贺再次全部歼灭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我们谨向沿海地区具有高度觉悟的英勇军民致以亲切的慰问和敬意！我们谨向兄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公安人员和民兵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窃据台湾一隅的蒋介石集团，在凶恶的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再动员它的特务机构，拼凑特务武装，和美国驻台湾的特务机构共同策划，从去年 10 月到今年 10 月的一年多时间内，除了派遣六股武装特务，在越南沿海地区偷渡登陆以外，还先后派遣了二十四股武装特务，连续在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沿海地区偷渡登陆和空中降落。最近，他们竟变本加厉，进一步同南越和南朝鲜的美国傀儡集团互相勾结，利用南越和南朝鲜的岛屿作为跳板，妄图扩大对我沿海地区的小股武装骚扰活动。这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但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这一系列罪恶活动，在我强大的英勇军民高度警惕和坚决打击下，都彻底失败了，二十四股武装特务先后被全部歼灭了。他们再一次派遣来的美制 U—2 间谍飞机，窜扰我华东地区上空，也已被我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事实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最近，蒋介石集团正在筹开“国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所谓“反攻复国大计”。为了虚张声势，装饰门面，蒋介石集团最近连续派遣小股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地区；并且编造了这样那样的所谓“海上渗透”和“内陆抗暴”的“胜利”的鬼话。这些鬼话，无非是心劳日拙、自欺欺人而已。真实的情况是，正当他们大肆吹嘘“胜利”之日，正是特务一一落网之时。我们为了诱歼继续来犯的敌特，过去没有按时一一公布。现在他们的“九全大会”就要开幕了，我们给他们算一笔账，让他们拿去“献礼”吧！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警告蒋介石集团：你们的武装特务，不管偷渡登陆或者空中降落，不管大股来犯或小股窜扰，不管白天来或者黑夜来，不管来几股来多少，总归要被全部、干净、彻底歼灭的。美国的间谍飞机，不管什么型号，不管用什么窜扰方式，都逃脱不了像 U—2 飞机那样一次又一次被击落的命运。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美帝国主义从台湾滚出去！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目前，在祖国领土的台湾岛上，广大台湾同胞处在美蒋罪恶统治下，苦难日深，斗争日烈。国民党的公教人员也是生活困难，无路可走，心怀不满。蒋军官兵则是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弃暗投明的越来越多；偷渡登陆的美蒋武装特务慑于我英勇军民的威力，不愿替美

蒋卖命，在爬上大陆以后，就立即缴械投降。今年8月间，在浙江省温岭县三蒜岛偷渡登陆的美蒋武装特务，就有伪支队长等五人向当地人民公社社员投诚。我们再一次向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号召：一切心向祖国的人，不论你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不论你们职位的高低，也不论你们过去罪恶的大小，只要你们弃暗投明，起义归来，人民政府仍和过去一样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热诚欢迎，不咎既往，并且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安置。台湾是一定要解放的，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选择自己的光明前途，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建立功勋。我们还要向美蒋武装特务警告：如果你们不甘心替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卖命，一登上祖国大陆就主动缴械投诚，就会受到人民政府的宽待，有功的还将得到奖赏。你们好自抉择吧！

在历次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美蒋武装特务的斗争中，我沿海地区的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人民公安部队、公安人员、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尤其是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在围歼武装特务的斗争中，同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人民公安部队和公安人员密切配合，迅速行动，不让一个特务漏网，充分显示了我国军民的伟大团结的强大威力。我国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美好幸福的生活，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怀有深仇大恨，不管敌人采用任何方式再来侵犯和挑衅，都要给以歼灭性的打击。

现在，决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集团还想垂死挣扎，继续搜罗特务武装，加紧训练，准备派来大陆骚扰。我沿海地区的军民，一定要经常保持革命警惕性，继续加强海防边防，加强战斗准备，密切注意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阴谋破坏活动。如果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不甘心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胆敢继续来犯，那就坚决予以全部、干净、彻底的歼灭！

高墙电网中的“特别大队”

西河，原是赣江入都阳湖口的一个小渔村。三面临水，一道土堤，仿佛是一条金项链，系着翡翠般的椭圆形的半岛。绿荫如泼的树林中，洁白的大院宛如是升起的帆，写意、浪漫，其余是栉比鳞次的红砖楼，极像一所学校。倘若不是围墙上那一排排镶有大号绝缘瓷瓶的高压电网，以及那屋顶是伞形的城堡式的了望塔，还有夜间那如一道道蓝色闪电的探照灯光，谁也不会料到，这里是戒备森严的监狱。

自50年代初，台湾当局就不间断地向大陆派遣特务，他们纷纷落网，此时，也作为重点“保护对象”，转移到这里。曾几何时，蒋介石的闹剧破产，转为派小股武装特务登陆，又大部有去无回。于是，新、老台湾派遣特务在鄱阳湖畔的这座监狱中戏剧式地相逢了，并一起编在“特别大队”里。不乏幽默的时光老人，创作了一幕幕令人回味的活剧。

毕竟是曾受过特殊训练的军人，他们依然保留着严格的军事化的习惯。狱中的服饰，只是黑、白两色。床上用品：蚊帐、被子、床单、枕头，全系白色；身上的衣服，除了内衣和夏季用的衬衣，均是黑色。虽然单调，却极为分明。步入他们的房间，纹丝不乱，且如昔日的军营，一切物品，全都排成一条线，给人一种简洁、明快，耳目一新的感觉。较之于由刑事犯组成的第二大队，他们最遵守监规，极少吵架，从不盗窃；但从那一双双的目光中，人们却可以读出更为复杂的内容。

台湾的派遣特务一般也是单线垂直联系的，相互之间并不了解，是囿于内部的纪律，还是职业上的敏感和戒心？他们之间，相互提防之心一直未灭，

难得倾吐真心。

对待这批特殊的犯人，狱中派出了能力最强的干部管理和教育。对他们不打、不骂、不侮辱，并且严格执行一项特殊的命令：进入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准带枪，也不带其它戒具。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特殊的心态、心理，以利于他们的改造。

7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正值十年浩劫时期，被迫害甚至屈死的干部和普通群众，编织了一部血泪交织的特殊历史。就是在鄱阳湖畔的这座监狱中，也不乏被冤屈的人们，但对这批来自台湾的特务们，从狱中的领导到普通干部，都没有过任何非礼的行为。其时，已处病中的毛泽东，得悉某些地方盛行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十分愤怒，亲自下令：“废除任何形式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允许犯人控告干部，并不得阻拦。”这一命令，同样原原本本地在“特别大队”中传达了。传达过后，一片惊讶、不解，继而是沉思：源于炎黄子孙的血缘亲情，难道能超越政治的分歧、隔阂，而填平海峡的鸿沟么？当然，对这一尖锐问题，当时是谁也不能也不敢回答的。

两座烟囱，高达百米，犹如两支巨笔，浓墨重彩地书写着变幻莫测的人生。台湾派遣特务绝大部分都经美国教官训练过，高鼻梁、蓝眼睛的心理战专家曾给这些肩负特殊使命的特工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图：大陆老百姓很穷、很穷，吃大锅清水汤，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你们只要一登陆，就会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继而建设起稳固的游击走廊。但事实截然相反，刚从饥馑的年代中挣扎过来的中国大陆老百姓，一听说当年的国民党“还乡团”回来了，人人喊打，他们一上岸，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很快就当了俘虏。

狱中虽然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但每天8小时的劳动，却是毫不含糊的。这里主要生产砖瓦，两座30年代设计水平的德式轮转窑，每天要吐出50多万块的砖瓦，取土，制坯，进窑，出窑，没有一道工序是轻松的。尤其是出窑，隧道式的窑内，温度高达摄氏五、六十度，人只要走进去，胡子、眉毛、头发全部被烫得卷了起来。古炮式的大型鼓风机，终日吼叫着。这里劳动的人们，一色赤膊，只穿一条短裤衩，日夜犹如在火焰山中煎熬。刚入狱时，人人心中暗暗叫苦。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学生出身，还从来没有经受过如此严酷的劳动。

他们得到了优待。当队长把“特别大队”领进崭新的工场时，一片鸦雀无声。一排排闪烁着亮光的缝纫机，默默地伫立着，这是特地为他们新建的被眼厂。在大陆的监狱中，一般只有女犯才能享受这样的优惠。这些粗手粗脚的男人，经过了短时期的培训，居然同样踩出了一派如温馨动人的交响诗般的均匀的扎扎声。

有小部分人的工种是纳鞋底。那完全是乡间妇女的活计。每人发一把锋利的锥子，一捆雪白的小麻绳，针头线脑，虽是轻松，但总有滑稽。最笨的是一个在平潭岛被俘的特工，据说，他是专搞爆破的，上岸时曾化装为人民解放军战士，开始，谁也没有看出破绽来。结果，在一座凉亭喝茶时，悄悄地问一个老人：“县党部在哪里？”一句话露出了马脚，大陆上从来不称什么“党部”，当场就被茶客们扭送到民兵营营部。有好几回，他锥破了手，在“特别大队”中传为笑话。“你大概是吃多了炸药，心里急毛了吧？”有人这样善意地取笑他。

他姓刘，在“特别大队”中，数得上是资历最老、职务最高的人物。

原来，他是江南某省特务组织的“潜伏组长”。1949年，百万雄师下

江南，蒋军如鸟兽散，但大批特务却悄然潜伏了下来。临危受命，他虽然只是一个“组长”，却肩负总指挥要职。尽管宣布了一整套严密的纪律，但当红旗插遍大陆的时候，他像飘零的秋叶，同样被扫进了人民的法网。命运钟情于他，他随机应变，坦白得好，立下功劳，得到了宽大，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还安排了工作。他感到幸运至极，其时，正是20多岁的好年华，他携着娇美的妻子和幼子，憧憬着玫瑰色的梦。

倘若不是那次香港之行，他的好梦还可以圆下去。人民和政府相信他，为了打破封锁，领导上派他到香港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不幸的是，一到那花花世界，他旧病复发，和台湾特务机关建立了联系，并作为“派遣人员”的身份，在大陆活动。他想利用人民的信任耍小聪明，公正的上帝愤怒了，他很快重落法网，进了这座监狱。

一个美满的小家庭被他自己葬送了。妻子耐不住寂寞，带着他的爱子改嫁给一个剧团的编剧。温文尔雅的剧作家，颇能体谅他的痛苦和处境，允许他的妻子常去狱中探望她的前夫。于是，在冷清悲凉的铁窗生涯中，他是唯一一个常得到女性温存和安慰的人。

虽已改嫁，她的心仍然系着他。这座监狱的接见亭是敞开的，心细的老看守在一旁种了几棵葡萄浓荫遮蔽，一派清凉，逢到葡萄成熟时节，更是满目硕果，盈盈喜人。这个不寻常的女人不避嫌疑，也不在乎旁人异样的目光，每月都来探望，带着孩子，还带着可口的食品，给他送来轻声细语的嘱托，给他送来了无微不至的关切。虽然狱中不允许有任何过分亲昵的举止，但只要一瞥那含情脉脉的女性的目光，他便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幸福。

心地善良的剧作家并未能逃脱厄运。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送去劳动教养。接着，是逐步升级，至“文化大革命”，变成面目全非的“牛鬼蛇神”了。可怜的女人，带着3个儿女（两个是剧作家生的），无依无靠。狱中领导伸出了援助的手，把他们全部接到监狱中来，让孩子上学，而大人，则安排了一项自食其力的工作。在当时，这确实算得上是件撼天动地的举动。

他深深地感动了。凝视着妻子丰韵犹存的面容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们，他才体味到共产党人那宽广的胸襟和善意的心灵。他心悦诚服，积极劳动，并且协助干部做其他人的工作。论资历和辈份，他在“特别大队”中都高人一筹，因此，“队员”们都信他、服他。

狱中首批特赦，这个“潜伏组长”就被释放了，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和自己的妻子及儿女团聚。当时，那个不幸的剧作家还没有“解放”。他不负情，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养育剧作家的两个孩子，并且允许自己的妻子常去看望他。

特定时期和特殊环境中形成的家庭关系，耐人品味，更令人思索。

“特别大队”中有一批“水鬼”，他们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武装潜水员，当年，偷偷摸摸地从海底潜入大陆，原以为可以逃脱天罗地网，结果，还是束手就擒，来到这个地方。很可惜，人们都说他们的潜水绝技胜过传说中的“水猴”，但极难得使他们有用武之地。

监狱的西侧是一片大水库。南昌盛夏，酷暑难当，担任警戒任务的武装基干连，除了少数正规的军人，大部分是知识青年，虽然身穿军装，但组织纪律性，总会差一些。这一天，几个武装的战士到水里去洗澡。没有干部带领。真不幸，他们已经洗完了澡，一个战士脚上沾了沙，到大堤旁去冲一下脚，不慎被巨大的漩涡吸了下去，转眼就没有踪影。

“出事了！”凄厉的报警声，几乎击碎了人们的心。水面汪洋，漩涡的上方，只有铜钱般大。即如虎口，吞噬着一个青年战士的生命，他被卷往何方，谁知道？只有让一个水性超群的人从漩涡口下去，才能探到虚实，这无疑是人钻虎口么？

人们自然想到“特别大队”的“水鬼”们。很快，几个“水鬼”奉命来到水库的堤岸上。没有潜水衣，也没有氧气泡包大堤上窄下宽，万一被漩涡游到堤坝下面的涵洞里，谁能承担责任？

“给我一瓶酒。”一个“水鬼”早已脱去上衣，只穿一条短裤。“我从漩涡口下去试试看。”他征得带队干部同意，咕咚咕咚地喝下了半瓶酒，纵身跳进了漩涡。

水面上只冒出一串细小的水花，瞬间就不见了。

悄然无声。凄凉的风，把人们的心都吹冷了。

一分钟过去了，还不见人冒出来，“水猴，钻到哪里去了呢？”一双双目光，搜寻着阴森森水面上的每一道涟漪。

突然，水库大堤下的涵洞口冒出一个人，是他，这位潜水本领过人的“水鬼”告诉人们，他已经摸到那位被卷到水下的战士，但力气不足，一时背不上来。说完，他又咕咚咕咚地喝下半瓶酒，运足气，重新从堤旁的漩涡口纵身跳了下去。

落水的战士终于被背出了水面。他两眼紧闭，全身乌紫，溺水时间过长，没有抢救过来。“水鬼”们的奋勇抢救行为，却传为了佳话，按照规定，给他记了一功。

1975年，棉里藏针，柔中有刚的邓小平，被毛泽东请出山，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四人帮”仍然猖獗一时，毛泽东、周恩来身体欠佳，中南海里，如诗如画的浩渺烟波，遮不断剑拔弩张的政治大搏斗。

历时近10年的浩劫，已把大陆的国民经济推到极其危险的总崩溃的边缘。但对台湾的关系，中南海的英明决策者们，却几乎没有分歧。一道特赦令从北京发出了：分批特赦所有在押的原国民党战犯以及各级在押人员，特赦所有在押的原台湾派遣特务。他们中愿意回台湾的，发足路费，提供方便；不愿回台湾，能够工作的，给予安排，不能工作的，由国家养起来。这无异是激动人心的声声春雷。

一个彩色的绣球，由北京抛到台湾海峡的彼岸，一时间，舆论界轰动之声频频传来，有人称颂共产党襟怀坦荡，也有人攻击说：“这是中共的统战策略，用心良苦。”但不管怎样，尝过铁窗滋味的人们从此自由了，他们手持烫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特赦证，脱下了囚服，换上了崭新的蓝卡其布中山装，每人还领了两百元零用钱。望天，天更高；看地，地更绿，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们的心中，最有数了。

狱中为他们举行盛大的送行宴会。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都派了专人来参加。10多年，甚至是20多年朝夕相伴的干部，也来为他们获得自由祝酒。从台湾来的人们，大多数要回台湾去了，那里，有他们的亲人。昔日，天各一方，今日，相聚就在眼前了，谁能不怦然心动？

面对丰盛的酒宴，他们中的不少人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但今天的泪，是喜悦的泪。

席间，轻松悦耳的乐曲，如水波荡漾。杯盏交错，消融了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隔膜。西河，鄱阳湖畔的一片小小的天地，今夜幻出了一道飞虹，无

声地越过苍凉的台湾，轻轻地系着那神秘的阿里山、日月潭。

当年的囚犯，神奇地变成了特殊的使者，捎去共产党人冰释前嫌的一番美意，也捎去善良的大陆老百姓渴望早日统一的美丽向往。

漫长而曲折的历史，终于画上了一个沉甸甸的句号。

第三节 美蒋联合耀武海峡

“北斗”两栖空降演习

在大陆沿海没有讨到便宜的蒋介石，总算在台湾海域寻找些许自慰。1963年11月26日，代号为“北斗”的台美联合两栖空降演习在台湾南部海面展开序幕。台中央社称：

“北斗演习”是今年中美两国联合举行的第四次例行防御性演习，演习正副统裁官分别由美国第7舰队两栖部队司令李约翰少将和中国海军李少将担任，双方动员的兵力有两栖舰艇21艘、部队3000人、飞机100架。

参加演习的中美陆战队士兵，已由两栖特遣部队的船团运抵台湾南部的“车城”滩头，并进入演习阵地，执行在演习中所担任的假想敌任务，同时其他海上及空中的假想敌部队亦正在组成中。

据中国国防部发布在“北斗”演习担任假想敌的美军部队是原驻琉球基地隶属美军第7舰队司令穆勒将军麾下的陆战队第3师，由师长马斯特少将指挥。另有中国海军陆战队两个连及一个陆军空降步兵连。

这项预期于12月5日结束的两栖空降作战演习，地点在台湾西南部海面与地区。参加演习的中美部队将于今天起开始在基地实施装载出海船团海上运动及先遣作战清除航道等作业，12月2日在台湾南部数处海滩实施两栖登陆与空降着陆，并展开年陆作战。

中美两国曾联合宣布，这次演习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美两国部队的密切合作与深切了解，并使中美双方人员熟练两栖与空降防御作战计划的作为与执行。

演习的构想是假想敌军由海上及空中侵入台湾南部并推进至东北方的北纬23度线时，即为国军部队所围困。中华民国政府依据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商请美国协助，美国第7舰队司令穆勒中将遂受命编组中美两栖与空降部队，向入侵的敌军侧背实施两栖突击登陆与空降突击，与国军部队会师，以夺取滩头阵地供盟军后续部队登陆，以摧毁并驱逐入侵的敌军。

“北斗”演习是今年内中美双方联合两栖空降作战演习的第二次，今年3月下旬中美双方曾在台湾南部举行一次大规模的“银锋”演习。

中美联盟“北斗”演习新闻组今天宣布，美国海军“红鱼”号潜艇将在这次两栖空降登陆作战演习中担任假想敌的角色，在这次演习中对中美特遣部队实施攻击。

新闻组并说，中美联盟举行的“北斗”演习与美国第7舰队及远东各盟军部队间所举行定期性的演习相似，旨在熟练各型两栖作战与维持已与盟国间建立的密切合作关系。

“枕戈”演习

1964年3月3日，台中央社连续报道了代号“枕戈”的演习情况，说美蒋在此次演习中共出动兵力5万人，各型舰艇120多艘，飞机900架，是近年来美国在西太平洋与“盟国”间所举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蒋介石3日曾到登陆滩头参观演习。其报道内容摘要如下：

蒋总统今晨从美国第7舰队的旗舰上坐直升机飞临“枕戈”演习的登陆滩头，参观中美联盟的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演习。

这位中华民国元首是于今晨 7 时 50 分飞到登陆滩头的。在此以前，总统曾在旗舰上观察中美海军舰队的海上作战情形，并作美国第 7 舰队司令穆勒中将军的嘉宾。

进行了 19 天的“枕戈”演习，今天是“登陆日”

的最高潮。中美两国海军陆战队在海空火力支援下，自清晨 8 时起分三个滩头突击登陆，并实施陆上作战。

当总统到达美军登陆滩头参观台后 10 分钟，两栖登陆的高潮即告开始。在第一舟波的登陆艇和两栖战车冲破海浪驶上滩头时，岸上响起了如雷的爆炸声。中美空军超音速喷射战斗机群一批又一批向滩头俯冲扫射，支援登陆部队顺利推进。

总统对美军部队的动作非常注意，当他从望远镜中看到美军登陆的熟练战技时曾点头赞许。

总统在美军登陆滩头停留了约 40 分钟，然后转到距离约 30 公里的国军登陆滩头，参观国军两栖登陆部队的岸勤作业，步战协同，攀登悬崖和政治作战。

总统于 9 时 50 分到达国军登陆滩头第一参观台，这时候中国海军陆战队 1200 名官兵已分成 7 个舟波登陆，在滩头建立了阵地，并继续向 531 号和 480 号高地挺进。

总统在参观台上一面听取简报，一面用望远镜视察正在源源登陆的坦克车和陆战队官兵，攀登山崖的演习。

总统在国军登陆滩头视察了 30 分钟，然后由中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郑为元中将陪同坐车到距参观台 1000 多码的公路边再下车，步行穿过田野巡视登陆步队的团指挥房和心战分遣队的演习作业。

总统曾走近高地的山丘旁，详细观察演习计划的执行和进展，对参加演习官兵的旺盛士气和战斗精神甚表满意。

总统于 10 时 50 分离开登陆滩头。

自中美两国先后实施 5 次联合两栖登陆作战演习以来，蒋总统亲临参观这是第二次。49 年间的中美联盟“蓝星演习”，总统也曾到美国海军旗舰上和登陆滩头观战。那一次总统曾发表谈话，认为中美两国联合作战演习，证明了中美两国军事合作精神，也已确切奠定了共同胜利的基础。

这次演习，中美双方共出动兵力 5 万人，舰艇 120 多艘，飞机 900 架。

第三章

“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危疑孤岛出现“新机”。蒋介石拍板定案，台湾、苏联密谋“反攻大陆”

第一节 孤岛“新机”

蒋介石再提“反攻大陆”

1967年，“文革”正值高潮，整个大陆陷于无政府状态。台湾当局又以碰到了反攻机会。于是又提出建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蒋介石认为自“8·23”炮战以来，敌我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中共党内“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政权也发生了“根本动摇”。因此，蒋介石发出叫嚣：

一切反毛的力量，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与信仰之下联合起来。

1967年3月29日，蒋介石向青年发出“训示”：成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

蒋介石还要求大陆“反毛”力量组成“讨毛救国联军”，扩大“讨毛救国的青年运动”，并保持与台湾国民党的“密切联系”。

蒋介石下令参谋总长黎玉玺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事宜，修订反攻两栖登陆作战计划和各种攻势作战计划；在军队训练上则加强近战、夜战、行军、攻坚、反快艇、反潜、两栖登陆及密接支援训练。蒋经国亦呼吁美国给予台湾后勤支援，“俾对中共以致命打击”。

上述言行不过是蒋介石的梦呓而已，不仅大陆没有“反毛”力量的响应，就连台湾的青年人也无人问津此“反攻”机构。蒋介石不管这些，他认真地在台大战争学院召集了三次军事会议，听取各方报告。

来自各方的情报，使蒋介石感到失望，他最后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军事行动不了了之。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位台湾高级将领说，蒋介石打消军事反攻念头有三：一是大陆已于1964年10月试爆原子弹成功；二是“文革”虽导致全国大乱，但人民解放军并无紊乱的迹象；三是约翰逊政府还是根本上不支持台湾的反攻计划。上述三点，蒋介石最为介意的是中共试爆原子弹成功。据悉，蒋介石在最后一次军事会议结束时，长长地叹一口气：“完了！我们反攻大陆已没希望了。”

东京“使馆”急电台北

绝望中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种新的“机遇”。这种“机遇”如此唐突，就连日夜企望“反攻大陆”的蒋介石也左右为难。1968年10月11日，东京的夜空阴气沉沉。

随着暮色的加深，位于市区的东京外籍记者俱乐部也渐渐地热闹了起来。

来自世界各地的“无冕之王”，云集在这块纯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尽情地放松、潇洒。

大约10时许，正在和路透社驻东京记者卡夫聊天的台湾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事卢为，发现一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西方记者挽着一位金发女郎径直向他走来。

经来者自我介绍，卢为得知他是英国《伦敦晚报》记者，名叫维克托·路易斯，身旁的女士是他的夫人珍妮佛。几句闲话后，路易斯便开门见山地表

示要访问台湾。

进一步深谈，卢为知道来者持的是苏联护照。他告诉路易斯，因为他的身份敏感，必需报告台北。

卢为常到外籍记者俱乐部，每次都有很多外国记者找他聊天，包括苏联塔斯社和《真理报》记者在内。路易斯以记者身分出现找他，卢为并不意外，这很有可能就是苏联驻东京记者提供的消息。

卢为离开记者俱乐部后，立即通过有关途径打听路易斯的来路。获得的消息表明，他的背景和苏联克格勃（KGB）有关，并有直通苏联高层的关系。

当时，台湾的“外交”处境已出现警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办事处在东京设有联络事务所，日本最具规模的报纸《朝日》和《读卖新闻》常常刊登廖承志的消息，并呼吁日中关系正常化。卢为认为，路易斯的出现，或许可以给困境中的台湾“外交”带来某种转机，于是向台驻日“大使”陈之迈积极进言，希望促成当局同意路易斯的要求。

12日，陈之迈通过台“外交部”拍电给台“新闻局长”魏景蒙说，《伦敦晚报》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即魏日后公开日记中代号为“王平”的人），目前正在东京进行访问，希望有机会访问台湾，就各项问题交换意见。

电报还称“外交部长”魏道明同意访问，并以便条向蒋经国的幕僚黄少谷提及此事。目前还无法与“国安局长”周中峰联络上。

当时台湾高层对路易斯了解的情况大概如下：

路易斯，英籍妻子。

莫斯科语文学院法律系学生，曾任职巴西、新西兰驻莫斯科大使馆，因政治理由受劳改9年，1956年获释离开反斯大林监狱。担任NBC及纽约时报记者，以及伦敦晚报记者。

认识杰克·安德森，并由其介绍进入HHH。

与赫鲁晓夫不和，抢到赫鲁晓夫下台的新闻。

访问台北后他将前往柬埔寨，并赴缅甸、达兰沙拉、坦桑尼亚、肯尼亚及其他国家，然后返回莫斯科。

健谈、机警、常识丰富。

他曾说，莫斯科共党干部曾听他谈话，对他的看法表示同感，认为台湾应与莫斯科接触。

他希望知道台湾对另一边（大陆）的情势有何看法，尤其对打倒毛泽东的看法，并希望知道台湾对与

莫斯科的关系有何建议。

北京曾两度拒绝发给他签证，现在大陆欢迎美国人的程度甚于欢迎苏联人。希望能见到经国先生或总统，讨论这些政策。

9月号的新闻周刊《潜望镜》专栏中提到路易斯的名字，说他提早一天以上抢到苏联入侵捷克的新闻。可以猜测，路易斯想证明他在苏联官员面前很吃得开。

路易斯说，第三国际已经行不通，共产主义就像基督教一样，会分裂成很多流派。现在每个共产国家或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各自的想法。例如在英国，共产党就认为不必推翻女皇。

路易斯进行这次访问的目的，从表面上是想利用此行为《伦敦晚报》写稿和用机密方式向苏联党政官员提出某些看法。

但他真正的想法是要“探明台湾对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情势有何看法，并探明是否可

能与苏联重修旧好，如果可以，如何修好？”

接到电报后，魏景蒙觉得当时有几个难题要解决：一是怎么和美国人说这件事。依当时国情又如何说得清楚？会不会引起猜疑？二是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是俄国人，会不会因为有这层来往，转过来影响到蒋经国的仕途和当局政策，于公于私都难办。

蒋氏父子重托魏景蒙

魏景蒙与蒋经国几十年相处，关系与感情都很特殊。魏的女儿魏小蒙在日后披露其父记载路易斯访台全部经过的日记《王平档案》时，曾有如下说明：

从家父的日记和过去多年来得诸家父的警欬，我看到家父和经国先生间有各式各样的来往，可以感觉到他们两人的感情非常深厚。有很多小故事我可以叙述一下。比方说，家父在中央社社长任内曾因公到印尼去，在那里得了副伤寒。回来后住进荣总治病，经国先生得知消息，立刻赶到医院看望家父，还殷殷探问病情。据我了解，经国先生虽然很关怀属下，但专程到医院探望部下的例子还不多。

有一次我陪家父到欧洲旅行。在罗马许愿池前，家父丢了一枚硬币许愿，当时家父没告诉我他许了什么愿。也是看到日记才知道当时经国先生眼疾开刀，家父不但心急，还为经国先生能够早日康复许愿。这才想起，家父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打长途电话回台北，探问经国先生的病情。

在两人交往过程中，有好长一段日子，差不多每个周末，家父都陪着经国先生到各处视察。接着更有一段日子，前后大概有两三年，经国先生常常邀家父前去谈话，为此，家父得随身佩着一个呼叫器，随时待命。

经国先生晚年有失眠的毛病，睡不着的时候就想到找家父聊天，因此，两人也就无所不谈。从家父的日记里也可印证家父对经国先生了解很深，包括家事和国事，而家父对经国先生的关心更情见乎辞，很怜惜经国先生的治国之苦。父亲还常常说，经国先生做

这个总统是没办法不干，苦得不得了。

经国先生唯一的女公子蒋孝章住在旧金山，最得经国先生疼爱，但是孝章很少回来。我记得有一次家父出国，还特别到旧金山跑了一趟，代经国先生传话给蒋孝章，要她抽空回去看看父亲。从这件事上，我觉得，经国先生满孤独的。

家父与经国先生几十年相处，关系与感情都很特殊。是君臣亦是密友，以家父传统式读书人的风格，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地为总统服务；更以诚恳爱护的态度对待密友。他两位的友谊情操，恐怕不是外人能体会的。

当时汪道渊先生和沈之岳先生与家父三人，是国策顾问中必须每周有一天在总统府上班的人。汪先生曾告诉我，家父过世后，有好一阵子没人敢在经国先生跟前提魏景蒙的名字，因为那就会见到经国先生满眼含泪，使人心痛。

有很多人认为魏景蒙性情开朗，是一位喜欢开玩笑甚至“大而化之”的人。但魏小蒙却认为“从他留下来的长达20年的日记可以看出，家父其实是一位做事相当严谨的人，他写字本来就讲究，并以书法知名。日记里的字亦复如此，小而有体，记事则要言不繁。日记本有点像今天的小记事本，活

页装订，每个月订成一本，取其随手方便，且随时可记。”

至于魏景蒙对蒋家的忠诚，魏小蒙有如下披露：

我觉得家父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化敌为友。在他的记者生涯当中，特别是抗战在重庆负责新闻检查工作期间，家父一度是外国记者最恨的人。整天叫他们不要登这个不要登那个。许多国际知名的记者包括白修德等，先是和家父争吵不休，到最后都受到家父与人为善的诚意和工作原则感动，都成为他的好朋友。他们发稿时，家父认为，那个不能登，就是不能登；改了能登的，也都依着家父的意思。应付这些大牌记者，很不容易，但家父做到了。不但改善了政府的公共关系，也维护了国家形象。

这批在重庆结识的记者几十年来还是念念不忘吉米·魏——家父的英文名字，只要到台湾采访一定先找到他叙旧。家父到台湾后和新闻工作一直有缘，外国记者来得更多，从帮忙安排采访总统到陪他们吃碗牛肉面，不一而足。有关家父的口碑，在国际新闻圈更是口耳相传，无形中又为国家做了不少工作。

韩战时，家父奉派到美方的共军战俘营采访，并伺机策应开导战俘。

还有就是家父以一个记者开辟了我和马来西亚的实际关系。早年马来西亚对我们很不友善，政府有心改善但找不到管道接触。后来想到家父，他就以记者身分申请采访总理东姑拉曼。记得当时家父先到新加坡等消息，大概拖了两三个月，终于见到了东姑拉曼，打开了我国和马来西亚高层接触的管道。东姑拉曼从总理任上下来，还来过台湾访问。

这趟由于等得太久，家父为了节省开销，不得不省吃俭用，还在旅馆里自己洗内衣内裤，这是他平常在家里不会做的。

这些事情，一方面是家父的爱国的情操支持地，一方面也是老总统和蒋经国信任他。

在魏景蒙从政生涯中，最得蒋氏父子信任的还是这次秘密接触路易斯，这是一件极敏感的工作，不是一般人的能耐所能济事，非但要能全面掌握情况，更要能恰如其分，准确地传达来往讯息。若非绝对信任，岂能托付？

蒋介石要求专人接待

路易斯来台之前，国际间对他就有很多传言。美国和英国当局都认为他是苏联间谍，可他娶的却是英国太太，他不但在英国有产业，而且和美国电视公司有生意来往。对于一个一时连身分都无法证实的苏联人，台湾如果准其访问，事后将如何向美国解说？又该由谁出面来说？

经过反复考虑，蒋介石拿定主意，同意路易斯来访。于是蒋经国告知魏景蒙最高当局的决定，并要魏找一个可靠的人接待。他们两位讲话时“行政院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就在旁边，魏景蒙就向蒋经国推荐由罗启来负责。

蒋经国特别交代，有关事宜绝不能走漏风声。魏景蒙建议，既让对方以记者身分入境，就应该让人到处走走，参观、采访，在接待上要有相应的配合，不留痕迹。

10月21日，魏景蒙接到卢为来电，说路易斯将在第二天搭乘华航班机来台，11时45分抵达。卢还说，路易斯对“中苏”关系有“偏见”，他曾送他一本《苏俄在中国》，让他仔细阅读，这次路易斯提出要看“故宫博物

院、农经、匪情”。

魏立即将此事告知蒋经国、周中峰以及“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当天下午，魏告诉卢，当局不会让路易斯参观军事，也不会让他观光。叶翔之在必要时会派“专家”在国际问题研究所与他会谈。在这次通话中，卢为说他晚上将在东京与路易斯晤谈，并建议第二天与路易斯一起回台，魏对后者给予回绝。

第二天上午，卢为再次来电报告：路易斯认为台湾应派代表到莫斯科，此事他可以帮忙。看了《苏俄在中国》后，路易斯认为书中对苏联不公平，他称自己绝对未在苏联受迫害，他希望澄清。

路易斯在台大发名片

10月22日，罗启准时到机场迎接路易斯。初次见面，这位“密使”给罗的印象很好。路易斯高约5呎10吋，45岁以下，长得不错，戴眼镜，从外形看来有点像大学教授，很斯文。以苏联人而言，英语流利。他说，他的英国太太目前在东京，将比他先回到莫斯科。他将前往东亚旅行。

路易斯来台前，卢为从东京传话曾说，路易斯希望在台湾不要太曝光。但没有想到他一到旅馆逢人就大发名片，自我介绍说他是莫斯科来的。

尽管台湾做了若干安排，但他们不急着把日程表拿出来，想看看路易斯会提出什么要求，到底是什么路数，有什么能耐。

用毕午饭，罗启用征询的口气说：“下午就可以安排和魏局长见面。”

路易斯问：“卢为告诉我，魏局长很资深，和高层关系很深？”

罗启答：“魏局长可以参加内阁会谈。他也是从事新闻工作出身的。”

问：“魏局长每天都能见到蒋介石？”

答：“我不能确定，你有什么事吗？”

魏景蒙首会路易斯

22日下午3点半，魏景蒙和路易斯首次会晤。

路易斯性子很急，初坐定就急着想见人。两人寒暄不到一分钟，路易斯又开始沉不住气了，说要见蒋介石和蒋经国，并且声明要谈的话题很严肃。魏景蒙不立即作出结论，只说一定会为他转报、代他联系。

魏在会晤中说：“我们过去与苏联合作有过惨痛经验。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国，也不想其他国家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

路易斯说：“那是过去的老政权。苏联现在是个新而年轻的国家，台湾应该忘掉过去那些不好的事情。在莫斯科，仍然有人认为，毛泽东可以救得起来，但其他人不作此想。”

路易斯还说，虽然他不是苏联政府派来的，但至少他可以传话，以发展成大使对大使级的会谈，例如说在拉美。或者台湾可以开始在莫斯科派驻贸易代表或新闻记者，台湾甚或可以开始运送许多珍宝到莫斯科展览。

接着，路易斯再次强调能与蒋经国晤谈几分钟，并希望能与蒋合拍几张照片，以在返回莫斯科时证明自己的权威。

路易斯还问：“两个中国政策能否使台湾高兴。”

魏答：“不行。因为中国人不希望中国长久分裂。”

魏的感觉是，苏联有个计划，“希望在毛泽东覆亡后有一个由他们操纵的中国，另一个中国由国民政府统治。”

路易斯认为美国和苏联有能力占领中国大陆，也许还有日本？但最合理的是以前与苏联有过关系的“中华民国”。他认为，当此苏联明确改变对北京的政策时，苏联与“中华民国”良好相处是合理的。他以捷克事件为例说，此事显示苏联真正的本质。他说，这都是苏联大使之过，因为他对捷克情势做了不完整的报告。他企图让魏景蒙相信，“苏联对盟邦非常宽大，这就是毛泽东和捷克能够不听命于莫斯科之故。”

路易斯还透露，他与苏联高层很熟，当他不在国内时，他的话当局更听得进。

魏问：“北京与莫斯科决裂的原因是什么？”

路攻击说：“赫鲁晓夫在北京一处海滩和毛会晤时，毛泽东问赫，苏联是否敢与美国开战（他猜毛泽东所指的是联合国），而这就是双方决裂的开始，因为对莫斯科而言，这种想法太牵强了，毕竟苏联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仍属于欧洲，而毛泽东则太过于自我色彩或太具中国色彩。

“苏联不会开战，对赫鲁晓夫来说，战争是个无法想象的困难字眼。

“你们没有理由担心与苏联合作，毕竟这样对国民党不会有任何伤害。”

魏景蒙把“自由中国人民”对苏联的感觉告诉了路易斯，并说，双方有加强了解的必要。魏表达了台湾“解救同胞”的决心，并告诉他，国民党在大陆内部有自己的人。他似乎表示，台湾不是非信任他和苏联不可，但双方之间若有较佳关系，对世界有关各方面都有益。路易斯谈到两个中国时，魏想起了 Ott Neuden，认为苏联将在西伯利亚附近制造一个傀儡中国，“自由中国”则由南方回到大陆。

会晤至 5 点半结束。从讲话内容研判，魏景蒙感到，路易斯应有管道直通苏联高层，而且有意拉拢台湾和莫斯科接触。

晚上，罗启再和路易斯吃饭，他问罗是不是国民党员，吃饭谁付帐，是不是蒋介石？后来，路易斯没事就拿这种问题开个玩笑。接着，他又提了两个让罗启难答的问题：一是国民党当初为什么要放弃长江以南，二是为什么放弃海南岛？这是战略上的大败笔。

罗启打定主意不做政治回应。他以海军出身的理解回答说，当时放弃海南岛主要是基于海上补给困难的考虑。路易斯接着问，你们是不是非常相信美国，相信美国永远不会变？

“今天在台湾相信美国的人要比相信俄国的人多，”罗启这么回答，“美国人会不会变是一回事，但是从中俄尼布楚条约以来，中国人多不相信俄国人是事实。”

听了这些话、路易斯只说，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蒋介石说，先让他忙几天

10 月 23 日上午，台“新闻局”安排路易斯去故宫博物院。

借此机会，魏景蒙用电话把昨天与路易斯会晤的情况向蒋经国报告，并把路易斯的希望告诉了他：

1. 在其他国家建立大使级接触。

2. 派新闻、商务或其他民间代表到莫斯科。
3. 提出两个中国的想法。
4. 让他在机场拍照。

蒋经国听完后，说了以下意见：

1. 领先向“总统”报告。
2. 无论如何安排叶翔之见他。

同一天，罗启也向上反映了路易斯的要求：

1. 要求见蒋经国。
2. 希望向南非及英国、菲律宾领事馆申请签证，因为他的签证是在东京申请的。
3. 希望南下高雄加工区等。

在魏景蒙汇报后不久，蒋经国给他打来电话，内容如下：

1. 申请签证已获准。
2. 我们会接待他，并让他到南部等地。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只说路易斯是代表英国报纸的记者。
3. 已向总统报告，他裁定，在决定是否与他会面之前，我们应让他忙几天。

这一天，路易斯除参观故宫博物院外，下午6点在台“经济部长”陶声洋的办公室拜会了陶。事先，陶不知道路易斯的具体情况，在他的要求下，魏景蒙在“新闻局”向他做简报。

会谈中，路易斯要求立即与莫斯科展开贸易。陶声洋说，台湾的经济与苏联的制度不同，能否立刻达成协议，要由上层决定。路易斯回答：“我会立刻打电报给莫斯科。”

晚上，在与魏景蒙晚餐后，路易斯谈到了中苏边界事件，他进一步攻击称：

可能不是真的，但毛泽东驱使妇女、儿童进入与新疆及东北接壤的苏联领土，如贝加尔湖海参崴等

等，间谍也混杂其中。利用库伦妇女和儿童收集苏联情报。这些事件多数都是这类渗透所造成。

莫斯科有游行活动：莫斯科警方抓了几个人并无意义，但当学生前往北京时，他却被五花大绑。

利用外国报纸指控苏联犯下暴行，并使苏联政府难堪。我认为他们是（流氓）。意识形态：我们不同意毛泽东、斯大林及列宁的“仇恨主义”。

这些人天生具有罪犯性格，一旦掌握权力，便传统任意滥用，并且紧抱不放。

路易斯把蒋介石比作沙皇，魏表示反对说：“我们是革命政党，推翻了满清政府。我们之所以失去大陆，基本上是因为两个理由：1. 战争使人民疲惫不堪；2. 忽略了共产党。”

与魏分手后，路易斯与罗启在街上闲逛。路说，台湾“对以色列的成功

过于着迷”。他所以会有这种印象是由于与魏的谈话的结果。魏曾告诉他，由历史看来，世界犹太人对我们并不太好。路易斯还说：“斯大林以担任美国间谍的罪名把他判刑 25 年，服刑 9 年后获释。”他“毕业于莫斯科语文学院，第一份工作是‘LOOK’（展望）杂志，后又任职于 BBC、《新闻周刊》、《纽约邮报》，现为自由撰稿作家及《伦敦晚报》代表，其妻任职 BBC、《时代》杂志。”

路易斯的签证只有 10 天，台湾方面根据蒋介石“先让他忙几天”的指令，安排他先到中南部参观加工出口区和土地改革。

蒋经国获准接见路易斯

10 月 24 日，魏景蒙队长途电话里得知，为了见路易斯，蒋经国在南部会很快赶回。

蒋经国对魏说，为让路易斯有处在一个“自由、开放国家”的感受，上午罗启不必陪他。

当魏景蒙再次向蒋经国完整报告路易斯是怎样的人以及与他交谈的内容时，蒋经国让魏告诉路易斯，指定魏景蒙与他打交道。

关于自己是否与他会面，蒋经国说，同意打交道，但应向当时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严家淦简略报告。关于会晤地点，蒋经国说，他可能在南部见他，并设法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不在办公室谈）。如此，魏将陪路易斯到南部。

同一天，魏景蒙在参加“行政院”院会时，蒋经国又打电话给他。说已向蒋介石报告，并决定：

1. 在 10 月 29 日下午 5 时以会见《伦敦晚报》记者的名义接见路易斯。
2. “总统”警告说，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应加以考虑。他说，美国一直都与台湾正常接触，不管谁担任美国下任总统，都会继续与中共交往，因为美国不想打仗，必须维持此地和平，而办法就是与共党谈判。

为了减少影响，蒋经国那几天多会见新闻界人物。当天下午会见两位美联社记者，第二天上午 10 点半还在部里接见 Russell House of Foreign World Features 人员。

路易斯与叶翔之会晤

“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于 10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到“新闻局，在魏景蒙陪同下和路易斯会晤。

会谈前，魏景蒙明白表示，这次会谈内容不会见诸文字。

双方坐定后，叶翔之问路易斯：“对中国大陆有何看法？”

答：“独裁的时代已经过去，斯大林死了，毛泽东会接班，接着他也会疯狂。”

问：“对台湾有何观感？”

答：“仍在发展中，但胜过日本。他在这里比在日本更自在。你们这里的中国人较好，你们聪明、有礼、机灵。”

这次会晤，路易斯提出以下问题：

1. 我们能展开大使级之类的接触吗？
2. 你们反攻大陆后，能容忍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以政党身分存在吗？
3. 如果你们反攻大陆，苏联保持中立有所帮助吗？
4. 苏联不会喜欢具有敌意的国民党作邻居。
5. 希望知道台湾愿意以哪个大使馆与莫斯科接触。
6. 离开台湾后，应与谁谈？
7. 莫斯科愿与台湾交换纯属中苏问题的情报，例如妇女及儿童渗透到与中国接壤的西伯利亚边界等。

叶翔之答复的重点如下：

1. 如果苏联保持中立，我们会很高兴，但真正的中立是不存在的，只是宣传词令而已。
2. 能以前那样与苏联合作。
3. 我们能容忍共产党（条件是他们不能有军队）。
4. 我们希望苏联真心展开工作。
5. 我们在中共军队、党内及其他地方都有自己人。
6. 我们也保持党的中立。
7. 如果苏联保持中立，没有美国帮助我们也能回去。
8. 在展开大使级接触后，我们可以考虑运送文物等到莫斯科展出。
9. 如果苏联承认国民政府，我们能否会接受，这点可以考虑，但我们双方必须对诸如目的等事宜要有更充分的了解。

叶翔之离去后，魏景蒙对路易斯说：“中共使我们以身为中国人耻。”
路易斯则表示，当苏联人被指责为野蛮、落后时，他也有同感。

根据罗启的报告，这一天上午，路易斯曾寄信到莫斯科。当他前往英国领事馆时，领事馆人员劝他尽快离开。菲律宾领事也大为震惊。

蒋经国为会晤定调

10月26日，蒋经国召叶翔之、魏景蒙研究会晤路易斯之事。

蒋经国说：“中苏关系历史悠久，交恶是错在斯大林。二次大战使我们再度携手合作。但后来苏联支持毛，我们处于不利地位。《中苏条约》是我们想与苏俄维持长久和平的证明。双方关系不好是因为我们过于信任《中苏条约》，加以苏俄在东北扶助毛泽东，违背了条约。”

叶翔之说：“据路易斯的口气，当毛泽东的威胁解除时，美国对苏联的威胁也不再存在，因为毛泽东统治的大陆太接近苏联，而历史上只有亚洲人（蒙古人）征服过苏联，所以苏联的威胁是毛泽东，并非欧洲和美国。由于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做360度的转变对我们而言是很困难的，所以得悄悄进行。”

蒋经国说：“我们现在退守海岛，来自中共的威胁十分严重，此事攸关我们的生死。因为我们都想看到毛泽东的覆亡，所以我们能够谈判。”

叶说：“无论如何，美国这些年来一直与中共接触。美国不希望我们反攻大陆，而希望我们与中共谈判。”

蒋经国：“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立场。如果我们回到大陆，边境问题不会成为苏俄的问题。过去我们曾从以下几点显示了诚意：1. 蒙古自治；2. 雅尔达会谈；3. 东北（旅顺、大连）的权利。但因苏联违反《中苏条约》，以致造成今天的问题。我们主张三民主义，不侵略他国。越战，美国希望我们参战，但我们拒绝了，我们不想加入国际战争。中共是我们内部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关切。总统的三民主义即总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总理定下的政策是中苏关系有如美加关系。”

蒋经国让魏景蒙向路易斯约定，会晤时，两人不得使用俄语，要通过翻译交谈，避开密谈的印象。其次，路易斯不能拍照。而这都是对美国人预留地步，免得将来解释不清。届时，由蒋经国告诉路易斯：

1. 在未先获苏联谅解前，台湾不会反攻大陆。
2. 台湾会像以往那样与苏联合作。
3. 乐见直接接触，但在何地接触？

蒋经国交待，跟路易斯谈过后，要马上巧妙地告知美国人。

魏景蒙说：“对这项交易我们必须慎重，不然台湾会面临与当年印度及巴基斯坦一样的情势。”

当天晚上，路易斯打电话找到罗启，告诉他：

1. 务必在星期一上午 11 时前返回；
2. 希望和叶翔之与魏景蒙午餐。

罗启在汇报路易斯的要求时还说，路易斯在高雄有一个女人。

叶翔之二晤路易斯

10 月 28 日，路易斯偕罗启返回台北。途中，他告诉罗启：苏联和中国大陆是没有希望复和的，不论是政党或人民皆然。改变中国大陆目前的状况，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日本有能力采取行动，但日本不干……。

第二，美国又不敢采取行动。

第三，中共内部的新势力，但他们的机会不大！

因此，从上述推断或可能性来看，唯一能够采取行动的，就是“中华民国”。

上次路易斯跟魏景蒙谈时，说过苏联和印度的关系很理想，换言之，苏联会希望“中华民国”比照印度的路线走。他相信，在今后 3 年之内，“中华民国”回大陆的机会是这 20 年来中最高，不过，最好也有有用的因素，就是苏联保持中立。但是，台湾必须让克里姆林宫相信，在光复大陆后，中国不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所以魏景蒙曾向上反映，台湾需要向苏联证明，他们未来会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

路易斯还认为，苏联必须在中国两大政党——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之中做一选择，而他个人认为国民党要好得多。

中午 12 时，路易斯、叶翔之在叶处会面。路易斯说：“何不在海外华人

地区建立一个反毛的中国共产党，可以和苏联驻日本大使（他认为是位又好又有影响力的苏联外交官）一谈，要求莫斯科协助和合作，并且让这个反毛共产党公开表明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国民党。”

叶翔之问：“为什么不跟我们合作，而要去建立一支亲莫斯科的共产党？”

路易斯说：“这很难改变，因为我们曾经合作过……”

叶说：“当我们收复三分之二的中国时，莫斯科曾乐意合作并且承认我们，但是后来我们失败了，莫斯科又和我们作对，跑去帮毛泽东，因为担心美国会在中国建立基地。”

路易斯表示，他深信在中苏过去的合作史上，国民党并没有“黑记录”。台湾收复大陆的最佳时机是在未来3年。

魏景蒙说：“这主要得看苏联的态度。”同时，他提出几点请路易斯向莫斯科报告：

1. 我们愿在实际行动之前先和莫斯科磋商（光复）大陆的行动。
2. 请严守中立，或者索性帮助我们。
3. 联络的管道（东京大使馆不错）。
4. 废除中苏条约（有助鼓舞我民心）。
5. 没有必要建立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
6. 两个中国绝对不可能，而且行不通。
7. 美国、苏联、日本都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大陆，唯一合理的政权就是台湾。

路易斯表示，他相信台湾有能力而且可以有效采取行动，这个信念是他在苏联即有——不是到台湾之后才产生的。

当叶翔之问路易斯对下列安排认为哪一种较符合苏联的安全利益：

美国——国民党

美国——毛泽东

他的答案是前者。他认为，在毛泽东之下，中共没有一个人可以信得过担任亲苏共产党的领导人。所以国民党介入是合理的，但是也不能相信国民党，因为它与老美关系密切。

会谈中，路易斯还说，如果台湾同意的话，愿意在英国报纸写点文章。英国领事馆反正已经知道他这次来访了。

下午16时，会议结束。魏景蒙向蒋经国报告路易斯和叶翔之的谈话内容。并认为：

1. 毛泽东是共同敌人，所以（中苏）应该合作。
2. 把会谈管道延到后天（10月30日）实施，好让他知道这是经过最高当局批准的。
3. 可以拍照片，可找新闻局的摄影师来拍。
4. 要求路易斯不要报道。
5. 他只是个“传话人”，因此需要照片证明。
6. 我们在土耳其大使馆酒会时告诉老美，只说我们和《伦敦晚报》的苏联人路易斯有过有趣的谈话（话题是赫鲁晓夫在海滨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7. 由魏景蒙对外说，路易斯来撰写有趣的东西，已经见过了蒋经国。
8. 英国、南非和菲律宾都没给他签证，这可能意味，他们都在看他这次来访的结果。

他在台湾南部有好几个女人，都是在短短时间就搭上的。

蒋经国会晤路易斯

10月29日，蒋经国会晤了路易斯。为了妥当考量，蒋经国上下午都约见了来台湾采访的外籍记者，路易斯只是其中之一，给人以只是接见记者而已的感觉。

双方先以英语短暂会谈，但仍对路易斯提供口头传译。

路易斯首先谈了他见蒋经国的主题：“希望和台湾建立直接联系，并把联系位阶提高到‘大使级’的层次。建议台北和莫斯科互设新闻处。希望看到台湾在短期内能对大陆采取行动，苏联会在这件事上保持中立态势，不会帮中共。”

此外，路易斯还谈到：

国民党必须说明将如何对待苏联和部分中国共产党，因为苏联人在道义上较同情他们，而且关切他们的福祉。

交换情报对双方都有价值（例如沿中苏边界的平民活动和人海战术——尤其是海参崴和贝加尔湖等中共宣称属于中国领土的那一带地区）。

莫斯科现在或许会容许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并透过他们提供协助，但是莫斯科绝不会重蹈扶植毛泽东的事。（魏说，您要怎么样让人相信你说的话）。

或者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成立，来和苏联接触。

莫斯科的党性极强，所以要让那些人改变想法，国民党必须提出许多保证。

赫鲁晓夫在北京和毛泽东就“立刻消灭老美”打交道的经验，毛拒绝对莫斯科……这就是双方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

我以莫斯科来人的身分讲话，而不是以国民党的苏联顾问身分。我不希望台湾引述我的话。对台湾强调这里的一切谈话都是“不列入记录”的，我同意！

蒋经国说：

当今中国大陆没有人可以继承毛，毛的接班人没有一个胆敢不反苏。毛泽东垮台后唯一能够治中国的，就是国民党。

现在，重点是，苏联当局要我们容忍一支在中国的亲莫斯科共产党，而且不去整肃苏联在中国的朋友。果如此，当我们在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时，莫斯科就会保守中立。

我们的看法是，既然国民党是社会主义党，毛泽东下台后，苏联干嘛不和我们合作。

路易斯说：“莫斯科宁愿透过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来和你们共事，那个党也会和国民党合作。莫斯科宁愿和国民党直接打交道，而不要透过第三国。国民党是一群讲理的人，是苏联可以共事的，这次来访证实了这点。”

蒋经国：“外交上的考虑是个大问题。”

最后，路易斯提到了今后连络接触的问题。蒋经国说：“这个问题明天答复。”

会晤结束后，路易斯要罗启告诉魏景蒙，在他来访后，可能会有其他苏联记者申请来访。他建议“如果我是魏景蒙，我不会给他们签证，因为他们不怀好心。”

这一天，路易斯打过电话给伦敦他的岳母，请她转告他的妻子他在台湾平安。他也接到家中报平安的复电。

10月30日上午，蒋经国告诉路易斯，他已向“总统”报告，关于联络问题意见如下：

1. 魏景蒙会安排建立联络系统的计划。

2. 卢为将担任“信差”，希望莫斯科能任命一名东京的联络人和卢接头，必要时，卢可以回台报告。

3. 希望莫斯科稍后派一人前来台北。

4. 只有蒋介石、蒋经国和魏景蒙知道这件事，其他人都不知。（叶翔之现在已在局外）。当时双方约定，“收到维克托的问候”为识别身分的用语。

这一天，蒋经国参加一个酒会，当大家的面，很轻松地告诉美国中情局驻台代表，“昨天接见了一位俄国籍记者的访问。”

老美知道蒋经国见了路易斯之后，反应很大。美国大使马康卫、美国在台湾情报单位NACC夜以继日打听，穷追不放。美国国务院则透过台湾驻美“大使”周书楷打听。一直过了好久，美国才没再追问。

这一天，蒋经国还要魏景蒙告诉路易斯，有人问到他这个人。并告诉路易斯，他已安排“R”（代号）见蒋经国。为了避免让毛泽东的情报人员探听，“R”不愿在台湾谈话，“R”很怕大陆，认为在一个敌对“国家”工作不安全，尤其是高级官员。

蒋经国问：“如果苏联要我们的人在其他有苏联大使馆的地方会谈，能同意吗？”

魏说：“这是可以考虑的。”

蒋经国说：“会派你去。”

接着，他又让魏问路易斯，苏联卖武器给台湾的佣金问题。魏不知蒋经国为何了解这事。路易斯于10月31日离台，乘坐的是直飞金边的航班，因为香港、菲律宾、南非没有给签证。临行前，路易斯希望再见蒋经国一次，蒋经国基于各种考虑没有答应。

蒋介石“关心特使”

11月1日，魏景蒙向蒋经国报告他和路易斯最后一次谈话的内容。

蒋经国对路易斯提出的“佣金”要求甚感困惑。

魏又说：“有人会在东京和我们联络。”

蒋经国又把叶翔之叫来，强调此事保密的重要。魏指出，“在路易斯来访之后，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太坏，尽管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并不坏，但这些年，美国都在华沙和毛泽东会谈，即使尼克松获胜，他也会加倍努力去和北京谈，不会帮助我们回老家，如果打仗了，也不会提供我们援助。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谈打倒共同敌人的事！”

蒋经国：“这个行动会有很大的后果。”

当天晚上，蒋经国又打电话告诉魏，要卢为回来一趟。

在路易斯来台期间，蒋介石始终没有考虑接见他。但对他在台一言一行的关切，可用“钜细靡遗”来形容。除了书面报告，要仔仔细细看，蒋介石还特别召见罗启两次，任何小处都不放过。

路易斯见蒋经国，不是蒋经国自己决定的，而是蒋介石考虑两三天之后

才点头。这也是先让路易斯到中南部参观的原因。

路易斯主动“泄密”

11月2日，魏景蒙打电话给卢为。命他返国述职。并透过蒋经国的办公室主任于振宇向蒋经国报告此事。11月4日，周中峰告诉魏景蒙，美国当局有人和他接触，询问有关路易斯来访的事，他希望多知道一点。

魏告诉他，自己会处理罗启和他助手之间的事。

同一天，《华盛顿邮报》在“瀛海珍闻”栏中报道：

俄记者出现台北

10月底，苏联记者路易斯曾去台湾4天。

路易斯为斯大林之女所写回忆录的穿线人，系在东京取得台湾签证。除了台北以外，并访问了金边。路易斯离台时，拟顺道进入香港，但为港府所拒绝，理由是香港不欢迎任何苏联记者。

《邮报》这条消息，未注明来源。据猜测，一系来自东京，一系美国国务院所授意，但美国国务院对此拒绝评论。

11月5日，美国有关方面向台“新闻局副局长”叶梅生打听有关路易斯的事，并说他们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VTAUYYEVGBNYEVICH LOUI（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说他曾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安排赫上NBC电视接受访问。

魏景蒙告诉他，这个人从日本来，台湾是以他的《伦敦晚报》记者身分给他签证，到最后一刻才发现他是苏联人。他曾和魏景蒙谈过莫斯科——北京的关系，认为双方纷争的根源，是核子冲突，以及利用人海战术夺取西伯利亚，还有赫鲁晓夫在海滨与毛泽东的谈话等等。

11月6日，蒋经国要知道《华盛顿邮报》对路易斯的访台做了哪些报道。

谈到有人了解路易斯来访之事，蒋经国说照这样答复：

路易斯是从东京来，代表《伦敦晚报》来采访，要求看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活动。我们让他看了土地改革计划、加工出口区和博物馆之后，他就走了。

蒋介石听取会晤经过

11月7日，蒋经国告诉魏景蒙，“总统”可能召他去报告路易斯的事。

这一天，捷克及南斯拉夫籍的“美国世界新闻班”人员与“国际研究所”的15人访问团一起来台，台老特工徐开远也与该团体同行。魏景蒙叫罗启亲自向“国防部长”蒋经国报告此事。

接着，魏景蒙去向蒋介石报告路易斯来访经过，以及来访期间的谈话内容，还有路易斯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事。

关于路易斯来访前的联系经过，魏景蒙告诉蒋介石，他打的电报是答复驻美大使周书楷，他没有打电报给日本使馆，因为有关此事的电报打得愈少愈好。他还提到，卢为很快就要回去。

魏景蒙报告了一个多小时，蒋介石听后表示支持蒋经国和魏在与路易斯

会谈时所说的一切。

在魏景蒙的报告里，特别注意到过去有关双方合作之事，“我们在华南掩护他们的人员，他们在华北掩护我方人员”，蒋介石问魏景蒙，是否曾向蒋经国报告此事。魏说有。

魏景蒙离开后与蒋经国联络，他承认自己忘了向蒋介石报告这一点。

魏还报告：

1. 需要派人到非共产党国家以色列。
2. 明年派新闻代表到以色列。
3. 根据徐开远的建议，同意明年让捷克及南斯拉夫人员与美国的 15 人代表团一起访问台湾。

对第二条，蒋经国要他按兵不动，也不要答复。

11 月 18 日，魏景蒙为蒋介石和蒋经国翻译 9 月号《时代》杂志那篇杰佛利·波卡所写的文章，题为“你会买一把这个人用过的旧剑吗？”他本人来台访问时，已把文章内容的多数重点告诉台湾当局。文章说路易斯是苏联特务机构克格勃（KGB）的特务，在莫斯科郊区过着豪华生活。

11 月 20 日，台驻美“大使”周书楷来电，报告一则有关路易斯来访的新闻报道，之前还有一则消息说，美国与苏联将在东南亚合作对抗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全会后，力量可能更强大，所以美国和苏联会更害怕中共的侵略性。

蒋经国希望魏景蒙在数日内写好一份有关魏景蒙、叶翔之以及他本人与路易斯会谈情形的报告，以供新闻界发稿。魏景蒙要写的 3 份报告是：

1. 魏景蒙与路易斯的会谈。
2. 叶翔之和魏景蒙与路易斯的会谈。
3. 蒋经国与路易斯的会谈。

外电暗示苏蒋将有接触

11 月 29 日，台“外交部”报告：史丹利·卡诺在 11 月 18 日发表了一篇有关路易斯来访的报道，其中有很多推测之词，暗示台湾与苏联将在最近数月于外交、政治圈展开接触。魏景蒙做了简单报告：

11 月 30 日上午 10 时见《华盛顿邮报》记者史丹利·卡诺，如谈话中问及路易斯时，应作下列答复：

路易斯在东京台湾使馆以《伦敦晚报》记者之证明书请求来台采访经济、土地、故宫消息，使馆转新闻局，本局照准。及签证时始知其为苏联籍。彼云并非共产党党员而在斯大林政权下被放逐西伯利亚 10 年之久，领馆如此报告本局后，魏景蒙即决定准其来台。理由：此人可能来台要求政府庇护，但一面通知治安当局注意其行动，好在台湾并无不可见人告人之事。

路易斯于 10 月 22 日抵台，31 日离台，在台寓第一饭店，曾见魏景蒙，23 日见陶声洋，观光及逛博物馆，24 日赴乌来，下晚看电影。

- 25 日：孔庙、“共”情。
- 26 日：中非农事会、赴高雄加工区、澄清湖。
- 27 日：日月潭。

28日晚：回北市。

29日：蒋经国谈话魏景蒙在场；在阳明山及附近郊游。

30日：魏景蒙见他。

本地无记者知之故无报道。

对于 22 日谈话内容，魏景蒙向台“外交部”透露：

新闻局告其核准来访是为其英国记者身分，如有意要求庇护，台湾欢迎。蒋总统宽大为怀，故有甚多共党来归。蒋总统召示云“不是敌人就是友人”，而此地自由之土，有言论自由，有探访自由。当我们提到自由中国人不信任苏联时，他回答：斯大林下台了，新一代在苏联掌权。因苏联共产党不守条约之信用。对其来台的活动我告诉他，“你要看的经、农、古物方面，本局已有接洽准备，你为苏联公民，我有两问题请问，如不方便可以不必答复，此地有言论自由，亦有不言之自由。

问一：莫斯科、北京两政权都是一类，为何火并以至如此？

问二：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之报道究竟正确如何？

曾告路易斯一切谈话皆为“不列入记录”，我们不便说话太多。

答一：毛泽东要共党国家之霸权。

答二：一部分西伯利亚之土地中共欲“收回移民”，并无大冲突。

魏景蒙答美国记者问

11月30日，魏景蒙告诉史丹利·卡诺，路易斯访台是为了看土地改革、经济和博物馆。

以记者身分见蒋经国。魏景蒙担任译员。

蒋经国希望知道英国对毛泽东的态度。但他知道的不多。

路易斯想知道大陆及毛泽东的最新状况，以及台湾对中国大陆及毛泽东的看法。

路易斯对台湾印象深刻。

魏说，据他看来，“路易斯并不怎么危险。”

卡诺：“那只是外表。”

魏景蒙告诉卡诺，自由中国人民并不信任苏联，魏也告诉路易斯这点。

卡诺认为，路易斯绝对是个危险人物。他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家旅馆见过路易斯，所以知道他曾来台北。他对自己是19年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苏联人十分自豪。路易斯希望卡诺不要利用他透露的东西写新闻。

卡诺说，路易斯来台是为苏联探路，因为苏联目前正在亚洲加强公关工作。有资料显示：苏联正在向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示好，以对抗中共。他们甚至帮印尼训练部队以对付印尼境内亲中共的共产党势力。中共驻河内大使馆人员对苏联人表现出公开的敌意，在馆内殴打苏联人。苏联也在争取美国，因为苏联认为中共正在讨好美国。

卡诺建议台“新闻局”把苏联驻金边大使馆人员拉希德·卡马丹放在台湾的公开资料中，并看看会有何反应。有关卡马丹的资料可能从香港寄出。

此外，卡诺仍希望见蒋经国，如能获安排，他愿停留到星期一。

12月1日魏景蒙把与卡诺会谈的情形告诉了蒋经国。

新华社揭露苏蒋勾结

对于苏蒋之间的罪恶勾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视而不见。1969年3月5日，新华通讯社专就此事发电揭露。电文如下：

苏修叛徒集团同七亿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集团正在加紧进行反革命勾结。不久前，苏修叛徒集团派出一名“记者”到蒋帮窃踞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登门朝拜，阴谋策划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勾当。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席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挑衅。

据西方报刊和通讯社透露，一个化名维克托·路易斯的苏联人（他的真名叫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授意下，于去年10月下旬以记者的身份去台湾省进行秘密活动。他在台北活动期间，同蒋帮“国防部长”蒋经国“举行了会见”，并就阴谋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勾当“交换了意见”。路易斯还代表苏修叛徒集团“非正式地邀请”蒋帮派遣“记者”去苏联“访问”。美联社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消息透露，路易斯在回到莫斯科后并发表谈话，无耻吹捧什么蒋帮的“积极的方面”，竭力美化蒋帮对台湾省的罪恶统治。

与此同时，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通讯社还纷纷报道，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等许多地方，苏修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同蒋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进行“非正式接触的事已显著地增多起来”。蒋帮也在“鼓励”它的“外交人员”和记者同苏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搞在一起”。这些事实表明苏修叛徒集团伙同美帝勾结蒋帮恶毒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行径已经达到何等卑鄙的地步。

苏修叛徒集团同蒋帮进行的新的反革命勾结，绝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长期以来它们就同蒋帮勾勾搭搭，积极为美帝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效劳。1963年，它们公然让蒋帮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臭名昭著的所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把蒋帮窃踞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称作“国家”，把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称为“总统”。它们多次在刊物上刊印蒋帮的旗子。它们还无数次同蒋帮的“代表”坐在一条板凳上开各种国际会议。现在苏修叛徒集团竟然派人到台湾省同蒋帮勾结，这是它们反华阴谋活动的一个新的罪证。

苏修叛徒集团加紧勾结蒋帮猖狂反华，充分暴露了它们的虚弱本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变得更加坚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苏修叛徒集团勾结美帝、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最大障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强盗行径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反对，苏修叛徒集团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像一根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越拉越紧。苏联人民反对苏修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也日益加强。苏修叛徒集团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勾结美帝和各国反动派反华，甚至饥不择食地把蒋帮这具早已腐烂发臭的政治僵尸也当作宝贝来利用。这是它们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妄图进行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

但是，不管苏修、美帝拼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加速自己的灭亡。

第二节 台苏“特使”再会维也纳

路易斯再次提约

1969年5月1日清晨5时，路易斯从罗马打电话来，要求从台湾驻罗马“大使馆”取得去台的签证，并说由于签证的关系，他在罗马不能住得太久。

魏景蒙告诉他，台北和东京一样糟，到处都是新闻记者。要他到曼谷或新加坡去。

他说，他没法去新加坡，去曼谷也只能停留24小时，在罗马没人注意他，因此最好是从罗马直接来台北。

魏要他在罗马等，5小时后给他答复。

路易斯给魏景蒙留了他的地址和电话：伊登旅馆 215 房；旅馆总机：480551。

上午8时5分，魏在台“国防部”打电话给路易斯：

“我准备于一周或10天后启程经香港赴曼谷，途中还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停留，预计要在5月18日或19日抵达目的地。如果没有意外，可望在5月20日在曼谷和你见面。至于为何要延迟那么久，等见面时再告诉你。这段时间，请你和台湾驻曼谷新闻参事屠益箴联系，屠的办公室电话：58053；住宅：91449。魏不说：“我会随时让屠益箴知道自己的行程。”

路易斯说：“签证有问题，我只能拿到曼谷的过境签证。请选一周以内的任何时间见面。”

魏说：“可我不能在5月20日以前到曼谷。请你做些调整，并让我知道。”

路：“确实有困难，请你重新考虑提前在一周内动身，并打电话给我。”

魏：“等请示后回答。”

当魏去向在“立法院”的蒋经国报告时，蒋说：“不可以。如果路易斯今晚没打电话来，就去电告诉他，不能在5月20日以前见面。”

后来蒋经国又打电话告诉魏：“不必给他打电话，请立即到我处来。”当魏来到他长安东路的官邸时，蒋经国告诉魏：

“最好不要在20日去曼谷见他。如果他再打电话来，并坚持要在一周或10天内见面，就告诉在罗马或维也纳见他。如果没电话，还是在20日以前去曼谷，等几天。”

5月4日10时30分，路易斯打电话到魏家，魏不在。下午2时5分，魏打电话给路易斯，4时才接通（经过美国）。此时，他已改住维也纳的劳顿旅馆（HOTEL SCHLOSS LAUDON），电话：842430。他希望6月和魏见面，或者马上在维也纳见。

魏回答：“可以在5月12日至14日在维也纳见。”

通话后，魏马上与蒋经国联系。因他去庆生旅行，至下午6时才接通电话。魏景蒙向蒋经国报告通话之事，蒋说：“考虑后再答复。”魏说：“我必须打电话把决定告诉路易斯。”

5月5日，蒋经国再次来电，首先向魏景蒙通报了西德人克拉索夫斯基获自法新社驻莫斯科记者3月26日的报告：

谢里宾、贝里会等主张与台接近。近日会议中有5项基本问题之建议，并获得上级有条件支持：

- A. 毛政权有崩溃及内战可能，（苏联）可能与台合作且极有希望。
- B. 中苏合作基础，可用有条件或密约规定之。双方协议在毛崩溃后，成立一个国民党与新组织之共产党合作之联合政府。
- C. 新的中国国家制度，不一定要使用共产党名称，但须符合社会经济之进步条件。故在相当期间内，容许一个两党之“人民民主国家制度”。
- D. 国共联合政府仅属过渡性质，苏联对于联合政府之援助，不仅于新中国共产党；惟困该新中国共产党需要相当长时间始能在社会、政治方面发展成一个具有力量之亲苏党派，故苏联必须先与中国国民党合作。
- E. 美国的远东政策，为莫斯科与台北接近之最大障碍。

蒋说：“研究后以为，贝里舍不致与谢里宾同流，前者为元老派，而谢则为少壮派。”

5月6日上午10时30分，蒋经国约见魏景蒙，将魏的行程改为：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曼谷——维也纳——罗马——曼谷——香港。

蒋要魏轻松地进行这次旅行，届时向岛内媒体发布魏出国的新闻，但魏在国外与台联络时勿用“路易斯”的名字。下午3时15分，魏再见蒋经国。讨论将来以何种方法联络。在这次会晤中，蒋经国说：“最好把比利时列入行程，而且国家愈多愈好。已告诉总统，你会在香港停留一天。”

魏说：“取得欧洲签证，需要在香港待两天。”

蒋介石审定会谈原则

下午4时，魏陪同蒋经国赴士林官邸见蒋介石。蒋介石对魏景蒙之行有关细节作出安排，魏记录如下：

- 一、行程增列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丹麦。
- 二、将向路易斯宣读由蒋经国和魏所写，并由蒋介石亲自改正及批准的要点。向他读过文件后即予销毁。魏不携带中文原件。
- 三、若路易斯问起以下问题时，魏应以口头回答。
 - 1. 问魏从台北带来什么条件或文字？
答：因为是他要求魏来的，便没有什么好说。
 - 2. 台湾需要何种武器和装备？
答：你对我们台湾的装备情形很清楚，你应该可以提出一份清单。
- 四、下次会谈应在台北进行，因为必须由蒋介石或蒋经国来做决定，而他们几乎无法悄悄不为人知地离开台湾。
- 五、如果下一次会谈是不须请示的事务性协商，则在维也纳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
(魏这次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他们以具体措词谈如何合作，以及应采何种步骤推翻毛政权。)

对蒋介石批示的5点原则，魏记：

- 一、中国大陆毛政权仍然存在已经危害了甲乙双方的基本利益（甲：中国，乙：苏联），如再令其继续发展必成更恶劣的后果，此点即为甲乙双方合作之基础。
- 二、有关合作之办法，首先应以双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权，以及推翻后甲乙双方应

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件，故商讨各种办法之前必先决定政策。

三、甲方与乙方共同合作推翻毛政权，可得到国内的朝野及大陆人民之谅解。但决不能采取在历史上已经失败并因此而造成甲乙双方极大的祸患，即所谓国共合作之政策。

任何以共产党名义号召之举，不独遭到中国人民之恐惧、痛恨，就是毛共组织内之反毛分子亦将起而抵抗，此对乙方亦为绝对有害而不利的。

当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苏友好条约，支持蒋委员长领导之国民政府谋得统一，则决不致形成如今日对甲乙双方共同之祸患。

四、甲方为吸收毛政权内各部门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以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之下采取反毛救国联合战线，其在全国各党派中成员之一参加共同讨毛复国之战争。

五、至于甲乙双方之基本问题如边疆、经济、外交等，应作为今后商谈之主要课题。

5月7日，蒋经国再次指示魏景蒙：

1. 出国之事不发布新闻。
2. 可能不会谈到5点原则。
3. 在出国期间完全不和他直接联络。

莫斯科对台保证

1969年5月7日下午，魏景蒙抵港。按计划，一路顺利：9日晚抵新加坡、10日抵吉隆坡、12日夜飞罗马、13日抵西德、14日晚抵维也纳。

在约定地点进晚餐时，魏景蒙见到了路易斯，但有一人与他同桌，其身后还有一人。魏没有和他招呼。11时半，路来电话约魏在宾馆外散步。魏按时来到了约定地，在马路上，路易斯说：“返国后，当局还有对中共姑息者，至珍宝岛事发生后始有行动，此事曾一再搁置。4月去电话时，莫斯科已有大使阶之人在东京等候。在罗马再去电话，东京之人已回莫斯科。当初急欲去台之意是让东京之人速与台湾搭线。”

魏告其：“将来重要之接谈必须在台湾。”

路回答：“主持政策者无法更名改姓，而又绝对不愿外间知道赴台之事。故今后联络问题，大家再想想。”接着，他转换了话题：“在罗马时曾到你们驻教廷大使馆申请入境不成，又到驻意大使馆又不成。曾打电话到台北魏家中及罗启，方知魏已离台。由欧赴台经马尼拉仍可守密。”（路易斯行动不能改姓名）

对上次在台北会晤时的重点之一，路易斯说这次有了正式之答复。莫斯科认为中国大陆有背弃条约之信义，故有以下对台之保证，其英译汉如次：

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是纯为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毛泽东，以上文字请勿予外人道及。如有愿告美国者，希望先商苏联。

路易斯问台方有无话要说，以便其上呈，魏告之有几点意见要苏联考虑之，遂约其次晨9时来室一谈，并将蒋介石所批5点原则中的重点略述之，如政策问题：不能以另立共产党来号召大陆人民；各党派可纳入国民党领导

下之反毛联盟组织。路说将加密发莫斯科。

关于上次所谈军火问题，路易斯说还是要由台方提出并开列清单及交货地点。

交换情报，路易斯说：“希望即刻开始，开始时可重量不重质，譬如关于大陆军队之布置（对苏联有关之资料）、九全分析等。但每页须以打字抄件送交，视合作交换情形如何再加质量。”路强调：“此点是本人意见，算中间人对台着想者。因莫斯科有人亦重量者。如今后往来方便，重要问题可赴莫斯科交换意见。”

在这次见面中，路易斯急于下次之会谈，使魏感到严重之事可随时发生。

魏说：“如有必要，下次再谈可在维也纳，而该旅馆极静。罗马不可。”

路易斯说，他仍须去台，魏复以回台后研究之。

路易斯说：“最好台方商务人员持新加坡或其他中立国之护照者，时常赴莫斯科做生意，保证其有利之营业并资联系。”（路易斯的夫人为美国某大厂之驻苏代理）

魏问：“如合作成功后亲莫（斯科）华人（在莫、在外国者）是否嘱其来归？”

彼答：“此类事当不成问题。”

对这次会晤，魏记录如下：

1. 中国内乱于苏联无关。
2. 高级人员曾到日等候（大使级的）。
3. 密码附加通知（TANALIN）（魏景蒙）不可由莫拍发，地址柏林。
4. 明晨先到我室来写带来之 5 点。
5. 情报：关于共军布置、九全秘件即可交换，军火需要我们开单“地点、交货”。如有大事发生于大陆，如何支援我们？如何利用俄基地等军事行动。
6. 他们高级人来，现在不可能几小时内可以接济等。不能用伪护照。故地点最好设在公海或中立地如 code（密码）。
7. 将 5 点加密电莫斯科听其回音，有文字的更改。
8. 在 WIEN（维也纳）一谈，然后希望在莫一谈后方能彼来台之议，柏林（已告其非来台不可理由）。
9. 如何可使其来台？以后之 SAS 可停台？
10. 亲莫华人可使其来归，我们的建议。
11. 星华人持星护照者前赴莫做生意，即可开始（其夫人为美国某厂代理）。

魏景蒙传达“蒋五点”

15 日晨 9 时半，路易斯来到了魏的房间。魏估计他是将头天所商谈的各点与其同伴商议后再来的。

魏景蒙照文慢读，路易斯认真抄录，将 5 点读记完后，双方进行复读校对。

确认无误，路易斯收起记录说：“5 点似嫌空洞，台湾最好先提出如何解决毛为第一。”

魏告以：“不谈政策，走到哪里算哪里是不妥的。如一旦大陆发生大变，或台登陆大陆等等，苏联如何支持我们须事先有所计划。关于利用苏联基地、

我方需要军火接济之各点、情报交换等等，5 点有回音后，下次会谈各点可望加入程序。

接着，双方协商“高级会议”之地点。路易斯说：“莫斯科希望在公海。”魏说：“高级谈话必须在台举行。”并强调了台方的理由。

路认为，如有必要仍愿来台，希望魏回台后考虑之。接着，又提出以下问题：

1. 在欧洲，台湾有何人可代转函电，可准其接头（不谈事务）？
2. 台方之大陆资料如经其他路线送苏者，可减少或停止，专用此线交换之。
3. 将来如台动手时，苏联不怕制造边疆之事件以应合之。
4. 商务人赴莫斯科前，须有可贸易之货单，以便即可开始通商，望两个月内可成行。

15 日下午 4 时半，路易斯又来到魏室。谓台 5 点中有的文字译成俄文后辞句太凶，故须略润饰之，其各处改动点如下：

开头语改为“如果苏联过去之领袖们能对国民政府关系有弹性之处理，如 1945 年之中苏友好条约，而协助蒋委员长领导之政策……”

（第三点）“定不可再用过去已失败之政策如国共合作者”，改为“不论任何政策，类如过去之国共合作者，皆不能期有成功”。

（第五点）“至于两国间之基本问题如望不致有何解决之困难，类如边疆、经济及外交等”。……（可留在以后作商讨之课题）改为“吾人希望不致有何解决之困难，类如：边疆、经济及外交等。”

这次会晤双方约定，如下次仍在维也纳会谈，路易斯将由苏联以外之欧洲国家电魏如下：

CHINANNEWS TAIPEI（台北英文中国日报）
INFORM TANALIN（通知魏景蒙）
MALL DICK ARTICLE（维也纳报社）（日期）
CONFIRM DEADLINE（确定限期）
如电魏景蒙家中者则有商业语气：

约瑟夫——台北	贝蒂——金厦沙
约翰——曼谷	南西——吉隆坡
克利斯——东京	贝丝——新加坡
珍——罗马	彼得——马尼拉
安——塞浦路斯	狄克——WIEN. S.L（维也纳）
玛丽——哥本哈根	景蒙——CMW
WL——王平（路易斯代号）	JOESmith

双方协商派“贸易商”

15 日夜 10 时 30 分，路约魏散步。期间，魏询路易斯对下次会谈之课题有无增减或修改。

答：“没有。如有，可以后联络。但广泛交换情报即可开始，以满足如何对付毛泽东和双方军事之需要。最好有专人写稿，开始重量不必重质，如人事资料可长可短。希望派一位贸易人才来莫时带来。此人不必要常时驻莫。”

但可常来。有若干事可告彼转达你方。此人定可赚钱，再希有若干地点如领事等可传递信件或言语。”

问：“同来几人？系何种人？”

答：“二人，一是不公开之同僚，一是保镖者。同僚应是可商量问题之人。”

问：“何时对我方 5 点有答复？”

答：“恐稍须时日，看来可同意。”

问：“新疆骚动是怎么回事？”

答：“两星期前中共在边境派大批牛群入苏境之卡吉克。不料牛群中隐藏军队，现已挖好壕阵。苏联已决心将其撵出。可能有一场战争。牛群为常有之事。”

问：“下次会谈之程序？”

答：“下次可广泛交换情报，以如何对付双方之需要。”

问：“下面的日程？”

答：“拟两日后即去奥赴莫再往加拿大。”

16 日晨，魏景蒙通过台驻柏林联络人宋风恩，将与路易斯会晤情况报蒋经国。除上述情况，魏还汇报：

莫斯科将召开国际共产国家会议。不参加者，到现在有毛泽东、阿尔巴尼亚、北朝鲜、北越、捷克、南斯拉夫、古巴。苏联驻维也纳之外交官近以间谍罪被奥政府驱逐出境，但非严重，故将来再来维也纳会谈

不妨也。加拿大靠拢美国不能在加会谈。比利时一时不会承认中共，因又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大本营。

中苏边境苏有重兵，如海参崴发生威胁，俄会全面作战。

何人在欧洲如柏林他们可以接头？或转电或转言者在欧洲。

上午 9 时，路易斯再来。称： 11 时离 SCHLOSS LAUTON 旅馆。下午 1 时 15 分飞在罗马。两天后回莫斯科，然后再赴加拿大打某报纸之毁谤官司（或可得美金 5 万元）。路还说：“商务人员最好由柏林进入。”

晚上，魏对此次会谈经过做了如下记录：

1. 路易斯带来之苏方正式答复；
2. 彼抄 5 点但不太准确；
3. 关于下次地点；
4. 下次谈话程序；
5. 在台举行高层次会议之铺路；
6. 军事合作之基础；
7. 情报交换；
8. 高级会晤之地点：原地或塞浦路斯岛（我有大使馆）；
9. 情报即可交换。商务代表应于两个月间派往，经东柏林进入莫斯科（或由罗马尼亚、捷克等地进入亦可）；
10. 情报交换开始时重量，渐而重质为妥。中文即可。最新消息重写过再送苏。亦可经常由商务代表转（其夫人为美国某大厂之代理）；

- 11.再要求在欧洲之我方可靠人士为转达电信名单地址以便传递；
- 12.再谈军事合作，基地，同时响应边境事件，中共亲俄党人之归顺（不成问题）（实在可怕，彼辈太现实也）；
- 13.总统号召几小时内军援之，会同后当更好点；
- 14.如能先在莫斯科一谈，则再来台谈可能性或大一点，表示非来台不可；
- 15.莫斯科内中国人多，反苏者已无有矣，故来一商务代表不妨也。

外界试探会谈消息

5月24日下午3时30分，魏景蒙离开香港，4时30分抵台北。即直接赴蒋经国办公室，报告维也纳之行。

5月25日（周日）上午8时30分赴长安东路官邸，再向蒋经国报告。

蒋重复确认路易斯从卡布里和罗马对魏说的话，似乎很重视那个没能在东京见到台方人员的人，认为那人可能有许多路易斯不知道的事要告诉台湾当局。

接着蒋问：“你对此行的印象如何？”

魏答：“彼方似乎比我方要急。”

蒋经国也对军事合作很感兴趣，关于“贸易商”的角色，蒋问：“朱新民担任好不好？”

魏未置可否。

蒋经国交待，如果蒋介石要见他，可如此报告“接触经过”，魏对此记录如下：

路易斯在卡布里时，来电表示想于4月底以前在欧洲或者在东京和我见面，当时他只在卡布里停留一天，然后就到罗马，他要我们答复，但我们未回答。

5月1日清晨5时，路易斯又从罗马打电话来，要求我们准他来台湾，被拒。由于东京媒体警觉性高，他没去成东京。后来，路易斯提到可在曼谷或新加坡见面，我同意在曼谷见，但要延到5月20日之后。经过商量后，蒋经国决定改在维也纳见。

5月4日，他打电话来，我回电打到维也纳劳顿旅馆，我们约定于5月12日至14日之间在劳顿旅馆见面。

蒋经国认为，下一次见面地点在塞浦路斯较好。届时也许还是派我去，叫我写信给路易斯约下次见面之事，但他要先请示。

告诉魏部长，路易斯没到维也纳（可见当时的外交部长魏道明被蒙在鼓里）。

5月27日上午10时，蒋经国召见魏景蒙，告之“下午4时总统狮子山茶宴后，于5时在中山楼召见你。”魏根据蒋经国的指示，对蒋介石说了以下几点：

- 1.他们急于举行高层会谈。
- 2.认为我们的5点内容空洞。
- 3.下次见面的重点，要谈情报交换、高层会谈方式、5点回音。至于见面地点，将等其来电时约定。
- 4.军火之事，他们提出的方式、地点、种类。
- 5.商务代表、两个月派联络员。

6. 苏之回音。

蒋介石决定等路易斯来电之后，再决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会考虑派人到莫斯科。

魏又向蒋汇报：“日前曾遇日本新闻专员山本，当其说有谣传我见过路易斯了，我大笑以对。”

蒋说：“曾想向魏道明提你和路易斯见面的事，但怕他感到尴尬所以没告之。下次见他时会告诉他，以为补偿。”

魏又向蒋提到：“澳洲大使 26 日在酒会中问我，‘你的莫斯科之行满意吗？’ CIA 的塞佛斯想跟我一谈，还有山本告诉我王惕吾和韦永成立委说我见过路易斯。”

蒋介石听完笑了笑说：“大家对你此行猜测，是想当然耳。”

对魏景蒙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蒋介石十分满意。

5 月 29 日，有消息传来，路易斯已取得南韩签证。路易斯这次并未在东京出现，故有人怀疑路可能到南韩了，并认为南韩可能想知道路上次到台北时，谈了些什么。

第三节 一次重要会晤的流产

蒋介石亲笔会晤内容

1969年9月20日，蒋经国来电告诉魏景蒙：“明天下午2时30分赴中山楼听副总统演讲。然后一起见总统。最近，尤特（C. YUTER J.S.D.）正在推动全球禁止核子试爆，他已与俄国官员谈过，尤其是支持此构想的基德洛夫。他也告诉美国大使李奥纳德等人。在今年8月20日的一封信函中，提到由美国和苏联联手摧毁中共的核子武力，以惩处不受管制之国家。这封信中，他也暗示我们愿执行此项处理。但他仍然在联合国安理会倡议给予中共联合国会员资格。”建议向蒋介石报告上次会谈时，提出以下的重点：

1. 我们进一步改善关系的时机已成熟。（包括大陆内外的亲苏共党分子）、（派代表驻莫斯科等）。所有这些关系的改善应可在高层次抵台湾时达成。（交换共情）
2. 应提供我方海空军的攻击配备，俾便同步配合苏联的倒毛行动。
3. 罗布泊（中共在新疆的核弹基地）对我们双方都是威胁。（建议使用苏联飞机和我们的飞行员）
4. 透过安排，我们愿考虑正式承认外蒙古，并建立外交关系。（将来与西藏的关系）

下午3时30分，蒋经国和魏景蒙赴“荣民总医院”探视蒋介石，蒋的脸颊上仍有一点伤痕。3人谈了很多也谈了很久。蒋介石令魏景蒙不要去象牙海岸，应在赴罗马后立即回台。以下的文字可视为最后的定稿。

见到路易斯时，先听他如何说法，如果其态度依然友好，或有积极之建议，我方不妨做以下之表示（我：甲方，彼：乙方）：

一、在目前情形之下，中苏两国已经到了应作进一步增进双边友好关系。乙方如派员来台面商进行步骤及提出具体的建议，则双方就可切实合作，积极进行。

二、毛泽东拥有原子武器，甲乙双方皆受其严重的威胁，甲方可与乙方共商如何使其彻底消灭之方法。三、如不用武力，毛政权是不会自己崩溃的。甲方有足够训练的人力担负其事，惟其海空军的力量还不够，故需要乙方供应适当海空军之攻击武寨。（类如米格—23、远程轰炸机、飞弹潜艇等）、（第三项最好要待对才提出我方再提，否则始终不提）、（此时可察其反应如何，方清淡提醒重用甲方的精干空军人员驾驶新式米格轰炸机突击其原子设备，未尝不是一个方法）

四、为了造成毛泽东极不利的形势，以及变更今后世界的局势，甲方与乙方应共同磋商在适当的条件下，甲方可以考虑正式承认外蒙古并建立外交关系。

9月20日

中正亲笔于荣民总医院

接着，蒋介石又讲了下次见面的9点提示：

1. 问他对我方所提5点，你们有否意见（答复）。
2. 我们始终遵循孙总理遗嘱，愿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3. 反毛之中共党员如其有愿皆可容纳于国民党之内，但其不能另有共党的组织，亦不能跨党。
4. 中共在国内如另有组织，则与国内各政党的组织同在国民党领导之下。

5. 如果问起要什么武器，则可答应此事还待他们对我方所提 5 点有了确实答复再行详商，如无对我方 5 点有了确答，则待双方正式代表会商时详谈。但我所欠缺者只是海空军新式武器，至于陆军武器现可自给之语。（略答）

问其是否已准备派正式代表来台，或要由我国驻双方友好国家大使先议，但最后仍须在台北举行最后的会谈。 6. 外蒙问题可以略提我承认其独立的可能性，但新疆与东三省的主权与领土必须完整。

7. 对毛具体计划应由双方组织参谋团共同实施。

8. 讨毛行动必须由我政府单独负责实施，不须外国参加。

9. 对毛共核子武器，由他们供给武器，由我方负责实施摧毁。魏把蒋介石以上 9 点提示译成英文之后，蒋经国交待他另加 3 点：

1. 甲方不愿为了中国讨毛战争而引起世界之纷争，故不需要外国参与其事，只要乙方声明此为中国内政问题，不予干涉。

2. 乙方应当体念到过去支持毛共夺取政权之政策是斯大林的绝对错误。今后乙方只有支持国民党推翻毛共政权，方能使中国人民对乙方发生好感。即中共党员与军队亦将因此而亲苏，并将与乙方重归旧好，如果乙方仍想扶持中共其一部分人起来讨毛，则无异于以暴易暴，必然是大陆人民不能忍受的。

3. 在甲乙双方合作之下，国民党领导全国从事讨毛战争，在政治上可以容纳一切反毛政治团体（包括反毛共党分子）。

魏景蒙抵罗马

在与蒋氏父子会谈后，魏景蒙感触颇多，当天晚上，写下了如下杂记：

1. 美国与中共勾搭并非新鲜事，20 年来他们一直扬言放弃我们，美国与中共棘手的是台湾问题，美国想把台湾作为基地。

2. 台湾政府和人民此时特别感到不悦，但美国不能占领台湾，台湾也不能自行成为独立国家。

3. 如果废除苏联与中共的友好条约，会对大陆的中国人民带来极大冲击，对我们有利。

4. 不交换情报和代表，如此零星会引起猜疑，对苏联不好。

5. 1949 年以后，加上斯大林支持毛泽东。“是大陆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6. 使美国与中共关系不顺畅的，除了台湾以外，还有金门和马祖问题，我们被要求自这两外岛撤退，但我们断然拒绝。

7.（大使级）会谈，我们同意在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进行大使级的会谈。

8. 我应问他苏联倡议亚洲共同安全联盟意图何在？东南亚的情势非常复杂，受美国影响很大，日本、南韩不会接受此构想。因此，关键问题是毛泽东仍然存在。他对承认外蒙古的行动有何看法？

9 月 22 日，魏景蒙前往阳明山向蒋经国辞行。魏问：“如果反攻大陆，美国的态度如何？”

蒋答：“第一，美国自顾不暇顾我事；第二，反攻大陆不受任何协议约束；第三，美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把握反攻成功，美国不反对，换句话说，如果苏联以武器支援，美国不反对。”

9月22日，魏景蒙在孟买投邮，信是写给路易斯的，约定10月罗马见。内容如下：

亲爱的路易斯：

我于10月2日至6日一定会在罗马，我没能能在伊登旅馆订到房间，改住罗马的Parco Dir Principi 旅馆，我的电话号码大概是861089、841071，我会在那里等你的电话。

祝好

Tanalin (景蒙)

10月2日，魏景蒙抵罗马。

打电话至伊登旅馆，路易斯不在那儿，也没有预订2日和4日的房间。在打电话之间，魏景蒙做了一个噩梦，梦见间谍在跟踪他，而他又找不到路易斯。晚餐后，魏于10时许走到伊登旅馆，服务人员说，路易斯来电，他可能于4日到，停留一星期，要来访者尽量不打电报或长途电话。据旅馆工作人员说，路易斯自称是美国人。于是魏景蒙在伊登的柜台留言给路易斯，“请回电Principi 旅馆227号房”。

中午12时30分。魏景蒙从飞机中收到莫斯科电台再度指控中共是盲目的排他主义和国家主义。

这一天的广播对有关中苏关系问题做如下报道：

1. 边疆撤兵36公里；
2. 恢复谈判与贸易；
3. 苏联将援助河内；

10月4日，正午时分魏景蒙向伊登查证，路易斯仍未住进。下午3时、6时、9时、11时再查，仍未住进。

路易斯失约

10月5日8时30分，魏景蒙再次向伊登旅馆查证，询问台人员说，路易斯已取消预订房间。魏赶紧到电信局打电话给他，路的太太接电话。魏告诉她自己的旅馆地址，并说会在罗马等到10月7日。

魏再向伊登旅馆查证，询问台说：“他昨晚打电话给经理，取消预订。”

10时45分再打电话至莫斯科。转告他在Principi 等路到10月6日晚为止。10月6日前再打电话告诉他新地址。并商定10月7日回家，不再呆在罗马。

魏景蒙等着看路易斯是不是会打电话给他。但他知道，事情至为明了，不必等候矣，归去来兮。客气地打电话给他太太，只是告诉她，自己记挂他，但必须回家处理事情，如果路要找他，可以打电话至他家。杰姆斯(魏景蒙)。

10月6日10时，魏景蒙再次打电话给路易斯太太。她说：“从未收到自孟买寄来的信。有很多要寄给他的东西都没收到。”

魏说：“请他打电话到我家和我联络。我明早返台。”

10月9日下午4时30分魏景蒙返家。

下午6时30分向蒋经国报告任务失败。蒋经国称许魏的行事并作出如下的反应，“中共和苏联不会联手，幸好你没见到他告诉我们的态度，不必去见总统，好戏就要上场，等着瞧吧！”

10月10日，蒋介石要在“国庆”典礼之后见魏景蒙，但他已离开（张群）办公室前往泰顺街。

取得电话联系后，魏获指示在下午3时偕蒋经国到士林官邸见蒋介石。

魏景蒙向老蒋报告和路易斯联络的所有经过。

蒋介石也认为这次会晤任务的失败是因苏联政策所致的看法。

以下是蒋介石的反应：

1. 我们现在按兵不动（不便采取任何行动）。
2. 他们不会有进展。
3. 应该看看中共第7和第8号广播稿，其中对解决边界冲突方面并无进展。

来自合众社的报道

魏景蒙作了半小时的报告后告退。蒋经国与蒋介石继续谈。

回家后，魏景蒙将《中国邮报》刊出的关于合众国际社9月17日发自英国的一篇报道剪下，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上面引述苏联“新闻记者”路易斯在《伦敦晚报》撰写的新闻报道，说苏联“很可能”采取像进犯捷克一样的模式，攻击中共的核子设施。全文如下：

合众国际社伦敦17日电

一名经常在国外为苏联传送消息的苏联“记者”周二暗示，苏联可能干预中共，显然会攻击中共的核子设施。

曾预测赫鲁晓夫于1964年垮台的莫斯科记者维克托·路易斯，仍如前次在销路广大的《伦敦晚报》上提出上述极为不祥的暗示。路易斯指出，苏联可能会发动入侵捷克式的干预行动，他说，中国大陆的反毛力量“非常可能”推出一位领袖，由他来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手足支援”。路易斯在文稿中指出：“从过去一年来发生的事情观察，证实苏联采取下述政策，即社会主义国家有权依据自身或那些遭到威胁国家的利益，干预彼此的事务。”

“中国大陆比捷克大好几倍，而且会积极抵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定会施行此种政策。”

谈到苏联攻击中共核子设施的问题，路易斯神秘地又说：“苏联敢不敢攻击中共在罗布泊的核子设施，是个战略上的问题，因此全世界只能在事后才见分晓。”

路易斯说：“莫斯科的消息灵通人士对于西方会因苏联计划空袭罗布泊而兴奋感到意外，此间都很清楚苏联的核子设施目标就是对准中共的核子设施。”

他说，苏联倾向以火箭取代部队的攻击，苏联有“各种火箭可供选择，端视地形和其他情况而定。”

“例如，中共想占领一个岛屿，它会放火烧光地面和很多已经派在该地的军队和装备。”

此话显然是指中苏在珍宝岛的边境冲突，有关该岛曾为焦土一事，以往未曾透露过。

他并提出警告说，“毫无疑问，中共在每次遭到小股势力攻击时，一定会采用焦土政策……在莫斯科看不出准备与中共开战的迹象……全苏联人最近已有毛泽东可能发动攻击的准备。”

路易斯说，以往抨击中共的冗长演说仅在苏共集会时向党员宣读，但现在已被视为人人皆应知晓。

他说：“当然，此间还有许多事是不为外人知的，但这些事都会引起军事上相当严重的关切。”

路易斯在报道中还说，从越南获得的消息，中共已从北越撤回许多顾问，他们汲取了和美国人作战的长足经验，而这些人都会被调派至中苏边界。

第四节 “第一号令”出笼背景

神州大地全面备战

1969年秋。北京西郊玉泉山。

毛泽东的案头放置着一份文件：曾经到过台湾、会晤过蒋经国、经常代表苏联官方透露重大决策的“自由撰稿人”维克托·路易斯在伦敦《新闻晚报》赤裸裸地写道：苏联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阅过之后，毛泽东久久地陷入了沉思。

如果说美国人主动“泄密”别有用意，那么这位苏联“密使”的公开叫嚷又说明了什么？既然在新疆敢扔，那么在北京也有可能。

毛泽东立即向中央发出警告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毛泽东给他们具体决定了疏散的时间是10月20日，即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之日以前，并为一些老同志指定了地点，大致都在京广铁路线附近。说完，他便离开北京，前往武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全部疏散，只留周恩来和一个副总参谋长在西郊玉泉山坐镇指挥。

林彪跑到苏州以后，次日便发出了那个著名的战备“第一号令”。于是，引起了全国一片动荡不安：满载军队的列车彻夜不停地在铁路线上隆隆行驶，边防的士兵们在野外帐篷里枕戈待旦……这是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调动。

“第一号令”的内容包括：

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

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并迅速报告。

由于“第一号令”是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的，所以又称“林彪一号令”。

接着，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县；陈毅到石家庄；叶剑英到长沙；聂荣臻到邯郸；刘少奇鼻子上插着鼻饲管躺在担架上被押送到开封；邓小平、陈云、王震被“疏散”到江西；陶铸被押送去合肥。这些被打倒、被夺权的对象，反而要重点“保护”起来了，似乎他们对这些“黑帮”们的人身安全，关心得无微不至。

10月19日，林彪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意。尽管毛泽东对苏联的核攻击保持高度的警惕，也主张中央领导同志不要集中在北京。但是，也对林彪一伙借战备为名，以个人名义发号施令十分反感。所以毛泽东听了以后，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

林彪和黄永胜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他们还扣发和删改了某些军区关于执行这个“号令”的报告，对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封锁。

“一号令”实质上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这

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的篡党夺权阴谋扫除障碍。

汪东兴飞京急传指令

进入70年代后，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生活。首要议程是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要召开人大，先要修改宪法，使之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改天换地”相适应。

1970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收到了周恩来从北京送来的文件，他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人们今天早已熟知庐山会议上那一场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斗争，但很少有人知道，第一次提出设国家主席，是出自周恩来之口，而不是林彪。

周恩来的考虑是合理的。自从1966年8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在造反狂潮中停止工作以后，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定为“叛徒、内奸、工贼”，1969年11月惨死在开封。国家失去了国家元首。可以代行职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也被诬蔑为“军阀”，此刻正疏散在广东。外国元首来访，只能由总理周恩来出面。这毕竟名不正，言不顺，非长久之计。

那么，现在再设国家主席，由谁来当？显然，只有第二号人物林彪。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的。他总感到，在林彪狂热的个人崇拜语言后面，隐藏着一些令人难以琢磨的意味。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的地位如日中天，炙手可热之时，有过几次不同凡响的表示。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表示了对林彪大讲政变的不安。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中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说道，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并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立即引起了刚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满腹狐疑。

因此，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职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考虑是长久的，选择是唯一的。

3月7日，毛泽东召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对他明确他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要他第二天立即回北京传达。汪东兴乘坐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后，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点了一下头，毫不犹豫地说：“明天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由你向政治局传达。”

3月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除林彪未来以外，到会的成员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后，周恩来指定叶群把毛泽东的意见和会议讨论的情况报告给林彪。

事情本来到此可以画上句号。虽然不设国家主席并非一个圆满的处理，但也别无良策。谁知，一个星期之后，风云突变。

3月17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到是否设国家主席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康生、张春桥主张不设，吴法宪、李

作鹏主张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分歧还反映在宪法中是否写进“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此言是林彪发明的，写进了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林彪等人一直视此为一大功绩，是“高举”、“紧跟”的“专利”。而康生、张春桥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时，就知道了毛泽东讨厌这句话、严令删去的内情，所以主张在宪法中不写。但他们故意不说是毛泽东的意见，只一味坚持不要写，却暗中窃喜吴法宪等人越来越陷进圈套。不明就里的吴法宪则拼命抓住康生、张春桥的反对态度，以为既抓住了笔杆子们的一条罪状，又可以维护林彪的地位。

自中共“九大”以后即开始争权夺利的两个集团展开了各怀鬼胎的争斗。

周恩来不露声色地审视着一切。他拿起了红色电话机，拨通武汉东湖，向汪东兴说明了怀仁堂的唇枪舌战，同时又送去了一封信。汪东兴把信呈交毛泽东时，转述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听说，毛泽东脸上立即显出不快的神色，再次对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你回京传达。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缓缓的话语中蕴含着坚决的态度。

然而，林彪竟不为所动。

4月11日晚，林彪在终日不出的密室中踱来踱去，突然叫来秘书，口授了一个电话的意见：

- 一、关于这次人大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考虑缓和中美关系

叶群亲自打电话将这个意见告诉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听后笑了。他不无调侃地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么就让董老（董必武）当吧！”收敛笑容后，毛泽东又提笔在中央政治局转来的林彪意见上斩钉截铁地批了一句话：“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的态度不容置疑，林彪也并不退让。于是，此后，演出了一场人所共知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风云。

但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还明显地表现在对外方针上，这一点则不曾为人们和后来的研究者注目。

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著名声明，即“五·二”声明。这个声明是乔冠华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其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孟子》名言的引用，使之增色不少。但毛泽东内心并不以为这个声明特别重要。他脑海深处，正在考虑做一篇缓和中美关系的大文章。

按照中央的安排，5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上午9点，来到人民大会堂118室，这是毛泽东接见外宾的主要场所，又称湖南厅。他们会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及宾努首相。

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一见面就赶上几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倾诉着感谢的话语。此刻，这个落难的王公感受到真正朋友的情谊。

3月19日，西哈努克一行从莫斯科抵达北京，这次国事访问却成了苏联卑劣的出卖。在西哈努克访问苏联期间，柬埔寨发生了政变，朗诺上台。苏联却严密封锁消息，不让亲王一行知道，又若无其事地照常接待他。礼送他出国的那天，才在飞机上告诉柬埔寨国内政变的消息，然后撒手而去。目瞪口呆的亲王顷刻无家可归。这时，中国政府伸出了援救之手，决定照常接待西哈努克亲王。他到达北京机场后，周恩来立即对他说：“我们已发表了亲王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抵京的消息。”“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热泪盈眶的西哈努克于3月23日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柬埔寨爱国统一战线。

见到毛泽东，西哈努克激动是自然的，而林彪那天的表现则有些反常。

早晨5点多钟，林彪就把秘书叫来。他坐在沙发上，慢吞吞地说：“今天我要参加天安门大会去。你们给我点点话题，我听听。”所谓话题，就是有关的国际形势，因为这是发布“五·二”声明的大会。秘书从柬埔寨起头，又讲到越南、老挝人民的斗争，阿拉伯人民同以色列的斗争，苏联、美国的动向等等。忽然，秘书发现林彪头仰在沙发上，两眼紧闭，嘴巴微张地睡着了。秘书只好悄悄地退出来。

为了应付上午的大会，叶群立即布置给林彪打了一针兴奋剂，引起了林彪的亢进和反常。

林彪对着西哈努克，语无伦次地说着：“全力支持你们的斗争，打倒美帝国主义。……地球是一个大火球。有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站得最高，不仅考虑中国，而且还考虑全世界。”毛泽东不冷不热地瞥了林彪一眼，对西哈努克笑着说：“他是讲打的。”林彪一反谦恭不语的常态，急急地争辩似的抢着说：“讲道理讲不清楚，就只有打。”

也许觉察到自己的抢白失态，林彪又赶紧唱起了高调：“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毛泽东思想普及全世界。毛主席将活得很长，毛主席将来会看到打垮美帝国主义、打垮苏联修正主义……”听到这里，毛泽东不耐烦地把手一摆，说：“好了，就吹到这里，开会去。”

林彪反对中美关系缓和

大家一起驱车来到了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红旗似海，万头攒动，汇集着几十万人，将举行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林彪要在会上宣读“五·二”声明。西哈努克情绪激动地在城楼上用中国话喊了10几次“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报以“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西哈努克双手合拢，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说：“我们有中国做我们的可靠后方，一定会战胜！”毛泽东却笑着回答：“没有中国，你们也行。”他掰开手指历数说：“华盛顿当时反对英国，他只有300万人口，战胜了英国，法国大革命时很困难，整个欧洲国家包围法国；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只有8万党员……他们都胜利了嘛！”

表现失常的还是林彪。

对着麦克风，他用湖北腔大声说道：“我要发表讲话！……我讲讲关于越南……两个越南……半个越南……”显然，他离开了讲话稿，正在百万人

大会上胡言乱语。好一阵子，林彪才开始宣读“声明”。

人们都为林彪的讲话表现吃惊，却没有注意到在谈话中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他是讲打的”及林彪辩白态度的分量。西哈努克更没有弄清这反映了中国头号人物和二号人物的什么不同。何谓“讲道理讲不清楚，就只有打”？

分歧要从1969年冬季讲起。苏联日益嚣张的核战争威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使毛泽东迫切地感受到必须改变这种中国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两害取其轻，他考虑采取战国时代秦国远交近攻的战略。就在这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作出了向中国表示缓和的一些姿态。他指派美国驻华沙的大使斯托塞尔与中国临时代办雷阳进行接触，中国政府立即作出积极反应，双方决定恢复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3月，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中、美大使级会谈又暂告停止。但大门的门缝并未关死，双方都在试探、寻找更合适的方式。毛泽东、尼克松这两个东、西半球的顶尖人物，思路的电波已经开始串通。

林彪反对中、美缓和。当然，他没有直接这样做，而是通过他的支持另一种倾向予以表示。

中、美关系能否缓和，关键在于越南问题能否解决。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后，采用各种战争手段都无法在越南取胜，开始试图从这个没膝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他需要一个契机。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通过谈判可以给美国一个台阶下，促使美军早日撤出越南。那么，剩下的南越政权便远不是越南北方的对手。胜利可以提前到来。因此，他为越南领导人提的建议是：多采取一些主力军作战，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在尼克松的背上击一猛掌，推动他痛下撤军的决心。

他在一次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武元甲时建议，要在越南最南方金瓯半岛地区发展一些主力军，“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的胜仗”。他说：“单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动，我看也不行。”

林彪则不同。写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他，在与越南领导人几次会谈中，设计了一个战略方针，简言之，就是一个字——“熬”。用游击战和美国人拖下去，既不进行正面主力作战，也不谈判，10、20年地拖下去。

发展了游击战理论的毛泽东，深知游击战并不是解决战争的手段，只是促使敌我力量发生转变的过渡。“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对越南领导人批判林彪说：“我们过去党内意见也不统一。一派人（指林彪）就是劝你们把美国抓住不放，一个字，叫作‘熬’，就是只能打游击战，不要打大仗。而我是劝你们要集中兵力打大仗。你不打败敌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么舒服的呀！不是这样，你们谈判桌上得不了这样的结果。”

林彪为什么主张“熬”？因为，主要由军人组成的林彪集团在不胜不和的持续战争状态中，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林彪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

1972年7月，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又说到林彪：“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他反对我们跟美国接近，跟你们西方接近。”

“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和林彪见面，是在1971年6月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代表团访华。毛泽东、林

彪、周恩来、康生等在人民大会堂 118 室与他们举行了会谈。林彪未穿军装，神色呆滞，一言不发。几个月来，他一直顽固地拒绝检查庐山会议上的错误，放过了毛泽东给他的一次又一次机会。

毛泽东和齐奥塞斯库谈到中国的教育时，慢慢地说：“有些人口里说是听话的，但心里是埋怨的。这就要时间，慢慢来。”他瞟了林彪一眼。林彪仍是一言不发，毫无反应。

毛泽东提高了声调：“赫鲁晓夫叫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说，把赫鲁晓夫请到北京大学讲学，讲他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柯西金不干，他说不好啊！”

除了外宾，在座的人谁都知道，“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明”语言。毛泽东这时把它与赫鲁晓夫联系起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林彪面色苍白，呆坐在那里。

未等接见结束，林彪就离开了 118 室。他独自一人坐到门外大厅西北角的一张椅子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警卫员都在远处莫名其妙地愣愣望着林彪。他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脸上无一丝血色，仿佛一尊蜡人。

118 室里，毛泽东身边的座位空着。毛泽东泰然处之，依然谈笑风生。直到会见结束，毛泽东和罗马尼亚贵宾离开了 118 室，林彪仍然独自一人坐在门外大厅里。

他在想什么？永远是一个谜。

此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毛泽东开始了他震惊世界的南巡。

秋风再起的时节，林彪在外邦大漠身首异处，毛泽东也生了一场大病。

第五节 “密使”再晤维也纳

尼克松对中美关系的探索

1969年初，尼克松以总统身份所进行的第一次国外旅行，便开始试探和中国改善关系的问题。他在巴黎与戴高乐总统会谈时，戴高乐告诉他：“对你们来说，与其在中国强大起来后而不得不承认它，还不如早点承认。”他认为戴高乐的话是对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干的7亿人口的巨大潜力无疑将使中国成为经济巨人和军事巨人。他请求戴高乐通过法国驻华大使把一个口信转达给中国人，说他将结束美国卷入越南事务的状态。1969年4月，新任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把尼克松的口信带到了北京。

接着，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关系的行动。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从7月23日起放宽对美国人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100美元的中国货物。7月23日，尼克松在白宫的草坪对一批学生说：我盼望这一时刻的到来，那里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及全世界的所有人民都能走在一起，一起谈话。

在中苏核大战危机期间，由于中国坚决反击的决心和充分的战争准备，也因为美国的强大压力，苏联终于放弃了进行核战争的愚蠢想法。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不仅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胆略，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而且也使美国总统尼克松看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坚定了他打开中美交往关系大门的决心。

11月初，尼克松命令美国海军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2月12日，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邀请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在中国使馆会谈了一小时，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两年后双方代表的首次接触，这使美国人感到欢欣鼓舞。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从12月23日起，允许美国拥有的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的物资。

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举行了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与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中国大使馆内和美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了会谈，这使自1968年1月8日第134次会谈以来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会谈宣告恢复。在2月20日举行的第135次会谈中。斯托塞尔向中国建议，由美国政府派出一位高级代表到北京进行更深入的会谈。他遵照指示告诉雷阳：“美国在台湾有限的军事力量对贵国政府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我们希望，随着亚洲日益走向和平和稳定，我们将能够减少我们目前在台湾的军事设施。”雷阳在宣读的声明中，则建议双方继续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或通过双方都能接受的渠道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中国政府将乐于接受美国总统派出特使深入研究根本性的原则问题。

4月7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公报中根据国外资产管制条例，规定国外子公司和外国公司同中国的贸易中，允许装有美国制造的非战略物资的部件输往中国。

布拉萨大酒店前的枪声

1970年4月24日中午，蒋经国从纽约的皮耶饭店前往布拉萨大酒店，参加远东美国协会为他举行的午宴。这里的气氛很煞风景，有几十个台独联盟分子，手持要求台湾独立的标语向蒋经国示威。12时10分，蒋经国在严密的护送下到来。当他下车走近酒店的正门时，突然从正门两侧闪出两个刺客，其中一个迅速冲过警卫，在蒋经国身后掏出手枪就要射击，此时的蒋经国随着扇形转动门进入门内，正处在有效射程内。就在刺客将扣动扳机的一刹那，美方一名警卫抓住了刺客手腕向上一举，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同时，两名台方警卫挺身相挡，推了蒋经国一把，子弹从蒋经国身边上方飞过，射入墙壁。开枪的刺客挣扎着要冲进去打第二枪，被警卫关在转动门里就擒。另一名刺客也被制服。

经美国警方审讯，刺客叫黄文雄和郑自才，都是台湾青年，系台独联盟的狂热分子。

布拉萨大酒店门前一声枪响，令美国朝野震惊。当夜零时30分，消息传到台北，84岁的蒋介石闻讯惊喜交集。

蒋经国遇刺无恙，却留下种种谜团。这次从4月20日至24日的访问，是蒋经国第五次访美，是在当上了“行政院副院长”后的第一次访美。美国在接待礼仪上有过度不寻常的表现，以接待国家元首礼仪，包括动用三军仪仗、19响礼炮，接待了一位“副首相”。蒋经国此次访美目的之一，是急于想知道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举行的华沙双边会谈，打算做何种让步。但是尼克松、基辛格和蒋经国会晤，除了惯常的外交辞令，没有透露一点信息。对蒋经国的其它要求，如更新军事装备等，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承诺。给予那么高规格的接待，给却不给任何实惠，这对于台湾来说，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未来关系的谜团”。

但令人费解的却是安全的“漏洞”，蒋经国此次访美安全措施，那是非常严密的。在公众场合都是内、中、外三围警卫。以蒋经国为中心的10米半径内为内围，除美国的礼宾人员外，全是台方贴身警卫；10米到20米内为中围，由美方便衣和穿警服警卫混合编组负责；20米到50米外，由美方警局武装人员负责。就是这样的三层警卫，竟使二个刺客混进外围，突进中围，接近内围，在距蒋经国10米多的地方开枪射击。这确实叫台湾警方对赫赫有名的美国警方迷惑不解，不能不说是一个“安全谜团”。

另外还有一个“马康卫谜团”。马康卫当时是美国驻台湾“大使”，他对蒋经国访美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卖劲。在蒋经国访美动身前，他先行返美去做“妥善安排”，结果却是蒋经国险些殒命。如果与马康卫的过去联系起来，那就更令人深思。马康卫在担任美国驻南朝鲜大使任内，发生了军事政变，90岁高龄的总统李承晚被赶下台，在马康卫“道义”的“保护下脱险”，被秘密送住美国夏威夷，老死在那里。以后马康卫继任驻南越大使，又发生了军事政变，总统吴庭艳在马康卫“道义”的“通知”下，乘汽车逃亡，在离开总统府的半途被叛军乱枪射杀。总之，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马康卫到哪里哪里就有灾星出现？马康卫为蒋经国访美的“妥善安排”与遇刺有没有什么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马康卫谜团”。

以上种种谜团，随着时光的流逝，有的已经解开。“未来关系的谜团”，以尼克松1972年2月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说明，尼克松此次邀请台湾政权核心人物之一的蒋经国访美，是向台湾“道别的一种方式”。“安全谜团”也已理出了头绪，擒凶的美方警卫与行刺阴谋无关，那名及时抓住刺客手腕

而使蒋经国无恙的美方警卫，确是尽职尽责，为此蒋经国将自己当时所戴贵重手表相赠，以谢救命之恩。当然台方有功警卫也更亏待不了，在关键时刻挺身救驾的钟湖滨、温哈熊由于一挡一推，表现了特有的“忠诚”，分别被拔擢为“中视公司”总经理和联勤总司令。至于两个刺客的行刺目的，则是为制造“台湾独立”服务，行刺是台独政治运动的一项行动。关于“马康卫谜团”至今仍是不解之谜，也许谜底在美联邦调查局的绝密档案里。

当天蒋经国遇刺无恙，照样按原计划进入布拉萨大酒店赴宴。宴会未终，美国捷足记者追踪而至，请他发表“遇刺感想”。美国记者之如此突发新闻采访，令贵宾大为折服。蒋经国说：“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美国果然成就蒋经国的仁爱之心，释放了刺客，理由是未伤及刺客所要刺之人。

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在闻讯后，都当面向他们请来的贵宾表达了“美国式的歉意”。不过还说因为美国是一个“完全民主开放的国家”，诸如此类事情的发生，绝非特例，譬如肯尼迪总统也一样遇刺啊，而且被刺殒命哩！因此希望勿因“意外事件”而介意，更希望不影响双方长久深厚的感情。蒋经国则答：“昨天事情发生之当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第一个关心的事则为有没有人因我的来访，而被这一‘意外事件’受到误伤，在知道没有人受到误伤之后，我就如释重负了。一天之后，如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起，我几乎都已忘了这一‘意外事件’了。”

路易斯为失约道歉

1970年3月，路易斯给魏景蒙寄来了复活节卡片。8月22日自哥本哈根来电，称会停留至下周中，9月15日至9月底会在大阪，希望在博览会上与魏晤面，或可过境台北或马来西亚时，在机场晤面。路称，可随时以他住家为联络点。口气非常认真。

8月27日，魏景蒙自日月潭回台北后，即电路易斯。

次日，魏在家中接到路8月6日自缅甸寄来的信函，希望见面，大约8月20日在哥本哈根，抵达后即电魏，最好致电其家说明行程。夜间，魏打电话至哥本哈根，路易斯已离丹麦。

9月3日，“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召见魏景蒙，嘱复函路易斯。其内容大意如此：

8月6日来信收到，昨日电话才知“你已走了”。如有此需要，10月底11月初可在罗马见面。

9月12日，罗启持函飞罗马，魏交待：9月17日寄第一封信，18日寄第二封信。

9月15日，“大使馆”来电：“路易斯赴塞浦路斯，希望来台被拒绝。”

9月25日下午5时30分，路易斯自塞浦路斯来电话：“9月29日在曼谷过境，希望来台过境。”

魏答：“不必来台，速电家中读我罗马函。”

路易斯：“何时可见面？”

答：“如有必要，10月底11月初。”

10月1日，上午9时45分，路易斯从瑞士苏黎世来电话，称：“信已收到，10月底可能在德黑兰。”

魏：“不能在德黑兰见面。”

路：“能早见否？”

答：“不能。”

路：“最早何时何地？”

答：“11月1日在罗马伊登旅馆，已订房。”

10月17日，蒋经国告诉魏景蒙：“如果谈到他的家务事，要断然拒绝。外蒙古和边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你可问之‘你们何时及如何帮我们的忙？’告诉罗启，把会面地点改到维也纳，仍在同一天、同一家旅馆。”

魏景蒙通知欧洲的罗启，赶紧打电话给路易斯太太，通知改地点。如果路易斯10月31日不在维也纳，就从维也纳打电话至罗马，并发电报。

10月28日12时30分，路易斯从南斯拉夫来电，称他同意改地点，并会在10月30日住进劳顿旅馆(Landon Hotel)大约待到11月1日。并说他有点犹豫，因为须获维也纳签证，他建议在南斯拉夫见面，魏以同样理由回绝。

10月29日上午9时5分，罗启来电。魏告诉他：“已和路易斯接触，在维也纳乡村旅馆见面，时间在10月30日至11月1日之间。”

1970年10月30日，路易斯住进了亚士都旅馆309号房。

下午2时，路易斯来劳顿，在离旅馆5公里的马路与魏会面。他先为去年10月失约，未在罗马晤面道歉，因为莫斯科的鸽派觉得，如果晤面，会破坏北京会谈，将是很困窘的事，鸽派的代表为柯西金。

鹰派需要“弹药”

在这次谈话中，路易斯一再抱怨电话太难接通，导致多次未能和魏联络上。路问：“有无可靠的中间人在维也纳或新加坡，或吉隆坡。能否给我台北的过境签证，以便急需时用？”

魏略加思考反问：“此次要求见面的理由安在？”

路答：“明年3月（已延开二次）将召开苏共代表大会，会充分讨论权力问题，这是‘鹰派’表明他们观点的重要时刻。在台北时，蒋经国曾告诉我，毛死后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可能更恶化，我在多个场合转达了此一观点，效果甚佳。但如今‘鸽派’认为，柯西金已与周恩来晤面，并建立了会谈管道，且双方并无战事，情况已经很好了。‘鹰派’说，‘你不能保证将来没有战争，而且只会给毛泽东更多的时间来准备战争。’如果台湾可以提供情报，证明毛泽东在积极准备发动更大的战争（对抗莫斯科），我就可以充分利用。”

“除了提供大陆情况外，台湾应再有一份假设的声明，告诉莫斯科台湾希望他们做什么以便消灭毛泽东。”

魏问：“苏联愿意做到什么程度，以及莫斯科能做些什么？”

路说：“上回在维也纳，苏联已经很确定的承诺，如果国共交战，苏联不会帮中共。这一次，更进一步地说，苏联愿和国民党合作来消灭毛。”

他们约谈了 30 分钟，因来往的人愈来愈多，便决定离开，到美丽的乡间去转了一圈，并且继续会谈。

路易斯在匈牙利租了一辆车，和太太一道开到维也纳来。两人上车后，路问魏：“你们有什么‘弹药’可以给‘鹰派’，好让他们在大会里能提出可信的证据。”

魏说：“这件事一定要在高层会谈中讨论。”

路不同意，说：“高层之间要先有桥，我们就是桥。德国与苏联谈判即像我们这样谈成的。”

魏说：“若干至关紧要的事，只能在高阶层说，例如官方承认或者共同发展西北或东北。”

路说：“这些事不应在现阶段列入谈判，因为它们还太遥远了。目前我方的兴趣是双方应如何在政治上及军事上进行合作，以消灭毛泽东。因为苏联已开始意识到，和毛泽东已毫无希望复合，而且毛之后也不会有亲苏派，因此毛帮非消灭不可。”

魏问：“双方如果合作，莫斯科能做什么事。”

答：“莫斯科当然不会派遣大批军队到大陆和毛作战，不过，苏联可以配合台湾的行动，在你们发动反攻时，先以飞弹摧毁中共的海防基地。很明显的，美国不会帮你们打反攻之战，苏联是唯一‘有兴趣’的强权。美国已与北京会谈，台湾日益丧失外交承认，加拿大和一些欧洲国家也不会站在你们这一边，如果你们不能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反攻，就可能再也没机会消灭毛。”

为了说服“鸽派”

魏回答：“国不在大小，兵不在多寡之论，我们有领袖、有主义，我们有信心，我们不怕，我们会成功。我在和美国人接触中了解，如果中共和苏联发生战争，美国一定是帮助中共的。”

路：“克里姆林宫正在积极准备 3 月的大会，我希望有材料（不需书面），口头即可，愈快愈好，最好在 11 月 15 日至 20 日之间。此外，中共的和平攻势日益加强，苏联很不高兴，但又不好公开说。”

魏说：“我们要消灭毛泽东，目的在解除人民的苦难；防止核子战争爆发，以免上亿无辜中国人丧生，我们反对在中国或任何地方进行核子战争，因此，必须阻止老毛使用核子武器。我们也知道，苏联之所以对我们的反攻有兴趣，是为了它自己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政策和原则，即使初始成功，日后必有无穷麻烦。如一旦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起冲突，苏联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在‘鸽派’、‘鹰派’来看，答案是一致的——就是置身事外。”

路说：“克里姆林宫的领袖知道，国民党和蒋介石要比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好，因此，如果我们能说服他们，毛的接班人不可能对苏联友好，那么‘鸽派’就不会再对他们抱希望……关于国民党和苏联在军事或政治上合作的事，并不一定要进入细节，它可以是很简单的——理论上的，或者是假设性的。”

由于台湾没法提供一个在路易斯活动范围内的联络地点，路易斯只好把他岳母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魏，叫魏把他们下次会面的地点告诉她。

路说：“我会在欧洲游历一阵子，大约到 11 月下旬，等你的电话。北京

会谈很快就会在莫斯科召开，为什么？为了面子。莫斯科新任驻北京大使是个畜牲，所以莫斯科派他赴任。”

路给魏看一份哥本哈根的剪报——“陶普斯号”船员事件（苏联油船船员，在台湾海域被捕）。路说：或许这是他来台北的一个好借口，他要魏替他想办法。他给魏几封信和照片，好让他交给“陶普斯号”船员。

他们谈完后，魏看手表，正好下午6点。

分手时，路约定魏在他的亚士都旅馆309房见面，和他们夫妇共进午餐。

席上路说：“克里姆林宫知道苏联的粮食问题很大，最简易的解决之道，是给人民工作，但这不行，因为如果克里姆林宫这样做，共产主义的根基就没了。”

10月30日，魏景蒙在日记上写了关于“鸽派”和“鹰派”：“柯西金代表鸽派，布里兹涅夫代表鹰派，后者会胜。柯西金那一帮有长期和老毛打交道的经验，但布和国民党并没有很多经历。”10月31日，亚士都旅馆309房。

这是栋老旧的英国旅馆，魏到那里去见路易斯。他太太珍妮佛是个很英国化的精明女子，有3个孩子，都是男的，她还想生个女儿。

他们给魏景蒙看小孩的照片、他们的大房子，还有一间加盖的，充作书房或书室。

他们到餐厅午餐，决定餐后开车到乡下兜风以便谈话。

最后一次谈话

大约两点半吃完，他们沿着17号公路驶往维也纳森林。

下午6时许返回维也纳，第二天，路易斯离此前往苏黎世和罗马。

这段兜风是要做最后一次谈话，看看还有哪颗石头没被翻开。魏先打开话题，这是他昨晚在旅馆就想好的。魏说：

“我们昨天谈的两点，由于时间不够，可能很难做到。不过第一点我们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北京利用和谈暗中积极准备攻打苏联的策略，是众所周知之事。他们‘赤化亚洲’的计划已定，正积极推动。苏联希望我们提供一些情报——不论是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都欢迎。毛打算动用核子武器，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我们如果加以宣扬，对他和对目标都有帮助。

“第二点，关于莫斯科合作支持我们反攻大陆的计划。这一点台北很难准备，这需要召开高层幕僚会议。做这种计划，非我智慧所及。”

路易斯进一步建议，“台湾可说出需要哪些装备，要多少，以及需要何种政治支援（若有必要可分阶段）。”他拟了一个草案，“比方说，台湾可提出，希望在展开登陆前，苏联先以飞弹摧毁台海对岸的海防武器。

“又譬如，台湾可以要求苏联提供轰炸机去摧毁罗布泊等等。让台飞行员使用西伯利亚或其他地方的空军基地。”

他解释：“老美不会帮你们反攻大陆，只想要台湾和老毛保持和平，而苏联却会帮你们光复大陆。这两件事并不冲突，你们可以以概略的方式说。”

魏说：“我们原则同意你们的军事行动。”

路说：“你们能做的，以及你们希望苏联做什么，何时希望苏联协同你们的行动。一旦这些构想被认为可行，我们会‘立刻’与贵方军事将领展开数次会谈。这样做对台湾毫无所失，因为，台湾早已誓言要反攻大陆，而苏

联可以帮助。简言之，我们要利用第一点来说服克里姆林宫领袖，和毛泽东是不可能和平的，中国大陆不会有人对苏联友好。如果这一点获认可，下一步就是要消灭毛泽东。

“这里是我们提出的一个草案，上面列出苏联可以如何合作以共襄盛举。一旦同意了，军事和政治领袖会共同磋商如何采取行动。”

魏说：“容我坦白讲，假使我们成功登陆了，而‘鸽派’却扯后腿，危及我们的计划，怎么办？”

路说：“第一步只是试探动作，这个问题可日后再谈。在社会主义世界，是容不下两个领导人的，一旦两人有冲突，其中之一必不择手段干掉另一个。在这种时候，宁可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合作，也不能容许内部存在一个背叛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台北和莫斯科之间太难联系，随时都可能发生紧急状况，但像现在却要花上一星期或10天才能联络上，实在荒谬。有些国家根本就和台北没有电话联系，有些国家的电话则遭窃听，台湾应该给我方几个人名，好让苏方能安全传递信息。希望在维也纳、罗马、吉隆坡，新加坡或斐济、蒲隆地都能有一个人。”

魏问：“柏林如何？”

路摇头说：“那个间谍窝一点也不好。”

魏给他朱新民的电话，告诉他：“这只是作为紧急联络管道之用，我会在10月31日晚上告诉朱。”

第六节 台湾当局酝酿对策

驻苏“贸易商”来电

1970年11月6日，魏景蒙一回到台北，就收到台湾派往苏联的“贸易商”朱新民的电报：

Party concerned asks your cable stating remittance date sincene
cessary. Journey for establishments registration before Nov12

晚11时30分向蒋经国报告会晤经过。当谈到苏联“陶普斯号”船员之事时，蒋说：“这或许是个好主意。这批船员是1954年7月23日为我海军截获的，共42名。其中大部分已于1955、1957和1958年分3批释放，下次释放“陶普斯号”船员之前，先通知路易斯释放的时间和将去的地点，再通知美国记者。中共释放了美国犯人，我们何不也放人？”

同时，罗启在机场也转来朱新民的电报，内容同上。

11月7日上午8时，魏景蒙陪同蒋经国赴士林官邸，向蒋介石报告，约45分钟。报告内容：

此次在维也纳与路易斯见面，前后两次共8个小时。察其态度堪称积极，惟有时表示作双方之掮客口吻。此次约谈重点为了苏联将于明年3月间召开全代会，对将来中共之政策有所决定，故要求我方及早（勿迟于11月20日）将两项资料口头告路易斯，以便运用：

1. 毛之生前与死后，大陆情形决无任何希望与苏联友好。相反的，毛正利用北平和谈，暗中积极准备大举进攻苏联。

2. 根据以上事实判断，苏联只有倒毛一条路可走。因此，与我合同，可期成功。况美国之态度是不支持台湾反攻，但选择我政府与毛间，美国当愿我政府回主中国。苏联之态度是如果决定倒毛，最合理的途径是与台湾合作。因此必须要了解台湾是否确实有意合作。如有诚意，则需要苏联何种军事援助，及何种配合军事的行动以期成功。

路易斯以为上次接触已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若我有军事行动时，苏联认为是中国国内问题，不予参与。

此次会谈是进一步谈苏联参加合同倒毛行动问题。谨将两次谈话内容记录谨陈察看。

魏景蒙记录如下：

10月24日飞德国京城（英国签证未得到）。26—27日在波昂召英、比、德3处负责人谈话，指示今后国际形势动荡中之中心工作。

10月27日——11月2日在维也纳。

10月28日，电莫斯科，请路易斯改在维也纳同时在旧饭店见面。罗马空气不好，路易斯复电话，10月

30日见面。

10月30日晨，路来电约下午两时在旅社外马路上见面，路易斯开车，并在郊外小吃店边吃边谈。然后在郊外驰车谈话。前后共4小时。

10月31日，又在路之旅馆中与其英国妻子3人共进午餐，然后再驱车郊外，又有4个小时之久，前后共8个小时（并非皆在谈此事）。

所谈内容略之如下：

1. 道歉去年爽约之事，实北京谈判问题。

2. 过去接触得到了一个具体结果：苏不干涉国共内乱。现在是进一步而为合作倒毛了。

3. 明年3月间莫斯科召开人代会，为重要政策之决定，一切政策问题在积极筹备之中。要求我们给他两点参考资料：a、毛共与苏联不共戴天，非打不能倒毛。无亲苏派……中共准备大举攻苏。b、因此之故，台苏之间应可合作倒毛工作。在此点上强调我愿合作倒毛；希望苏方之合作如下：

（譬如，D日登陆，苏方先以火箭摧毁海防武器。利用苏联基地消灭罗布泊及其他重要设施等等。并说明合作及配合得好，大约若干时间前消灭之。不必细数，可分几个时期。

蒋介石关心苏方诚意

蒋介石看完记录后问：“对方的态度，是否诚恳？”

魏答：“是。但有时候摆出做掮客的样子。”

蒋介石又转问蒋经国有关“陶普斯”号与船员的事。蒋经国回答：“美国曾提到此事，并说是受红十字会之请。他们不愿碰这件事，希望我们直接与红十字会打交道。”蒋介石又问：“我们有没有和朱新民通密码？”

魏：“是经过外交部。”

蒋介石：“要早一点做好决定。今晚完成书面报告。”魏于当晚做好报告，8日上午9时到七海山庄呈交蒋经国。11月9日，蒋经国指示：

1. 如果朋友要钱，告诉他没问题。10日发电朱新民，请他转告路易斯，汇款不久就到。

2. 13日由罗启从曼谷打电报给伦敦路易斯的岳母，请她转告路易斯，电文为：

1970年11月13日亲爱的史泰敦夫人：

请在您方便时，将下列讯息转达令郎路易斯，本人将不胜感激：

“公司已原则同意。

—俟我方研究细节后，即会做决定。”

TANALIN 敬启

由于路易斯要在欧洲停留到11月中旬以等待台方的回音，所以给了魏景蒙他岳母之外另一个在布鲁塞尔的紧急联络人地址和电话：

MR. EUGENESTANOGLOV20, SQUAU DES SOLBOSCH BRUSSELLES 电话：493473
在这个联络点，魏与路取得了联系，路告诉魏：“我的妻子珍妮佛将马上回莫斯科。陶普斯号船员的事，让老美介入使他们获释，是很愚蠢的，何不让我来做这件事的宣传工作，至于我该怎么做，悉听台湾的指示，这样做，可使我在苏联人眼中有面子，也可给我借口能够公开到台北去。另外，我受够了台湾大使馆不友好的方式，每当有急事想联络大使馆时，总是受到刁难。

有关过境签证，希望能在 11 月 10 日到 20 日之间交给我。问候蒋经国和其他人好。”

11 月 16 日，蒋经国告诉魏：“总统明天要见你。”17 日，蒋介石再次召见魏景蒙，至于台湾究应透过打电话给路易斯的岳母，答复他“我们对两点都同意”，还是应由魏亲自再跑一趟，当面告诉路台湾对两点的答复，蒋介石也难以作决。

第七节 蒋介石再叹“反攻”无望

蒋介石后悔不敢建立内线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时年65岁。蛰居台湾而梦想“反攻大陆”的蒋介石，此时已年届84岁。得知林彪折戟沉沙，禁不住老泪纵横。蒋介石之所以悲枪泪涌，并非留恋自己与林彪的师生之情，而是另有隐衷——正当林彪在“文革”中出尽风头，大红大紫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一次中常委会议上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会后，蒋介石的秘书陶希圣（陶系黄冈人，与林彪是小同乡）问及此事，蒋说：“你查一查1945年的档案就知道了。”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林彪曾受命前往重庆，面见蒋介石，为毛泽东主席与蒋的谈判打前站。林彪见了蒋，显得毕恭毕敬，一口一声地称“校长”。蒋说：“你们共产党还让这样称呼吗？”林彪谨慎地答道：“我尽管在共产党内，将来校长一定晓得我能为国家做什么事。”当着蒋介石的面，林彪不敢长谈，他表示有一些“意见”想通过蒋的心腹详谈，然后转达给蒋。蒋即传唤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郑也是黄埔生），当着郑的面说：“林彪同学有些事情要与你充分交换意见。”郑介民即与林彪在嘉陵江畔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作了几个小时的长谈。随后，郑介民向蒋递交了一份很长的报告。60年代陶希圣查阅过的这份郑介民所写的长报告，至今仍保存在台湾阳明书屋（该书屋专门保藏蒋生前的档案文献资料）。

60年代蒋介石断言林彪不会忠于毛泽东，是基于抗战时林彪在他面前的直言不讳，而且蒋手里也确实掌握了一份有关林彪所述意见的长篇报告。林彪死后，蒋介石很难过，几次对秘书陶希圣提起“可惜当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这条内线”。

此后，国际上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蒋介石再次感到“反攻”大陆实在是遥不可及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

1971年10月25日晚，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罗马尼亚驻加拿大使馆官邸灯火通明，觥筹交错。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正在这里作客。

晚餐过后，好客的主人留下中国客人边喝咖啡边聊天。此刻正在进行的联合国大会自然成为宾主讨论的中心话题，他们就大会能否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的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提案各抒己见。

突然，主人16岁的女儿从二楼匆匆而下，大声喊着：“通过啦！中国的席位得了三分之二还多的票数！”

主人急忙请黄华一行到二楼收看电视。大家迫不及待地来到电视机前，只见荧屏上正播放联大大会厅的场景：大厅里灯火辉煌，会场情绪沸腾，大多数代表激动地站了起来，对刚被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2758（26）号决议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喊：“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他们互相祝贺、握手、拥抱，来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一些代表甚至高兴地舞蹈起来……

随着镜头的转动，荧屏上出现了另一种场面：蒋台代表垂头丧气，结结巴巴用英语争辩了几句后，狼狈而去……

看到这里，黄华大使内心激动不已。中国多年来奋斗的外交目标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客人们在接受了主人的祝贺后连忙赶回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大家又围在一起收看电视台重播的这一震动全世界的新闻。在距离伟大祖国万里之遥的使馆，这一夜成了大家难忘的时光。

美国总统尼克松今天极为颓丧、恼怒。联大表决的时候，尼克松坐在白宫书房的沙发上看电视。他神情专注地直盯着电视机，有个不知趣的工作人员要进来请示工作被他挥手示意赶了出去。电视机播出联合国宽敞的、蓝色和金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大厅里气氛紧张，十分安静。当电动记数牌上的灯光表明美国的提案被击败，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获得通过时，尼克松气得脑门筋都鼓了起来，下颏扭得更歪。他粗暴地敲了一下沙发扶手，跳起来，跑过去，将电视机关了。刚才被赶出去的那人走了进来。尼克松十分恼火地对他吼道：“太不像话！太失礼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在一个国际讲坛上的表现如此恶劣，它可能非常严重地损害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

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端，中国首都北京。

新华社的编辑们认真地收看着一条条外电，跟踪着联大会议的情况。大家在紧张、期待中度过了分分秒秒。奇迹出现了，北京时间上午时分，世界各大通讯社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出快讯：联合国 1971 年 10 月 25 日夜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 23 国提案，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视作真正代表人民的新生力量正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了……

编辑部沸腾了：人们忘了一夜的劳顿，迅速地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译成中文，通过电波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事隔多年，一位当时的值班编辑谈起此事时，他无不幸福地说：“读着那些消息，我心情不知有多么激动，多么兴奋。”

是啊，做为一个中国人，做为一名知识分子，做为一名首先获悉这一令炎黄子孙自豪的消息，他怎么能不为之兴奋和欢呼呢！

众所周知，中国原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后，新生的、真正代表亿万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要取代蒋介石集团窃取的联合国席位，但是，由于美国等一些国家从中阻挠，使蒋台政权代表仍然霸占联大的席位，人民共和国为了赢得国际的支持，为了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在世界大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作出了外交上的积极努力。

从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 1971 年获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整整 22 个寒来春往，新中国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崎岖的外交历程，一段令人回味无穷的风景线。

周恩来和基辛格开了一个玩笑

“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周恩来的脸上充盈着笑，当他把第二次访华的基辛格一行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用英语向他告别。

被被誉为世界超级谈判大师的基辛格对于周恩来的谈判方式感到震惊，

也十分钦佩。他曾代表美国经历了多次谈判，其中包括苏联人、越南人，但没有碰到过眼前这样的对手。周恩来在确定一种合理解决问题的观点后，一步就跨到那里，然后坚持立场不变。这样做，一开始就接触问题实质，显出了谈判者的真诚。基辛格在日后写的回忆录中透露：

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有人把这种办法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无可改变的立场；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这一天4点多钟，天还没全亮，中美双方又继续在钓鱼台里讨论公报，修饰文字了。这就是以后震惊世界的上海公报。双方在基辛格上机之前又对文本进行讨论。将近9点钟的时候，秘书将刚刚得到的联大通过恢复中国席位的消息，悄悄地告诉了周恩来。

如果说周恩来用英语向基辛格告别是一种喜悦的流露，那么乔冠华与基辛格的这段对话就可具玩味了。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么？”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内，乔冠华问，“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一笑，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笑声十分豪爽：“我看不见得吧？”

就在刚才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瞅空低声告诉乔冠华，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周总理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没有将这个�息告诉他。

机场上，我方人员在叶剑英的带领下给基辛格送行，他们从眉宇、神态都露出了异样的喜悦。自信的客人还以为中国人今天特别高兴是因为公报文本的构架已经基本上定了下来，大概中国人因为公报基本上采用了中国提出的方案才显得特别高兴吧！基辛格的飞机启动了，很快驶向跑道。望着腾空而起的飞机，叶剑英抑制不住兴奋说开了：“基辛格上飞机得知了联大的消息，不知道他作何感想？！”

果不其然，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就给他送来了电讯稿。基辛格一看，大为惊讶，将电讯稿递给助手们传看。

电讯稿上打着：

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基辛格双手捧着头，好一会才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

足。”

基辛格说罢，苦笑了一下。

洛德望着舷窗外的云海，慨叹着：“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基辛格想不到他担心的事到来得这么快！他的心茫然地往下坠着，显得格外沉重。刚才离开钓鱼台时的欣喜心情已消失殆尽，变得有点苦涩。阿尔巴尼亚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提倡的双重代表权和把安理会席位给北京的提案，已经没有得到表决的机会。美国从来没有这么惨重地失败过。这要怪谁呢？一批和美国友好的国家一方面不愿同美国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他们有利。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惩罚。现在我们自己要跟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美国的惩罚了。基辛格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在思索着。

电讯员又送来电讯稿，白宫要他在回国途中在阿拉斯加停留，以免在联合国表决的这一天回到华盛顿。基辛格立刻就品味出这份电讯的含义：实际上是说他的北京之行要对美国在联大的失败负责。他回想起上个月即将公布第二次北京之行前夕，罗杰斯和他的争论。毫无疑问，他判断得出，这一定是罗杰斯施加了压力，白宫才叫他在阿拉斯加停留的。

停就停吧。秋末的阿拉斯加已经十分寒冷。基辛格及其助手们心情都十分颓丧。一个个都沉默着。

基辛格一行从阿拉斯加飞回华盛顿，降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天低云暗，机场上冷冷清清，没有记者，没有摄影师，只有个别工作人员来迎接。跟三个多月之前，基辛格第一次赴北京归来相比，那次总统亲自热烈地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机场迎接；这次就显得太冷落了。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抵达以后，这一行人本来还怀有几分英雄载誉归来的情绪，一下飞机，就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冷风刮走了。基辛格还联想到，“七·一五”公告以后，自己名声大震，声望日高，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总统对此显示出不安，有一家报纸还瞎凑热闹，说基辛格的名望已经超过了总统，这无异于给本来已经不安与恼火的总统火上加油。

走下舷梯后，扑面的冷风使洛德伸手把外衣的领口紧了紧。霍尔德里奇则脸色阴沉地对基辛格说：“看来，他们将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的失败归罪于我们去北京的访问。”

基辛格嘴角泛出一丝苦涩的笑。他继而又想，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这到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决定，只不过比预料来得早一些罢了。中国的哲学中就说过有所得必有所失的哲理，打开了神秘的中国之门已经是难能可贵的成功了。他想，尽管尼克松可能脾气乖戾、气量狭小，他也不致于拿即将到手的胜利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来冒风险的。

组团去纽约

这次联大表决结果，也是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之外。他们也估计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所以还没有一点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0月24日，基辛格在会谈中间及周恩来对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观点时，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

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有的是耐心，还可以继续等待。”

送走了基辛格，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 26 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 3 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影还笼罩在中国土地上。那时，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织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我们也很高兴，并说早就应该恢复我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但是，中国决定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那时，外交部国际司由最冷清的司在一夜之间变得特别重要了。

“乔老爷”就是乔冠华。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梁带领一支由 5 人组成的先遣队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就，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特别感到扬眉吐气，为之振奋。他在 1951 年，曾经跟伍修权一块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当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 20 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分去对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乔冠华离京前夕，当时还在患病的陈毅设家宴为他饯行，驻法国大使黄镇也来作陪、祝贺。陈老总为乔冠华饯行，表示他对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的热烈祝贺和由衷的高兴。陈老总和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几年患难与共，使他俩感情笃深。

开始“文革”动乱的时候，造反派高喊“打倒陈、姬、乔”。到 1971 年的时候，姬鹏飞、乔冠华已经恢复了工作。陈毅受到林彪的迫害，处境还十分艰难。但是陈老总尽管身处逆境，仍然关注国际形势的新动向与中国的外交工作。林彪曾经一度剥夺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及新华社《参考资料》（即“大内参”）的权利，也阻挡不住陈老总对党、国家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

1969年在老师讨论国际形势的座谈会上，陈老总顶着“左”的压力，不顾个人安危，向中央提出过打开中美关系的提议。在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毛泽东听有人说还不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指示要让陈老总看文件。当时，外交部大楼里盛传陈老总即将重新恢复外交部的工作，这反映大家的心情：盼望陈老总能在我们外交有新起步的时候回来主持工作。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患肠癌的陈毅与患肺结核的乔冠华都住在301医院治疗。他俩在医院里推心置腹，不仅畅谈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也谈论了许多关于林彪的话，那时，林彪还在台上。9月初，乔冠华病愈出院。“九·一三”那天，周恩来将乔冠华与《人民日报》社崔奇找去准备写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声明。乔冠华首先想到了被林彪迫害得最苦的陈毅，他特地到301医院，面露喜色地悄声告诉陈毅：“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么？我今天特地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明说。先让你高兴高兴！”

陈毅盯着乔冠华。从乔冠华脸上流露出的从来未有过的喜悦神态，陈老总猜出了五、六成，惊喜地问：“真的么？”

乔冠华只是笑着说：“我只能让你高兴，我还不能回答。”

陈毅受到乔冠华情绪的影响，也笑得很开心。

过了几天，中央将“九·一三”事件正式通知了陈毅。乔冠华又特地赶到医院，将那首改唐人诗的新“塞上曲”“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吟给陈老总听。陈老总听罢，连声叹绝，两人相对放声大笑。以致使不知内幕的值班护士感到惑然。

在陈毅的家宴上，张茜为即将飞赴纽约的乔冠华开了茅台，当时已遭癌细胞深深地侵蚀肌体的陈毅遵医嘱不能饮酒，为了庆贺进入联大与林彪倒台两大胜利，陈毅还是和乔冠华频频干杯。

中国代表团走进沸腾的联合国会场

11月11日中午中国代表团一行50多人在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的率领下，乘飞机到达纽约。这是众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美国友人、爱国华侨翘盼已久的一天。机场上早就等待着欢迎的人群，其中有23个提案国和所有友好国家的代表，有联合国秘书处的官员和纽约市长的代表，有华侨、华人代表，还有400多名驻纽约的各国记者，他们聚集在专门架设的台架上，摄影机不停地在响着，照着。

下飞机后，代表团正、副团长向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团长乔冠华在机场发表了讲话。他谈到：我国代表团将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他也向美国人民表示了良好的祝愿。他说，“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市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他的讲话虽简短，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鼓掌和极好的反响。人们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代表团的“积极态度”、“温和调子”，认为中国人“和蔼可亲”。

在代表团从机场到旅馆的途中，有大批记者和群众尾随，也有人驾车跑在前面向代表团欢迎招手。在旅馆，华侨各界送来的大批花篮已摆满走廊。代表团将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交给旅馆经理，请他挂在旅馆大门口。马

路对面马上挤满了观看五星红旗升起的人群。

代表团听说，在更早些时候，也就是当天清晨，就有几百名爱国华侨、华人举着毛泽东主席的像和五星红旗，打着写有“热烈欢迎我们祖国的代表”的横幅标语，聚集到机场欢迎代表团。他们不光来自纽约，有的是特地从其他城市赶来的；其中有老人，也有儿童，也有一些美国友好人士的代表。美方出动 100 多名警察，借口“安全问题”不让他们同代表团接近。先遣小组知道这情况后，即刻来到机场警察指挥处，强烈反对他们的这种措施。经过交涉，才做出了妥当的安排：中国代表团离开机场时在华侨的队伍面前经过。这样，既适当满足了华侨渴望想见祖国亲人的心情，也让代表团有机会向侨胞们招手致谢。

代表团到达后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正、副团长拜会了正在医院养病的秘书长吴丹，向他递交了出席联大的代表证书；拜会了本届联大主席、印尼代表马利克，以及 23 个提案国的许多代表。乔冠华对马利克坦率地表示，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当前的情况还不十分熟悉，因此还不能立即像大家所期望的那样积极活动。这种审慎立场和谦虚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1 年 11 月 15 日，是联合国历史上又一个大有意义的日子。

上午 10 时，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热烈欢迎的气氛顿时弥漫整个会场，形成本届大会的又一高潮。许多代表拥上前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代表握手，并且纷纷报名要求在会上致欢迎词。由于发言者十分踊跃，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原定半天就结束的大会，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下去，一直开到傍晚 6 时 40 分，先后历时 6 小时，破当年联合国大会的纪录。

当天，致欢迎词的共有 57 个国家的代表。有的代表由于时间不允许，还做了书面发言。他们的发言都热情洋溢，气势宏大，深为感人。他们用美好的语言盛赞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指出多年来把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和从百年屈辱中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最不公正的行为。他们说，现在联合国终于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正义的立场终于胜利。一、两个国家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各国的霸道行为，终究是行不通的。他们强调，中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使联合国遵循的普遍性原则得到体现，使联合国宪章得以维护，使这个组织“恢复了活力”，“恢复了威信”，增加了它“缔造和平的力量”，也使大家增强了信心。

会上，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还就美国报刊指责他们 10 月 25 日在会场内外快乐欢笑和舞蹈进行了理直气壮的反驳。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指出：这些都是非洲国家以“恰当的方法自发地表示出他们的满意心情”，谁也无权限制；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主权国家，“我们绝不会为我们的快活表示什么歉意，因为这是一个早就该取得的胜利，这是联合国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他们的发言向世界宣告，中小国家也在联合国讲坛上敢于扬眉吐气了。

乔冠华团长登上讲台。他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他再次宣布中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奋斗，他讲话后，会场上掌声经久不息。许多国家的代表再次来到中国代表团座席前，亲切握手祝贺。这篇讲话，被共同社记者认为是“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其反响波及全世界。

布什代表美国欢迎中国

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已成定局，且是大势所趋，加上中美关系此时开始解冻，尼克松也即将访华，于是，美国人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必须和中国代表接触。

但是，这第一次接触怎样开头呢？

在中国代表团出席大会的前一天晚上，联合国礼宾司司长科尔莱向中国代表团透露，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上届美国总统）很愿同乔冠华团长在会前先见一面。科尔莱同时具体安排了中国代表团第二天早晨进入大会会议厅的路线。中国代表团很快发觉了其中有文章。当11月15日上午中国代表在科尔莱陪同下按既定路线走向大会会议厅时，布什果然也在会议厅门外的走廊上与人“随意聊天”。科尔莱随即将布什介绍给乔冠华。两国代表握了手。这件经过巧妙安排的会见立即在会场内外传为趣闻。就在这次大会上，布什以东道国身份发表了简短讲话，欢迎中国代表。他说，中国代表来到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包括美国在内，大家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历史时刻来到了”。

一星期后的11月23日，当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黄华第一次出席安理会会议时，又出现了同联合国大会上同样的极为热烈的欢迎场面。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致欢迎词，热切期望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加发挥她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经过22年崎岖的外交历程，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终于被恢复和承认，新中国从北京走向纽约，走向世界，以其固有的丰采展现在国际舞台上。

第八节 “老朋友”的保证

周书楷发出“警讯”

在微妙的中美外交“小步舞”刚起步的时候，台湾就十分敏感地察觉到此事对自己的不妙。但真正准确判断出美国在旋转中要与自己拉开距离，是尼克松下令第7舰队停止巡逻台湾海峡，他的借口是美国经济困难。这对台湾当局来说等于是一个晴天霹雳。1970年7月15日，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得悉这条消息后，震惊得几分钟内说不出话来。后来他说：“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他受台湾当局命令，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强烈抗议”。翌日上午，台湾“外交次长”杨西昆匆忙约见美国“大使”马康卫，指责尼克松的举动是“最不友好的行为”。但尼克松并不为之所动摇。

基辛格访华，使台湾当局倍感自己已面临冒险或毁灭情势，唯有以冒险以求生存，决不可坐待毁灭。当务之急，是阻止尼克松访华。于是，“外交部长”周书楷公开叫嚷：“如果魔鬼能救我的国家，我也会与魔鬼握手。”联苏举措，呼之欲出。

对台湾当局发出的这种警讯，华盛顿当权者当然不能等闲视之，台湾毕竟是美国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政府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台湾当局进行安抚。1971年8月1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艾伯特赴中国台北，转告尼克松关于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的保证。10月，尼克松又派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作为私人代表再赴中国台北，向蒋介石转交美国总统信件，重申美国“完全恪守”同台湾当局缔结的条约。特别是1972年1月，美国国务院公开宣称美、台“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无限有效”。这是给台湾当局吃了定心丸。

1972年2月16日，基辛格在尼克松启程访华前约见沈剑虹谈话，基辛格说：“希望台湾不要对尼克松访问发表任何官方评论，华盛顿和台北不要恶言相向，台、美之间关系不会因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而有所改变。”

尼克松率先与周恩来握手

2月21日，北京的气候同美国一样阴冷。当尼克松乘坐的“76精神号”专机飞越太平洋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上空时，正巧太阳冲出了厚积的云层照射到大地上。尼克松从舷窗向外眺望，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他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上午11时10分，尼克松总统的副机到京，美国人做事相当认真，1月3日，总统国家安全副助理黑格就带了一个庞大的先遣技术小组到北京。他们在首都机场建立起一个电视转播台，并进行其它准备工作。先遣组为总统座机确定将要滑行的路线、停放的位置。机门朝哪个方向打开？总统从哪个点下飞机？舷梯放在哪个角度？这一切，都用皮尺量好，然后划上标志，固定下来。就连飞机的前轮将停在哪儿块地板上，主轮压在哪个点上，都测量后做上记号。

间隔20分钟以后，总统专机平稳地停定在候机楼前。舱门开了，穿大衣的尼克松与其穿红大衣的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出乎这位美国总统的意料，机场的欢迎是冷调子的，没有欢呼雀跃的群众，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

地毯，没有礼炮。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机场上空飘扬。

由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只能以符合这种情况的礼遇接待这位第一次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紧随他身后的是李先念、叶剑英等领导人和包括各界的代表百余人，没有外国驻华使节。

当尼克松下到舷梯快一半时，周恩来带头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当尼克松走完梯级，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便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俩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

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尼克松日后回忆：“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待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圆满结束，随着通讯卫星向全世界实况播出，这时，罗杰斯、基辛格、霍尔德曼等代表团成员，才获准涌出机舱，走下舷梯。

原来，特另重视电视的神奇作用的尼克松已经下令对电视转播作了精心的计划安排。中美两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在时差上，中国的北京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13个小时。中国每天上午的活动可以在晚上电视的黄金时间传到美国，晚上的活动又可以在早晨的电视上作实况转播。因而，尼克松特意安排他到达北京的时间是21日上午11点30分，也即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10点30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

为了突出美国总统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镜头，尼克松和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摄像机拍摄尼克松走下舷梯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与握手时，镜头里美方应该只有总统单独一个人。他要纠正传闻中1954年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此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就连罗杰斯和基辛格这样的人物，也被告知要留在飞机上，直到总统与周恩来握手结束。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还特别委派一名强壮高大的副官待总统一走出机舱就挡住飞机的通道。于是，当尼克松走下舷梯时，身后不再有人跟随出来，不像往常国家首脑来访时常见的，代表团成员及随员们会尾随着元首沿舷梯鱼贯而下。长长的舷梯只有尼克松与夫人两人迈步走下来，仿佛偌大的“76精神号”专机只载着他们俩人。

尼克松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恩来的左边，这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仪仗队。仪仗队的士兵一个个身材高大健壮，衣着笔挺，精神抖擞。周恩来和尼克松在长长的威武的队列间踏着节奏鲜明的步伐走过时，每个士兵都神态昂扬地微微转动着头，行着注目礼，使人觉得庄严、肃穆、兴奋。

周恩来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红旗高级轿车进城。当车队驶至长安大街时，尼克松心里还满以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举行。尼克松在白宫作访华准备时，观看过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向毛泽东欢呼的纪录片镜头，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在飞机上曾经想过，要是他受到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欢迎，那么，盛况将不亚于他在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受到

的接待。可是，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广阔的广场空无一人，据说许多行人被挡在横街小巷里。尼克松的希望落了空。他的心情有点黯然。他注意到连大街也是空的。

这时，周恩来一一将天安门广场的主要建筑指给尼克松看：“这是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在这里会见群众。那是人民大会堂，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

尼克松“哦、哦”应着，看着窗外。他是觉得有点冷淡；但是，外表没有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感觉。

尼克松住入 18 号楼

汽车很快驰入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在尼克松与基辛格及白宫来的工作人员下榻的 18 号楼等候。18 号楼被人戏称为“元首楼”。它是一座二层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建筑物，建筑面积约 4000 平方米，楼身洁白，飞檐绿瓦，门前悬挂着盏盏大红纱灯，有一种非凡的气派。

元首楼一楼有一处 328 平方米、布置精美的室内花园，厅内铺着绒毯般的塑料草坪。花园的东南、西北角分布着造型优美又形态各异的山石和水池，水池中喷泉飞花，金鱼攒动。池边围种着四季花木有山茶、棕竹、散尾葵、兰草、杜鹃、梅花、玉兰、芭蕉等。由于这里无论是那个季节都显得妩媚可爱，生气勃勃，所以被称为“四季厅”。

步入宾馆后，大家在会客厅摆成大圆圈的沙发上就坐，周恩来在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官员的陪同下，一一招呼了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他在寒暄中还经常开几个玩笑，显出自信与轻松。让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了周恩来的风度。

午宴结束后，尼克松一行人各自回住房去盥洗。

罗杰斯和国务院的人员住在不远处的一幢稍小的 6 号楼，基辛格前两次来访时在这幢楼里住过。

从住处的安排上能体察出周恩来很熟悉美国的国情，知道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

刚一会儿，周恩来来找基辛格。他俩在会客室刚见面，周恩来不像往常一样先开开玩笑，直接说：“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

尽管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这是有所准备的；基辛格却没有料到安排得那么快，他内心还是很高兴，却控制住没有明显流露出来。他想到周恩来没有提到请罗杰斯国务卿一块去，他也不打算问，他想到的是自己能干的助手洛德，便问：“我能否带助手洛德去作记录？”

周恩来点头同意了，语气有点急：“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

基辛格知道毛泽东和他所蔑视的历代皇帝一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据说，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他的召见都是突如其来的。因而，基辛格马上去请尼克松。那里，尼克松正想洗一个淋浴，饶有兴趣地欣赏着卫生间。他听说当年赫鲁晓夫做为第一名客人住进了总统套间时，曾抱怨卫生间的浴池太小了，难以容下他自由的想象。细心的周恩来知道之后，马上请人重新设计，着实改造了一番，才成今天这种样式。

毛泽东驾驭整个会晤

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是毛泽东主席作出的。他对尼克松的来访很重视。尼克松刚吃完午饭，毛泽东就决定会见尼克松。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游泳池”。

14时40分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泽东的书房。

基辛格后来对毛泽东的书房作了如下的描述：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

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他虽然大病初愈，但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但他并不避讳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他患了支气管炎与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摆着大痰盂。他的病是他长期大量吸烟所致。他曾经遵医嘱努力戒烟，但是戒不掉。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两人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20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回来呢？

毛泽东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护士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的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

“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麼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当尼克松在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时，毛泽东又摆了摆手，指着周恩来说道：

“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

哲学问题。”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毛泽东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尼克松表示，他这次来访是冒很大的风险的，作出这次决定实属不易，他懂得“只争朝夕”。毛泽东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然后握手告别。

半个多月以后，当基辛格在白宫他那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琢磨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纪录时，他发现毛泽东谈话中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他注意到，公报里的每一个段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话。怪不得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的谈判中，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总理，都反复地引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主要内容。

在毛泽东会晤尼克松后的几小时之内，中国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视。这种作法表明，毛泽东本人很快赞扬了尼克松的访问。

周恩来的即席表演

2月21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宾主云集。尼克松及夫人、基辛格等由周恩来陪同坐在可以容纳20人的主宾席的大圆桌旁。

在中国人的宴会上，无休止的祝酒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招待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贵宾用的茅台酒据说已贮存30年以上。当服务员将那古雅的小口白陶瓷酒罐打开，一股特殊的芳香悠悠溢出，沁向四周。

“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周恩来举起面前的一个小酒杯向尼克松介绍。当时的国宴，每个客人面前至少摆上大、中、小三个酒杯，每个酒杯都斟得满满的，其中必有国酒“茅台”，其余的是各种名牌葡萄酒，另外还要上桔子水、矿泉水。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多了，饭后想吸一支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讲到这里，不等翻译译出，自己先笑了。

周恩来也开怀大笑。他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认真点燃自己杯中的茅台酒，用愉快的声音说：“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蔚蓝色的火苗闪烁着，周恩来的目光也在闪烁。酒杯里的火苗越燃越小，终于渐渐燃尽。周恩来的目光也出现了瞬间的迷茫，一副怅然若失的淡淡的伤怀鲜明地浮现在脸上，却稍瞬即隐地逝去，眼睛重新一亮，显示出内心的火焰还不曾熄，他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望了尼克松一眼，含义无穷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的表演将尼克松总统迷住了。尼克松回到华盛顿以后，曾得意地向他的女儿特里西娅表演茅台酒的利害，当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点着了

火。岂知蓝色的火焰跳跃着，竟不熄灭，他大为骇然；碗炸开了，吐着火苗的茅台酒流满了桌面。基辛格曾经幽默地提到此事，“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奋勇协力，慌忙救火，才把火扑灭，防止了一场国家的悲剧。否则的话，尼克松政府会自作自受地提前收场，比实际发生的会更早些。”

做完茅台酒的表演后，周恩来端起了服务员新换上的酒杯，茅台酒早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已扬名四海了，但是，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的晚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

上，电视摄像机拍下了周恩来与尼克松满脸喜悦地用茅台干杯的镜头，并向全世界播送，更使茅台酒伴随着这个历史性的“干杯”而名震世界。尼克松对于这种干杯的动作不是十分熟练，在举着酒杯与周恩来碰杯的一刹那，举杯的那只胳膊还要往上一耸。

宴会中，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尼克松他使用筷子的熟练技巧。

周恩来对尼克松夫人帕特称赞：“总统和你都能熟练地用筷子。”

帕特笑着说：“为了来中国，我们在白宫都学着用筷子呐。”

据说，早在半年前，尼克松就把他餐桌上的刀子、叉子换成了中国的筷子。

双方祝酒后，周恩来举着杯到每一宴席去绕圈子，向美国官方代表人员逐一敬酒。清脆的碰杯声在餐厅里响个不停，像轻风吹拂下的巨大的枝形吊灯上的那些流苏和水晶坠儿的叮咚之声一般悦耳。

可是，只要有人稍一留意便会发现，周恩来祝酒时，说着“干杯”，却一次也不像过去那样痛快豪爽地喝干杯中酒。他只是“舔酒”，用嘴唇轻轻沾一下杯沿，然后礼貌热情地向对方致意，用一个微笑和注目的眼光替代了干杯的动作。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时，酒杯仍然是满的。

尼克松一次又一次朝周恩来的酒杯投去目光，终于问了一句：“我听说您的酒量很大？”

周恩来笑了笑，带着回忆的神情：“过去能喝。红军长征时，我曾经一次喝过25杯茅台。”周恩来把酒杯捏在手指间，注目着转动酒杯，“比这个杯子大。”

尼克松吃了一惊，继而疑惑地问：“可是今天你没喝？”

周恩来点头：“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两杯，最多三杯。”

尼克松说：“我在书里曾经读过这样一段故事，说红军长征途中攻占生产茅台酒的茅台镇，把镇里的酒全都喝光了。”

周恩来眨动双眼，目光里流露出对往昔的眷恋，说：“长征路上，茅台酒是被我们看作包治百病的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

“让我们用这个‘万应良药’干杯。”尼克松举杯。

周恩来举杯。这一次他干了杯，因为客人先干了杯。

席间，指着摆放在桌上的熊猫牌香烟盒对帕特说：“我想送给你这个。”

帕特大为吃惊：“你说……烟么？”

周恩来笑了，向帕特解释说：

“不，不是烟，我说的是熊猫。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

“哦！”帕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特，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这个镜头通过通讯卫星传到美国，正好是在早晨的新闻节目中播出。这

天，在美国的街头，家庭里，办公楼内，企业里，人们都在议论着周恩来送熊猫。《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华盛顿邮报》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后来，尼克松也决定送两只北部寒冷地区生长的麝香牛给中国。

第九节 艰难的“基乔会谈”

台湾问题最为棘手

基辛格这次随尼克松访华，没有参加任何参观游览活动。他在上两次访华时已经看过这些名胜了。他曾风趣地开玩笑说，他是被细心的中国人用作试验的豚鼠，来试验时间安排和保卫措施，并看看这些外行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古迹面前作一些什么反应。这些时间，他主要是同乔冠华一块，躲在钓鱼台的宾馆里，逐字逐句地研究公报。

尼克松访华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罗杰斯国务卿和姬鹏飞外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第三个层次是基辛格与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起草公报的会谈。这第三个层次的会谈是最为艰难的。

而台湾问题又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词大部分在十 10 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辞，分歧还是巨大的，针锋相对的。分歧虽然很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基调却是两方同意的，那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开拓。他们两人的会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基乔会谈”。

“基乔会谈”的第一天，2月22日，两人逐行审查公报现存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两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第二天，主要由基辛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第三天，2月24日，基乔之间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争吵激烈；两人都有学者风度，谈判风格又各不相同，基辛格辩辞逻辑性强，富于哲理，一腔带德国口音英语很难翻译；而乔冠华在雄辩之中思路清晰，思辩性强，原则当中豪爽豁达。

乔冠华提出的中国方案，美国观点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基辛格拒绝了 this 方案，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缓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的撤军。”乔冠华坚持说。

“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决不会答应的。”基辛格当然也不相让。

每到这个时刻，双方相持不下，都会把扯紧的弦放松，开一两句玩笑来冲淡紧张气氛，用友好的态度把巨大的决心掩盖起来，不致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两人的谈判艺术接近炉火纯青。

这时，乔冠华果然松了弦，说：

“博士，你是出生在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乔冠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四十年代跟美国人打过交道，朝鲜战争

期间也参加过与美国人交锋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他诸熟谈判艺术，善于掌握节奏；该犀利时，锋锐芒利，寸土不让；该徐缓时，和风细雨，开朗豪爽。数月以前，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二十六届联合国代表大会，风度迷人地坐进刚刚恢复的中国席位时，在各国代表的注目下，敞怀朗声大笑，表现了新中国进入国际讲坛的豪情。纽约某大报为此专门写了篇评论。题为《乔的笑》。基辛格与乔冠华在谈判桌上相互交锋论战，也相互洞察了解，两人竟成了好友，经常往来。

会谈取得突破

第四天，2月25日，这天上午尼克松参观故宫，当他看到两千年前死去的一位王爷穿的金缕玉衣时，说：“穿上这玩意儿就不好到处走动了。”当他看到一个皇帝为避免听到谏言而戴的耳塞时，开玩笑他说：“给我搞一副吧。”

这时基乔谈判，两人还是不着急，随随便便漫谈着交换意见，仍是各执己见。好像谈判根本没有最后时限，好像明天不必飞去杭州，后天也无须在上海发表公报。其实，这都是在用共同的办法向对方施加压力。到了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两人再碰头，双方都提出了新方案，作了让步。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全部撤出驻台的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方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提出，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方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以前是两点包括在一个句子里的。

乔冠华表示出了兴趣，提出修改个别词汇。他说，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要用“前提”。他说：“用‘前景’，含义更积极些，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基辛格也同意了，开玩笑说：“我看台湾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

“基乔会谈”在这时已经取得了突破，周恩来进来参加了半小时谈判。尼克松了解到中国人不喜欢搞小动作，喜欢诚挚坦率，他就坦率地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词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两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攻击。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周恩来了解了“基乔会谈”的突破以后，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正的论点。

公报文本最终落实

基乔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后，于10点半再次会晤。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15分钟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措同问题，行文如下——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

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午夜，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尼克松也批准了这一段。

接着，基乔两人继续会晤，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把公报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至深夜两点，也就是第五天的凌晨两点，公报文本落实了，大功终于告成。这几天以来，基辛格、乔冠华几乎没有睡觉。他俩都觉得如释重负，压力一消失，这才突然意识到疲倦、劳累和瞌睡，可是心情格外轻松和愉快。

第五天，2月26日，在飞往杭州以前，尼克松与周恩来在机场审阅了公报。尼克松是乘坐中国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飞往杭州的。总统自己的“波音—707”专机也跟着起飞。在起飞之前，公报的打印工作刚结束。想不到因为公报问题，美国方面又横生波澜，把尼克松都几乎气疯了。

美国方面节外生枝

原来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公报。他们看后，一路上嘀咕这份公报不理想，他们的不满是大有原因的。这次由罗杰斯国务卿带来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是一些职业外交家；在草拟公报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没有参加，对此难免会有看法。此外，没有参加谈判的人不熟悉谈判所经历的艰难，往往在自己的心中设立了一个理想的公报文本，并拿它同手头的打印文本进行对比；那样一来，意见就多了。到达杭州以后，罗杰斯对尼克松说公报不够圆满而交给总统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的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要求进行修改。例如，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说这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另一条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竟达15处之多。

在刘庄宾馆尼克松套房的客厅，尼克松穿着睡衣，走来走去，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要有所作为而采取了对华主动的行动，但那些保守派支持者对访华的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紧张的了。他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所作的让步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通知中国人说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中国人将怎么看待他这个总统。他除了气愤之外，感到特别痛苦的是，要解释这些修改建议的重要

性简直是不可能的。

晚宴开始之前，他把基辛格叫来商量。

基辛格也心情阴郁，坐在沙发上阴沉着脸说话：“罗杰斯他们提出修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推翻了重搞。他们讲你向中国让了步……”

“我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局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们还有没有脸？！”尼克松近乎在吼叫。

“你也知道，全世界都已经等着明天在上海发公报。”基辛格忿忿地说。

“看我不回去把国务院那帮家伙都收拾了！”尼克松火极了，“我哪能带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天呐！”

“总统，要紧的是明天发布公报。”基辛格说。

尼克松沉默了好一会，铁青着脸来回走动。突然，他转身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之后你再找乔谈一谈。”

“真难启齿呵！”基辛格脸有难色，还是应允了。

当晚，杭州宴会的南方菜特别精美，嗜好美食的基辛格却没能好好品味，他在心里嘀咕着宴会之后怎么跟乔冠华谈话。

晚上 10 点 20 分，乔冠华和基辛格举行会晤。乔冠华因为辛苦几天搞完了公报，心情也很好，宴会上喝得很痛快，脸上泛着红光，脸带笑容地坐下来谈话。

基辛格将精心琢磨了好一会的话说了出来：

“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

乔冠华用点挖苦的口气开玩笑说：“博士，这个‘公众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了，动不动都拿出来用。”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作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么？”乔冠华爽脆地说。

“是的。是这个意思。”基辛格坦率地说。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尖锐地回答说：

“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作出了很多让步，听说尼克松总统接受了公报，昨晚，我们政治局已经批准了公报。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 24 小时了，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

“我们总统确有为难的地方，乔先生，”基辛格知道中国人注重实际，他唯一的希望在于坦率，于是，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简述了一番，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乔冠华暂停了晤谈，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

周恩来正在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询问上海方面接待工作的情况。周恩来放下电话后，乔冠华立即作了汇报。

周恩来太累了。尼克松访华期间，最忙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尼克松访华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周恩来亲自掌管，所有的会谈讨论都由他亲自过问，还每天安排随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顶多能够合眼皮休息个把钟头。

听着乔冠华的汇报，他瘦削的脸在柔和的灯光下棱角显得更为分明，只

是眼睛还很灵，很亮。他很不在行地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就摆在烟灰缸沿。

乔冠华汇报完关切地说：“总理，你太困了。”

“你说说你的看法。”周恩来轻轻地将烟喷吐出嘴唇。

“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乔冠华说。

周恩来的眼睛望了一下窗外，西湖岸边的灯光闪烁。今天晚宴之前，给罗杰斯那一班人当翻译的章含之找他作了汇报，说她了解到国务卿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经达成协议的公报大发牢骚，还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要闹一番。周恩来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对美国国情作过研究，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他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见。他还考虑，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罗杰斯，补一下课。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说：

“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我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乔冠华顿时领会了周恩来话的含义，微笑说：

“总理，我明白了。”

周恩来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他们根据毛泽东所定的原则，对美国国务院专家们所提的意见，进行反复的推敲。直至凌晨二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然而，天亮之后公报的命运又将是如何呢？基、乔两人很是担心。

第十节 蒋介石举棋不定

尼克松乘坐中国专机

尼克松在北京度过5天，经历了紧张的秘密谈判、游览和出席公众活动。第五天，2月26日，按预定日程，到西子湖畔的杭州参观游览。

这次尼克松乘坐的是中国“伊尔—18”型涡轮螺旋桨飞机。

这是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访华所做的特殊安排。就在尼克松为了这次历史性的北京之行，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桌前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北京的毛泽东、周恩来也没有等闲视之。早在1972年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听完各小组汇报准备工作后，专门讲了尼克松访问杭州、上海时要让他坐中国民航的飞机。因为以前尼克松在国外访问，从不乘坐东道国飞机。

“尼克松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就要听我们的安排喽。”周恩来的表情和语气都饱含着民族的尊严和自信。

他给民航下了死命令：“马仁辉同志、张瑞霭同志，这次专机任务可不同往常，你们一定要保证搞好呀！”周恩来十分清楚，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依靠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保障的。“你们从现在起，就要组织执行专机任务的机组试航。另外，除尼克松去杭州、上海的当天要试飞外，头天下午还要先试飞一次，要确保万无一失！”

此外，周恩来又对机务和警卫工作作了具体指示：“要对机务人员讲清楚，专机必须进行全面认真的检查，待试飞后进行铅封。对警卫部队进行教育，告诉他们严加看守飞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以后的几次开会，周恩来对接待工作的细节问题，都作了详细的指示，会上，有人提出：接待方针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不好掌握分寸。周恩来扑哧笑了：

“这有什么难呢？人家伸手，你就伸手过去，不要傲慢，也不要嘻嘻哈哈的嘛。”

运载美国总统的中国专机就要起飞了。机场上好不热闹：民航和空军出动了“伊尔—18”型、“子爵号”和“云雀”直升机3个机种、12架飞机。组织这样一个多机种、大机群的参观访问团，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伊尔—18”总理专机临时定为总统专机。为了保密起见，机号由216改为218。尼克松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坐中客舱。

总统自己的“76精神号”专机也跟着起飞。

周恩来巧喻“13”

由周恩来专机机长张瑞霭驾驶的“伊尔—18”型飞机，26日从北京到杭州。27日从杭州到上海。

当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时，尼克松翘着拇指对周恩来说：“飞得很好。”

周恩来面带自信地微笑，不卑不亢地回答：“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

基辛格接过话头：“总统还是第一次乘外国飞机。因为中国最安全。”基辛格说话的神色，无不自豪，因为这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中方当初做出这项安排时，美方曾有异议，基辛格深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积极斡旋，说服美国方面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上海是尼克松访华的最后一站。

尼克松总统一行下榻于著名的锦江饭店里。在上海这幢最现代化的宾馆楼里，尼克松夫妇被安排住在 15 层，基辛格住在 14 层，罗杰斯、格林和其他国务院官员住在 13 层。

2 月 27 日，到达上海不久，周恩来总理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国务卿及其助手们。他走进大厅，走进电梯。电梯迅疾往上升。头顶的电梯标志牌上，“13”处亮着红灯。

周恩来望着标志灯，恍然大悟似地说：“怎么能安排他们住第 13 层？13 呀！西方人最忌讳 13……”

标志灯熄灭了，电梯门开了。

周恩来带着翻译走进罗杰斯的套间，听见谈“13”的声音戛然而止。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正在房间里说话，大约是在发牢骚生气，一个个面有愠色。见周总理来了，罗杰斯朝他们示意，他们一个个只好客气地装出笑，极不自然。

周恩来伸出手，说：“罗杰斯先生，你好！”

“总理先生，你好。”罗杰斯跟周总理握手。

周恩来逐一地与国务院的官员握手之后，在罗杰斯身旁的沙发上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说：“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委托，来看望你和各位先生。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这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

周恩来的话缓和了室内的紧张气氛。

“总理先生也是很英明的。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的招，太漂亮了！一下子就将两国疏远的距离拉近了。”罗杰斯笑着说。

“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忌讳。”周恩来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13’就像中国的‘鬼’。”

众人哈哈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

周恩来走后，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的气也消了大半。中国有句俗话，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主要是对基辛格有意见，对尼克松的某些做法有意见。如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来看望，他们不但不便发作，而且对周恩来这个人，十分倾倒。后来，罗杰斯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多次来中国访问。至今还对我国人民抱着友好的感情，这些都是从对周恩来的钦佩开始的。

当天下午，尼克松趁着基辛格为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而在作准备的时候，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走进展览馆大厅，他的眼睛盯着几位共产主义领袖的大幅画像时，嘴里念道：“这是马克思，这是恩格斯，这是列宁，这是斯大林。”

“对，你都认识。”周恩来说。

“一共四个。”

“对。”

“那个恩格斯，我们在美国不大见到他的照片。”

尼克松在参观各种工业设备，他还伸手去按电钮，新式机床运转起来。

他对周恩来说：

“我们按电钮，必须是为了建设，而不是为了毁灭。”

周恩来哈哈大笑。四周的气氛十分热烈。

尼克松兴致来了，又对周恩来说：“1959年夏天，我作为副总统在莫斯科陪同赫鲁晓夫参观美国展览会，在洗衣机前，他同我争吵谁的火箭厉害些，我讲比火箭没有意义，战争爆发谁都当不了赢家。”

周恩来笑得更大声，笑罢说：“我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厨房辩论’，它使你出了名。”

尼克松笑了，说：“我想不是坏名声。”他想了想，又半开玩笑地说，“总理先生，你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你的坏话。”

周恩来收住笑，对尼克松说：“我信奉毛主席说的一句有名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下午5时，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大家就称它为“上海公报”。

此后，下午5点50分，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为给台湾方面及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以“安慰”，基辛格煞有介事地在会上申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并不变动，以表示“没有抛弃老朋友”。可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说明并没有引起记者们的兴趣；上海公报对世界的震动与冲击，使基辛格的解释黯然失色。

台对《联合公报》表示不安

尼克松访华，全球为之注目。在所有的关注者中，蒋介石最为尴尬。尽管与美国有约在先台湾不对访华恶言相加，但台湾当局的面子总不能不顾。在尼克松一行到达北京的当天台湾当局“国大”会议立即发表声明，称“戡乱”反共“国策”绝不改变，不承认中、美间任何协议，大陆中共是“叛乱集团”，无权代表中国。

由于《联合公报》中的措词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语，尽管是中国方面的立场，但这也预示着美国政府对台湾“正统”地位的否定，台湾当局非常焦急。3月6日，台湾当局指示沈剑虹会见尼克松，要求当面澄清，以消除因《联合公报》引起的不安。尼克松要沈剑虹转告蒋介石：“美国决心遵守对台湾的承诺”，其中当然也包括共同防御条约继续有效。第二天，沈剑虹飞回台北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要的就是美国总统的保证，但这种保证与以前却是大不相同了。台湾这位“蒋总统”听完汇报后，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从此以后，我们要比以前更依靠自己。”

蒋介石不敢贸然行事

蒋介石决定“与俄帝往来”。而苏联，对于台湾的基地，久已垂涎欲滴，也正趁美国调整其亚洲战略部署的机会，大肆扩张，以取美国的地位而代之。因此，蒋苏交易，本来可以一拍就成。但是蒋苏双方当时均有顾虑。特别是台湾方面，顾虑尤多。

顾虑之一：当时美国并不是真的要退出亚洲，苏美从东南亚到东北亚的

争夺正烈。即使美国中断美蒋关系，美国也不愿看到台湾成为苏联的战略基地。

顾虑之二：中国一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台湾，过去一直要美国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假若中美一旦建交，美国宣布美蒋条约废弃而蒋介石公开投苏，中华人民共和国岂能放过他？

顾虑之三：中国人民包括：台湾百姓、海外侨胞、以至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对苏联都无好感，蒋介石如一意孤行，势将引起群情汹涌，火山爆发。

因此，蒋介石左思右想，还是不敢公然行事。为了替将来公开拉拢联苏铺路，蒋介石一方面继续同苏联秘密往来，暗中发展关系；另一方面，为了不激怒美国和平息岛内舆论，蒋介石撤换了曾公开鼓吹联苏的“外交部长”周书楷。

《南华早报》的惊人报道

1973年2月17日，法新社转发了香港《南华早报》一则当天消息：

一旦美国承认北京，国民党人将把他们的一个或数个沿海岛屿，诸如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租借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作为同莫斯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换条件。

该报报道台湾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的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俄国的一些使者已经在不断地到台湾访问了。这位官员在化名到香港访问以后已于昨天离开这里。

据报道，这位人士说，这一措施将作为在紧急情况下保护台湾而不危及其稳定的一种措施。

该报刊登的一位特派记者的报道说，这还将使俄国从一切可能的角度遏制北京的战略得以实现。

这则报道说，这是前外长周书楷先生去年在国民党最高“决策者们”的同意下采取的同反北京的共产

党国家发展关系的“灵活外交”的一部分。

这位国民党的高级国防官员在香港的短期逗留期间说，如果美国在外交上承认北京，那自然而然就会使1955年美国 and 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失效，因为1972年2月的上海公报已阐明了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

他认为，美国总统顾问基辛格和北京领导人的会谈可能导致在北京和华盛顿设立非官方的贸易机构。

台“国防部”称“荒唐可笑”

《南华日报》的这则报道，在岛内外掀起了大波。为了平息舆论，台“国防部”发言人当天晚上发表声明，认为香港报纸的这则关于台湾当局将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是“荒唐可笑的”。

“国防部”发言人说：香港的《南华早报》今天说，“台湾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他最近化名到香港——对约30名立法委员说，国民党已扬言，万一美国废除安全条约，依据台湾的灵活外交，将把他们一个或更多的沿海岛屿，诸如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租给苏联，作为苏联的一个海军基地，以换取同莫斯科的互不侵犯条约。”据查，台湾没有任何高级官

员在香港对任何人说过这种话。

他说，“‘常识’是国民党中国在同北京政府的斗争中绝不会同任何共产党国家结成任何联盟。”

《北极熊何事来台峡？》

《南华早报》风波刚过，媒体又传台苏“私通”。合众国际社 1973 年 5 月 14 日自台北报道：“一支 3 到 5 艘战舰的苏俄舰队，上星期六驶过台湾海峡，显然是致力于侦察中共的海岸防卫。”

与上次不同的是，台湾官方很快证实了这一传闻。5 月 15 日，台“国防部”军事发言人李长浩证实，“苏俄军舰曾于上星期六通过台湾海峡，但其航行位置是在公海上。”

当记者要求评论这项报道时，李长浩说，“关于苏俄军舰于本月 12 日通过台湾海峡一事，我军方于事前业已获得情报，在其进入海峡期间，我有关单位曾加强戒备，严密监视，并切实掌握全盘状况，直到这些军舰在当天下午脱离台湾海峡，继续向西南方向进行为止。”

李长浩拒绝对这支舰队的企图发表任何评论。

21 日，《星岛日报》刊登了王延芝专栏的文章，题为《北极熊何事来台峡？》，摘要如下：

据电讯报道，苏舰之进入台湾海峡，事先曾经通知台北当局。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虽然我们不知其详，但这至少表示出几点意义：

- 一、莫斯科与台北当局有互通消息的途径；
- 二、莫斯科尊重台北当局对台峡的实际权限；
- 三、苏舰在台峡活动并非对台北当局敌意行为；事实上苏舰也是靠近大陆海岸行驶活动，而非靠近台湾海岸。

令人颇感兴趣的是：莫斯科给台北的通知是如何传达的？台北当局有没有答复？如果有，是怎样答复？苏联是否曾经给中国政府同样的通知？如果曾有通知，中国政府是怎样答复的？

近年苏联锐意发展海军，美国的观察家说这是“北极熊下海”。现在这头北极熊居然游入台峡了。从前有人问一位禅宗高僧：“达摩何事东来？”他答道：“并州萝卜八斤重。”现在要问：“北极熊何事入台峡？”答案会不会是：“台湾西瓜八斤重？”克里姆林宫这次行动，动机显然很复杂。就全面来说，这是耀武扬威、扩张海权的表现。苏联海军在地中海已经取得与美国第 6 舰队分庭抗礼的地位，在印度洋也是烟波纵横，目无余子。现在到台湾海峡来招摇一番，也是炫耀实力的意思。

就军事方面说，苏舰出没台峡，自然对中国沿海地区有侦察作用。虽然现代的人造卫星可以从高空搜集情报，但是沿海侦察自仍有其价值，否则不会有“普韦布洛”号那种任务。

但是无论如何，苏联海军此次行动的主要目的仍是政治方面的，克里姆林宫主人想围堵中国，已是公开的秘密。莫斯科与台湾当局之间眉来眼去，也是有迹象可寻，有理由可信的事。在美国与中国日趋“关系正常化”之时，当台湾当局在对外关系日趋孤立之际，北极熊来作一个“雪中送炭”的姿态，以求换一个八斤重的大西瓜，也未曾是不可能的。

可是，从北极游到台峡，这一包湿炭是不是能燃起来，似乎颇成问题。从

香港、台湾频频传出的有关苏联有意“染指”海峡的消息，明眼人一看便知，有人想借此制止发展中的中美关系。

“猎鲨”联合演习

尼克松访华后，美国第7舰队曾一度停止在台湾海峡游戈。但是，自传出了苏联舰队穿越海峡和台湾当局欲将一个或数个岛屿租借给苏联的新闻后不久。为了安抚台湾当局，美国又于1975年7月，与台湾当局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法新社1975年7月27日发自台北的报道称：

美国和国民党的海军7月中旬在台湾南部高雄海岸附近举行了一次代号为“猎鲨”的联合演习。

据说国防部发言人李长浩少将曾说，这次军事演习十分成功，证明两国海军合作得非常好，并且拥有出色的战斗力。

这里的消息灵通人士说，双方为这次演习出动了差不多同等数量的舰只。演习为期大约一周，一方是进攻，另一方是防守。

官方人士说，这次军事演习是两个盟国之间一次例行的军事演习，他们还说，联合军事演习是定期举行的。

两个月前，美国和台湾在台湾的中部和南部举行了一次海空救援演习。

美国人士说，虽然美国削减了它在台湾的军事力量，但是还是像过去一样在台湾举行了防备紧急情况的军事演习。

泛亚社于同日发出的一则电文称：

台国防部发言人李长浩证实了台美海军曾于当月中旬在高雄外海实施大规模联合军事作战演习，结果十分“圆满”，但军方拒绝透露详情，只称此乃例行演习。据悉：此次演习命名“猎鲨”，双方海军出动的兵

力和舰队相当庞大，演习持续达一星期之久，双方在假想的作战计划下，展示防御和攻击的能力。双方当时均未发布新闻，实则除此次海军联合作战演习外，两个月前，中美海军亦曾在台湾中南部举行联合救难演习。有关人士说：除联合演习外，依据“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所进行的军事合作项目亦陆续实施，例如中美合作制造F—5E新式战斗机的计划，正在台中空军航空发展中心顺利推动。美国第7舰队在台湾海峡亦照常巡逻。

路易斯再度赴台

维克托·路易斯自1968年10月后，又先后于1974年12月和1975年上半年二次赴台。

1975年7月15日出版的日本《现代亚洲》认为，维克托·路易斯后一次去台，表示了苏联和台湾当局的“新勾结”，“是苏联为在蒋介石死后（当时蒋已病重）的台湾进行布局，是它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使他‘独立’的阴谋的一部分。”在这之前，香港《星岛晚报》曾透露，苏“诗人”叶夫图申科，于1973年6月在香港同“台湾代表”进行过一次“不留纪录的秘密会谈”。苏联还通过它驻泰使馆人员，同盘踞在泰国北部的蒋93师残部

接触。

据日本报刊揭露，苏联从 1973 年起就加紧同日本的“台湾帮”接触，通过他们为苏蒋勾结进行搭线。日本《信使周刊》1975 年 3 月 7 日报道，苏联利用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和自民党“亲台派”的议员向蒋游说。该刊指出，佐藤年初赴台，是同他 1974 年 12 月与柯西金的会谈有关系的。苏联还曾利用 1973 年和 1974 年分别在东京和莫斯科举行“亚洲和平与安全保障”讨论会的机会，同“日华民族文化协会”的头目久住忠男、末次一郎、小谷秀二郎等人频繁接触，并邀请东京大学教授卫藤沈吉赴苏讨论“台湾问题”。《现代亚洲》认为，“苏联把纠集在‘日华民族文化协会’里的‘台湾帮’邀请到莫斯科，就是要加强接近‘台湾，的渠道”，并利用这条渠道推销它的“亚安体系”。

此外，苏联还直接或假手东欧卫星国邀请台湾地区人员前往莫斯科和东欧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应邀去莫斯科活动的有：台湾《中国时报》连载“历史小说”的作者马彬（笔名南宫博）、香港“工团总会”英文秘书梁某、居港“红学家”潘重规，以及一些旅美的亲蒋分子。前往东欧的则有台湾“国际经合会副主任”费骅、旅美“物理学家”杨伯先、居港“报人”卜少夫等人。苏还通过“港澳区立法委员”徐亨等人在港拉拢一些人赴苏“旅游”。

香港《星岛晚报》1975 年 6 月 29 日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苏联向国府送秋波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能借用在台湾的海军基地。”

台不断放出媚苏言论

在台湾当局方面，自 1974 年 11 月底美国总统福特将于 1975 年访华的公告发表后，再一次放出媚苏言论。1974 年 12 月 13 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航空版刊登美国新奥尔良南方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郭定五的文章，叫嚷“为冲破孤立，开创新局，中华民国与中共的敌人苏俄间的谈判接触”“机会较大”，“不妨加以充分的利用”。1975 年 1 月，该报又为潘重规赴苏活动后写的《列宁格勒十日记》一书刊登广告，为该书的出版进行宣传。《自立晚报》7 月 28 日则以报道“欧洲华侨和留学生”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为名主张“运用更大弹性的外交，‘变敌人的敌人我们的朋友’”。在美国出版的刊物《东潮》杂志，1975 年 1 月在《中美断交之后》一文中，鼓吹“台湾未来新外交的一个新原则便是对东欧及苏俄诸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突破”。

1975 年，台北出版的《新时代》月刊 5 月号，出了一个《敬悼蒋公专辑》，发表了许多鼓吹“格遵蒋公遗训”的文章，整本杂志从封面到内页都披“黑”带孝，但其中赫然有一篇论及台湾“外交”的文章，却一反“蒋公遗训”，文曰：

我们应采多元化的外交，弹性的外交，而不可集中于中美的外交。美国虽仍表示维持对我关系，信守对我条约的承诺，但同时又致力于美匪（按：指中国）关系正常化！……对于美国国内的这股暗流，我们应未雨绸缪。我国的国策是光复大陆、消灭共产政权。在不违背此一国策前提下，为增强反共复国的实力，外交政策上适度的调整，策略上机动的运用，以适应变动中的国际政治，似无不可。

该文题为《美苏毛三角关系与美国的亚洲盟邦》，作者周煦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提到苏联或苏俄或俄国或俄帝，却是呼之欲出，全段文字就是鼓吹同苏往来。在台北报刊的字典中，“多元外交”、“弹性外交”者，即突破僵硬的原则而同苏联打交道之谓也。

7月1日，台湾《联合报》报道了蒋经国6月下旬在台湾“国军检讨会”中讲话的消息，蒋经国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反共政策绝不动摇，有两扇门将永远关闭，即“绝不与中共和谈，绝不与俄帝来往”。但就在7月下旬，台湾《自立晚报》一连发表了两篇力主实行“弹性外交”的文章，作者均为该报记者林幸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把“弹性外交”的对手苏联的名点出来了。7月24日林幸一的文章有这几段：

我们目前的国际环境，非常险恶，毛共（按：指中共）处心积虑地在利用我们外交的弱点，打击我们。

处此变局之中，万事莫如外交急，而当今外交亟应采取更大的弹性，不宜再一味强调“不变”，否则只有使我在国际社会益形窘迫与孤立。

关于敌友关系方面，我国政策殊难适应。中共之友国多与我为敌，而我之友国并不以中共为敌，毛共最大的敌人是苏联集团，而我国亦视苏联集团为敌人，此一局势对我国十分不利。

我们似不宜再将共产主义与共产国家人民混为一谈。亦即我们反对毛共与共产主义为一回事，是否仇视所有共产国家及其人民为另一回事。

今日亲苏联集团者皆仇视毛共，亲毛共者亦反对苏联，我们今天对外宣传与外交策略，似无需再将毛共与苏联划为一体敌人，因为此种宣传并无损于敌人，也无利于我们。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立法委员张九如的一句话。张九如在年前亦曾建议政府，对于当前外交，宜机警肆应，采取弹性。他说，我们在光复大陆，确保世界和平的奋斗过程中，宜“不以国体政治之异同及历史之关系而有所迎拒。”他说，“当前莫急于确能利用机势，变敌之敌为我之友。”

《自立晚报》在7月24日发表了该文后，似乎意犹未尽，在7月28日又发表了林幸一的另一篇文章，再谈“弹性外交”之调：“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国际朋友，运用更大弹性外交，‘变敌人的敌人为我们的朋友’，以突破中共阴谋，开创外交关系新境界。”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重新重用因鼓吹“与魔鬼拥抱”而下台的周书楷，台湾《中国报道》杂志在6月中旬的一期刊载的《周书楷很有个性》一文说：“前外交部长、现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周书楷，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物。……周氏近年来，甚得蒋院长垂青，参与机要。”看来周书楷已实际上成为蒋经国的首席顾问。很难想象这位顾问的“锦囊”中没有投靠苏修这条“妙计”。

此外，台还释放曾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法新社华裔记者袁锦涛，同时再次放出与苏联开展贸易的空气。《南华早报》7月21日援引“可靠消息”报道说，根据这项“弹性贸易政策”，“台湾可能考虑同苏联集团中任何国家建立贸易关系的可能性。”

苏联对台湾当局的拉拢活动，暴露了它急于同台湾当局勾结，染指台湾的狼子野心。但由于台湾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还不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美国也不会马上放弃台湾；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也需要一段时间来稳定局

面，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内部在对与苏勾结的问题上也有阻力。“立法委员”胡秋原主办的《中华》杂志1975年初就曾公开抨击“联俄”是“幻想”，“必然自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蒋经国鼓吹要加强“弹性外交”，但还不敢打破台湾现状，铤而走险，公开与苏联勾结。于是媒介有这样的评论：“台湾当时放出的媚苏言论和所作姿态，同它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后动作是出于同一个动机，主要是害怕被美国抛弃，企图以此要挟美国，阻挠福特访华。”正如《中央日报》文章鼓吹的那样，主要是想达到所谓“以夷制夷”的目的。然而，苏联正是利用台湾这种投机心理和蒋美关系中出现的矛盾，加紧它的活动，而台湾为了自身利益和需要，也不会放弃和苏联的暗中勾结。因此，日后的苏蒋关系特别是苏联的动向，一直表现得十分微妙。

蒋介石“至死未渝”其志

蒋介石很想回溪口、回南京，但他无法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这是他的悲剧。美国人协助他在台湾整军经武，就是不让他“反攻大陆”；美国人默许他软禁亲美的孙立人、驱逐吴国桢、逮捕雷震，就是不让他“收复失土”；美国人同意他占有金门、马祖，就是不让他登陆闽浙沿海。

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纽约时报》说他是一个“至死未渝其志的人”；就像沈葆楨挽郑成功一样，蒋介石未能“还我河山”的“缺憾”，只能“还诸天地”了！

第四章

区区小岛，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长期以来，台湾当局不惜血本购置军火。
它在卧薪尝胆吗？老虎发出了伤人的信号

第一节 “反攻”主旋律下的军备

令人瞩目的军费比率

当今世界，美国早已是名副其实的军事大国，它的军费开支数额使其他国家望尘莫及。苏联解体后，英、法、德、日等国纷纷增加军费开支，以填补苏联留下的空缺。地处阿拉伯国家“夹缝”中的以色列，虽是地理上的小国却是军事上的大国。但以上这些国家，每年的国防开支占财政总预算的比例高达20—30%。

然而，当人们把目光聚集在美国、欧洲、中东、伊拉克的时候，却忽视了西太平洋一个面积仅为3.6万平方公里的岛屿——台湾。

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从那时起他就执著地追求“反攻”压倒一切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从50年代一直演奏至今。

1994年6月15日，台湾《自由时报》报道：

行政院主计处昨日指出，我国国防支出占中央政府支出去年度为26.71%，虽仍超越所有已开发国家，但此一比例已逐年缩减。至84年度此一比例已低于23%，惟与世界各国比较，仍属偏高。

主计处在《各国中央政府收支及债务概况》研究中指出，1993年我国国防支出经费占当年度总支出达26.71%，除较美国的20.51%为高外，也高于所有已开发国家。由主计处资料显示，我国此一比率也高于若干国情与我相似的国家，如以色列与南韩在1992年国防经费支出占该国中央政府支出比率亦仅分别为20.37%及19.93%，显见我国国防经费支出确仍属偏高；不过主计处官员强调，南韩比率较我国为低实为拜美国协防之赐，否则应与我在伯仲之间。

主计处官员表示，我国国防支出比率虽然仍属偏高，但已较1990年的35.83%大幅降低了近13个百分点。他强调，国防支出在78年及79年的成长率分别高达17.2%及12.3%，惟自80年以来不但成长幅度逐年趋缓，甚至在83年度更呈2.54%的负成长，而甫通过立院审查的84年度国防预算亦较上年减少2.04%以上。主计处官员表示，我国国防预算囿于国

情始终居高不下，不过近5年来已有减缓的趋势。

1996年1月27日，台湾“行政院”召开预算平衡会，决定199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规模是12340亿元，较上年度增长9.6%。其中“国防”预算增长幅度最大，台“行政院”官员说：“国防预算的大幅度成长，主要是用在提升战力上。今年度（1996年）‘国防’预算编列了2523亿元，下年度的‘国防’预算编列为2800亿元，成长12%，主要用途除了提升战力外，还包括一般性和经常性支出，以及陆军购买坦克等军备。”

台湾军费神秘流程

如此庞大的军费如何开销，台湾当局对此一直秘而不宣。1994年台湾《财讯》9月号刊登孔昭奇的一篇报道，揭开了台湾军费的神秘流程：

监察委员康宁祥近来针对军事采购曾有一番较深入的调查，并获得相当程度的“成

果”，其中对敏感的军购经费存放与管理内幕，也多有触及，可惜媒体报道甚少，使国人失去一窥军费革息流向的机会。广东、中美银行角色吃重，央行充当国防部“人头”。现根据康宁祥的调查报告全文（含内容精彩的附件），披露军购经费存放管理的主要内情。

世界各国向美国采购武器装备、军用物资，依据美方规定，应于一季前预付军售价款，再由美国按实际交货状况，分月支付美国三军或军火商，其未支付部分则由美方控存，不付利息（我国曾多年“享受”此一不公待遇）。后来超级买主沙特阿拉伯要求美国发还“控存款利息”之事曝光，我国国防部驻美采勤团国防采购组要求比照办理，美国原则同意，但因涉及美国本身利益，不愿他国跟进，除要求我方严守秘密外，并要求经管我国军购经费的国外代理银行依规定设置专户，理革息事宜。这就是我国军购孳息起源。至于革息收入作业流程中，两家神秘的广东银行、中美银行扮演相当重要角色。国军各申购单位，依美军售发价书规定，经由联勤总部综合财务处与国内汇银汇拨作业，将军售款汇至美国中美、广东银行的国防部驻美采购组购案款帐户，国来组再依发价书所订付款时程及金额，并参考军售案执行进度，将应付款项汇至美军安全援助帐务中心设在丹佛中央银行的我国军售款专户。民国 69 年，美军对因付款时差而未动用的我军购款，可汇至一专门帐户孳息，美军帐务中心即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签订“有关台湾出资之外国军售双方合约”，合意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开立“中华民国外国军售证券投资基金帐户”，即军售孳息帐户。由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业务往来对象权限各国中央银行及国际金融机构，国防部乃商得时任央行总裁俞国华同意，由央行权充国防部“人头”，以央行名义出具同意书，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办理有关事宜；不过，央行虽愿当“人头”，但俞国华仍要求军方将“投资所得外汇收益”按年函送央行备查，军方后来有无“申报财产”及收益详情如何，至今仍是一个谜。然而美军帐务中心倒是依规定，将我国军购经费的未付尾款，汇拨至央行的联邦储备银行军售孳息帐户，并将孳息按月汇至中美银行国采组帐户。至于军方的“商购案”孳息收入作业流程，与军购案类似，中美银行、广东银行、中国商银也是“三分天下”，扮演吃重角色，例如陆军、空军及中科院是中美银行客户；海军、联勤总部是广东银行客户；军方安翔计划则是中国商银客户。

据调查，除了革息收入，驻美国采组经费及收入，也都存放上述三家银行（其实只有两家，因中美银行为中国商银掌控）。到底这几家银行因何魅力能长年承包军费独门生意，不但国人纳闷，监察院也亟欲了解真相。由于事涉敏感及外界议论纷纷，李登辉总统曾在去年 7 月 13 日的一次军事会谈中，希望“行政院纳编相关人员成立管理小组妥为处理运用，以免遭致外界攻讦”。国防部长孙震乃根据指示，在去年 8 月邀集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等单位，举行“国防部国外采购经费管理协调会”，获致五项重要决议：一、国外采购孳息款应依法纳入预算程序办理（按：等于承认以往孳息款未依法动支，原因为“保密”）。二、采勤团采购经费待支数，以维持该团采购任务运作最低必要之数额为原则。三、国防部在美采购经费存放银行应依国库法第八条规定研处（按：显示以往有游走法律边缘之嫌）。四、采勤团待支经费因孳息报缴，将持续降低，不宜再设超部会管理小组，以便责任明确。决议第三项因为可能涉及若干“既得利益”、央行业务及军方秘密，行政院秘书长李厚高特致函国防部，要求和央行等单位“再加研酌报核”，果然在前央行总裁谢森中等人一阵“研酌”之下，仍主张维持旧制。换言之，中美银行、广东银行、中国商银仍可继续“三分天下”，处理军费革息有关业务。谢森中的理由有两大点：

一、国防经费大都属机密性质，央行若指定代库保管，该代库基于保密原则，势必无法根据国库法、国库出纳会计制度等规定，按期提供报表或作实地考核，俾便央行国库局控管。

二、目前纽约地区虽有数家本国银行，惟其中多属初创阶段，分行规模不大，且多不符合央行“每一支库服务对象至少包括两个中央政府机关”规定，加以上述因保密所致监控上之困难，央行目前尚难指定该地区之代库。

监委康宁祥对谢森中看法颇不以为然，康宁祥认为军费孳息款于75年自动解密，且国防部召开协调会时也承认“现既已解密”，并愿依法处理军费有关事宜，倒是谢森中还在“戒严时代”，坚持旧制，令人不解。康宁祥表示，国防经费在国家民主化后，更应迈向制度化、公开化之境，断无再借“机密”以规避法制规范之理。且国内银行在美国设立分行者多达16家次，分布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西雅图、矽谷等地，而央行所谓“每一支库服务对象至少包括两个中央政府机关”，只是央行内部作业规定，应可随事实需要调整，因此央行顾虑的“保密原则”及“纽约地区无适当银行”并不存在，央行实应依国库法规定，主动负责指定当地本国银行代理国库的责任，不可再任令公款存管于非属本国银行之广东、中美银行！至于央行权充国防部在美“人头”案，康宁祥认为虽是当时基于军事安全及政经因素考量，但目前形势有变，且“人头

帐户”内的资金，非属中央银行外汇存底资金，无法列入央行资产负债表列管，国防部与央行不应再便宜行事，应及早找寻彻底解决方法，才对得起全体老百姓。

一个买来的武器装备“现代化”

“速达成效，买来一个武器装备现代化”，一个时期以来一直是台湾军的座右铭。80年代初宋长志任“国防部长”时，就大力提倡“武器装备能买多少就算多少，只要对建军备战有益处，即可花大代价全数买回。”

钱多腰粗，一副“大款”的派头。

由于生产能力与客观条件的制约，台湾的大型军事装备均依赖进口。一架性能优良的战斗机数千万美元，一艘先进的大型战舰则上亿美无。台湾军方不惜血本购置从枪械配件到作战舰只的各种武器装备。小小台湾，成了世界军火需求的大户。

80年代是台湾购买军火的“旺季”，美国是台湾最大的军火贸易伙伴。台湾先后在美国购买了3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各类装甲车辆、F—104型战斗机、改良F—5E型战斗机、基林级驱逐舰、标准型艇载防空对地导弹、S—70型直升机、CH—47型直升机、C—130H型运输机、雷达警报器、电子干扰机以及白麻雀型空对空导弹、M60型坦克和改良S2型反潜机的电子装备等。

花5亿美元向荷兰购买了“海龙号”、“海虎号”两艘常规潜艇。

另向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瑞典等西方国家购买了数亿美元的武器配件。

进入90年代，这一势头更盛。

1992年9月2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为了多得选票，在得克萨斯州的通用动力公司宣布，他已批准该公司向台湾出售价值60亿美元的共150架F—16型战斗机。这是美、台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火交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11月18日从法国巴黎传出消息，法国政府已批准达骚公司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2000型战斗机和1000枚导弹，这笔交易价值达26亿多美元，几乎等于35万台湾人一年的生产毛额（以每人年7500美元计）。那些辛苦挣钱、诚实纳税的台湾老百姓们只有在阅兵式上，才能瞻仰一下这些“高科技结晶”的风采。

1995年1月14日，台湾《中国时报》在题为“三军二代武器装备采购和规划就绪”一文中指出：

据透露，陆军向美国采购的M60A3战车首批20辆，预计今年4月返国成军；空军向美国租借的T38教练机首批20架现已在美装船，预计下个月中旬抵台。据了解，为配合国军10年兵力整建案，三军的二代武器装备采购和规划已大致就绪。军方估计，相关军事采购投资如果均能顺利执行，预算总金额将逾新台币一万亿元；若以10年时程分配预算，每年军事投资约1000亿元。

据了解，目前三军已执行的重大采购案，包括F16战机、幻影战机、拉斐特舰、派里舰等，进度均颇顺利。惟部分采购案基于国防预算额度及中央政府总预算分配的限制，已略有调整。

在海军部分，二代武器采购主要为潜舰、二代一级舰和二代二级舰。二代一级舰包括派里舰、拉斐特舰和向美租借的诺克斯舰。据指出，诺克斯后续三艘租借进度相当顺利，预计下半年返国；派里舰（中船建造）的第八艘，原预订采购美国的“小神盾”战斗系统，因经费昂贵，参谋本部近日已取消建案；拉斐特舰的战斗系统，则由向美采购改为向法采购。

至于规划中的潜舰采购，据指出，因多年来制造传统潜舰的美国已同意重开生产线出售潜舰给埃及，海军正积极争取获得；此外，法国和德国也是接触对象。二代二级舰由于预算高，且优先顺序不若潜舰，未来能否顺利建案，尚待观察。

在陆军部分，据了解，向美租借的M60A3战车进度执行顺利；向美采购的武装直升机和战搜直升机，第二批已于上个月返国；M48H战车量产已完成，惟妥善率不高；根据陆军呈报参谋本部的资料，M48H妥善率仅50%。

据指出，陆军未来计划采购无人飞机，担任军团侦察任务；同时有意采购法国“西北风”飞弹，做为野战部队的低空防卫武器。据了解，陆军也有意采购美国M8轻战车，但因每辆单价超过新台币2亿元，陆军决定在该型战车大量生产，价格压低后，才进场采购。

在空军部分，据了解，向美采购的4架预警机，1994年已陆续在美交机，现在进行航电系统的装配和测试，首架预警机将于9月返国成军；向美租借的T38

教练机，预计下个月中旬返国。

至于F16和幻影战机的生产进度，据指出，F16交机会较密集，幻影交机时程较长，目前进度“没落后也没超前”。甫成军的IDF战机，同时兼负战备和训练的任务，故每天巡弋的航次，不若F5多。空军现有34架IDF战机。

如今，要把台湾三军武器装备集中起来，足可以办一个“万国武器博览会”了。

台湾三军实力

小岛养大军。台湾这支庞大的军队，实力不可以抵估，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可以毫无愧色地排列在世界几个军事大国之后而位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前。

台湾海军现有兵力6.8万人，各类舰艇570多艘，围绕“制海”总目标，朝着“舰艇导弹化、指挥自动化、反潜立体化”方向发展，具体步骤是“提升扫雷战力，整建战略渔港，强化反封锁能力，精进制海战力”。海军1994

年4月拟订《海军报告书》，计划在2001年前完成战力的全面更新。海空军1995年首次进行战略部署调整，把加强三军防空、反潜、反登陆作战能力作为三军联合作战最高指导原则。海军在实行反封锁、争取制海权、确保台岛安全方针下把反潜重点放在东岸，从1995年初开始按照取消军区、扩编舰队的原则进行第7次整编，计划到本世纪末拥有8大舰队，并于9月1日成立号称“第7舰队”的168艘巡防舰队，部署在东部海域。

空军现有兵力6.8万人，各类战机680多架，围绕“制空”的基本战略，实行“精实取胜”的作战原则。位于东部花莲的总投资18亿美元的“佳山计划”工程已于1991年竣工并投入使用，发挥“保存战略于地下，发挥战力于空中”的作用。经过8年研制，空军“强网计划”自动化防空系统1994年8月正式担任战略任务；为加强对中共进行“全方位”的监控，成立了电子作战部队，并组建“空军电子作战暨空运联队”，空军从今年开始，改变各联队只驻守单一机种的部署，采用混合编组方式，以增强与中共争夺制空权的能力。

陆军现有兵力24万人，拥有坦克、装甲车2600多辆，火炮1400多门，导弹800多枚，建军方向是“立体化、机械化、电子化、自动化”。1994年，陆军航空兵成立第一个“战斗直升机与战搜直升机中队”，着手筹设“快速反应作战司令部”，研制出“反快速反应部队”战法。

第二节 活跃的“军事外交”

台美军事交往穿梭不停

近年来，台湾当局和美国“最热门的军事关系”是商谈台湾反导弹系统的建立。据台报报道，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洛德 1995 年 11 月 9 日表示，华盛顿有关部门正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域试射导弹一事，“检讨台海安全的平衡，而且是否再售予台湾更先进的导弹防卫系统，也将纳入检讨”。洛德指出：“更先进的导弹防卫系统”，就是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台湾当局决策官员证实，台将要求美国评估台湾参与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可能性，并曾邀请辞职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赴台说明美国 TMD 发展状况。此外，台湾当局还悄悄派相关将领前往美国“探路”。

每年例行的台美“军售会议”，是台军方将领赴美活动的大好时机。1996 年初，去美访问的就有台军“参谋本部”联二情报参谋次长黄荣德和联三作战参谋次长执行官帅化民等。他们向美国说明台湾军备需要，以“有助美国建立台海发生危机时反应模式”。

台湾副“总统”李元簇赴危地马拉出席该国新任总统就职仪式期间，通过沙特阿拉伯向美国购买以“爱国者”导弹为主的一笔价值 60 亿美元的军火。据透露，这笔生意是美国背后指使，由沙特阿拉伯国王的儿子出面与李元簇商谈。这是因为美国因中国抗议，已答应不直接向台湾出售军火，便改变手法通过沙特将武器转卖给台湾。

台湾 1994 年从美国订购的 160 辆 M60A3 型坦克，首批 20 辆 1996 年初运抵台湾。“中央社”说，M60A3 型坦克将成为今后台湾的主战坦克，对提高台陆军的快速机动能力有“莫大助益”。

美国会准备立法，提高对台军售等级。“中央社”1996 年 1 月 16 日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正准备立法，以提高对台军售等级，包括对抗海上封锁的柴油潜艇。据透露，1995 年 12 月台湾官员访美就武器交易问题与共和党领导人进行了磋商，共和党开始认真检讨提高对台军售等级的法案。据推测，台湾要求优先提供的武器包括柴油潜艇、鱼叉导弹、P3 猎户星座警戒机、目标 120 型中距离空对空导弹和刺针导弹等。

台与欧洲军事关系新动向

台湾《中国时报》1996 年 1 月 15 日报道，台、法目前秘密签署一项“整体后勤支援协定”。台报说，台向法采购的幻影战机、拉法叶舰等军事装备，合约金款超过台币 2000 亿元。为保证日后的后勤维修，台军方希望“比照美国政府对台军售”建立一套制度，因而频频与法磋商。台、法签署“整体后勤支援协定”，是双方军售迈向制度化的第一步。台报还说，台军方决策当局已决定采购法国西北风导弹，双方正最后议价。

台《民众日报》1996 年 1 月 11 日报道，台军方权威消息透露，欧洲重要军火外销国荷兰三军参谋总长日前专程赴台进行秘密访问及参观军事设施。此外，欧洲还有两个国家的军事首脑将访台。台报宣传外国将领密集访台，除表明台湾在军事外交上颇有进展外，台湾“军事上强大的实力及全球

排名前 5 名的对外军购能力”是否已成为国际军事大国决策首脑争相拉拢往来的对象，颇受瞩目。

台图谋在东南亚国家寻求军事伙伴

据台报报道，台军方针对亚洲邻近国家发展“亚太区域安全体系”获得重大进展，最近在东南亚国家寻求成为军事合作伙伴对象的计划有“重大突破”，其中包括：

一、新加坡空军参谋长吴永祥 1996 年 1 月 8 日秘密访台，宣传台、新之间的“坚定友谊还是会存在的”。

二、台洽租菲律宾空域案“似有转机”：台湾《联合报》1996 年 1 月 15 日报道，两年前台就探寻菲方出租空域供台训练飞行员，并表达可以向菲再提供战机。但菲方“迫于中共外交压力”及若干内部因素而婉拒。

1996 年 1 月台“空军司令”黄显荣率团访菲。台报说，黄显荣秘密访菲，加上菲同意接收两架台空军汰除的 F5B 战机，显示台湾洽租菲律宾空域案‘似有转机’。台“国防部”一位官员评论说，菲国态度转变，可能是最近菲与中共因为南海问题矛盾加深，有意牵制中共。

另据法新社报道，台空军已同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和美国进行联系，寻求向外国租空军基地用以训练飞行员，其中美国是首选。

三、台《民众日报》1996 年 1 月 20 日报道，印尼总统苏哈托可能赴台寻求军事合作。报道说，印尼方面近期（可能在 3 月前后）将有重要将领及首长，其中包括苏哈托以“私人度假方式”访台，可能将有台、印尼双方商业及军事方面的合作计划进行讨论。有关苏哈托将访台一事，目前在印尼侨界及军情机构已有传闻。

第三节 老虎并没有睡着

以大陆为“最大假想敌”

李登辉主政以后，出于岛内政治发展和与我抗争的需要，反复宣称中共仍是台湾“最大的敌人”，尤其是在1991年5月台湾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以后，李登辉等鼓吹大力加强“国防”建设，确保台湾安全。为此，台湾根据“国统纲领”，确定在军事上继续坚持“反共保台”，提升台湾军队整体防卫能力的方针。按照李登辉关于建立“吓阻战略”的建军指导思想，台湾在1992年2月17日公布的第一部《国防报告书》中，以大陆为主要“假想敌”，主张建立精锐的武装力量，阻止中共以武力统一台湾。台湾军事发展战略也从奉行多年的“制空、制海、反登陆”调整为“反封锁”，依据“战略持久，战术速决”的指导原则，确定“加强制海反登陆和以海制海为重心，突破敌人孤立封锁”的防卫方针。1994年3月23日，台湾又公布了第二部《国防报告书》，继续以大陆为主要作战对象，表示“最严重和最直接的威胁当推中共的武力进犯”，指出现阶段台湾建军已从“攻守一体”调整为“守势防卫”，在作战指导原则上强调掌握制空权、制海权，在战术上重视提高快速反应和反击能力。确立了“减少人力、增加火力、提升战力和机动力”的新国防政策，并按照“精简常备，广储后备”的原则，加强后备役建设。1995年6月，李登辉在视察“昆仑二号”演习时叫嚣“可以百年没有战争，不可一日没有战备”，“国防部长”蒋仲苓甚至表示，即使两岸关系改善，台湾也不缩减战力。

军队朝着“军队国家化”

“军队国家化”和“本土化”是“宪政改革”对军队的必然结果。李登辉始终坚持“军队国家化”，他在推行“宪政改革”的过程中，通过对200多名高级将领进行调整，大力扶植提拔台籍将领，扼制大陆籍将领等方式，从制度上消灭“军事强人”，削除郝柏村在军中的势力和影响，进而实现对军队的控制，加速“军队国家化”进程。在民进党等在野势力的冲击和社会功利价值观的侵蚀下，军队的作用也日趋萎缩，已从以往的卡政者沦为单纯的政治工具，由“党军”逐步转变成“国军”，只负责有关“国防”事务，而军队事务也趋于公开化、透明化。目前，台湾军中台籍士兵占军队总数的90%，基层军官占70%左右，中级军官占50%左右，台籍将领占20%左右，“本土化”已成定局，并加快“军队国家化”的进程。

军事演习频仍

1995年以来，台湾军队进行军事演习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武器之精良，均是前所未有的。今年1月28日，台海军展开为期3天代号“海鲨行动”的反潜战演习，其主要目的“在训练舰艇官兵对潜舰的处置及对水面舰艇的作战能力”。2月初在台湾南部屏东县举行两次实弹军事演习，第一场发射大炮和坦克炮火，第二场是实弹演练台制的步枪和大炮。台“国防部”称，这次演习“旨在训练军方的作战能力，显示台湾制武器的火力”。而台海军

于2月6日在花莲外海又进行一次“战斗巡弋”操演，“意在展示海军二代兵力优异的反潜和防空能力”。外电援引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的话说，举行这次演习“目的是让居民对武装训练队的防御能力抱有‘信心’。还有一些演习，由于台湾当局‘低调处理’，未作披露。

另据报道，今年5月台湾还将举行“汉光12号”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将由陆军主办，“以本岛地面防卫作为演训重点”，军方近期内作出的军事部署及战术调整将在这次演习中“验证”。

老虎发出了伤人的信号

上述情况表明，台湾当局在现阶段没有与我结束敌对状态的打算。李登辉在最近发表的讲话中，建议研究成立亚太集体安全体系的可行性，并声称“巩固国防”是当前6项工作之一，表示台湾有防卫的充分准备。可见，今后一段时期，台为达到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谋求“独立国际法人地位”，维持两岸“分裂分治”现状的政治目的，必然会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与我进行长期抗衡。台湾扩充军备的主要趋势：一是着手实施有限度“吓阻战略”。二是落实未来10年的建军计划，在“制空、制海、反登陆”的基本原则下继续加强海空军建设。三是继续加快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同时争取向国际市场推销军火，扩大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利用这些军事合作达到牵制于我的目的。四是继续全力推动“军队国家化”和“本土化”的进程。

显然，台湾扩充军事力量，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使海峡两岸的敌对状态升级，在增强与大陆抗衡的同时，客观上增大了海峡两岸分离的因素，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老虎发出了伤人的信号，我们必须注意它。

